

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下册

傅国涌 著

東方出版社





本书将从辛亥革命的表象逐渐深入到它的内层，重新解读百年前的那场大变局。从武昌枪响到清帝退位，大江南北，从各省封疆大吏到王公大臣分别作出了怎样的选择？本书通过大量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以史家的冷静之笔将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心态、表现一一呈现，没有任何遮掩，也没有任何美化或丑化，在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在王朝落幕时的真实面孔。辛亥革命最终以和谈的方式完成了民国的『创世记』，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南北双方财政的困境，正是缺钱逼使双方走向对话、妥协，并以民国结束了帝国，这是以往常常被忽略的一点。在辛亥大潮中，不仅那些创造历史的大人物一一登场，其中还闪现着许多初次亮相的少年学子的身影，他们中既有后来的名将白崇禧、张治中、万耀煌们，也有知识分子叶圣陶、萨孟武、顾颉刚、吴宓们，他们一起推开或见证了民国的那扇门。



百年辛亥

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下册

傅国涌 著

東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姚　恋
责任编辑：李　葳
封面设计：万有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下册 / 傅国涌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ISBN 978-7-5060-4282-6

Ⅰ.①百…　①Ⅱ.傅…　①辛亥革命—研究　Ⅳ.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2351 号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BAI NIAN XINHAI：QINLIZHE DE SIREN JILU
傅国涌　著

出版发行：東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174355
印　　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354 千字
印　　张：23.75
书　　号：ISBN　978-7-5060-4282-6
定　　价：42.80 元

引　言

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教科书的普及，年复一年的纪念，大量的革命记忆，几乎都是单向度的革命视角，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而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我个人更希望看到革命发生时的社会心态。当革命来临之际，那些掌握社会优势资源、不愿看到革命发生的集团、个人是如何反应，如何面对的？王公亲贵特别是最高统治者隆裕太后怎样一步步作出选择，她的选择带来的正面效应该如何认识？革命在不同的社会力量当中如何激起回响？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碰撞、博弈又怎样影响了革命的结果？他们的共识是如何达成的？革命在哪些层面达到了确实的目标？

这些问号，以往的历史书或者没有回答，或者回答得不够清楚。百年之后，我之所以要重建辛亥叙事，就是想真正逼近现场，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一看那场不同于王朝更迭、原地踏步的历史巨变。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所在，在基本史实都不够完整的前提下，我们做出的任何历史解释往往是不可靠的。我们以往在看历史时，常常是先有了观点，而且这个观点是固定、不可动摇的，然后再寻找史料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与此相悖的史料则被毫不留情地舍弃了。

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裹着他们的心跳，那些可以触摸的细节，尤其具有现场感。

我曾说，在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双眼睛，他们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体察到了历史的脉络是如何展开的。这些眼睛既包括了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了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这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包括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他们留下的私下记录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面貌，体会当时社会的脉动。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蘅、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到最后，“京朝达官纷纷奏请开缺，可耻哉！安乐则麇集，患难则兽散。”恽毓鼎在日记中不无悲愤。①

这背后是不可阻挡的人心思变，这是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而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推背图》、《烧饼歌》这些神秘预言书的流行，星象预警，特别是一而再的水灾导致的粮荒，大米价格的失控，加剧了人心的瓦解。清朝去势矣。最终冲垮清朝的乃是时也势也，而不是革命党人的谋划和武力，时势的后面是人心的变化，正是人心恐慌，武昌起事引发了各地的挤兑潮、逃难潮，许多亲历者在日记中记下了大量的细节，谣言的四处流传，城里人逃往乡下，乡下人逃进城，最先逃跑的则是王公亲贵、官员们。天津、上海租

界的人满为患，金融的恐慌、银行的倒闭……他们目睹了时代的激变，深味乱世的恐惧，渴望安全，渴望和平和秩序。

许多在华的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见证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他们在日记、书信和报告中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间谍宗方小太郎、公司职员内田顾一、传教士计约翰、记者莫理循的日记，大量外交官、海关人员之间的书信往来，让我们看到革命是怎样展开、一个王朝是怎样垮塌的，更让我们看到外国人在这场革命中选择的立场，他们大致上保持了中立，而不是支持朝廷。即使日本有意干预中国内政，试图影响这场革命，也因英国的反对而没有采取有力行动。革命最终以妥协告终，就与列强中立有关，正是列强拒绝给南北双方借款，南北财政几乎面临相同的困境，才导致对话成功，达成逼清廷退位、共建民国的共识。

如果说那时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大量信、电掺杂了本国政治利益的成分，那么一个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儒勒·乐和甘的家书透露的完全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1911 年 11 月 19 日，他在成都领事馆给母亲写信说：

>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②

在他们眼中，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崭新的共和制，却并没有在最广大的底层中国人中引起热烈的回响。这与鲁迅等本国人的观察是吻合的。辛亥革命带来的变化，表面上可以感知的就是剪辫、易帜、改历。五色旗在那场革命中的胜出具有标志性，过去的许多史书对此都没有说清，孙中山的表达也不确切，1912 年 1 月 12 日，他在给临时参议会的信中说，“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③史家张玉法的《中华民国史稿》也说：“武昌革命爆发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等省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江、浙、皖及其他各省多用五色旗”。④其实，江浙一带独立都是采用白旗，十八星旗主要在湖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主要在广东，

其他省很少采用。正是各省旗帜不一，南方临时政府出现前，各方经讨论通过以五色旗为国旗，此时南京已克复，五色旗从一开始即不是地域性的。就这面旗帜的象征意义来说，更具包容性，与剪辫、改历一样，南北对五色旗也具有高度共识。正是这些最低限度的共识，降低了流血的代价，以较小的社会震荡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从这些具体而微却至关重要的变化中，历史推开了另一扇门。

在起伏不定的浪涛中，被一个浪头卷入或被浪花溅过的普通青年、少年乃至儿童，不仅有蒋介石、毛泽东、李宗仁、张治中、白崇禧、黄绍竑、陈铭枢、蒋光鼐、顾维钧这些领袖、名将、外交家，更多在文艺、学术等领域各领风骚的人，如鲁迅、胡适、茅盾、郁达夫、徐志摩、顾颉刚、叶圣陶、吴宓、左舜生、王云五、陈布雷、吴虞、赵景深、黄药眠……他们都已从这里起步，这场革命给他们一生的影响有多大多深已无法测度。他们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至今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度。叶圣陶、吴宓、胡适、徐志摩、吴虞以及陆澹如、朱峙三等人留下了或完整或零星的日记，更多的人留下了回忆或当时的文字，他们都是辛亥之子，虽然他们不是那幕历史的主角或配角，他们只是群角或观众，但是他们的视角同样不可替代，那是大时代中一双双怀着不同梦想的眼睛，他们各自的见证丰富了历史。当我在百年前的辛亥大变局中，在密集的人流之中陆续看见他们的背影，他禁不住想，历史原来就是这样。

本书分上、下册，共九篇，从“人心思变”到“创立民国”，通过大量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借助密密麻麻的真实细节，力图靠近历史的现场，复原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图景，回到当时的历史中。我的努力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唯有请读完此书的读者来做判断。

傅国涌

2011年6月2日

【注释】

① 1912年1月17日，《恽毓鼎澄斋日记》(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71页。

② [法] 博里斯·马尔坦，张宇凌译：《是在中国，给你写信儒勒·乐和甘——中华帝国混乱年代期间法国驻华领事》，岳麓书社2005年，第81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18页。

④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35页。

目　录

第五篇　朝廷内外

一、瑞澂弃城

失守疆臣首瑞澂，咸将澂字误称征。倘然不是休征验，翻戏何能一品膺。

——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

据湖广总督瑞澂的夫人廖克玉口述：1911 年 10 月 10 日晚上兵变消息传进总督衙门时，瑞澂与张彪、张梅生等人商量。张梅生主张死守待援，“楚豫”舰管带陈德龙则说，到兵舰上照样可以指挥。此前，廖母已关照廖克玉，等到瑞澂进来时劝他快点逃走。她们母女是革命党的卧底。本来还在犹豫的瑞澂立即下令在后花园挖了个墙洞，爬过去后一家都上了“楚豫”舰。两三天后，瑞澂安排她们母女先搭长江轮到上海，住在哈同花园。隔了一段时间，瑞澂躲在外国轮船的大橱里逃到上海，辫子剪了，胡子剃了，人也憔悴不堪。她记得，当时有人编了一个京戏《鄂州血》，骂瑞澂听了老婆的话临阵脱逃，在大舞台上演。[①]

几天后（10 月 14 日），英国传教士计约翰的日记说，有两个外国人去了瑞澂逃跑后的总督衙门，看到一片狼藉。C.W. 林辅华记述：

……几处未遭火烧的地方，有些房间被撬去了地板，有些隔墙板被掀开了，这可以表明士兵们为抓获总督已搜遍了每一个角落。那里的所有房间内，书籍、图籍、信札、图样和各种陶器散乱一地，全是难以名状的残物堆。

客厅里，一套精致的欧式家具遭到严重破坏，壁炉挡板被扔在砸坏了的地板上，一辆送餐车被敲瘪了一侧。客厅里还有一张少了一组抽屉的漂亮书桌，抽屉是从桌子下部拉掉的。寝室内已被全部毁坏，除了一些碎砖外，只剩下一副已被炮火的高温扭成怪模怪样的西式铁床架。[②]

瑞澂向北京和各省发出告急电，“省城兵与匪合，猛扑督署，其势甚锐，不得已暂登兵轮避锋”。此时，北京报纸还在登载这则消息：“瑞澂在武昌拿获革党，并有防患于未然之奏，廷旨嘉之，并令其择优褒奖。”[③]



湖广总督瑞澂

10月12日，朝廷只是下旨将瑞澂革职，“仍署湖广总督，带罪图功”。其中内幕，据内阁阁丞华世奎对张国淦说是这样的：武昌兵变、瑞澂出逃的电到，庆亲王奕劻意在从严究办，即令查以前疆臣弃城处分成案，拟旨将瑞澂拿交法部治罪，镇国公载泽反对，改为革职戴罪图功，载泽与瑞澂是姻亲，“素来遇事袒护，庆邸无如之何”。[④]

另有一说，庆亲王奏“封疆重臣，弃职逃去，岂可宽待？”隆裕太后说：“庚子那一年，咱们也不是逃走的吗？”庆亲王一时语塞，退而愤然说：“小舅子保驾！”指的就是载泽。瑞澂为载泽的姐夫，载泽为隆裕

的妹夫。[5]

瑞澂弃城而走的消息在北京官场一传开，许多人表示不满。

10月12日，缪荃孙日记："瑞澂以一身免，真庸才也。"[6]

10月13日，许宝蘅当天入值，"见瑞澂电奏新军之变，全诿罪于张彪，并涉及张文襄。身任封疆，遇变仓皇走出，不思尽忠报国，犹复诿过人，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7]

同日，恽毓鼎日记说："瑞澂初六日（9月27日）即遣全眷回京，尽载贿而行。十三日（10月4日）闻有革党起事之信，移往楚豫兵轮。昼在署办事，夜宿舟中。十九日（10月10日）搜杀党人未毕，忽闻枪炮声，仓皇出城。藩臬以下官或遁或匿，无一守者，匪党坐而得之。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10月15日，"闻瑞澂出洋十二万元，求各国领事保险，德英两领事均鄙贱其人，不屑保，俄人保之。瑞为宣宗朝已故两广总督大学士琦善之孙，英吉利之陷广州，琦善实启之，固失地辱国之世家也。真所谓谬种流传矣。"[8]

这些消息有真有假，可见京中传闻纷纷。

10月17日，翰林徐兆玮日记说："自武昌出者，谓在城绝不知城之失守，及出城始知之。观此可知瑞督弃城之罪不可逃也。"[9]

10月18日，翰林院侍讲学士罗文华的奏折说，革命党起事之说，相传已非一日，瑞澂闻之，即异常惊恐，自10月1日以后，"昼则入署办事，夜则避宿兵轮"。[10]

10月20日，法国驻华武官高拉尔德写信给陆军部长："人们说：怯懦的总督在受到攻击之前就离开了他的衙门；而张彪将军的迅速逃走，使得忠实于他的部队的防守瘫痪，从而使得应当仅仅是一次小冲突的事件变成了革命党的胜利。"[11]

川粤铁路督办公所提调王孝绳目睹了瑞澂在"楚豫"舰上的不安。10月13日，瑞澂"异常急躁，因官幕已星散，不敷办公"。第二天，他想招几个人来办文案，也无人响应。[12]

同一天，计约翰日记说："瑞澂现在正郁郁不乐地坐在离江边不远的快艇内，朝廷已根本不会再起用他，人们也完全摒弃了他……"[13]

在处置瑞瀓的问题上，言官舆论汹汹，要将他明正典刑，最高决策层却犹豫不定。10月17日恽毓鼎日记说，“言官相继论瑞瀓、张彪罪，请诛之，以申国纪。……瑞为泽公姊夫，袒甚力，恐国法不能及也。”[14]

10月20日，胡石庵在汉口接到北京同志由上海转来的急电，“言清廷有旨，令各省官获到瑞瀓、张彪，即行正法”。其实清廷此时压根没有下旨。[15]

10月22日，恽毓鼎日记说：

> 阅报纸论瑞瀓事，司道相率逃匿，有至京者，朝廷悉置不问，尚得谓有法纪乎？既无法纪，何以立国？悲愤填膺，手足俱冷。祖宗三百年缔造艰难之天下，以三年而尽弃之，岂能不哭？恨不呼列祖列宗，放声痛哭。……又旧制督抚同城而治，郭嵩焘、薛福成二公皆以为可裁并，余意亦深然其说。即今思之，湖北巡抚不裁，瑞瀓虽逃，苟得一有胆力之汉巡抚，无难调遣标兵，居城定乱，何致一长官逃而阖城属员皆逃乎？益知祖制之不可轻动也。[16]

同日，许宝蘅日记说，“全台奏请将张彪、瑞瀓正法，拟旨谕知，已派袁督查办，协理入对后，又将旨撤下，令台长明日预备召见，十二时散归。”[17]

24日，恽毓鼎日记中对监国摄政王载沣不满：“金台联衔上疏请斩瑞瀓，监国特召见三台长和解之。台臣之欲杀瑞瀓，为国家宗社计也。监国之视宗社，当重且切于诸臣，乃力袒瑞瀓，一若台臣之与瑞有私仇者，岂不异哉！”[18]

同日，徐兆玮听说瑞瀓已逃至九江，电奏以“楚豫”轮油米粮饷垂罄为由：“此等小人，真万死不足蔽辜矣！前日全台劾奏，昨特召见都察院三堂。监国谕已交袁世凯查办，以安台谏之心。未知亲贵更能为其援手否？”[19]

10月25日，资政院第二次会议，有议员提案要求将瑞瀓和张彪明正典刑。[20]

10月26日，资政院的奏折指控瑞瀓事先毫无防范，首先弃城逃船，导致武汉不守。

也是这一天，瑞瀓在逃往上海时，发出一份致内阁请代奏电，称10月20日开轮下驶到九江，一面筹拨铜元4000串，以一半运交萨镇冰，一半运交张

彪。一面在九江买米2000石，正在装运间，九江于10月23日夜突然发生兵变，道署被抢，炮台被占，电局及招商码头被踞，并有以20万购瑞澂的传言。“楚豫”兵轮子弹无多，兵心涣散，甚不愿他在舰上，怕成为众矢之的。其余各舰也因九江兵变，纷纷开轮上驶，不听调遣。他无兵无将，无法可施，迫不得已，改坐商轮，到上海暂住。“以瑞澂衰病之身，一死诚何足惜；第念际此种族革命，以人之多寡为消长，在彼族方冀我族多死一人，即少一敌。且与其以身饲匪，上亵国威，何如伏阙请诛，借彰宪典。”[21]

10月29日，由许宝蘅起草的“拿问瑞澂上谕”下达：

> 该革督竟不遵旨带罪图功，乃敢潜逃出省，辜负朕恩，偷生丧耻，实堪痛恨，何能再予姑容。着张人骏迅即派员将瑞澂拿解来京，交法部严讯治罪。[22]

当天，恽毓鼎日记说：“瑞澂逃至上海，朝廷震怒，奉旨交张人骏拿解进京，交法部严讯治罪。人心稍快。”[23]

第二天，两江总督张人骏致电上海道刘燕翼：

> 瑞革督奉旨拿解，已委员赴沪会拿，望不动声色，先行看管。至要。[24]

早在10月21日，《民立报》转载过外文报纸的报道：“瑞澂已剪发剃须，易洋装，挈二十万金，将东渡扶桑。”

当年11月6日出版的《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说，瑞澂逃到上海时，沪道刘燕翼即安排廨员宝子观秘密看守，因他们之间有亲谊，任其自由，被潜逃日本。[25]

10月31日，樊芬从上海致电赵尔巽说，“旨着江督将瑞澂拿解来京。按瑞已赴日本。”[26]

这些消息有误，瑞澂并没有逃到日本，而是一直躲在租界。[27]

11月2日，张人骏接到刘燕翼回电：

奉佳电，遵即亲自督同廨员宝令，驰赴瑞革督寓所察视，见工部局已派有探办多人在彼保护。据瑞革督面称，自知身为大臣，不应辜恩溺职，早当恭诣阙北请罪。惟现染病恙，拟医治少愈即力病起程，已径自电求宪台核示。至瑞革督寓居公共租 [界]，在工部局警权范围之内，非华官所能看管……[28]

11 月 8 日，汉口日本领事馆情报有来自张彪的说法，“关于瑞澂之行踪，彼原在上海，想已于本月十四日 [11 月 4 日] 到北京”。[29]

可见连张彪也不知道瑞澂一直躲在上海。

当瑞澂逃到上海，熊希龄在东北写信给夫人朱其慧说：“莘帅举动出我意外。前月廿五以后，我曾两次电告，内有万一事不可为，乞思见危之义一语。次电则谓责备者多，愿公熟计。不知两电能否达到。然彼仓皇出走，竟至上海，实非所宜。”

11 月 1 日，熊希龄给上海赵凤昌去电，“请劝莘帅自裁，免辱为要”。[30]

另有一个满洲人志锜（瑾妃、珍妃的胞弟）素来主张维新，知革命得手，误于瑞澂，也从京师给赵凤昌来电，“传内意，请讽瑞自裁，以谢朝廷”。赵虽与瑞澂有来往，“惟以死节岂容人劝”，且正为革命的事忙得日不暇给，哪有时间为清廷传达使命，一笑置之。[31]

曹汝霖回忆说，瑞澂在兵变后，“不知所措，性又怯懦，仓卒逃入兵舰，只顾性命，不能收拾时局”。[32]

瑞澂在满人中并非庸才，也非保守派，他主张立宪，还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他反对将全国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用于支付海陆军经费，认为“新政各项均不可缓，惟有海陆军可缓”。谘议局联合会决议游说各省督抚，由张謇前往武昌找瑞澂，希望他发起督抚联奏，1910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1 日，十七省督抚两次联电要求摄政王明年开国会，瑞澂是其中活跃的，当时未参加的督抚只有赵尔丰、陈夔龙、张人骏、松寿、恩寿数人而已。[33]

张謇在苏州惟盈旅馆替程德全起草的那份呼吁解散亲贵内阁、下罪己诏、实行宪政的电奏底稿有一段：

督臣瑞澂夙抱公忠，其事前防范，何尝不密，临时之戒备，何尝不严，而皆变生仓卒，溃若决川。[34]

10月30日，清廷所下罪己诏仍归罪于瑞澂：

湘鄂乱事，由于瑞澂之激变，与无端构乱者不同，惟咎用瑞澂之不当，军民何罪。

即使瑞澂不逃，武昌一隅存有变数，但人心思变、天下瓦解之势已成，清朝的命运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换一个人，不是瑞澂，表现未必有多大不同，甚至可能更糟。但他确实为各省疆臣不战而逃开了个头。

10月18日，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写信：

绅士要求巡抚让位给革命党，不要抵抗，巡抚坚决拒绝。……

此地的商人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很放心，他们都同情革命，知道自己会得到保护。[35]

10月22日，长沙易帜。余韶记得，他们进入巡抚衙门大堂时，巡抚余诚格正和卫队营讲话，一见他们到了，装作很镇静地说："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湖南都是好百姓，你们不要杀人。"随即用白布亲书"大汉"二字，叫人挂在桅杆上。

阎幼甫也回忆，预先拟定四位代表进入衙门，代表对余诚格说："请抚台赞助革命。"余说："我从不同你们为难，至于如何赞助革命，还得等我想一想。"随即命人拿出预备好的白布，亲书一"汉"字，命手下人悬挂在抚署前坪的桅杆上……他吩咐快预备点心，请代表用茶，他先告退……匆忙带着家眷在后墙打开一个窦口，逃往小西门外某洋行。[36]

"汉"字旗到底是不是余诚格所写，其他亲历者有不同回忆。曾任湖南外交司长的粟戡时追记：当时，两个湖南谘议局议员黄翼球、常治带了军队去巡抚衙门，余诚格小衣小帽出来，他们劝他反正，他不肯，说，"此事重大，当

入内与家父商之”。然后在后院挖了一个墙洞，带着全家逃走。黄翼球随手扯下白色桌台布和床单，与常治各书一个大大的“汉”字，挂在门前桅杆上。[37]

龙铁元回忆：“巡抚余诚格已慌从后园逃走，印还丢在地上。大众取床上布用墨汁写一大‘汉’字，挂在门外桅上（清代大官署门前例有双桅）。”[38]

当天，王闿运听说包围抚署，“未猛攻唾手而得，须臾满城白旗”。恽毓鼎在北京听说：“长沙兵变失守，巡抚余诚格遁去。”[39]

两天后，许宝蘅听说长沙有变，“余寿帅无下落，恐亦逃矣”。有人来找王闿运，说随余诚格到长沙不久，“主人遁去，一无所依”。王先安排他住下。[40]

10月23日，伟克非给安格联信中所说与此差不多：

> 政变成功，……巡抚衙门被团团围住，卫兵倒戈。巡抚无法躲藏，只好客气地接见他们……
>
> 巡抚回到衙门后，带着他的家眷和印信跑了，现在他们出三千两赏格要捉他回来。[41]

小学生左舜生和同学一起到都督府报名参加学生军，就是几天前的巡抚衙门。他们到余诚格的签押房看过，“见地上有凌乱之书籍颇多，可想象其出走时之仓皇也”。[42]

10月25日，恽毓鼎日记说：“长沙兵变，宣告独立，抚臣余诚格逃至岳州，瑞澂逃往九江，行将远飏矣……朝廷犹爱之而不忍加诛，奇极！行见逃官之接踵也。”[43]

余诚格逃到安徽，请安徽巡抚朱家宝代转的电奏称，陆军炮营、标营、巡防队叛变，“诚格暂避入水师营，不意水师亦悬白旗，遂登湘帆小轮，俟调省外各队力图克复”，无一字涉及仓皇出逃。[44]

10月30日，许宝蘅早饭后入值，拟余诚格革职上谕一道。“湖南巡抚余诚格，着即革职，戴罪图功，并着暂管湖南巡抚印信。”[45]

余诚格逃到上海，挂念着遗留在长沙的财产，不久给谭延闿写信，称谭为“中华民国湘军大都督翰林院谭大人”，谭没有直接答复，而是在《长沙日

报》登广告："余寿屏君，财务悉封存府中，毫无遗失，请派妥员来领……"

10月22日，西安与长沙同一天发难，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出逃，躲在一下属的家里被搜获时，当场以手枪自杀，连发两弹，只是受伤，未死。其他官员纷纷逃散，不知去向。[46]

10月28日，恽毓鼎日记说："西安兵变，护抚钱能训，或云逃去。"[47]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辗转接到一封信，是一个牧师从陕西省汉中发出的，说起义士兵到咸阳追赶上了钱能训，请他继续担任职务，钱予以拒绝，并企图自杀。"他的伤势证明是不严重的，士兵们没有忘记过去在他手下得到的好处，所以把他置于一位外国外科医生的照料之下。"[48]

12月11日，许宝蘅听说，有人从钱能训的仆人那里得知，钱当时将手枪交给仆人，要仆人向他开枪，仆人不肯，另外有人朝他连放两枪，中腹而不死，革军已拥入，请西医剖腹取出子弹。[49]民国时，钱能训还做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武昌消息传到云南，因为汉口、汉阳电报不通，云贵总督李经羲对长江上下游的军情安危、防卫把握都无从探悉，被谣言折腾得日夜不安。10月20日，两江总督张人骏接到他的来电，当天复电安慰他，长江下游几省安静，"谣言不免，现注意内防，以遏响应"。[50]

有人向他进言，新军协统蔡锷"确系革命党首领，宜早去之，以安军心"。他回答："此次武昌事起，全系鄂省当局仓皇失措，操切过甚所致，吾滇宜镇静处之，使之潜消默化为妥，不可再事操切，以坏大事。"他对蔡锷一直信任，此前广西来电说蔡锷是革命党，不能重用，尤其不能掌兵。他还把电报拿给蔡锷看。

10月30日，云南新军起义，李经羲和家属躲进法国教堂（也有说是法国领事馆）。蔡锷请他出来维持大局，他不肯，云南的军人也多不同意。蔡锷恐生不测，不再勉强，送他出境，和雷飚等亲自随轿步行，送到车上，并派兵一连随车送至河口。[51]

李经羲12月6日致内阁请代奏电说，10月30日总督府失守后，他曾举枪自杀，"被巡捕夺去，拥至其家"，11月2日他"自出就死"，"全局议绅

偕叛党劝充都督，始则跪求，继则恫吓”，他坚决不从，八天后，他们知道不可相强，于11月10日夜护送出境，去了香港。[52]

英国驻云南总领事额必廉写信向朱尔典汇报，11月13日，李经羲获准动身前往越南，“由学生志愿兵护送至边境的河口地方。可是，他对于那些护送人员的意图感到十分担心，因为他们似乎对他很不尊敬；他指望得到两位法国领事官员的保护，韦礼德伴送他至盘溪，而伯伟伴送他直到边境。人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李经羲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这里普遍的印象是，他以很高的代价换得了他的自由，这笔赎金将填满已经枯竭的地方库藏。”[53]

云南一共逃出了三个民国的总理：李经羲（1917年曾任国务总理）之外，总督署总参议靳云鹏（1919年9月任国务总理）装成轿夫，抬着一顶轿子混出城逃走。分巡临开广兵备道兼管蒙自关务的龚心湛（1919年6月至9月代理国务总理），曾留学英国，号称能吏，也得到法国领事的帮助得以逃走。

贵州独立前夕，贵州巡抚沈瑜庆的政策是“等等看”，随大流。11月初，咨议局、士绅、学界纷纷要求独立，他先是拒绝签署宣布独立的文件，最后在无奈之下匆忙发表宣言。但他拒绝出任都督，在卫队不稳、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交政于咨议局，先去汉口，再到上海，他走之前，军政府担心他一去会动摇人心，一再挽留，因他去志已决，送川费两千两，并派卫队沿途保护。[54]

沈瑜庆后来隐居不出，不愿在民国做官，家人都很责怪他，他抑郁成病。



浙江巡抚增韫

11月3日夜，浙江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见巡抚增韫，“请将营墙先行拆卸，满人编入汉籍，宣告独立，以免战争之惨”。增韫没有接受。[55]

上海、苏州相继独立，杭州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有人说增韫已弃城逃走。

增韫于11月4日轻装简从，只带了卫队长赵经新与赵振邦二人，陪着老娘，带着妻女，步行上街，在清河坊丰绸缎庄、舒莲记扇庄等大店铺买东西，借以辟谣和安定人心。

当天中午，增韫与杭州知府英霖、仁和知县沈思齐、督练公所总参议袁思永等商议对策，袁思永说新军仅1700人，且在城外，每支枪只有3发子弹，不足为患，而巡防营十数营，每营500人，械弹充足。其他人都不说话，英霖则痛哭流涕说，只有独立这一条路，说了很多。增韫令沈思齐起草浙江独立布告，依次传阅，都无异议。他吩咐印十份，分贴各城门。英霖说，刻板已来不及，可叫10个人分写，送到将军署会印。布告写成已是晚上10点，送到旗营会印，营门已闭，拒不肯开，会印不成，布告未能贴出。[56]

当夜11时，枪声起，接着巡抚衙门火起，增韫与他老母向署后的土山奔避，被抓。次日，被解送到福建会馆，再转到陆军小学校。临时议决，革命军以不杀人为宗旨，派陶成章护送到上海，恢复其自由。[57]

11月5日，恽毓鼎日记说："先是，巡抚增韫取媚于 [载] 泽、 [载] 洵，将防营一律裁尽。处州镇素称雄劲，某公力争不能留。省垣唯有新军，增韫一筹莫展，坐而待遁，杭人固知祸在旦夕矣。自贿赂盛行，朝廷唯以出财之多寡，为官阶之高下，故所用皆苟贱无耻之徒，首以收回本金为事。如瑞澂、增韫者，非以贿进，安能躐绾疆符，偾国家事乎？吾恨诸疆臣，吾不能不痛恨执权亲贵也。"[58]

11月17日，许宝蘅日记说："增韫已为浙人拥送出境，航海北来，行至秦王岛登岸，由临榆县来电奏明失守情形。既至山海关，而不来京请罪，亦畏死而已。"[59]

11月18日下旨，浙江巡抚增韫擅离职守革职。

11月2日，叶昌炽听说，"赣省兵变，抚逃似亦确"。[60]

11月6日，恽毓鼎日记："闻南昌失守，巡抚冯汝骙不知下落。安庆继陷，巡抚朱家宝遁去"。[61]

冯汝骙为河南人，进士出身，在江西巡抚任上几年，较为亲民，江西人对他颇有好感。当时就读于南昌陆军小学的周雍能说，江西巡抚冯汝骙"为人尚仁厚，我看他对我们年轻的陆小学生很好"。[62]冯的心态从10月18日给

张人骏的电报可以窥知，他不想出兵支持武汉，只图自保，乃至想通过外国势力，再来个东南互保：

闻驻九江以下师船纷纷驶赴援汉，拟请安帅稿联衔电部，告以上驶无裨，徒使下游人民惊恐，转致内乱；不保全完善土地，凭何规复武汉？……

再，屡次外人观望，两不相扰，似有线索；……通商口岸关系洋商财产，若联洋人，互保东南大局，匪不足平。[63]

10月30日，南昌光复，要推举冯汝骙为都督，他坚决不肯。亲历九江独立的吴铁城回忆：

巡抚冯汝骙在满清官吏中还算是一个比较长厚的人，官声颇好；他知南昌局面无可挽回，便在一夕悄然离开抚署，趁船出走。

某日，九江江防司令部报告，说南昌巡抚冯汝骙及眷属乘轮到了九江；我即照料他上岸，住在前江西景德镇御窑督办孙廷林的房子，并派人陪伴。在某一夜里，他吞烟自尽了，[他原有很深的嗜好]，陪伴的人也畏罪潜逃。当时原欲事定后送他回乡，并无其他恶意，结果如此，出于意料外。[64]

11月7日上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接到芜湖来电，据"大元"轮提供的情报，南昌落入革命军手中，"冯巡抚只身逃遁，据闻后来被捕，现被押于九江"。

次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得到九江情报："江西巡抚冯汝骙企图从南昌逃走，为革命军捕获，四日晚九时送往九江军政分府扣押。此人与袁世凯有亲戚关系，又系南昌协统吴介璋之亲友，故虽在拘留中仍受宾客待遇。冯曾请求往南京总督衙门一行，以便缴还官印，惟革命军恐其泄漏军机，未许可。"[65]

在南昌新军做过管带的李烈钧自述，南昌光复，"冯汝骙闻风遁。时余方督师九江，闻讯即下令派舟迎护来浔，居于孙慕唐之花园，优礼之，以示大国

风度，而不乘人于危也。而冯卒以忠于清室，乘间自戕，余甚惜之，厚为之殓，听其眷属护送归葬焉”。[66]



江西巡抚冯汝骙

汉阳兵败来到九江的卓仁机这样回忆，“有一天我同参谋彭学遒在江边码头上闲游，看见码头上靠着一艘有楼的大型小火轮船，船上有几十名挂着驳壳枪的士兵上上下下。我问码头上戴英雄帽的人，才知道是江西巡抚冯汝骙乘这小火轮由南昌来到这里，挂驳壳枪的士兵是他的卫队，他们是要到安庆去的。……当下我们就决定不让他走，上船去劝他留在九江。我们上了船，在餐厅里见了冯汝骙，他是一个大胖子，年约五十多岁，我们请他留在这里同我们一起革命。他说倘若不让他走，他只有死而已，态度很坚决。我们向他劝说一个多钟头，他还是表示‘有死而已’，不愿留下来。他的卫队也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回岸站在一个高地上，用大嗓子向群众报告：‘冯汝骙抚台在这个船上，他要逃到安庆去，再带兵回来打我们，我们两个人上船劝了他半天，请他留在我们这里，他始终不答应。我们现在向大家报告，请赞成革命的人都上船一同劝他不要走，要他和我们一块革命，如果他仍然不肯，我们就把他抬下船来。’话说完后，立刻就有一百多人同声响应，一窝蜂似地涌上船去，把大胖子冯汝骙抬下来，用黄包车送到司令部，由司令部找了一座九江最好的花园招待他住下来。住了一个星期，他要求吸鸦片烟，招待他的人给他找到了，还以为这是官僚习惯，不算什么，不料那天晚上他竟吞下鸦片烟膏，第二天就死了。”[67]

冯汝骙的几个儿子冯迈等人的奏折，措辞或有美化，但大致离事实不远，只是说他 11 月 9 日在九江“吞金自尽”，与其他吞鸦片自尽的说法不合：

九月初八 [10 月 29 日]，省城谘议局及各团体遽开大会，职父即恐生变，莅会痛哭，劝谕勉强镇定。突于初十夜四更，四面火起，………全城悬挂白旗……谘议局及各团体更番环伺，逼充伪都督，职父矢死拒绝。旋又开会强迫，逼索巡抚关防。……该党谓职父居官尚好，不忍戕害。惟因关防未经交出，派队送至九江监守不懈。[68]

11 月 11 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得到九江情报："传现在九江军政分府拘押中之前南昌巡抚冯汝骙，因要求送回河南未被许可，欲去南京上海亦未果，乃于 9 日吞服鸦片自杀云。"[69]

12 月 1 日，恽毓鼎日记，"闻江西巡抚冯公汝骙在九江自尽"。

12 月 7 日，苏州叶昌炽从邸钞上看到上谕，"江西巡抚冯汝骙从容就义，大节凛然，加恩予谥"。[70]

安徽巡抚朱家宝的惊恐从他 10 月 20 日转发给张人骏的电文可知，他向海军部请求派兵轮五艘，配足子弹，防守安徽的沿江要隘。安庆局势最初还算安静，23 日，芜湖海关税务司梅尔士给安格联写信，从安庆传教士们的来信可以看出，"当地的人只等适当的机会到来就宣布赞成革命，其他一切平静，巡抚在当地很得人心，直到现在还能控制局势。据说黎元洪曾发电报问巡抚，安庆是否参加革命，巡抚在同咨议局商量之后，已经含混地作了答复"。[71]



安徽巡抚朱家宝

10 月 30 日，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从武汉回上海途中，上午八时半自九江出发，路经安庆，发现"巡抚朱家宝为避不虞之变起见，不宿于衙门内"。[72]

这一天晚上，驻安庆的炮营、标营相继发难，被朱家宝挫败，他遣散新军

各营，本来还想全城搜捕，士绅童挹芳进言："党人皆挟有猛烈炸弹，如逼其走险，恐全城俱毁。"[73]

到11月8日，他改变态度，接受咨议局的独立要求。之所以如此，除了长江上下游各处纷纷起事，大势已去，还有一个因素：他与袁世凯私交密切，而这时得到彰德来的密电，要他"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成见，贻误大局"。另一说法是赵秉钧转达袁世凯的旨意："勿贪小节，致昧远图"。[74]

朱家宝被推为安徽都督，当印信送来，他"放声大哭，再三退让，始允暂受"。[75]他所出的安民告示以"安徽巡抚兼安徽都督"落款，舆论大哗，他只好取消安徽巡抚的头衔，没有几天即因兵变逃走。[76]

朱家宝上奏清廷，为安庆失守请求罢黜治罪，却把失守的责任一归为咨议局及各士绅的压力，二归为九江军队的蜂拥入城，"变起仓卒，无兵可以守御"。进一步归结为缺饷："此次鄂赣苏浙先后失陷，皖处各省之中，腹背受敌，而饷绌兵单，较他省为尤甚。迭经臣三次电请部拨饷项，迄无丝毫的款，未能添募一兵，以致束手无策。"

他所说也是实情，武昌起事前，张謇本来与他约好谈治理淮河的事。10月11日，张謇到达安庆，第二天早晨他们见面，知武昌已失守，"安庆筹防无款，新军率不可信，势处大难，无暇更说导淮事矣"。张謇当夜离开。[77]

到1912年1月26日，朱家宝奉旨："失守地方本属咎有应得，惟近年安徽屡次变乱，均经该抚立即扑灭，不为无功；此次悉力防守，卒以饷绌兵单，省城失陷，情尚可原。着开缺听候查办。"[78]

这样的处置无疑是最轻微的，这当中少不了袁世凯的袒护。

对于两广总督张鸣岐，1911年10月21日给事中高润生的奏折认为他不可靠："查该督少不更事，其素日行为，除熟于应酬，工于运动外，别无所长。"[79]

10月16日，江苏巡抚程德全托张謇起草了解散亲贵内阁、下罪己诏、实行宪政的奏折，通电向各省督抚将军征集签名，张鸣歧回电"时机未至"，22日，电奏已发出，他又来电"此奏不可不发，愿附名。"[80]

23日，他独自上了一道折子，主张责任内阁，亲贵不任总理，下罪己诏，召集国会等。有下属在日记里称许："此皆破釜沉舟之言，力量颇大，疆臣


两广总督张鸣岐

之矫矫者。”[81]

10月31日，有人从广东到北京，与恽毓鼎谈及张鸣岐“颇怀观望”，但也承认“其痛陈时弊一奏，则固切中要害，一时说论也”。[82]

这份电奏刊登在11月1日的《申报》，有人读到这一句：“今兹之乱，本非偶然，故自川鄂肇乱，警报日至，无知愚民乃至闻官军失利而群有喜色，闻革党败衄而訾为妄言。”认为大可表示人民对于革命的感情。11月3日，《申报》记者在“海上闲谈”栏目说，“未也，于官军下接失利二字，于革党下接败衄而字”。毫无疑问，张鸣岐是站在清廷的立场，所以他阻止了10月29日的广州独立。

梁启超这一天写信给徐勤说，“张鸣岐数月来极相亲”。[83]可知张内心的复杂。

而广州“乱机勃勃”，时局的演变令张鸣岐难以应付。水师提督李准素以凶悍著称，曾镇压“三二九”起义，遭革命党人狙击未死，至此千方百计寻求反正之路，屡次派人到香港与胡汉民接洽。李准自述：

> 武汉起义，准默察天心，俯窥人事，知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纵报私恩，徒伤公义，……贻害生灵。利害相权，宜审轻重，于是应乎天而顺乎人，立意反正广东。[84]

龙济光的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张鸣岐惊慌失措，绅士江孔殷劝他宜早为计，免蹈被炸死的广州将军凤山覆辙。“张默然不语，神色极为惊惶。”[85]

11月8日，广州各界推张鸣岐为都督，将印信送去，他不接受。他在总督衙门对人说想去上海省亲时，禁不住黯然泪下。当夜，他乘小轿到沙面的英国领事馆避难，省中官吏逃走的十之八九。胡汉民自述受任都督之际，

"全城官吏尽空，等于无政府"。广州知府志宗出城时，把印悬于二堂的梁上，仍用黄布包好，里面有八个字："已做清官，不食汉禄。"韶关道台左绍佐也向张鸣岐电禀地方困难情形，请求开缺，免误大局。他在日记中说，"无官一身轻，以抽身得退为妙耳"。[86]

第二天一早，李准下令各炮台军舰一律升起民国军旗。张鸣岐乘英国的"汉弟"号到香港。11月10日，广州海关税务司梅乐和给安格联写信，"总督终于在昨天逃走 [到英国领事馆请求用英国军舰把他送到香港] 照会各国领事，他要离开广州，日常事务可以同咨议局接洽。其他高级官员也都跑了，广州现在已经无人领导。"[87]

当天，张鸣岐在香港总督府的午宴上说，"如果一个政府腐败，那么人民应该改变它。他认为目前的革命到10月30日都是正当的，这一天皇上颁布敕令承认其错误，允诺改良和颁布宪法。在此之后，运动就不再是正当的。"香港总督路戛德问及他现在打算怎么办，"他回答说对于清政府他是一名罪犯，因为未能在其治地维持法律和秩序。另一方面，由于他拒绝了革命党的提议，又不能为其所容。他还年轻，所知甚少，打算在此住一个星期或十天，然后去欧洲学习行政管理艺术，希望将来服务于国家。"他还要港督给他去英国的介绍信。[88]

11月20日，郑孝胥听说张鸣岐已逃到上海，"剪辫剃须，戴西人小帽"。[89]

第二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报告记录：

> 前粤督张某昨天到达上海，即往赫司克而路卅八号寓所，张的家属已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了。
>
> ……据说昨天到达上海的粤督张某被控携走一笔公款。[90]

顺带提一句，在李准的家乡四川，人称"陈和尚"的留日学生陈英奇攻占邻水后，抄没了李准的家产。[91]

1911年10月17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发起联名呼吁立宪的电奏，山东巡抚孙宝琦即同意署名。10月20日致电各省，"事机紧急，不宜再有忌讳，奏

稿沉痛之至。惟督臣瑞瀓夙抱公忠八字，必应删去”。[92]

10月25日，他又致电内阁，痛陈近年皇族布满朝廷，“皆少不更事，信用非人，各部大臣又多不洽人望，举措失宜；军民怀怨，酿成今日之祸”，呼吁解散现任内阁，另选贤能以维持大局，并宣布皇族不得再任国务大臣。“至宪法为君民共守之条文，断非钦定所能强以服从”，应交资政院议员协议、制定。[93]

有人策动山东独立，他坚决表示：“孙宝琦在山东有守土之责，土既不能守，惟有以身相殉！纵令不死，也不能领着大家宣告独立。”[94]

自11月5日起，山东独立之说风起。11月9日，高拉尔德写信给法国陆军部长：

> 山东省议会的独立声明要比沿海城市接连失陷的消息更叫朝廷不安。人们几乎看到一个个新政府到处在轻而易举地建立，但只有那些满洲高级官吏受到了被仇视之苦，积怨最频繁的理由是他们的贪污。虽然很轻易地改换了政府的首脑，群众却对此表现出满不在乎和麻木不仁，然而这些更换如此容易，其本身就应当引起思考。[95]

等到部分新军军官参与到要求独立的行列，为求自保，他只能屈从。他将官帽摘下来放在桌上说：“大家既都认为独立相宜，与山东有利，我也不坚持己见。”[96]

11月16日，恽毓鼎在日记中痛责：“孙抚以行贿纳女，躐跻开府，意中本无忠义二字，无怪其视君父若赘疣也。”

11月21日又说，“山东独立无成，已思反正。大约宣慰使柯（劭忞）一到，即可随风转舵，不知任总统之孙宝琦何以自处?”[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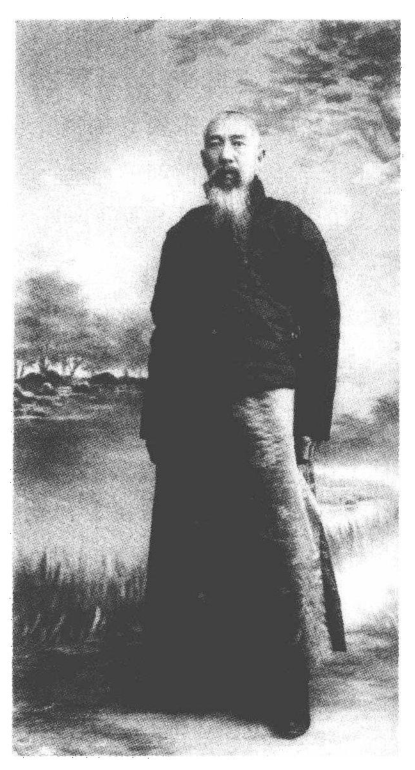
孙宝琦一再辩白自己不想独立，11月8日，他致电内阁、袁世凯及各督抚，表示独立是迫不得已，因为山东绅、商、学各界民意汹汹，语多要挟，深恐激成暴动，不可收拾，自己负保全疆土之责，拟即组织临时政府，自保秩序。但还没有正式宣布独立。

11月13日，他致电内阁，山东绅商学军各界组成的联合会不听他的再三

劝告，即日宣布独立，推他为总统，他怕出事，暂时答应，保一时治安。同时表示“世受国恩，形同叛逆，万死奚辞？惟有静候朝廷处置”。

11月17日，他致电袁世凯：“东省承认独立后，人心稍定，毫无暴动……琦尊旨保卫民生，力为维持，勉撑危局。可否？”[98]

11月18日，他写信给山东青州副都统秀昌，表明心迹：“大众公推弟为总统（各省均称都督，尚须改），……弟再三辞，不得脱，苦口良言，劝勿独立，俱无效。当时弟若不承认，必有奇祸（必有暴动之事），省城俱不得安，不得已权宜允许，实为全省生灵之计。”[99]



山东巡抚孙宝琦

11月25日，湖南凌盛仪的日记说：“山东巡抚孙宝琦反正，然其电北京电云：遥望北京，有声无泪。首鼠两端，故均不认其反正。”[100]

到11月27日，他通电取消独立，屈指不及半月，而“鬓发皆白”。[101]

当天，朱尔典给格雷的信说：“山东重新效忠于清朝，孙宝琦巡抚顺利地保住了他的职位。他甚至默许烟台方面目前保留它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愿望。”[102]

高拉尔德致信法国陆军部长，“山东省重新归顺朝廷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害怕德国的干预。这个转变很好地说明了在中国人身上，除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之外，对于国家政治并没有任何深厚的感情。”[103]

孙宝琦三次电奏请朝廷罢黜治罪，11月30日下达的上谕称：“本应加以严谴。惟念该抚世受国恩，不应荒谬至此，自系被人迫协，并非出自本心。……姑予宽容，仍着留任效力。”[104]

12月1日，恽毓鼎在日记中称他“有腼面目，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105]

他确实脸面无光，所以当他12月3日上折参逃走的山东各司道时，袁世凯将原折发还，因怕各司道反唇相讥，无言以答。[106]

当他取消山东独立的消息传到杭州老家，乡人大愤，要挖他的祖坟，12月6日，他致电内阁，自称本来病体不支，得到这个消息，不胜骇痛，"君亲两负，不可为人，方寸已乱，何堪治事"，恳请罢黜。[107]

12月18日他致电感谢袁世凯的成全，"恩准开缺"，平安着落。（进入民国他还做过总长、总理）

12月4日夜，南京失守的消息传来，恽毓鼎与人闲谈，说起"太平天国"当年，"天下糜烂，无一片干净土，其祸患过于今日"，然而，"督抚守土，将帅宣劳，绅民结团自卫，或练民兵以御贼，为国家效死者，比比皆是也。今日则守吏望风而逃，绅民甘心作贼，求其乃心王室者，戛戛乎其难之"。[108]

胡汉民自传也说："革命军起，封疆大臣辄望风窜走，否则树降旗以求自保。"[109]

从武昌开始，逃跑就是官员的常态。10月16日恽毓鼎日记：

> 瑞督既遁，藩司连甲踵之，匿于兵轮，……学使王寿彭微服匿于谦祥益绸缎庄（山东人营业）。臬司马吉樟衣冠坐大堂，骂贼求死。……此全城大官现象也。[110]

唯一求死的官员马吉樟也没有死成。

汉阳兵工厂总办王寿昌与收支处委员张鸿钧卷走公款八十多万两，逃到上海。

11月16日，掌湖北道监察御史温肃的奏折附片说，自湖北出事，地方官望风逃窜，几不知国法为何物。瑞澂、张彪以外，几乎都是闻变弃城而逃，未逃的则被拘，未闻一人死节。一个多月未闻追究其人，又不简补其缺，以至各省纷起仿效，不以为耻。

当天下达的上谕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有人奏，自湖北肇乱以来，地方官望风逃窜，请一律查办。[111]

法不责众，大江以南已望风披靡，即使真要查办也无从落实。

10月16日，九江税务司穆厚达写信给安格联，九江道台带了家眷躲起来了。

10月23日深夜，革命党平静地占领九江，“道台同前几天从南昌来的臬台早已在傍晚逃走了”。

10月17日，革命党占领宜昌的前一天下午，道台和三个委员乘民船逃走了，听说审判厅长已逃往城外山中，知府和知县归顺了革命党。[112]

日本驻长沙领事大河平早已看穿清朝的这些官员，10月19日，他给内田的电报说：“清国地方官员既畏军队叛变，又惧商民骚扰，狼狈已极。一有危急情况发生，毫不足恃。”[113]

10月30日，上海道刘襄孙、上海县田宝荣都已逃避租界。10月31日，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报告记录：

> 昨天有很多人自城里搬进租界。道台搬出了一批箱笼；县知事的太太也搬进了租界内的一所房子。

11月4日，上海海关税务司墨贤理写信给安格联：

> 道台衙门被焚，道台不在衙门里，他早已搬到租界内交涉司署去了。……今天早晨我去拜访道台，并问他要我帮什么忙。他极度惊恐，向我讲话时窃窃私语，好象怕被人听见似的。他对于自己的安全极为关心，问我是否可以设法保护他。我再三使他安心，说呆在租界里很安全；但是他还要我请求各国领事采取特别措施来保护他的安全。我和他谈到海关公事时，他答复说他不再管这些事情了，……这可怜的人已经心胆俱裂，但是他消除了紧张情绪，无官一身轻，住在租界里的安静住宅里，不久会恢复常态的。[114]

有些官员有过豪言壮语，最后也不能不面对现实。

曾声言如有革命暴动者格杀勿论的赣南兵备道吴庆焘，发现下属巡防军卫队营长施仁彪不敢妄动，感到大势已去，先将眷属送出，然后投奔光孝寺

削发为僧，悄悄离开江西。[115]

各地官员大多选择自保，逃跑则是自保的第一选择。

10月29日，天津的津海关税务司欧森写信给安格联：

> 此地如果发生革命，官员除逃往租界避难以外，不会有其他行动。总督已经准备好一只小火轮，随时可以送他顺海河开下去。[116]

高拉尔德11月9日给法国陆军部长的信中分析：

> 在这个自私自利的国家，对于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前者已被遗忘，后者尚不为人所知，每个人只想着拯救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放弃是出于加倍的胆怯，背叛则是由于更加无耻。旁观者们感到王朝已缺乏支持，他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不再是关于满洲人的胜利或者失败，而是满洲人结束的方式：自杀还是逃走。[117]

11月5日，宁波光复当夜，宁绍道台文溥弃印携眷而逃。次日，海关税务司柯必达写信给安格联：

> 昨天我听说宁波城内发生骚扰，立即去见知府[道台不在这里，由他代理]。他的态度很不自然，并且否认革命党已经占领宁波。过了两小时，当革命党的代表来拜访我时，我就听到了确实消息，知府已经为他们办事了。[118]

温处兵备道郭则沄先是躲了起来，然后在当地士绅黄仲荃等帮助下，乘招商局轮船逃往上海，他一开始因走不成而吓得哭了。温州知府李前泮为湘军名将李续宾后人，扮成工役，只身混入人群出城，所有个人细软都未带走。[119]

11月6日，清江浦（即淮阴）暂护提督印的淮扬道奭良弃城逃跑。[120]

驻烟台的东海道尹逃跑，官吏军警都逃避一空，宣布烟台独立时，民军

只有十来个人两支手枪。[121]

扬州盐运使增厚、知府嵩峋都是旗人，“听到枪声，增厚穿墙而走，嵩峋闻讯躲入天宁禅寺，把官印抛在瘦西湖里，挨过几天，逃奔高邮去了”。[122]

11月14日，恽毓鼎日记说，苏州独立，“藩司齐耀琳、臬司左孝同遁去((眉）齐耀琳之弟耀珊，湖北汉黄德道。革军犯汉口，耀珊闻风而遁，不愧难兄难弟。二人皆以重贿升官，岂肯做忠臣)，提学使樊公恭煦死之”。[123]

不肯做忠臣的又岂止齐氏兄弟。南京有张勋据守，11月8日，江苏布政使樊增祥等官员还是要出逃，到张人骏那里交印求去，张不答应，他们径自出城，乘火车逃往上海。[124]

驻南京的江防军骑兵营管带苏锡麟回忆，“当时南京城内的司道府县各级官吏纷纷弃职逃亡”。[125]

此前10月27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写信给朱尔典：“查南京自汉口起事消息传来，约有学生妇孺等，共计四万人迁去。最先逃避，及迁移眷属，乃南京之数大员。现在大员之家眷留此者，只江督藩司交涉司及关道而已。”[126]

11月19日，张人骏的奏折称：“司道府县各官及各署各局所供差人员均各仓皇出走。事后查访，仅有准补上元县调署江宁县知县陈兆槐尚未离城。”[127]

11月20日，法国驻天津领事写信给外长：

> 官员们被弃置不管，他们吓昏了头，希望找个避难所，必要时打算进基督教。我们的传教士要听听我的意见，然而这种意见是很难提的。[128]

11月15日，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入川调查，返程时再次经过巴东县。那是他们由陆路西行的起始地，上个月还是整齐的街市，现在满眼都是破屋残骸。“巴东知县孙德成怎么样了，打听的结果是，他不战先逃了。从他上个月招待我们之后，向我们讨仁丹、轻快丸的卑劣行径，就知道这是意料中之事，不禁一笑了之。”[129]

12月22日，赵尔丰被杀后，成都将军玉昆在家书中说：“川省大员中

仅剩我与奎都统，田军门（四川提督田振邦）十八已逃，藩、学、县等死逃均有。”[130]

二、石头城上

都督咸钦程德全，疆臣反正独公然。

——《海上光复竹枝词》

江苏那时分苏属、宁属，由督抚分治，江苏巡抚程德全驻苏州，两江总督张人骏驻南京。

11月4日夜，苏州光复，阖城安静。第二天，“闻之喜极”的中学生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

> 得悉昨日之事，系此地巡抚程公德全主其谋。程公夙有兴汉之志，唯秘不能宣，其后上下各相授意，乃于昨日召各官长会议，皆喜悦赞成。……不流血，不放枪，安然革新，皆程公明察之德所致也。吴人得公亦云福矣。
>
> ……今日之事，人言有沪上敢死队来，则无流血等事，尤当深感程公也。[131]

“苏城光复苏人福，全靠程都督。”这是当时苏州城中小孩传唱的童谣。翰林徐兆玮在家乡常熟给人写信：“此间秩序整齐，皆食雪楼先生之福。”[132]叶昌炽11月4日的日记则说，“旬日之前，即有人言□□腹有鳞甲，深沉难测，里巷无知，亦有颂言不讳，恃以无恐者。鼓钟于宫，声闻于外，今始知人言之非虚也。”[133]显然，也有人对程德全大为不满。

唐文治、雷奋、沈恩孚、杨廷栋等人联名写信给陈英士，推许程德全

“热心国事，锐意改革，旧日各督抚，无可与之并立者”。[134]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称，“他是个思想有条理的人，见过他的领事以及其他外国人对于他的印象极好”。[135]

当时的督抚中，只有他真正以苍生为念，并对那个时代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最初也无独立的打算，接连发出的几份电奏，都是建议朝廷改革自新，挽救危局。他本来就力主立宪，此刻更迫切希望朝廷走上立宪轨道，他与张謇这些立宪派是心气相通的。



江苏巡抚程德全

在他家教读的钱伟卿回忆，一天傍晚，他坐在抚衙花厅上，忽然赵尔丰的儿子来了。此人在苏州一个学校任教，说是发现了革命党的活动，来向他告密。话未听完，他就厉声呵斥：“此地是什么地方？能容许你这样胡说八道吗？”

苏州光复，只是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上的几片檐瓦。以封疆大吏身份宣布独立的，程德全是第一人。林述庆在《江左用兵记》说：“雪楼以督抚威望，一旦宣告独立，东南局势为之一变，有功民国多矣。”[136]

恽毓鼎于12月15日的日记中痛骂程德全，并臭诋他从政的历史，其语多有失实之处：

> 自革党扰乱，疆吏相率而逃，唯苏抚程德全甘心降贼。上海开会，德全首先拥戴黄兴为大元帅。弃十叶天子不事，而事黄兴，不知其是何狼心狗肺！德全，四川人。当庚子、辛丑间，以候选同知在奉天，颇为俄罗斯出力，俄人深德之。事定，捐直隶州，分发安徽，入都引见。由其仆介绍于俄公使之仆，得交俄使及其夫人。俄使夫人觐见时，盛誉德全于孝钦显皇后之前，遂特旨改道员，超擢奉天副都统，未几授黑龙江巡抚，移节江苏。到任年余，竟叛降革党。[137]



两江总督张人骏

也正是因为在黑龙江应对俄国的交涉中，他显示出中国人的血性、勇气和胆略，并赢得俄国人的尊重，受到慈禧太后破格起用。

两江总督张人骏直到南京攻陷前才逃走，在石头城撑了五十来天。10 月 10 日夜，张謇在火光中离开武汉，三天后到南京，14 日，他先去见江宁将军铁良，建议铁良和张人骏合力一面迅速援鄂，一面奏请速定宪法。铁良说要与张人骏商量。第二天，他去见张人骏，不料“张大诋立宪，不援鄂；谓瑞能首祸，自能了，不须人援”。他说：“武昌地据上游，若敌顺流而下，安庆又有应之者；江宁危矣！”张回答：“我自有兵能守，无恐。”他知道再说无益，怅然离开，当天日记中称“其无心肝人哉”！[13]



江宁将军铁良

此前，赵凤昌致电建议张人骏自保，其实用不着提醒，从一开始张人骏就只想自保。10 月 11 日，他急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海军部，下游江防紧要，请求多派兵船来防守。他不肯出兵援鄂，当时不是什么秘密，朝廷也无可奈何。

10 月 15 日，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写信给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我相信南京是局势的真正关键，如果政府能及

时保住南京，镇压革命就不会有什么困难。”

10月17日，金陵关税务司卢力飞写信给安格联：

……南京确是时局的关键所在。如果两江总督张人骏能够保持住他所管辖的几省，他今后将成为中国的伟大人物。听说北京有命令来，要他抽调一部分可靠的军队赶往湖北，他已拒绝执行，因为如果这样做，对两江各省的安全他就不能负责。另一种说法是，北京并没有这样的命令，是张勋自告奋勇，要统率所部到前线去，总督则不肯同意。[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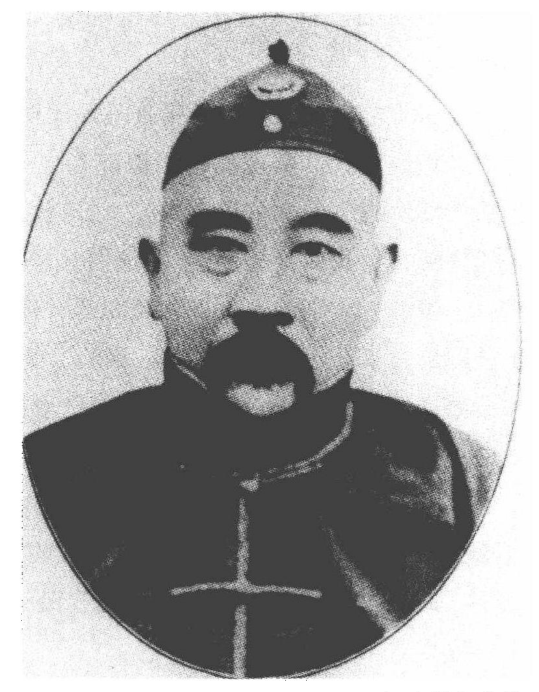
10月18日南京英国领事的报告说：“总督过去显得相当胆小，在目前的危机中却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令人敬佩地起而应付局面。”并称赞他“著名的诚实性格，以及普遍相信他对民众由衷的善意”。

10月27日报告：“江督之对于本地及汉口之事，均甚镇静。但伊属员中之惊恐者甚为不安。”[140]

为了应对军咨府要苏、皖、赣三省出兵武昌，10月22日，张人骏电商冯汝骙、朱家宝，一同复电，总的意思就是只图自保、不肯出兵，“各处陆军现谣言纷起，人心日夕惊惶，是防内更甚于防外”。

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日记：“总督张人骏虽然命其他大官巨室将家属尽行避难远地，然其态度仍极为镇静，与平时无异。城门在夜间亦照旧开放。”[141]

11月6日，张謇听说布政使樊增祥全家去上海，张人骏对人说：“我作总督，糊涂而来，本无



江南提督张勋

主见，今更一筹莫展，听诸君为之，但求将我送至下关耳。”[142]

11月7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写信给朱尔典：

> 昨天，实际上已经为在南京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做了准备，咨议局议长张謇先生或布政使樊增祥阁下都曾被推举为该政府的首脑，他们都暂时拒绝接受此项职务。就我所知，只是由于革命派迄今没有派遣任何代表自上海前来，才使得南京实际移交革命派一事延缓下来。[143]

尚秉和的《辛壬春秋》说，上海、苏州独立以后，仇继恒、虞洽卿去见张人骏，“金陵孤守难，请宣布独立免战”。张人骏和铁良心有所动，召集文武商议，“张勋首抗议，谓不战而屈，兵家之耻，如战败则与之耳。新防营统领王有宏和之。各司道则承张、铁意，主中立。人骏、铁良相觑，议竟夕不能决”。[144]

11月9日，郑孝胥在上海也听说，“张人骏、樊增祥等皆愿宣告独立，惟张勋不可”。[145]

江宁官电报局兼电话局稽查马涯民回忆，革命党曾想推举张人骏做都督，樊增祥做民政长。听说那些司道都答应了，就是张人骏不肯，说：“我世代受清朝的厚恩，怎么可以反叛？”司道再三劝告，张人骏哭着说：“你们自己去选择吧，让我回到故乡去！”他们只好推举樊增祥做都督，突然张勋跑进来对张人骏说：“别的人可以背叛朝廷，你老帅也可以背叛朝廷吗？”把桌子一拍就跑出去了。司道们知张勋一翻脸，绝不可能和平解决了，纷纷散去。

他说，11月9日后，张人骏、樊增祥也都逃跑了。电报早已不通，只有电话局还在照常工作。[146]

张人骏并没有逃，但如果不是江南提督张勋坚决要守南京，他不可能撑这么久。张謇于11月8日写信给张人骏，以民命为重。他回复：“窃谓朝旨已下，政府已翻，党人已赦，朝廷已处于极可怜之地，何忍再事煎迫。此间大势岌岌，弟惟力以图。”[147]

11月8日，新军第九镇起事，进攻雨花台。两天后，张人骏写信给夫人

陈氏说，“十八日事虽危险，而我并不惊慌，出花园后即有军队保护，至张少轩［张勋］处，晚住北极阁。今日辰刻回署，一切照常。……惟连日未得好睡，未免疲倦”。他给幼子张允靖的信中说：“我但能过得去，决不过于激烈，至多被发入山，不与闻世事耳。连日劳倦万分，多由少睡之故，……允言十一信言项城［袁世凯］正与武昌议招抚事，倘能早成、暂缓目前之急，亦不得已。惟要求太甚，朝廷未必即曲从耳。”[148]

> 倪嗣冲名共恶闻，南京负固骂张勋。……张督堪怜无节操，未能效命尚偷生。
>
> ——《海上光复竹枝词》

11月21日，苏古敦给安格联的信里有一句话，“黎元洪形容南京的张勋说，‘他和张彪一样，是一个只知道要钱的庸人。’”[149]

张勋凶悍，令人生畏，打仗却不含糊，否则南京也不可能守那么久。少女杨步伟家与他邻居，“(记得）在祖父死的第四天，他公然自己还来吊孝。他进来时大家怕极了……我在孝帷里面想偷偷地看看他是怎么一个人，我母亲捉了我的衣服不让我去看，所以这一个大名顶顶的张勋我始终没有看见过。”[150]可见张勋在人心中的形象。

11月14日，传言张勋的军队要来，苏州人大为恐慌，叶昌炽深为不解：“张军即无纪律，论逆顺之理，总为王师，何以畏之如虎？引领以望者，亦惴惴恐玉石之同烬，岂非古今之大变，到此真无从措一词矣。”[151]

同日，上海租界公部局的警务报告说，上海沪杭车站附近的湖北会馆下午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决死队，到南京去刺杀张勋，有20人报名参加。

关于张人骏的谣传不断传来，11月9日，郑孝胥在上海听到传言，“革军入南京，张人骏自尽”。[152]

同日，苏州叶昌炽听说张人骏与铁良、张勋等“相约背城一战，鞠躬尽瘁而后已”，第二天又听说张人骏的存亡消息，“传闻异词，甚有诬其变服出逃者”。[153]

还有一个说法，因为张勋怕张人骏和铁良潜逃，将他们软禁在北极阁，派兵看守。[154]

11月12日，卢力飞写信给安格联甚至提到张人骏自杀：

[6日] 因为总督向人透露，他已接奉密旨，令他投降。他自己虽愿意遵旨办理，但他无法劝令驻防将军铁良和旧军统领张勋同意。这样，全城就陷于恐慌中。7日上午，南京一个著名绅士警告我说，下一天 [8日] 将发生骚动，总督将自杀。7日下午，总督自杀的消息已经到处传遍了。[155]

11月7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给朱尔典写信：

昨天，我曾荣幸地电告您：朝廷已命令两江总督，如果革命军进攻南京，他不得进行抵抗。我知道，总督阁下以前曾致电北京，说明该省的形势对清政府来说是没有希望的，并实际上建议采取该办法作为避免重大流血牺牲及防止对全城可能造成破坏的唯一手段。朝廷也无疑地受到担心毁灭的影响，因为这里如果爆发战事，那些居住在南京的满族人必将遭到毁灭。但是，假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清政府的动机便被满族将军铁良所误解了。铁良拒绝承认该谕旨的真实性，并且宣布他打算把反抗革命军一事坚持到底……[156]

11月6日，张人骏给北京提学使发去一个密电询问真伪：

十四日 [11月4日] 罢兵上谕，外间多疑是否确实，乞速密示。[157]

所谓“罢兵上谕”没有得到证实。但袁世凯不愿援助南京，任南京陷落则有许多证据。

南京成为一座孤城，外无援军，最终的陷落不可避免。南京兵败之后，铁良在亲贵中散布：“江宁失守，实由袁世凯拥兵不救之故。”[158]

如果说，铁良为了推卸责任，所说不可靠，那么袁氏亲信徐世昌的说法应该重视：“项城以为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

兵力所能平定，主张剿抚兼施。……即南京亦不派重兵往援。”[159]

早在10月18日，张人骏就接到袁世凯来电：“宁省戒严，张勋当可得力。”[160]

张勋的江防军骑兵营管带苏锡麟回忆，在南京被围攻之前，张勋再三电告袁请求援军。“袁世凯回电说，北方可以调用的队伍，现在全都调往武汉前线作战，没有余力再向南京方面增援；南京死守无益，可以相机放弃，保全实力，扼守徐淮一带，以为北方屏蔽，使革命军不得北上。”[161]

张勋逃往徐州，就是遵照袁的这个命令。

当南京危急，张勋派统领高元善到北京告急。汪荣宝给父亲的信说，张勋守南京，“屡次告急求援，京外各处纷纷电请援应，项城一再迁延，乃预备援师。临行忽又改南而北，卒开往张家口，其用心究竟何在，虽难洞悉……”[162]

革命党方面也有类似回忆，江浙联军总参谋顾忠琛告诉江北支队参谋长华彦云：“雪楼 [程德全] 请我同袁世凯的密使廖宇春谈判。廖宇春保证我军进攻南京时，袁世凯决不出兵相助张勋。”以后华彦云在军界统一会开会时遇见廖宇春，谈起打张勋，廖还说到南方与联军秘密谈判的事。[163]

廖宇春南下与顾忠琛秘密谈判是在南京攻克之后，时间并不吻合。但袁世凯没有派一兵一卒援助南京确是事实。11月27日，张謇写信给攻打南京前线的程德全，“慰廷来电，无绝对反对意，亦可推见”。[164]

同一天，高拉尔德写信给法国陆军部长说：“政府曾考虑派遣第五镇增援南京，如果使用已经几乎完工了的天津——浦口铁路新线，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山东省的骚乱打乱了这个计划。”[165]

实则山东这一天取消了独立。12月12日，朱尔典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写信：“12月1日，我得到的消息表明，清朝中央政府方面有意试图援救南京。关内外铁路当局已奉命派火车自滦州运送七千名部队前往济南府；人们推测南京是他们的最后目的地，然而，我询问英王陛下驻济南府领事，驻守该地的第五镇军队中是否有些已乘车南下。12月2日，戴比德先生作了否定的回答。”[166]

张人骏给朝廷的奏折称困守南京孤城二十多天，“援军未来”。南京城

破，他和铁良登上日本军舰“秋津洲”号，经上海北逃。

张人骏一直没有进京，而是住在天津。

12月26日，铁良致内阁代奏电一方面称自己“受恩深重，此次防守不力，咎无可辞，应请从重治罪”，一方面又托病不进京，称自己“现在抵津患病，拟稍加调治，即行进京”。两天后，内阁奉旨：“铁良着先行开缺，驰往徐州防军，立功赎罪。”[60]

江苏北部尚未丢失，徐州仍在张勋手中。1912年1月17日，张人骏给儿子张允言写信吐露苦衷：

> 我事一无眉目，此次北来大错，后悔无及。非得巨款不能南行。……如须亲自到京，即于日内北上，如能先行遣报具呈，无须亲到尤好作为，到京即请假，抑即在此电阁代奏以病为辞（照宝臣[铁良]办法，惟为日似已太迟），……

当天，他又给张允言写了一信：

> 无款无兵如何前去？徐州防军之饷并不由张少轩（张勋）发给，皆本地官绅筹垫，我若到彼，岂肯再垫。项城前主甚误，细思此事，恐终难就局，不如乘此歇手，免致将来受累。

其间，他给亲家袁世凯也写了一信：

> 我公东山复起，人骏待罪北行，咫尺国门不得一瞻颜色，怅惘何如。金陵失事情形极为复杂，笔难罄书，不欲再渎清听，总之此事关于气数，人骏不幸身丁其间。命之不辰夫复谁怨。沦陷之时，本欲乘隙过江，以图规复。无如匪舰充斥，不能飞渡，并闻淮皖以北遍树降幡，辗转思维，与其受凌辱于贼臣，不如归此身于司败，刀锯斧钺亦属天恩。遂与宝臣将军潜行赴沪，航海北来。及抵津门，始知徐州反正，少轩收集散亡，仅能自保。儿辈传述钧谕，指示迷

途，感激之余辄思变计，日昨遣人赴徐，查察大势，仍属危险……

信中还说，“徐州为四战之地，无江河可限，无险隘可防”，以张勋数千饥饿疲乏之师，加上当地的缉捕队，缺械少饷，“其祸殆不忍言”。他详细调查徐州的“军情”：

徐饷项属巡防马步，共十九营，每月饷银三万余两，向由省局及海州分司淮北督销分拨，现在绅士已筹垫两月，竭蹶万分，十二月饷尚无着落，总督一到，断无再垫之理。

水灾严重，总督一到，势必纷纷请赈，如果没有巨款，无法应付。[68]

他思虑再三，不愿去徐州，而袁世凯给他指示的迷途，就是去徐州继续做两江总督。最后他还是学铁良的样，以“病难速愈”恳请罢斥治罪上奏，折中历述保卫南京、鏖战多日的艰难，并称自己和铁良到天津，留在那里就是筹划徐州兵饷等事，无奈自南京吃紧，“筹划战守，日夜焦劳，心力俱瘁，受病已深，精神亦觉恍惚，在津延医诊治，迄未全愈”，两江总督职务重要，恳请罢黜治罪，另简贤员。等病体稍好，“即当赴京归罪”。1月23日，他奉旨：“失守地方本属咎有应得，惟念该督效力有年，此次与铁良张勋坚守苦战，援绝城陷，情尚可原。既据奏称病难速痊，着开缺听候查办。”朝廷同时下旨由张勋护理两江总督。[69]

三、陆钟琦殉清

试观督抚将军辈，死者寥寥遁者多。

——《海上光复竹枝词》

真正愿意殉清的封疆大吏没有几个。1911年10月28日夜，太原新军发难，次日早晨，山西巡抚陆钟琦被打死，死得最从容。他从江苏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仅仅几个月。他罹难时的情形，阎锡山回忆，阻止起义的新军协统谭振德被击毙之后，巡抚衙门的卫兵没有抵抗，纷纷溃败。此时，陆钟琦衣冠整齐，立于三堂楼前，陆公子在旁边说："你们不要动枪，我们可以商量。"他说："不要，你们照我打罢！"[170]

另有人回忆，陆光熙想给父亲解围，拿着一包银钱，跑出来往地上一扔，立即被杀。[171]

时在山西大学堂任教的瑞典人高本汉11月20日在《每日新闻》发表《革命前夜的中国：一位瑞典目击者的印象和思考》：

> 10月29日星期天，……
>
> 在接待大厅的门外边，德高望重的陆巡抚和他年轻的儿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候他们。片刻的犹豫。……他回答，"我终生效忠皇上，我不会效忠起义者！"震耳欲聋的一声枪响，一切都完了。他的妻子晃晃悠悠地跑出来，被一颗子弹击倒，死在丈夫身上。他的大儿子，一位活跃的革命者，刚刚从日本回来，默默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有人从他背后开了一枪：有人怀疑他不可靠。[172]

恽毓鼎听说，陆家阖门大小18口都被杀。有奶妈带了他一幼孙，幸免于难。陆家第三子在太原城外闻乱，换上乞丐的衣服，污面提筐，混在难民中进城，"至今尚无消息。一门忠孝，可敬可泣！"[173]

陆家父子死后，从后门进去的荣福桐亲眼看见，陆钟琦身穿棉袍，死在抚衙的东廊底下，小帽抛落在一边；陆光熙穿军装，挂指挥刀，横躺在那里。有一个陆的家人是坐着死的。陆光熙的一个儿子受伤，陆妻逃在关帝庙中未死。[174]

陆光熙（亮臣）是阎锡山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阎后来说："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故我对他们的尸体均礼葬之。"

上海新舞台演出新剧《吴禄贞》，夏月珊扮演陆钟琦，起首念词四句："一心原想保大清，见了民军说欢迎，人人说我是骑墙党，实在是为保家当，

又为性命。”[175]

所谓“为保家当，又为性命”恰与事实相反。11月3日，叶昌炽在苏州得知太原兵变、陆钟琦不屈被杀的消息，几天前（10月28日）他还给陆写过一信，尚未寄达，而噩耗已至。他在日记中为有这样一位同科进士而骄傲：“临危授命，在疆臣中庶无愧色，吾同年为不死矣。”[176]

11月4日，荣庆日记说：“奉谕恳切晓示，布告天下，陆申甫尽节，痛哉。”

同日，恽毓鼎听到传闻，山西提法使李盛铎闻变，投河而死（传闻不确）：

> ……陆、李皆己丑同年，陆以道学称，李以气节称，咸不负素志。自武昌乱起，湘拳继之。疆臣余诚格、钱能训及司道各官，或逃或匿，无一死者。幸有二公，足以增光战史矣。[177]

11月6日郑孝胥日记：“苏州已降于革党，程德全为苏都督，藩台左孝同痛哭而去。太原叛，巡抚陆钟琦死之。左与陆素为舆论所轻，然临难乃不屈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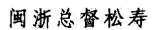
11月7日，叶昌炽从邸钞上读到陆钟琦死事，照总督例抚恤，感叹：“但有褒忠之典，并无讨叛之词，太阿之柄已下移矣。”[178]

11月24日，朱尔典写信给格雷，提及上个月太原的陷落：

> 当时革命党人前往巡抚陆钟琦的官邸，陆钟琦回答那些质问他的人们说，他拒绝停止对清朝的效忠；他还告诉那些攻击他的人们，他宁死不降。因此，他被枪毙。有一位从太原府给我提供情报的人，后来察看了巡抚的尸体，发现他的胸部有两处弹伤。他的妻子和儿子遭到同样的命运……[179]

12月31日，湖南的同盟会员凌盛仪日记说：“满清之奴，谁肯效死？疆臣死难者，惟闽浙总督松寿、江西巡抚冯汝骙、山西巡抚陆钟琦。不知大义，自殉小节者，数人而已，可见满清之倒运也。”[180]

冯汝骙、松寿都是自杀，督抚当中真正死得壮烈的，仅陆钟琦一人。



闽浙总督松寿





山西巡抚陆钟琦

11月9日，松寿在福州督署后门的盐道前高开榜画像店吞叶子金自尽。（另一种说法，松寿是服了毒药，走到府前街禄画店门前，毒发而死。）

《辛亥殉难记》称："辛亥之变，各行省大吏或走或叛，其死封疆者惟公（松寿）与晋抚陆公二人而已。"

松寿是满洲正白旗人，黄花岗起义后，尚其亨向他建议把剪辫子的一律抓起来杀掉，他力主慎重。武昌起义后，10月14日，他致电两江总督张人骏，十分着急："武昌警耗，现在情形如何？贵省如探有确信，望速示为盼。"当时咨议局有人提出独立，与朝廷脱离关系，他坚决不答应："不能做这样不要脸的事！"当福州举事前，福州将军朴寿软禁已被革命党策反的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他要求立即释放，以免扩大事端。

当时，福州旗营大多数人主张和平解决，以不流血为上策，将军朴寿一味主战，最后被杀。[181]

11月17日，消息传到京城，许宝蘅日记说："闻福州独立后，松督已自尽，朴将军则被戕。"11月20日，恽毓鼎日记说："知福州失陷，将军朴公（寿）全家自杀而后出与乱兵斗，被戕。总督松公（寿）自缢于督署。革党将其全眷护送至上海。忠义感人，无分顺逆也。"[182]

> 大鼎无端沸，无端算太平。人和风日煦，道重死生轻。铸错谁知悔，怀忠各盛名。病怀无所著，依恋夕阳明。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那天，荣庆写下这首诗，"怀忠各盛名"一句下，他自注是指陆钟琦、松寿、朴寿、端方等自杀或被杀的疆臣、将军。[183]

端方本可以不死。他在赋闲数年之后，因四川铁路风潮，而被起用为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带两千鄂军入川。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今井美代吉、小岛利一郎一行正好入川调查，11月5日在路上碰到端方的队伍，他们的旅行记录说：

> 尽管端方入蜀肩负着镇压四川动乱的大任，但是跟随他的两标湖



端方



端方（前排中坐）和戴鸿慈（前排左坐）等合影

北军并不听他的命令。如同夏虫扑火一般，他甘于为朝命牺牲自己。大丈夫常常有舍身蹈死的决心。今天碰巧看到他的轿子，他一边掀起帘子温颜从容地吃着烟一边向前进发，那样子看起来何等英勇！从这一小事窥见他镇定的程度，不由得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端方没有意识到此行的凶险，这些日本学生却为他捏着一把汗：

川民们渴望的岑春煊最终没有来，代之而来的却是在川民中并无声望的铁路大臣端方。听说跟随端方的两标湖北兵也抱有革命思想，什么时候护卫兵自身发起暴动也未可知。重庆一刻一刻地濒于危险。[184]

当时，曾有人给端方献上三策，一是退守西藏，二是经陕西去北京，三是就地在四川独立。他让标统曾广大宣布三策，谁知兵心已变，全体大哗，一闻湖北反正，人人有思归之心，不愿受端方驱使，一哄而散，自行秘密开会，认为“非杀端不足以谢川人，而尽种族革命之任”。[185]

11 月 27 日，端方和弟弟端锦在资州的天上宫被杀前，他向士兵求饶，称自己本是汉人，姓陶，先人投旗，“吾治军始湖南两江而直隶，待汝弟兄不薄，今之入川尤特加厚”。士兵回答：“诚然，然此私恩耳；今日之事乃国仇，不得顾私恩。”[186]

武昌出事的消息他早已得知，10 月 23 日他所带鄂军在重庆集合，他急于发放银质奖章，士兵生病他派弟弟到营里探视，目的是想收买兵心。

端方被杀之后，“营署以上诸官均不表同情，所以坠城者有人，混关者有人，更名易服者有人，至于端之亲近爪牙，均皆逃之一空”。成都将军玉昆的家书也说，“跟随各衙门随员不下百员，闻惊奔命，有往省逃，闻可惨之至。”[187]

端方至死都不知已被任命为四川总督，这个电报被赵尔丰压下了。随同端方入川的文案夏寿田说，端方在湖北不愿入川，但瑞澂不想一个地位相当的人留在自己的辖地，逼他成行，最初他与赵尔丰还电信不断，10 月 26 日，

四川总督赵尔丰





岑春煊

他电参赵尔丰，“到资州就为赵尔丰所遏，未能前进，署理川督之命，成都迄未转端，端至死时，尚不知也”。假如他知有此命，就不会在资州进退不得，“整队入成都，名正言顺，赵亦无词抵制，端果任事，自然迎合川人心理，与川绅合作，当不至于死也”。[188]

日本学生对端方之死有许多感想：

> 11 月 24 日
>
> 停宿资州。端方在此地。呜呼，他抽到了多么悲苦的命运之签，马不停蹄地向川蜀进军。……他从重庆向成都进发是 11 月初，然而现在为何还在资州呢？有人说是因为武昌起事，革命风云强劲，他抱有后顾之念，有人说是因为不想与赵尔丰会合，正在踌躇不前。我相信二者都有。……然而，谁预想到巴蜀之地留下千古不尽的遗恨，他最后竟死于非命。呜呼，捉摸不定的人世哟！呜呼，不可相信的中国人的心哟！他虽说不算是绝大的铁腕人物，但好歹是衰弱的满清的一代臣子。……其后数日他就死于部下一名小官的刀下。若果如传闻所说，他并非憎恨端方，而只是贪图军用银两便杀了端方的话，那实在让人同情。但是从一开始，四川人民就欢迎岑春煊而不喜欢端方的到来，同志会最初就表示了这样的意向，若端方来的话一定杀掉他。听说，端方也不像是一代大臣，临死之前丑态毕露。像端方这样的人看到四周的状况、听到四面的楚歌，居然没有临死的精神准备，还想最后逃走，不能不为之遗憾不已。我为端方之死表示同情的同时，也对他的贪生怕死感到可悲。[189]

端方的头颅被装入煤油箱，浸以清油。郭沫若说：“他死时的照片我是看见过的，一个大洋磁盘里盛着被斫下来了的头首，由一个兵捧着。”[190]

这支鄂军自资州东下，“经过东川各县镇军政府及民团商会，俱要求我军将押解之端方弟兄两颗首级，开匣参观，有时并为照相”。[191]

12 月 9 日，英国驻重庆代领事布朗写信给朱尔典：

12月7日至9日，从前由端方指挥的鄂军一标抵达此地。带着钦差大臣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的首级，装在一个煤油罐内。[192]

12月28日，宜昌税务司写信给安格联："这些士兵把抢来的端方的全部珠宝饰物给平善坝的关员看。他们还把端方和他兄弟的人头装在煤油听里带来，打算明天挂在宜昌城墙上示众，然后带到武昌去。"[193]

1912年1月5日，莫里循写信给《泰晤士报》的布拉姆："端方和他兄弟的首级装在煤油桶中已运到宜昌示众。……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194]

鄂军将端方首级带到武昌，黎元洪"闻之不忍，等家属来领"。

2月28日，郑孝胥在报纸上看到端方的头颅照片，"头平列案上，面目略可辨，旁有贼二人执刀，乱党赍其元至武昌献功耳。然忠烈之气如生，胜于叛臣之有腼面目远矣"。[195]

满洲名士颂端方，沪上犹留照几张，何苦出山抛一命，许多金石枉收藏。

——《海上光复竹枝词》

端方做过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在地方建设等方面多有作为，是一位能干的大臣，在同盟会员凌盛仪的眼里，"最能牢笼汉人，为满人中之铮铮者"。[196]

他赞成立宪，10月15日，程德全呼吁立宪的电奏征集签名时，他却回电"时机未至"。他喜欢收藏金石书画，收有许多海内孤本精拓、宋元明以来名迹，是这方面的行家。1912年1月5日，莫理循写信给布拉姆说："革命党负责的领袖们并不同情这种残酷的暴行。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我和端方甚熟悉，曾多次和他恳谈。他可能算得上当今最权威的古董收藏家，他收集的古物为中国之最上品。"[197]

端方的死讯传来，许多人为之震惊、悲伤。1月7日，恽毓鼎听说端方在资州被杀，先割一耳，再为乱刀砍死，然后，割下头颅送往武昌军政府，又

听说将军志锐在伊犁被杀，“不意良朋遭此惨祸，凄楚万分”。他在日记中感叹，端方罢镇之后，急于求出，才会附和盛宣怀，起而出任督办川汉路事。“功名之念，足以误人如此，可畏哉！”[198]

1月8日，荣庆日记中提及端方兄弟之死。

1月10日，郑孝胥日记说，“前日见上谕，有端方、端锦恤典，端果死矣，痛哉！”14日，他回想端方奉命入川时，在武昌、宜昌两次发电请他同往，他没有答应，如果自己去了，端方或能免之死地，也未可知。“端方逃死有二策：一于未行时先请入都，但称奏陈方略及于内阁、邮部密商事件，发电即行，到京后再行设法，必可不去，此上策也。一则入川后驻兵重庆，将鄂军调赴成都，别选陕、贵援兵自将，以观事变。即使兵不可恃，乱时尚可避匿领事署中，亦不至被害矣。仓卒觏祸，岂非智不足以自救乎，哀哉！”[199]

1月11日，藏书家叶昌炽想起端方的那些收藏：“吊国殇而念旧游，平生雅故哀然，昭忠之录，能无三叹。”[200]

1月25日，徐世昌、荣庆都在日记中记着端方家中设位致祭的事。

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郊收藏，三吴已编匋斋录；

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乎，夔云惨澹，万古同悲蜀道难。

直到3月12日，张謇还为端方写下这副挽联。

凶残狡诈、被川人称为“屠户”的赵尔丰试图以交出权力，换取一条命，最后也未能免于一死，在改旗易帜的关键时刻，赵尔丰、端方、岑春煊三个四川总督，只有滞留上海的岑春煊留命到民国。

风潮激烈话川中，屠户胡能得善终。妄把议员诬逆党，酿成革命论元功。

——《海上光复竹枝词》

1911年9月7日，赵尔丰下令开枪，杀死了数十请愿的平民。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儒勒·乐和甘在现场拍下许多尸体的照片。他在10月16日的家书中说：

> 所有，绝对是所有的照片，都呈现了没带武器的人，大部分是平民，有老有少。有人被击碎的手中还拿着扇子。没有一个人手中有枪。（棍子也没有）[201]

10月11日，恽毓鼎在日记中对赵尔丰深表不满："川事糜烂至此，朝廷犹不肯罢斥赵尔丰，别简有威望之员，岂竟弃川不顾耶？"[202]

此后，朝廷先后下旨，以岑春煊、端方为四川总督取代赵尔丰，但他们都到不了成都。赵封锁了外界消息，四川到处只有谣传，但他清楚整个局势的演变，急于为自己找出路，为求自保，他提出《宣布四川自治方案》，11月24日，他同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罗纶等在濬通银行达成协议，军权交朱庆澜，民政交蒲殿俊，自己以边防大臣准备赴藏边。[203]

25日，他约同城大小文武官员开会，宣布眼下四川大局不保，绅民请求独立，已商定十条规则。12月2日，成都将军玉昆的家书说，当时听了目瞪口呆，"彼时我心为难万分，若坚意不允，大局如何，且手下又无权势，可谓独木难支，营中老弱残兵何足支恃，不由同众大哭朝廷如此速亡之快耳！"[204]

11月27日成都宣告独立。12月8日，发生兵变。时为新军队官的贺国光回忆，藩库中有银400万两，"尽皆由暴乱军民所瓜分"。次日，赵尔丰复出，出安民告示，其意本善。陆军小学堂监督尹昌衡带兵驱散乱兵，出任都督。12月22日，攻入旧总督衙门，杀了赵尔丰。斩标书上写着："恶贯满盈之总督赵尔丰。"杀赵后，又将他的头游行四街。[205]

当日，玉昆的家书写得更详细：

> 惟尔丰死之甚惨。事先政府将署中亲兵左右全行买通，临事毫无保护。以炮响为号令，尔丰往外逃跑，早预埋伏，被人捉着。四人扛起就往军政府跑，入府即斩，将首级挂在枪刺，遍街游示。伊子被枪，内眷遇害，所有金银财宝衣服等物全行抄出入府……[206]

贺国光将赵尔丰的首级浸在酒中，本想运往西康收拾人心（因西康人对赵深为憎恨），后又作罢。他令人将赵的尸体和头缝在一起（缝了四针），再

送到八旗会馆。[207]

在清朝垮台之际，广州将军凤山还未上任就被炸死，西安将军文瑞自杀，伊犁将军志锐被杀，死得最有尊严的是京口副都统载穆，他交出枪支、大炮、马匹，使镇江和平易帜，然后在衙门悄悄自缢。

四、只有一个升允

“传闻摄政王偶作豪语，谓朝廷尚有好督抚在，何惧于革命。盖指升允、岑春煊辈。”[208]

这只是传闻，未必可靠，但恭亲王溥伟对摄政王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当朝廷下旨重新起用袁世凯时，他担心引虎自卫，去见摄政王，希望能起用一些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他列举三人，“瞿子玖、岑春煊，袁所畏也；升吉甫，忠梗可恃。诚使瞿入内阁，岑督北洋，以升允为钦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游，庶杜袁四之狡谋。”摄政王表示明日商量，从此再无下文。[209]

武昌发难的消息传来，做过湖广总督、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正在病中。他密奏中枢：岑春煊带队入川，此时应该在湖北，请革去瑞职，以岑调任，责令收复省会。参与兵变的只是一小部分，速电南湖一带各军并汉口驻军，力图规复。陆军第二镇第一协全部现驻保阳，即时下动员令，京汉快车两日一夜可达汉口，直逼武昌，以壮岑军声势。乌合之众，人心未定，收复不难。而中枢没有答复。[210]

陈夔龙没有说错，10月10日当夜，岑春煊就在武昌，他自述动身回上海的前一日，武汉事起，“枪声不绝。余仍安卧，至黎明出城买舟渡江，乘轮东下。”[211]

他说得似乎很轻松。10月17日，徐兆玮听说他“在武昌剃头易服，始得出城”。10月20日，张人骏给李经羲的复电也说：“西林微服出鄂，回沪养疴。”[212]

郭沫若回忆，“后来我们看上海的报纸——好像是《神州日报》——画

有一方漫画嘲笑岑春煊，题为《岑三少割须弃袍》。因为权限不分明，他逗留在汉口不进，遭遇了双十之变。”[213]

“割须遄返敢云非”，《海上光复竹枝词》中这一句就是指岑春煊。[214]

这些说法虽略有出入，但岑春煊离开武昌时的狼狈则可以想见。

当四川铁路风潮兴起，官民冲突白热化，朝廷先后起用两个赋闲的前督抚端方和岑春煊。9月15日，谕旨要岑“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两天后，岑即在上海发出《告蜀中父老子弟文》。郭沫若回忆：岑在四川总督任上其实也没有做什么，只是他的官纪很严，爱惩办一些贪官污吏；一般川人对他有好感，听说他来了，他们普遍地欢欣鼓舞。这篇告父老子弟书开篇一句“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很能抓住川人的心。“那措辞的娓婉动人而且得体，真是极尽了他的宣抚的能事。这个文电一到，在四川一百四十几个州县都传遍了，成都城竟有一两天自动解围……文电并不甚长，只有五六百字的光景，四川人把它当成‘福音书’一样诵读。”多年后，郭沫若和几位朋友谈起这个文电，还有人能全文背诵。“而他这样寥寥的几百言实在可以当几百万大兵，我时常在想，清廷假使专门依赖岑春煊，让他一个人单人独马的进四川，那川事一定会立地平息。”[215]

10月3日，重庆关税务司斯泰老写信给安格联说：“岑春煊奉派办理四川剿抚事宜的消息传来，运动的气焰已经被压下去了。”[216]

10月13日，江苏巡抚程德全给内阁电中赞许：“岑春煊示谕蜀中父老，不妄戮无辜一人，民气渐就宁贴。”[217]问题是，岑春煊进不了四川，到武汉就遇到阻力。赵尔丰、端方不愿他入川，瑞澂与他的分歧也很大。连在京的云南人周钟岳都听说了，瑞澂力劝岑带兵入蜀，岑说带兵则更难解决，“瑞又电中枢，谓岑意不可测，请止其入川”。[218]

瑞澂与他的分歧不在带兵与否，而在是否镇压。9月30日，瑞澂致邮传部电说得很清楚：

> 今午与西林论川事，其意仍坚持：一不主办首要；一商股非还给十成现银不可。澂再四谆劝，百意不回。……果西林挟此宗旨，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肆其影响，将及他省。……不如不

入川为宜。[219]

岑春煊自述与瑞澂论川事意见不同，“自知与中外大臣意旨皆不合，决计奉身而退。先乞假回沪就医，即获谕旨”。还没来得及离开，武昌起义发生了。至此，朝廷才决心起用他来平息四川之乱，10月14日下达上谕：“湖广总督着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四川总督着岑春煊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均着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当天，那桐、荣庆等大臣都在日记中提及，视此举为转危为安的安排。对于这个任命，岑春煊不想接受，他说：“是时旧部久散，仓卒无从召集，而各省纷纷起事，长江西上之路已断”，然电辞不准。[220]

次日，程德全呼吁解散亲贵内阁、实行宪政的奏折征求他签名，他“回电赞成而不列名”。[221]

10月18日，许宝蘅日记：“西林又奏辞，仍降旨敦促。”[222]

10月28日，上谕要岑春煊在粤军两营之外，再添慕八营，由度支部筹拨饷银一百万两，迅速入川。10月29日，张人骏给李经羲的复电说：“西林仍驻上海，已奏准募勇八营，惟饷械两绌，恐难于速行。”[223]

岑春煊独居上海租界，眼看着南方各省土崩瓦解，寸步难行。而朝中一直有人（像恭亲王溥伟）对他寄以重望。10月25日，御史温肃的奏折称：“岑春煊阻于鄂乱，入川之路既穷，应令以川督驻长江南岸，为南路督师大臣……袁世凯以鄂督驻长江北岸，为北路督师大臣”，意图以岑牵制袁世凯。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奏：“岑春煊尚未起程，且入川道途梗塞，权其缓急，拟请电饬岑春煊迅由海道来京，假以兵权，而固根本。”宗室宝熙及于式枚上奏，请迅速电召岑来京，并拟请特旨授为钦差大臣，驻扎保定。一面将进攻陕西、陕西的军队归他节制，一面招募劲兵，四出援应，为居中营外之策。[224]

连日本学生都知道川人盼他入川而不是端方，11月9日，御史赵熙的奏折中还有“川人则望岑春煊如岁”一句。但他远在上海，沿江入川既不可能，他曾想取道河南、陕西，转战入川，正在电请朝廷拨款拨械，准备起程，而上海宣布独立。他所调的黎天才部反正，“至是无寸土一卒，以为凭借”。[225]

11月21日，他再次上奏要求开缺，“上海变起，部饬上海道拨现款三十

万元，亦无从提取矣。……人心涣散，兵难再招，制造局失，军械一空，又不仅饷糈无着而已。病中痛愤，非独水陆道梗，西望蜀江，力穷飞渡；即目击沪事，亦无可挽救。”[226]

目睹民心离散，天下瓦解，这位慈禧太后、恭亲王及许多朝臣眼中的“好督抚”最后也放弃了清朝，转而支持共和。1912年1月10日，郑孝胥从报纸上看到岑春煊给袁世凯主张共和的电文，在日记中大骂：

> 岑岂亦被逼而发此电耶，抑已降于革党耶？怪哉！天下好名誉必让袁世凯一人做尽，南方士大夫真不值一钱也。……岑庸劣无根柢，一生色厉而内荏，固宜以降服革党收场也。岑避地沪上，本可不发一语；今一开口而肺肝尽露，原来亦是主张推翻王室之宗旨，平日声名扫地。此与自投粪坑何异？其愚至此，竖子真不知君臣忠义为何语！

附和革命党的又何止一个岑春煊，第二天，郑孝胥日记说：“寄寓上海者大半附和革党”。[227]

真正为清朝而战且战到最后的只有一个升允。

张伯英回忆，10月22日，西安新军起义时，已卸任的陕甘总督升允“乘枪声稀疏，从东柳巷（在西安的汉城）他的家里潜出北门，步行经草滩过渭河，沿途招集旧属，窜入甘肃。这时陕甘总督为长庚（旗人）。升允到兰州后，同长庚调兵遣将。”

党叙五等回忆，西安起义发生时升允正在城外的草滩别墅，管领一部分旗兵屯垦草滩军田。

升允以蒙古人而入旗籍，因头大于常人，被人叫做“升大脸”，

他其实不是一个悍将，而是个精通经学的儒生，与关中郭希仁等人相交，以理学相标榜。他抛下妻女，逃出西安，进入甘肃，力促长庚出兵，长庚“以未奉朝命，尚在犹豫”，升允大怒，竟夺印视事，调集宁夏总兵马安良等部进攻陕西。[228]

朝廷先是补授杨文鼎为陕西巡抚，杨迟迟不敢上任；11 月 17 日下旨由升允署理陕西巡抚，并督办陕西军务，这才名正言顺。这天，许宝蘅到内阁，“得知会以升允署陕抚，因甘督奏升允自请收复西安也”。[229]

在各战场俘虏的民军，都被升允一律斩决。张凤翙最初派出的议和代表也被升允所杀。

1912 年 1 月 18 日，朱尔典写给格雷的信里说，“陕西巡抚升允率领的一大支甘肃部队已自西面逼近，到达离城约五十英里的地方，……除了缺乏纪律的一群群土匪之外，没有任何人阻止清军抵达西安府。因此西安城的被围是完全可能的”。[230]

直到 2 月 12 日朝廷颁布退位诏书，升允收到电报，还向部下将领隐瞒，陕西战事仍在继续。2 月 13 日，陕西军政府派代表雷恒炎带着电报，去十八里铺见升允，商谈停战，立马被杀，升允怕士兵知道退位的事。[231]

2 月 18 日，袁世凯派人到山西介休迎源堡将原新疆布政使王树枏接到北京，任命他为宣慰使前往陕西劝升允罢兵。王以为清朝养士近三百年，“而怀忠报国至死不变者仅见升公一人。至事之成与不成，则有天命存焉”，他不能为袁这样的“乱臣贼子”去作说客，因此力辞。[232]

2 月 25 日，吴宓日记说，“是日午，民立报馆得陕张都督电，言升允以清帝退位，激而愈暴，殊形猖獗，进陷醴泉，咸阳危急，速乞接济军火等因。”[233]

2 月 26 日，叶昌炽日记说：“闻共和之政，陕以西不受命，吉帅 [升允] 前茅已至醴泉，……不禁望长安而西笑。”[234]

升允给东北“素抱君主立宪政体”的某统领写了一信（发表在 3 月 28 日的《盛京时报》），称自己部下士卒四万多人，兵力布置之处，纵横已有六七千里，共和以来，“无颜为生，只求得死所而已”，信中痛骂“亲贵中之满奸庆贼”，提议互相呼应，攻入京师，“先杀亲贵中之庆邸，继斩袁世凯之奸头，以谢先帝在天之灵”。他说“且今之共和云者，乃表面而已，其实际各据一方，各施其能，名实不符，何望其共和之有哉？吾恐愈求共和而共和愈远。盖今我中土非君主立宪不能有效，而共和绝无存立之理，况名实不符，各据一方乎？”[235]

郑孝胥从《时事新报》上看到一则报道，升允有意将太后、皇帝一同请到陕甘为偏安之计。他称许：“升允能如此，可为忠臣义士吐气。”[236]

等到马安良从张凤翙和北京王宽的函电知道实情，大怒，当面诘问升允，升允才由怀中取出清帝逊位和议停战电文给他看，他说：“清帝已退，吾为谁争，欲令吾辅尔为帝乎？”升允无语以对。[237]

3月2日，攻陕的甘肃各军听说清帝退位，还不大敢相信，到3月7日才停战。这天，与升允熟悉的关中耆老牛梦周、张晓山受命到十八里铺，升允放声大哭，当场痛骂袁世凯误国，说：“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圣恩。至于议和条约，已由彭 [英甲]、马 [安良] 二公主持，我不过问。”[238]

3月8日，彭英甲以营务处总理身份代表全军签定停战协定。

马安良与陕西民军首领张云山在乾州城外古庙会面，言归于好。马安良要求送还升允眷属，张云山满口应承，不久即将升允妻女送到平凉。3月10日，张凤翙与升允约定12日在醴泉会面，升允却于前一日离开了十八里铺，临走前给牛梦周、张晓山留下一信：“弟之不畏死，两先生所知也。静观部下健儿，皆有郁郁不可聊赖之意，倘不知轻重，突生意外……则不如不会之为愈……他日讲学关辅之间，与两先生相见，亦不为后也。”[239]

5月5日，《时报》刊登一条北京专电：

> 前清陕甘总督升允之子，在天津剪辫子回家后，对其父说：“我已投身民党”，升允听后大怒，命手下人将其子杀害。

这样的升允只有一个。

赵尔巽（赵尔丰之兄）从四川总督调任东三省总督不久，他在四川搜刮甚多，辛亥正月，成都将军玉昆私下在家书中说他，“在川不满三年，身得数十万之资。临行将省中黄金买贵起行，实说得饱载而归。”“走肖此番进京，托宝丰银号转托外人代买黄货两千多两，所以市面人言啧啧，可谓买尽。”[240]

赵尔巽对清室的忠诚没有问题，但他只图自保，四川、武昌出事，从他

挂出保安会的旗帜起，就没有打算为捍卫这个王朝做什么努力，只是勉强捱到最后而已。

10月14日，程德全电奏呼吁立即立宪，向各省督抚将军征集签名，热河都统溥颋本来赞同列名，隔一天又来电，因赵尔巽不以此举为然，要求取消签名。[241]

接下来的日子，各地独立消息不断传来，奉天的立宪派、革命党人，包括新军协统蓝天蔚都在推动独立，他的应对之策是成立保安会，挂出暧昧的杏黄旗，尽管他骨子里愿意守护君主制。在奉天30年的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夸他“在重大决策时所表现出的明智、老练、低调和勇气”：

>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应该有这样一位意志坚强、态度谦和、做事稳妥、有政治眼光的人；应该有这样一位愿意抛弃个人观点和情感去努力维护和平、保护人民利益的人，来掌管着满洲事务，这对中国和满洲都有好处。[242]

其间，因为赵尔巽请假10天，引起外界一些猜测。12月19日，当地海关税务司穆厚敦写信向安格联汇报，赵对帝制一向有强烈的偏爱。1912年1月13日，穆厚敦又给安格联写信：“不要说建成一个共和国，即使是暂时改为共和政体，恐怕总督也会辞职。他的生命之树已经根深蒂固，不易改变方向。他效忠皇室，还可以落一个好名气，因为年纪老迈，即使在形式上背弃皇室，辜负生平，也犯不着……”[243]

1月21、22日，赵尔巽给辽原阿王爷、热河都统锡良的电报，希望合力力争，以保住君主制。当时，一批主张君主制的人在北京秘密开会，提议如果袁世凯辞职，就以赵代替袁为总理，以锡良为东三省总督。他们担忧的是，袁去，赵到京最快也要五天，锡良到奉也须数日，“中间无人，至为可虑”。

到2月17日退位诏书颁布后，蒙古王公联合会给赵尔巽等来电，还要代表全蒙古推他为统一政府临时大总统。

这些空谈当然不可能实现，赵尔巽也从来没有收拾局面的打算；有之，也只为自保而已。2月1日，他给吉林民政使韩国钧的回电透露了全部心思：“万一共和，奉以保境息民为主。”2月13日，他给吉林巡抚陈昭常等人的电

中说："（自武昌变起），三省即以维持治安、不启外人干涉为目的，迄今数月，上下一心，尚无贻误。即国体解决后，仍认定保守治安，照常办理"。[244]

自始至终，他在东北采取的都是自保之策，而不是坚定地捍卫这个王朝。2月4日，郑孝胥在上海听说赵尔巽反对共和，将据东三省独立。[245]

2月6日，袁世凯身边的幕僚梁士诒、阮忠枢等都担心，国体问题即将解决，"惟奉天一省尚未妥洽，并闻日本从中唆使，恐发表后尚有风潮，甚为可虑"。[246]

当时外界有这样的传闻，赵尔巽也曾于2月7日致电袁世凯，提出包括"东三省臣民对于大清皇帝致其尊敬亲密，永无限制"；"南北政府未统一、各国未正式承认以前，不令东三省承认"等七条。袁世凯也"深虑东三省人民破坏大局，致酿外人干涉"，几次给他电报，希望他顾全大局，力维治安。2月15、16日，叶景葵等和张謇、汤寿潜、熊希龄等人听说有亲贵到东北，计划借助外人，与他同谋独立，接连给他来电。17日，他复电："来电所云，稍有国家思想者，无不知之。东省情势不同，千回百折，始归一致。即传闻之异辞，可知波澜之起伏矣。"[247]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回忆：

> 革命开始之前，赵尔巽是位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人。虽然69岁了，但外表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性格开朗，对前途抱乐观态度，使人充满信心。可6个月后，他变成了一位老人。内外的极度紧张把他击垮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谋杀，也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关在政府大楼里。……[248]

至此，他心力交瘁。一旦清廷退位已成定局，袁世凯掌握大局，他不可能另树一帜，但东北的局势有几天确乎有点紧张。穆厚敦2月23日给安格联的信里说："我10日那天见到总督，并且和他谈起，满洲要宣布独立的谣言如果成为事实，必然给满洲带来莫大的灾难。……第二天，美国总领事去见总督，并且竭力使总督相信，满洲与中国本部分离，即使是局部的、暂时的，也等于自杀。……他要总督肯定同临时政府合作，把瓜分的危险减到最低限度。总督不肯作肯定的答复，但答应两天以内告诉他。……交涉司对我说过，

在谕旨颁发以前，总督已经打电报给袁世凯表示愿意合作了。”[249]

2月18日，奉天挂出五色旗。“对于朝廷退位，他有切肤之痛”，然而他只能痛苦地面对这个朝代的结束。[250]

五、荫昌的两个车头

冲龄清帝尚茫然，可叹王公国务员。

——《海上光复竹枝词》

1911年10月11日，武昌出事的消息传到北京，协理大臣徐世昌的日记说：“闻武昌为叛兵所扰，瑞总督乘兵轮到汉口。”另一位协理大臣那桐日记说：“接到各处来电，知武昌新军变乱，踞城戕官，鄂督避往汉口，提督张彪被害（此信不确）。”荣庆日记说：“闻鄂耗甚恶。”他们位高权重，城府很深，日记都记得极简，很少透露心迹，徐世昌尤其如此，他当天的日记提及，那桐与邮传大臣盛宣怀午后找他谈公事，随后他与那桐谒见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谈公事，谈些什么，他只字未记。同一天，那桐日记只是说，访徐世昌，“电约盛宫保、朗贝勒、荫大臣、寿、谭、邹、胡、曹各堂谈湖北事”。[251]



协理大臣徐世昌

整整一天，朝廷没有做出任何决策。时在承宣厅办事的徐宝蘅第二天入值，才知昨天尚未降旨，那些将瑞澂革职，暂署理湖广总督，荫昌带兵南下，萨镇冰带兵舰前往的决定都是10月12日做出的。

军咨府的朋友告诉梅兰芳，武昌兵变的消息到京后，监国摄政王载沣马上召集御前会议，各部大臣都列席，已是12日早晨的事了：

> 会议开始，载沣面色阴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先开口。这样僵持了许久之后。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才用低沉的语调说了一句话："还是请午楼 [荫昌的号] 辛苦一趟吧！"载沣表示赞成，这次御前会议就这样草草收场。[52]

内阁阁丞华世奎说"其实汉人中并非无人"，他提议以江北提督段祺瑞率清江浦混成协乘军舰到武汉，"为时甚快"，但未被采纳，原因在于满汉之见。[53]

时在军咨府的冯耿光回忆，那天天刚亮，他们聚齐在内阁 [即旧军机处] 候旨室里，不多时有人传话，说庆王、徐世昌、那桐已到，请载涛进去，不到半个钟头，载涛出来说："王爷已经决定了，由荫昌督师，抽调滦州两镇向武汉出发。"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洵贝勒要调海军提督萨镇冰抽调海军的'四海'驶进长江，以壮声势。"

"四海"是指海军当中最大的四艘巡洋舰——"海筹"、"海容"、"海琛"、"海圻"。其时，"海圻"远在欧洲访问。

> 载涛的话还未说完，只见荫昌走进来了。他身穿袍褂，脚下却蹬着一双长统的军用皮靴。他不仅打扮得很奇特，而且走上来时，十足地摆出了一副三花脸的姿态，实在使在座的人们有些忍俊不禁。他平时一贯如此，但在这样的紧张局面之下，他竟还是"故我依然"，却是人们所料想不到的。
>
> 当时在座的人们忍住了笑口向他"恭喜"说："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荫昌随着就有声有色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

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在座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一位掌握全国兵马的陆军大臣作出这样的行动，未免荒唐儿戏。[254]

在颜惠庆眼里，曾留学德国、担任过驻柏林钦使的荫昌，“举止轻浮，常以开玩笑掩盖其浅薄，即在公众场合也喧闹嬉戏，不成体统”。[255]

梅兰芳从姨夫徐兰沅那里听到一个传闻，荫昌带兵出发前：

> 大理院正卿岳柱臣、鸿胪寺正卿英杰臣等在观音寺福兴居给他饯行，席间大家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荫昌却用《战太平》里华安的词儿打着哈哈说：“……又道是，母子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嘻嘻嘻，哈哈哈哇呀……”[256]

荫昌一直拖到10月15日下午才出发。

恽宝惠（随荫昌南下的秘书官）的父亲恽毓鼎10月15日的日记说：“晨起宝惠叩辞入署，未刻从荫大臣乘专车赴彰德……陆军第一镇、第六镇及抽调各镇兵队陆续开发。”[257]

当天，盛宣怀给荫昌一信：“汉阳钱厂、枪炮厂关系国家实业、军事前途，十分重大……此次用兵，如能力达保全目的……事平之后，两厂当合筹十万银元，重犒麾下有功将领士卒，决不食言。”[258]

英国驻华使馆武官韦乐沛10月22日的报告写得很清楚：

> 10月15日星期天，荫昌以及参谋总部乘坐下午5点35分的军用专列离开北京。亲王载涛和政府高级官员到东站送行。[259]

10月17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说：

> 星期天晚上荫昌离去时的场面没有一丝热情。听荫昌像日本人那样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简直荒唐之极。我算了一下，有五个

人跟着喊。大部分旁观者不知他在说些什么。[260]

10月16日，汪荣宝日记也说："闻荫大臣以昨晚督师进发。"[261]

这一天，清华学生吴宓听说荫昌受命率军南下，因为害怕不敢去，通过镇国公载泽和摄政王载沣，起用袁世凯代为督师。[262]

10月18日，御史文鉴的奏折说，"前虽简任陆军大臣荫昌驰往剿办。然闻命下之日，该大臣忧疑惊怛，肝胆俱坠。"[263]

知情的华世奎告诉张国淦，从12日命荫昌督师，到14日起用袁世凯，相距仅两天，"荫昌督师，在当时已有点勉强，荫虽是德国陆军学生，未曾经过战役，受命后编调军队，颇觉运掉为难"。北洋军队都是袁世凯一手训练，庆亲王提出起用袁，徐世昌、那桐附和，且说东交民巷盛传非袁莫属，载泽等最初虽反对，大势如此也不再坚持，摄政王只有答应。载涛回忆，"载沣本不愿意将这个大对头请出，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生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的勇气，只有听任摆布，忍泪屈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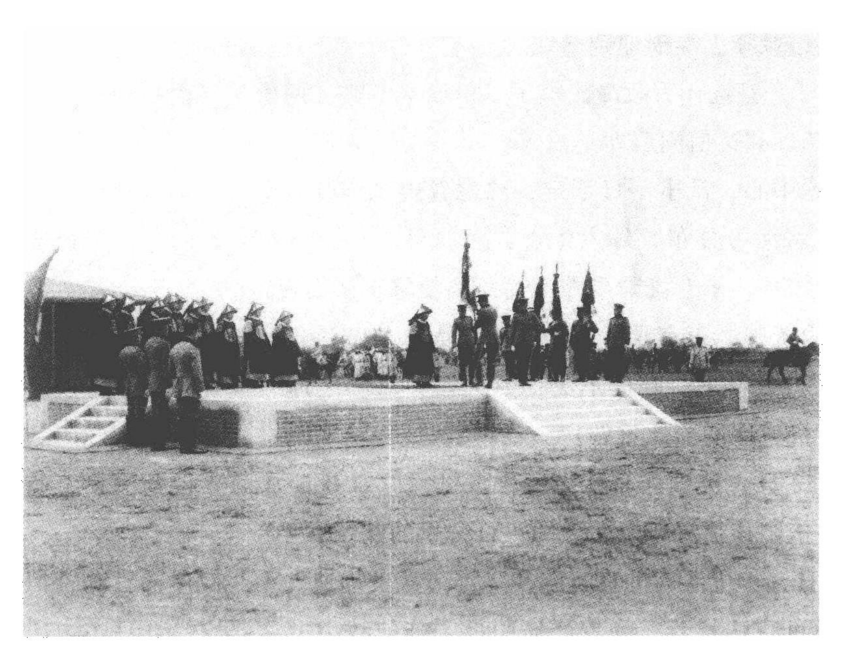
徐世昌说，早在四川争路风潮扩大时，那桐就密推袁世凯。等到武昌事起，电奏到京，朝廷更加不安。载泽等懵然主剿，以为武昌一隅，大军一到，指日可定。实际上当时空气弥漫，如大祸旦夕即来。庆王与袁世凯平时就往还不断，力主他出来收拾局面。摄政王和其他亲贵虽畏忌袁，也无可奈何。[264]

此一任命的重要，从那桐、徐世昌、荣庆等人都写入日记可知。许宝蘅称，当天入值，起草谕旨甚多，其中起用袁世凯的谕旨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道。

曹汝霖说："荫昌虽曾学陆军于德国，娶了德国太太，德语娴熟，但于军事知识有限，又没有经过战事。"[265]

从江西北上看秋操的欧阳武听说，荫昌用火车装运罐头洋酒食品等物就有一、二辆车，"可见荫昌的洋派十足，不像一个军人"。[266]

车到河南信阳，还没有到达湖北，荫昌就不肯走了，而且把司令部直接设在火车上，前后都有车头，胜则可进，败则可退，"行动果称灵便，而将怯兵庸，由此可见"。[267]



1911年3月摄政王检阅军队



陆军大臣荫昌

盛宣怀通过载泽上奏逼他到前线。

10月20日，盛宣怀为载泽代拟了三份面奏节略，两份是催荫昌到第一线的，因他自17日到达信阳后即不前进：

“武汉地据中心，乱事一日不定，恐他省望风响应，糜烂更不堪设想；即兵力、财力亦将无可分布，外人生心，尤属可虑。……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惟自来用兵，未有统帅畏缩不前而能使将士用命者也。”

“荫昌身为统帅，正宜乘此声势，率领大队节节进规，以寒匪胆。信阳远在豫境，距汉口数百里，呼应不灵，万无顿兵遥制之理。……荫昌若再逡巡不进，贻误事机，岂能当此重咎！”[268]

到10月22日，英国武官从可靠来源处（京汉路管理局）得到消息，荫昌的总部已由信阳移往汉口以北大约一百公里的花园。[269]

10月25日，御史温肃的奏折附片二：“兵贵神速。……臣不揣冒昧，拟请乘此电线尚可直达行营，降旨严饬荫昌亲临前敌……。”早在10月14日，他就上奏折说：“荫昌则宜身临前敌，方易调度。”[270]

恽毓鼎的儿子恽宝惠是荫昌身边的总文案，他在10月28日得知，荫昌和随员都住在火车上，十天没有下车。[271]

某日凌晨，有一个卫兵到火车上报告，有三四百革命党，直奔火车而来。荫昌立即命令开车北逃。随即得知，那只是百十个下地摘棉花的农民，压根不是革命党。[272]

六、王公大臣

荫昌如此，其他王公亲贵也好不到那里去。包天笑的《留芳记》说得没错：“这班乳臭未干的亲贵，教他们赁厢听戏，饮酒看花，逛胡同，吃馆子，那便是翩翩年少；若论冲锋打仗，决算运筹，还远得很。”[273]

在军咨府任职的陈之骥回忆，军咨府相当于参谋部，掌握一切军机，两

位军咨大臣一是载涛，一是毓朗。

载涛好演京剧又好养马，有“活弼马温”之徽号。武昌起义时正出京打秋操，大臣毓朗抱定一推二不管的主意，饬令僚属向载涛要办法。等到载涛回京，两人相对，亦徒呼负负。[274]

在决定退位与否的一次御前会议上（1912年1月19日），隆裕太后召集14个王公贝勒商议，少年恭亲王溥伟奏：“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太后问载涛：“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的回答是：“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太后默然良久，说：“你们先下去罢。”[275]

11月7日，力主君主立宪的严复在北京东城金鱼胡同用英文给莫理循写信，分析目前这场起义的远因和近因，首先就是“摄政王及其大臣们的极端无能”。他说，十多年前，先有普鲁士亨利亲王，后有日本军官福岛安正向满族王公们建议，当务之急是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其次是将权力集中在皇室中央政府。“政府以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改编军队，而摄政王完全凭借这支军队作为靠山，以为这样一来他就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了。他自封为大元帅，让他一个兄弟统率陆军，让他另一个兄弟统率海军，他认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了。他做梦也想不到恰是他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

载涛统率陆军，载洵统率海军。熟知清廷内情的莫理循评价，“载洵是个昏庸无能腐朽透顶的亲王”。[276]

时为外务部侍郎曹汝霖的回忆可证：

摄政王罢斥了袁世凯，即起用亲贵，加以重任，如载洵之海军大臣，载涛之军咨府大臣，荫昌之陆军大臣（荫虽留德学陆军，然于军事毫无研究，惟载涛之命是听），载泽之度支大臣，瑞澂之湖广总督（载泽姻戚），时论谓满朝亲贵，贿赂公行，实非虚语。亲贵贪污，首推载洵，他在海军大臣任内，卖官鬻缺，贪婪无厌，后到英

> 国定购战舰，议价未成，先讲回佣，声名狼藉，贻笑中外。其弟载涛，尚知自爱，惟年少气盛，傲慢性成，人皆以为熏莸同器，其实以乃兄之污名而弟同受其累，亦是事实。但以毫无军事经验之幼弟，付以陆军之重任，其举措亦属荒谬。

曹汝霖对摄政王虽有知遇之感，但在他看来，摄政王“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不足与言国事也”。[277]

德龄公主评价载沣：“他是一个很愚蠢的人——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很保守。没有人能和他谈论改革的话题。”[278]

10月27日，恽毓鼎念及时局，放声痛哭。三年来，“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不顾国脉，不恤民力，“所不知者，我监国及四亲贵耳（载洵、载涛、载泽、毓朗）。”

面对突发危机，这群少不更事、毫无经验的天潢贵胄，又能做什么？

后来恽毓鼎在日记中叹息：“王室虽存，而环顾皇族，无一人足语济世安民者”，分析其中原因，当光绪二十年以后，慈禧太后裁撤上书房，不令近支子弟读书，十六七岁就华服骏马，到处玩乐，“目不睹圣贤之论，耳不闻正人之言，志趣才识，何从高远？”等到摄政王监国，大量起用这批少年亲贵，才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早在光绪中叶，嘉定徐季和就在亲友中说：“国亡不久矣。”众人惊问其故，徐回答：“吾久在朝列，遍观近支皇族中，无一明白有英气者。上既无嗣，异日承大统、执国政者，必不出此诸贵，安能望其守祖宗基业乎？”而今这些话都要一一应验了。[279]

曹汝霖说：“原来此次肇祸之因，由于武昌兵变，瑞澂处置失当，继以永平秋操，载涛悉调新军赴永平，不能南下平乱，遂使事变愈演愈烈，卒召亡清之祸。瑞澂满人也，载涛亲贵也，追源祸始，二人均为亡清之罪魁。然则清之亡，实亡于满人亲贵，汉人不过因利乘便，造成时势之英雄而已。”[280]

这一年，载沣28岁，载洵25岁，载涛24岁。那批上了岁数的王公大臣同样缺乏应变的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局势一步步失控。10月16日，少年吴宓在日记中说：“惟政府近来焦虑异常，诸大老毫无能为，惟互相悲叹而已。”[281]



摄政王载沣



庆亲王奕劻

10月23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写信给格雷："皇帝的谕旨，以惊人的速度一个接着一个地发布出来，……这些谕旨暴露出一种软弱和紧张的情绪，它不是企图激发人们对清政府的信任的。"[28]

在外务部任职的颜惠庆说：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北京措手不及。当时清廷主政者，多系平庸低能之辈，且无经验。监管国事的摄政王载沣，虽意图良美，但生性软弱。庆亲王奕劻具有丰富的经验，可惜年事已高。协理大臣那桐，富有才华，能言善辩，却缺乏实际本领和决断才能。唯有镇国公载泽，在满族大臣中堪称果决勇毅之人。……

[徐世昌、梁敦彦和盛宣怀] 他们满腹经纶，老于世故，但面对只有打过仗的人才能应付的局面，就显得体魄不够强健、气势不能夺人了。清廷大臣不是宿命论者，就是失败主义者，早已外强中干，色厉而内荏。烽火未起，官员们已准备投降了。更何况既不了解各省实情，又久未经历战事，因此，他们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

载沣是光绪帝的弟弟，他儿子溥杰说他爱藏书，自号"书癖"，家中挂着他手书的对联："有书自富贵，无事小神仙。"他最喜欢白居易的这首诗，曾写在团扇上：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

在美国人眼中"浑身透露着高贵"的载沣在载润看来，"生性懦弱，在政治上并无识见"，"怯懦怕事"，"优柔寡断，毫无政治手段"。他亲弟弟载涛也说：

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

> 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他儿子溥杰说：“我父亲的歉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致和我的祖父要似。”

溥仪幼时见到父亲，见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后来才明白，“他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并且“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天津《大公报》有文章称载沣的性格“木楼座钟”。有遗老告诉溥仪说，载沣“与王公大臣常相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溥仪看过父亲用满文写的日记，他回忆说：

> 没有找到什么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外事项的，每逢立夏，他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留分头”，此外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每逢朔望以及其他日子，都有关于天象的详细观察的记载和报上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科学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是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的……

溥仪回忆，母亲对他说过，有一天他父亲从宫里回到家来，神情不变地对她说：“从此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气得她大哭了一场，告诫儿子长大了不能像阿玛那样没有志气。此记大约就是他父亲被迫辞去摄政王的那天。[283]

曹汝霖说：“时庆王当国，虽明白事体，然年老守旧，不能大有作为。”[284]

庆亲王奕劻即使年事不高，也不是应变之才。冯耿光回忆，庆亲王对载涛不放心，怕他利用这次调兵的机会，以禁卫军来对付自己，为确保自身安全，先调姜桂题的毅军来守九门和庆王府周围。给事中高润生 10 月 21 日的奏折附片分析，毅军进城，正是引发京城谣言、导致人心恐慌的原因之一。[285]

11 月 14 日，庆亲王对来访的日本公使伊院集说：“此次内乱，出人意

表，竟至危及国家安全，令人痛恨之极。本人日夜焦虑，废寝忘食，思欲匡救。然全国形势日非，刻刻告急，数日前几至京师治安亦难确保，……但今后如何演变，未可预卜，实堪忧虑。”[286]

除了焦虑、忧虑，他已无能为力。12月10日恽毓鼎日记说：“报纸登庆亲王奕劻金银、珠宝、衣饰详单，所值在一万万两以上。曩见嘉庆初查抄和珅家产账簿，其丰富为自古权臣所不及。今庆邸则又过之。此皆卖国卖官所积也，而犹贪婪无厌，一事不肯放过。呜呼！七十老翁，身死后将何如？国亡后将何如？好利一念，能使天良丧尽。如有天道，断无保存之理。”[287]

载涛多年后仍记得，12月7日北京报纸登载，“奕劻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估计所值在现金万万两以上，其来源固无从深悉，恐亦不是随便捏造。平日蓄积有如是之巨，真是骇人听闻。”他听说，吴禄贞出任第六镇统制，就是花了运动费二万两，像吴这样很有声望的军人，奕劻尚不肯轻轻放过，其他可以想见。[288]

吕公望回忆，武昌起义前夕他北上见吴禄贞，知朝廷有意任吴为山东巡抚，奕劻索贿二十万两，无力筹措，所以未成。[289]

清廷退位之后，林纾写信给吴畲芬说：

“然德宗果不为武后所害，立宪早成，天下亦不糜烂至此。罪大恶极者为那拉氏，次则奕劻，又次则载沣三兄弟及溥伦，万不可加以赦令也。”

只有曹汝霖在回忆录中为庆王辩解了一句：“人都称庆邸贪污，观之庆邸在贪污中比其他亲贵尚可称为廉洁者也。”[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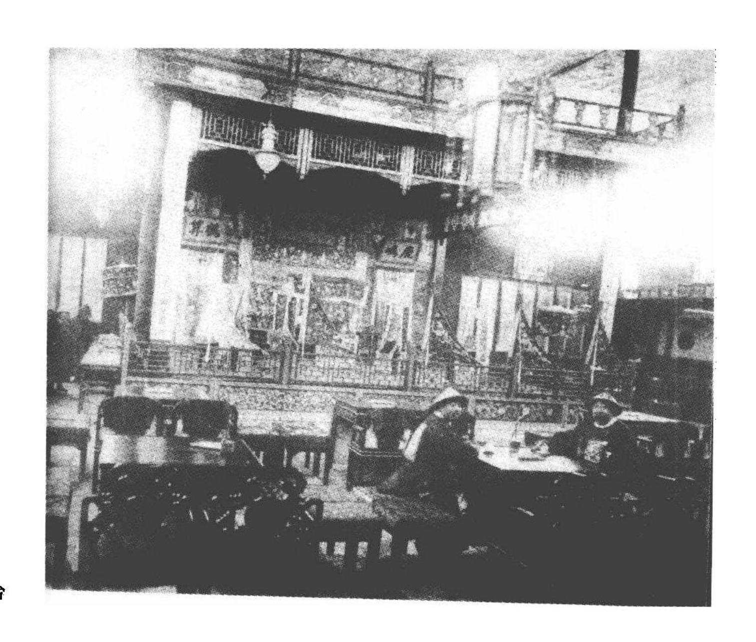
“富有才华”的那桐实在看不出什么才华。10月11日，他日记说，“湖北事更紧急”。12日，“鄂事益急，汉口已失，奈何！”

虽然如此，他的生活并未发生什么变化，依然祝寿，依然请客，10月15日，他为“宝儿二旬生辰”，约了至近亲友本家聚餐，“客仅十余家”一语，可以感受到他对客人请少了而不无惋惜，只是冷落了他家里那个大大的豪华戏台。

10月18日这一天内，他连到华世奎、盛宣怀、肃亲王三家拜寿。10月21日，他到徐世昌家拜寿，为徐夫人的生日。11月3日，他去徐世昌家拜寿。荣庆日记也说去给徐世昌祝寿未遇。第二天，徐世昌日记说，摄政王送



协理大臣那桐



那桐家的戏台

礼，“又谢客数家”。[291]

11 月 6 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找过那桐，他日记中极简略，只有“英使来谈”四个字，但第二天莫里循给布拉姆的信说：

> 朱尔典昨天见了那桐。他只有用瘫痪这个字眼才能描述那桐的状况。那桐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几乎要落泪了，但他宣称朝廷不会离开北京，他相信如果离开，那就是清朝的末日。[292]

直到此时，那桐日记中仍不时有拜寿的记录：11 月 9 日到熙九亲家太太处拜寿，11 月 22 日，到伦贝子、博公处拜寿。次年 1 月 6 日，他夫人 48 岁生日，“因时局不定，兼有期服，亲友来者俱挡驾，送礼者均未收”。[293]

当权多年，他收的礼不可数计。载涛回忆，“那桐亦是著名大贪污者，拿钱走他的门路者，大有其人。”辛亥年初成都将军玉昆的家书中讲到赵尔巽调任时，与那桐密电往来不止一次，隐约露出赵走的就是那桐的门路。载涛说，奕劻与那桐、那桐与袁世凯彼此都是姻亲，关系密切，奕劻、那桐只认得钱，至于清廷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294]

> 利国无能但利身，虚名开济两朝臣。笑他药性如甘草，却负黄花号菊人。
>
>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

菊人，是徐世昌的号，他的日记表面上静如止水，那么重大的政局变动，他几乎每天千篇一律地写着：未明起入值、回家看书、小憩、会客、留客饭、看公事，等等。很少记录他们讨论过什么公事，许多大事在他日记里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在这些冷冰冰的文字中，看不到他的判断，看不到他的心情起伏，更看不到时代的风云。连私人日记都滴水不漏，称他“老于世故”，确乎一语中的。

奕劻、那桐、徐世昌，一个总理大臣，两个协理大臣，正是他们力主召袁世凯出来挽救危局。所以当皇族内阁解散，由袁组阁，他们不仅没有什么难过，反而如释重负。

自小站练兵起，徐世昌即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他在日记中提到袁都称“慰廷”。袁的东山再起当然是他愿意看到的。早在这年5月，他被授予协理大臣，一面恳辞，一面与那桐一同上折请起用袁，公开登在当时的《政治官报》上。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1月13日，袁一到京，他即“访谈良久”。第二天，他又到袁那里“久谈”。15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交内阁协理大臣差，使慰廷总理。……晚在慰廷处晚饭。”此后，经常有到袁处吃早饭或晚饭或久谈，至于谈些什么，没有一个字记录。

11月13日，袁世凯一到北京，那桐即去拜访，“稍谈即归”。15日，“袁总理今日谢恩人阁办事。桐于本日交卸协理大臣”。12月1日，袁派了卫兵26人到他家守护。[295]

12月10日，摄政王被迫退位后，御史温肃上了一道折子，指控“庆亲王奕劻当国有年，那桐、徐世昌亦夙膺厚寄，年来万事隳坏，致酿成滔天之祸，谁实尸之？载泽主持铁路国有，与盛宣怀、瑞澂内外合谋，通国皆知，实为此次祸首。”[296]

当举国舆论汹汹，认为铁路国有政策是惹祸之源，载泽却想推卸自己的责任。10月20日，远在广东的左绍佐听说载泽到处给督抚发电报，说铁路收归国有，由摄政王一人主持，他和盛宣怀都不知道。“此等举动，殊属可笑。善则归君之义，岂未闻乎？事已至此，且须图谋救败之法，若君臣相诿，何益于事。且即主义实出于监国，伊为度支大臣，所职何事，乃谢以不知耶？近传其有告病之说矣。”[297]

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听说载泽称病，已请假。[298]

11月3日，英国人安格联给上海海关税务司墨贤理的信说：“财政混乱需要费许多事才能澄清，但是满人中唯一最能干的载泽被迫去职，度支部又少了一个好首脑了。”[299]

然而，许多中国人都说载泽误国，甚至称他为“首恶”。

10月18日，程德全呼吁罢亲贵内阁、立即实行宪政的电奏到京，内阁阁丞华世奎告诉张国淦：“摄政王不置可否。庆屡请休，总协理一同恳求罢斥。泽、洵、涛三人，不以为然，泽尤强硬，言荫昌大军，已到汉口，指日可平。”华叹息：“误国全在载泽一人”。[300]

10月29日，梁启超写信给徐君勉，两年来，与亲贵中载涛、载洵有联系。“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而涛与泽地位相逼，暗争日甚。去年解禁之议，涛、洵争之不下十次，而梗之者则泽也。泽与庆结，泽夫人为太后之妹，日日出入宫禁……泽遍布私人，如张謇、郑孝胥之流，皆为之鹰犬，而外之复与袁结”。[301]

张謇与载泽并无交情，郑孝胥因盛宣怀的关系而与载泽有来往是真的。

11月6日，恽毓鼎日记说：“大江以南割据之势已成。总之，兵权一失，倒持刀柄以授人，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已。中央集权，其祸如此！泽为首恶，洵、涛、朗次之，何面目以对九庙之灵乎？”

12月27日，他在日记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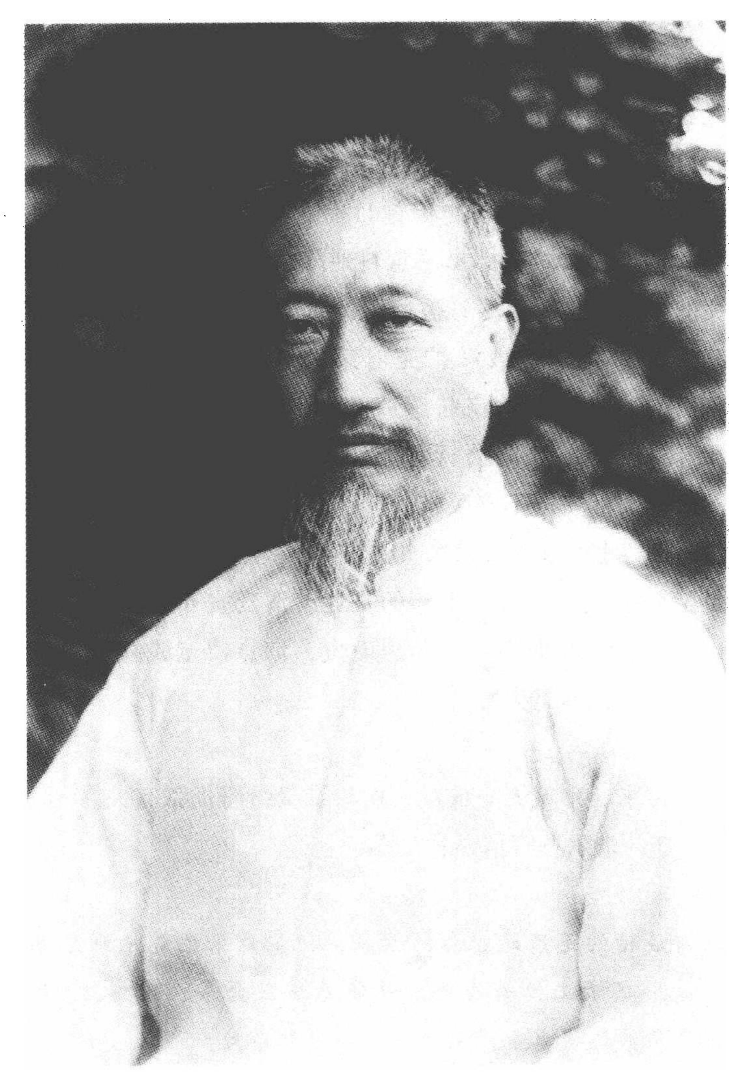
> 镇国公开缺。度支大臣载泽谢事后，在邸内设球房，终日与妻妾打球消遣。载泽字荫坪，宗室奕枨第五子，承嗣惠亲王绵愉之庶长子奕询，遂为睿皇帝子孙，醇贤亲王育为义子，娶承恩公桂祥次女，为孝钦显皇后内侄女婿。缘内援而参国政，削督抚兵权、财权归中央，倚任东洋留学生，建铁路收归国有政策，力庇其姊婿瑞澂，皆其主谋也。[302]

载泽是亲贵，要开刀也只能拿盛宣怀开刀。盛在宦海浮沉几十年，老谋深算，却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在劫难逃。

10月25日下午，资政院开会，议员在提案说明时纷纷呼吁“故非将盛大臣明正典刑，无以服人心而平乱事”。“是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303]

第二天，上谕下达：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汪荣宝为此高兴，当夜在日记中说：“斯足以伸国论而平公愤矣。”[304]

然而，资政院中要求杀盛宣怀以谢天下的呼声，并没有因他革职就消失。10月28日，朱尔典写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发出的电、信说：“第二天，事态发生了更严重的变化。资政院中散发了一份书面决议，请求朝廷下令将那位年迈的大臣立即处决。”莫理循也写信给伦敦：“当时资政院有人提出要处死盛。”[305]



熊希龄

想杀盛宣怀的人多矣，10月29日，梁启超写给徐君勉信中说到他的计划，“今日所欲办之事，……杀盛以快天下之心……”[306]

在外国人眼中，盛宣怀却是中国改革的希望，在英、美、德、法四国公使保护下，他取道天津、青岛去了日本。

毓朗的弟弟毓盈说，如果盛宣怀不做尚书，或许清朝不至于亡。[307]其实，亡清者不是盛宣怀，即使杀了他也不足以谢天下。铁路政策并非他一个人决定得了的。11月16日，他给朱尔典的信里虽感委屈：“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和度支大臣与我一起参与此事，但像目前这样的危机，没有时间来讨论错误是否完全在我。这一灾难突然出乎意料地降临到我身上。”同时说，“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突然变化，但尽管被褫职，我仍对政治事务感兴趣。”[308]

想起三年来，奕劻、载泽扩充府第，载洵、载涛、溥伦都忙于造园、修屋，手中无权的翰林恽毓鼎感叹：“呜呼！当国诸公，不得不任其咎矣。……十年来，……贿赂公行，无一事非因贿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而进，人心安得不去，大乱安得不兴乎？”

12月28日，他想起数年来亲贵乱国，“论天道，论人心，均应遭此祸”，痛惜的只是清朝失去了二百七十年的基业。清廷宣布退位之日，他在日记中一一评点诸亲贵：“劻耄而贪，泽愚而愎，洵、涛童騃喜事，伦、朗庸鄙无能，载搏乳臭小儿，不足齿数。”[309]

武昌消息传来，京城人心慌乱，即与亲贵纷纷提款有关。

10月23日，朱尔典写信给坎贝尔说：

> 目前最糟的是清廷沮丧的情绪，他们看来已觉悟到皇朝的星辰将落。……庆亲王忙着将他的珍物兑换成金条，以便逃亡时携带。摄政王两兄弟已将妻子送到郊外山中的隐蔽处。[310]

10月30日，御史史履晋上了一个奏折：“而各王公大臣府第，亟于自保财产，纷纷向银行提取现银，积存私宅，且有转存外国银行及收买黄金金镑者。耳目昭彰，人心愈加慌恐。应请密谕各亲贵，速将所提现款仍存大清银

行，流通市面，既可生利，又固大局，公私两有裨益。傥再不竭力维持，则人不聊生，将激成大乱，恐私产亦难保矣。”[311]

同一时期，类似折子还有不少。亲贵提款存到外国银行，在当时不是什么秘密，连数目也大致清楚。自10月12日以来，“乱事初起，众亲贵竞向银行票号提取现银，辇存外国银行，且有倒贴子金以求其收纳者。庆王最多，240万（外间传为2400万，恐无如此之多）。世中堂累代储积，有200万。那中堂亦有此数。洵、涛两贝勒则仅百万。此外，极少皆数十万。观此而近十年之朝政可知已，不酿成亡国之祸不止也。国苟亡，此金亦总归乌有耳”。

“此次迁避眷口，寄顿财宝，以贵族为最甚，宜乎隆裕皇太后慨然谓举朝无一忠臣也。”[312]

因国库枯竭，袁世凯这边不断催逼军饷，到12月，亲贵大臣才陆续有些捐款，但十分有限。12月12日，那桐决定给度支部银1万两和正金银行银票一张。12月21日他将一张正金银行的存单（有京平足银3万两），连同上次交出的现银1万两，合计4万两，作为公义堂借款，交度支部查收。[313]

12月20日，有人对郑孝胥说，“亲贵私蓄2900万两，皆不肯借作国债，惟庆邸出10万而已，虽谓亲贵灭清可也。”[314]

12月24日，日本公使伊集院走访庆亲王、袁世凯，当面对庆亲王说，当此皇室存亡危急之秋，皇族应该“踊跃输将，捐献财力、物力，以济国家燃眉之急”。

另有一个说法，日本公使伊集院对庆亲王说，“中国日患贫困，而公等此次所寄东交民巷之现银竟达2000万以外，即以我国正金行征之，吾确知其数过六七百万，乃一听国之危亡，绝不之助……”[315]

12月29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讲到了那天朱尔典、伊集院与袁世凯、庆亲王会谈时，伊集院对庆亲王说：

在日本，当革命来临时，国家的上层人物树立了爱国精神的楷模。我的岳父[大久保利通，1878年被暗杀]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五十圆。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



军咨大臣毓朗



海军大臣载洵



军咨大臣载涛



度支大臣载泽

> 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316]

同一天，恽毓鼎日记说，袁世凯亲自商请亲贵捐助，庆王仅捐银5万，载泽捐5000金，“以行贿所得不能兑现之大清银行期票抵之（纳贿例用期票，订明事成后付款。此5000两票为九月初期，其时乱事已起，所谋未遂，此票已成废纸矣）”，银行退还，载泽脸不变色。亲贵之中，庆王当权最久，家最富，载洵卖海陆军军官缺及崇陵监修差使，载泽卖各省监理官及盐政处差，所获都不少。“诸亲贵若能毁家纾难，不下2000万两，……呜呼！其如诸亲贵毫无心肝何？呜呼！大清若亡，公等历年敛聚之财，不见夺于敌人，则受赚干没于外国银行耳。……伤哉，痛哉！”[317]

其中说庆亲王捐5万两，不确。日本公使伊集院当日给外务大臣内田的电报称，前一天袁世凯告诉他，“贵公使日前向庆亲王苦劝之结果，好歹捐出10万两，其他皇族尚无一人响应”。[318]

12月26日，庆王府约度支大臣绍英去，令他两天后派人取10万两。[319]绍英日记所说可靠。

12月27日，荣庆向度支部交出爱国捐万元，“以尽寸心。闻交者尚少，所交列天字第十号”。[320]

12月3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姜桂题、冯国璋、张勋、曹锟、张作霖等15名北方将领致电内阁，反对共和，愿意一战，只是饷源枯竭：

> 现闻北京各外国银行有现银不下三四千万两，统为亲贵大臣所存放。应请旨饬下各亲贵大臣分别提回，接济军用，作为国债。并饬下度支部妥定章程，以便事后归还。

当天恽毓鼎日记说，他们还分电庆、礼、肃、洵、涛、泽、朗、伦、那桐、世续十处，“请亲贵出财充饷，我辈出性命赴敌。如犹吝惜不出，军士将暴动矣（以劫掠恐之也）。诸贵得电甚惧，共谋解囊”，他以为每月兵饷48万两，“如果有银500万，则可支持一岁”。[321]

第二天，许宝蘅日记说：“昨日各路军队统领来电，请亲贵牺牲财产，将士牺牲性命，不认共和。”

1912年1月2日，袁世凯入宫，与隆裕太后有这样一番应答：

隆裕：“……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袁：“奕劻出银15万。”隆裕：“15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尽可向他们要。”[322]

1月3日，隆裕太后下旨：

> 现在库空如洗，各军待饷孔急。着宗人府传知各王公等，将存放私有财产尽力购买国债。并着度支部妥定归还章程，毋令丝毫亏损。

1月4日，赵尔巽、陈夔龙、段祺瑞等八位封疆大吏发出代奏电，呼应军方的通电：

> 外间盛传，仅亲贵存储外国银行之款，俱系现银，数及3000万。即无此数，但能尽数提买公债，饷源顿旺，军气必张。闻各使会议时，日使曾面诘亲贵，请将存款助饷，并指出某人存某行款若干。断非虚语。……亲贵大臣与国休戚，岂容漠视。国存则款固有着，国亡则家亦随之。[323]

东北新旧军将校孟恩远、张作霖等19人也联名通电各王公大臣，“请慨助军饷，并将存放外国之3000余万，悉数助军，则财散民聚，朝廷收辅助之效；而军兴饷足，大局有挽回之机”。[324]

1月5日，隆裕太后再发上谕，将此电转发给各省督抚，并抄送宗人府，传知各王公等，一体阅看。当天，庆王叫绍英两天后派司员去王府领银5万两，“作为购买债票之用”。[325]

加上前次的10万两，庆王一共拿出15万两，与袁世凯所陈一致。

1月11日，那桐再交出京平足银8万两，连同上次交的，合计11万

2800元，作为他认购爱国公债之款，领有收据一纸。2月9日，“度支部送来爱国债实收一纸，11万2800元，以备换股票之用”。[126]

1月14日，绍英到内阁会同外务大臣胡惟德交覆总理大臣袁世凯函，“为查明亲贵大臣在各银行并无存款事”。[127]可惜他的日记仅此一句，到底他们调查的存款情况如何，无法确知。

亲贵中只有一个恭亲王溥伟愿毁家报国，可惜无权也无钱。他与袁世凯见面时，袁向他诉苦：“人心尽去，我处兵弱饷缺，军械不足，奈何！”他回到府中，跟他母亲说，“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得到母亲的同意，他准备拿出所有古画古玩变价。[128]

1月19日，《盛京时报》发表论说《论亲贵大臣之不爱国》：“初不料度支部之所发表，计收到各亲贵大臣报效军饷银两及短期公债、爱国之公债之详细数目统计不过百余万元，仅足供军饷半月之用。”[129]

1月29日，离清廷退位之日迫近，恽毓鼎回顾当日：“当江汉事起，不过一隅之乱耳，乃纷纷提取现银数千万，辇而纳诸外国银行，市面为之窘滞。租界一席地，争先恐后，借以藏身。士民为之动摇，外国为之齿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亲贵已播亡国之种，安得不收亡国之果乎？”[130]

七、退还是不退

袁世凯东山再起，逼退摄政王，即派唐绍仪前往南方议和。

1911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判断，“袁世凯本人坚持君主立宪之决心业已动摇；甚至皇室懿亲，如庆亲王等，亦有转而赞成召开国会议决政体之迹象”。[131]

徐世昌回忆，12月27日接到唐绍仪要求召集临时国会来决定国体的来电，袁世凯约他商量，“认为国体共和，已是大势所趋，但对于宫廷及顽强亲贵，不能开口”。由他先去密陈庆亲王，得其许可，袁即往庆王处

计议，约集诸亲贵在庆王处讨论，只有载泽未到，决定改由内阁奏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会议。[332]

次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先召集近支王公会议，徐世昌称，“庆邸首先发言，毓朗、载泽表示不赞成，然亦说不出理由。其余俱附庆议”。当天参加的还有载沣、善耆、载洵、载涛、载泽、溥伦等。[333]

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及各国务大臣，袁回答，我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有关皇室安危大计，应垂询皇族近支王公。太后再召见近支王公，决定下旨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还是民主，付之公决。[334]

谕旨中有一句话：“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当夜，荣庆读到这个懿旨，长叹一声，“以国体付之会议，朝廷让步至矣”。[335]

叶昌炽在苏州读到懿旨，当天日记中说：“朝廷爱民如子，舍己从人，至德如天如地，驾唐虞而上之，草莽小臣读之尚泣数行下……”[336]

12月29日，许鼎霖写信给赵尔巽：

> 昨谒袁总理，知国会解决君主、民主系两次召集。近支王公议决，除泽公、肃王反对外，余皆赞成。惟泽、肃主持外援，亦非计耳。[337]

赵秉钧后来告诉唐绍仪内阁的秘书长魏宸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不再把重心放在开临时国会上面，而决计从清室着手，“乃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皇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338]

庆亲王就是袁世凯手中的一张大牌。载润回忆：

> 袁内阁成立后，载沣多次派王公、贝勒到奕劻家敦请，勉强进内应隆裕太后的召对，进内即对大众声言：“革命军队已有五万之众，我军前敌将士皆无战意。”到召对室，又申前言：“革命军已有六万之众，势难与战。”那彦图当时嘲笑他“数分钟内，革命党军队又增加了一万人之众，何其如此之速耶！”后闻人言，他受袁世凯数

十万之贿，故为此语。[339]

君主立宪会曾给恭亲王溥伟来信，称宗亲中人有人主张共和，所指的就是庆王和溥伦。

12月24日，庆亲王对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说："在此情况下，若问本人最后是否同意共和，本人并不坚决认定共和制度绝不可行，但按现时国民程度，若想彻底实现共和，用以增进国利民福，则觉万无可能。"[340]

1912年1月16日举行御前会议，胡惟德回忆，"宗室各王公等齐集，伦贝子（溥伦）主张自行颁布共和，庆邸附和之。"隆裕太后抱着皇帝大哭。载沣无言，溥伟、载泽反对甚力，无结果。[341]

当天，恽毓鼎听说，在决定和还是战的御前会议上，亲贵都愿退让，"……大清皇族既甘心禅让，求保余生，则诸臣虽忠勇奋发，果为谁出力乎？皇家自愿亡国，真中国三千年历史未有之奇。列祖列宗乃生此等子孙，岂非气数！"

次日，他听说亲贵会议上，"奕劻力主禅让，溥伦和之，因蒙古王公反对而散"。定于19日再议，他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岂奕劻等所能送人耶？"[342]

1月19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见醇亲王、恭亲王、睿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没有庆王。太后问："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他们一致说："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太后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看。过二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才说：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载沣答："是。"溥伟接话："既是奕劻这样说，现在载沣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劻欺罔。"那彦图奏："既是太后知道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

当天召见的王公贝勒共14人，只有4个人发表意见，其他人都缄口不言。[343]

胡惟德的回忆与溥伟所记略有出入：这一天开会，庆王仍未至，溥伟、

载泽主持仍坚决，庆王不来据说是为宗社党人挟持。伦贝子出尔反尔，也是因此。载洵、载涛两贝勒未发一言。[344]

毓朗回忆，“当时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争之甚力，以至泣下，王公无赞成禅让者”。[345]

当时京中有人极力反对并痛诋庆王，使庆王不敢发言，提出请假。[346]

过了两天，载沣对溥伟说：“这两日来，不知是怎样运动？老庆依然入朝，太后意思也颇活动，奈何奈何！”“老庆”就是奕劻。生性懦弱、已不在摄政王位上的载沣只能徒呼“奈何”，而朝廷逊位之说已传开，1月20日，奉天咨议局等致内阁电说：“乃日来更有可骇可怪之名词隐约人口，皆以为朝廷将有逊位之说。”[347]

1月22日，“亲贵等入对，仍无决定方法，惟议定俟国会决定国体”。[348]

这一天，高拉尔德致信法国陆军部长说：

> 关于皇帝退位问题，一周来未见任何决定。
>
> ……
>
> 王臣们的御前会议在皇宫举行。在第一次会议中，老亲王充当了退位的辩护人，只有很少的人反对他。但在第二次会议时，老亲王改变了观点，并带动了皇族会议的好几个成员和所有的蒙古亲王附和于他。[349]

“老亲王”就是庆王奕劻。

第二天，王荫棠给东北的袁金铠等写信：

> 今日御前会议，各亲贵均不赞成共和，泽公、肃邸反对尤力。皇太后一味痛哭，愁无以应对国务大臣，赖亲贵力争，未准共和之议。[350]

“各亲贵均不赞成共和”，显然不确，此时，恭亲王溥伟已被排出，在会上发言反对的，只有载泽、肃王善耆两人而已。1月24日，郑孝胥日记说：

“泽公反对逊位，主义甚正，惜无人助之，恐不足以制项城。”[351]

毓朗贝勒在御前会议上的发言：“要战，即效命疆场，责无旁贷。要和，也要早定大计。”叫人摸不清他到底主张什么。毓朗解释，“朝廷自王公等大臣全体辞职，兵权、政权、财权尽归一人之手，用人、行政尽一党是从，此时欲责皇太后坚持不让，事已无及，甚则弑逆之祸在所不免矣。余固不赞成禅让，而不敢为激烈言也。”[352]

此前，11 月 14 日他还对日本公使信誓旦旦地说：“在革命军逼迫下，万一本国政府陷于危亡，本人自当誓死抵抗……”[353]

然而，真到了存亡危急之际，连一句“激烈”话也不敢说，只顾保全性命、财产。毓朗如此，其他多数亲贵何尝不是如此。林纾给吴畲芬的信中说：“……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万无更翻之理，……大抵亲贵群诺，共和立成，亲贵反对，共和亦成，不过在此数日中耳。”

1 月 26 日，段祺瑞等 47 将领“恳请立定共和政体”的电报到京，宗室各王公“人人变色，无敢有异词者”，军咨使良弼被炸死，更是人人自危。1 月 28 日，奏事处传旨，近支王公、蒙古王公、国务大臣及冯国璋、姜桂题、乌珍明日预备召见，已在安排后事。30 日，皇太后召见庆王，“又召开御前会议，亲贵即无持反对论者矣”。

2 月 2 日，国务大臣入宫，商酌优礼皇室条件，“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354]

2 月 5 日，段祺瑞与部下将领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内阁电中说，时局危迫，“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在清朝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亲贵当中，真正反对退位的只有载泽、溥伟等二三王公而已。2 月 4 日，郑孝胥日记说：“苟皇室有死社稷、殉宗庙、宁死不辱之志，则忠臣义士激发奋厉，纵至亡国，犹可为史册之光耳。今闻惟载泽、溥伟不愿逊位，其余皆苟活偷生，不敢反抗。王室如此，而欲责忠义于臣民，难矣。”[355]

反对退位的还有一个肃亲王善耆。他是赞成立宪的，认为“若不速开国会，民心忿极，大祸必发”。这位曾任民政部大臣的亲王比较有个性，也有眼光和远见，因此招庆王、袁世凯之嫉。溥仪日后回忆，“汪精卫被捕受到肃

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经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56]

杨荫杭先后留学日本、美国，1910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书，善耆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法律课。杨绛回忆：

>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个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57]

"武昌爆发革命，北京之王公大臣狼狈恐惧之状达于极点，犹如风声鹤唳使其胆寒。上自摄政王，下至小吏旗兵都不知所措，且不顾国家之命运如何，唯独担忧自家生命财产之安危，丑态百出，……独肃王不然，犹如预期之时代到来，毫无惊异之状，只是大呼奴辈误国，顿足慨叹。"日本人川岛浪速透露，肃王曾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挽救清朝的命运。

1912年1月29日，高拉尔德给法国陆军部长的信里汇报："王公大臣们似乎在徒劳地请求日本作出干预行动，但这个强国拒绝进行孤立的和已经太迟的行动。"[58]

"肃亲王抱有一片回天之希望，但警察力量已被剥夺，离开了政权，而所有之权力落于袁一人手中，不仅赤手空拳没有任何力量，而且袁深恐满人等出而反抗，准备倾尽兵力、警力监视之。"王公们几乎都已在袁世凯面前表态赞同共和，"袁将此作为日后诺言，记录在案并签字盖章，大势终去也。直至最后宁死不屈者，唯肃、恭二王。"[59]

就是恭亲王也签了字。1月25日，段祺瑞致电内阁说，各路将领"昨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多愤愤不平，要求代奏……"，1月26日，47位将领的联名电称，宫廷本已定改为共和政体，"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袁世凯将此电给亲贵传阅，溥伟愤然说："本

爵等前因朝廷既愿让政权，不敢反对，已先后署名认可，何竟指为败类？且祺瑞此电，胁迫不太甚耶？”说话时声色俱厉。1月30日午后，溥伟听说赵秉钧将对他不利，避往西山。[360]

溥仪回忆录说，“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到外国学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后来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占领的旅顺，都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去到他们国家是不适宜的”。[361]

隆裕太后下达退位诏书时，对赵秉钧等国务大臣说：“予三年中深居宫中，不预外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说到这里，她失声大哭。接着又说，“亲贵至今日，不出一谋，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只知性命财产，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362]

退位诏一下，“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在会议上一直一言不发，颁布退位诏后回到家去抱孩子去了”。[363]五年后（1917年）庆王死于天津，内务府拟给他一个谥号“哲”，溥仪不同意：“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最后总算给了一个“密”字，据说是“追补前过”的意思。[364]

退位诏下当日，徐世昌日记说：“今日圣旨宣布共和政体，组织临时政府”；那桐日记说：“本日奉懿旨三道，宣布共和立宪国体。”荣庆日记说：“……今日谕旨宣布共和。”绍英日记说：“奉旨三道，一宣布共和政体，一宣示优待等条件，一责成各长官毋旷阙官……良可慨也。”

一个朝代的陨落，在这些大臣私下的日记里，竟看不出有什么痛苦，似乎连震惊也没有，平静得出奇，尤其那桐与徐世昌，他们的生活表面上也没有发生变化，照样地蒙太后恩赏，此前此后，他们日记中不断记录着得到的恩赏：

有吃的：如腊八粥、果盒菜碟、春饼、花糕、果品、伏糖、蜜饯、梨、馒头、果盘奶卷、黄鱼、汤羊、野鸡、熏猪、霍鹿、藕粉，等等。

有穿戴的：大卷八丝缎、江绸、帽、加宽绛色江绸、加宽米色江绸、加

宽竹灰江绸、加宽二蓝江绸……

有用的：从各色纸、各色绢、湖笔到荷包、手巾。退位诏下达当天，他们都收到了恩赏的荷包。

有皇太后御笔写的字：写得最多的“福”、“寿”，也有“卿云”、“光辉日新”等。

面对一个朝代的结束，深感痛心的乃是恽毓鼎这些手中无权的文人。2月12日，他从赵秉钧那里得知已宣布辞位：

> 呜呼！国竟亡矣。三万六千场之欢娱，极于亲贵；二百七十年之宗社，渺若云烟。天耶人耶，真堪痛哭。……自武昌乱起，至今不过一百二十日。八月十九以前，犹是太平一统江山也。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其实乱亡之祸，早伏于十年之前。[63]

2月13日，叶昌炽在苏州得知退位诏颁布，感叹说：

> 自来失国皆于孤寡之手，自八月鼎沸至今五月，沦胥之祸亦未有易于此时者也。呜呼噫嘻。

2月15日，缪荃孙在上海得知让位诏书已颁：

> 清国遂亡，自此以后，偷息人间，与已死何异。

2月17日，郑孝胥将三道诏书一字不落地抄在日记，感叹说：

> 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

而那些亲贵王公反不如他们，难怪湖南王闿运在2月19日的日记中嘲笑他们：

清廷遂以儿戏自亡，殊为可骇，又补廿四史所未及防之事变，以天下为神器者可以爽然。[366]

成都将军玉昆给儿子的家书说："我清家二百七十余年，无日无时不以民依为念，谁料如此民心天命也。乃最痛恨者，诸贵胄家，何面目对列祖列宗乎！贪生怕死、惜财爱命之辈，芳流千古，闻者无不痛息。"[367]

当年10月下旬，黄兴乘"楚同"军舰回故乡湖南，黄仲垲随行，在长江上连床夜话，黄兴亲口说，9月到北京，备受各界欢迎，宴席应酬每日都有。让他感到可笑的是，清室近支如载沣、载涛、载洵辈也设筵请他，见面就拱手致谢说："此次优待条件甚蒙先生维持，感谢无似。"黄兴"窘极不知所答"，而他们又殷勤劝酒，席终，拿出一个大大的留音机奏曲，说唱的是谭鑫培的某剧，问："先生亦乐此否？"黄兴只有唯唯而已，"观其恬恬熙熙，不知亡国为何事、令人感憾不已"。[368]

清室逊位，荫昌做了袁世凯的总统府侍从武官长，亲贵载涛、载洵、溥伦等也都想当侍从武官，"着军服佩刀以为荣，竟不知亡国之恨矣"。[369]有诗云：

依然乘马裼轻貂，何论新朝与旧朝。亲贵不知亡国恨，侍从争愿佩军刀。

【注释】

① 许云：《廖克玉谈武昌起义——访辛亥年湖广总督瑞澂的夫人》，香港《七十年代》，1980年第7期，第67–68页。

②《近代史资料》总72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21页。

③ 周钟岳：《惺庵日记》，《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2页。

④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第80页。

⑤ 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五十期。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40页。

⑥《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419页。

⑦《许宝蘅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368页。

⑧《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1、552页。

⑨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9页。

⑩《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24页。

⑪《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6页。

⑫《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1、203页。

⑬《近代史资料》总72号，第122-123、126页。

⑭《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2页。

⑮《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211页。

⑯《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3页。

⑰《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69页。

⑱《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4页。

⑲《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1页。

⑳《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78页。

㉑《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26页。

㉒《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71页。《辛亥革命》五，第299页。

㉓《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5页。

㉔《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47页。

㉕ 上海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143页。

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335页。

㉗《民立报》1912年7月26日刊载沪军都督陈英士给会审公廨的公文，要求查封他的遗产，他在湖广总督任上积欠官款四万余两，"正在核办间，忽接革督于日内因病身故"。他在上海有不少产业，要会审官交涉，予以查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52页。

㉘《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48页。

㉙《近代史资料》总25号，中华书局1961年，第563页。

㉚ 转引周秋光：《熊希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6页。

㉛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总第53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5页。

㉜《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92-93页。

㉝ 参考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第367、

440页。

㉞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271、272页。

㉟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第90页。

㊱《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164、122页。

㊲ 同明等编：《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页。

㊳《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164–165页。

㊴《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第3141页。《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3页。

㊵《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70页。《湘绮楼日记》，第3141页。

㊶《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91、92页。

㊷ 左舜生：《记辛亥长沙起义》，陈正茂主编《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下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1624页。

㊸《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4页。

㊹《湖南反正追记》，第276页。

㊺《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71页。

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12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173页。

㊼《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5页。

㊽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年，第252页。

㊾《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82页。

㊿《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40页。

51《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10、371、411页。

52《辛亥革命》六，第263、264页。

53《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282页。

54 贵阳邮政司都德哈给英国驻云贵总领事额必廉的信，《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205页。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222、223页。

55《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9–400页。

56《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161、165–166页。

57《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4、5页。

58《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7页。

59《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77页。

60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24页。

61《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7页。

62《辛亥殉难录》，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第44页。《周雍能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年，第 8 页。

⑥③《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39 页。

⑥④《吴铁城回忆录》，三民书局 1971 年，第 28 页。

⑥⑤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第 17 页。《近代史资料》总 25 号，第 561–562 页。

⑥⑥《党人三督传》，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第 83 页。

⑥⑦《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359 页。

⑥⑧《辛亥革命》六，第 395 页。

⑥⑨《近代史资料》总 25 号，第 568 页。

⑦⓪《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2 页。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第 239 页。

⑦①《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18–119 页。

⑦②《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中华书局 2007 年，第 44 页。

⑦③ 李则纲：《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 21 页。

⑦④《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447 页。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243 页。

⑦⑤《申报》1911 年 11 月 13 日。

⑦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334 页。

⑦⑦《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第 875 页。

⑦⑧《辛亥革命》七，第 217–218 页。

⑦⑨《辛亥革命》五，第 445 页。

⑧⓪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273 页。

⑧① 左绍佐日记，《近代史资料》总 25 号，第 513 页。

⑧②《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5 页。

⑧③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361 页。

⑧④ 李准：《光复广东始末记》，《辛亥革命》七，第 245、246 页。

⑧⑤《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 336 页。

⑧⑥《近代史资料》总 25 号，第 515 页。

⑧⑦《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06 页。

⑧⑧《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 23、24 页。

⑧⑨《郑孝胥日记》三，中华书局 1993 年，第 1357 页。

⑨⓪《历史档案》1981 年 3 期，第 61 页。

⑨①《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 296 页。

⑨②《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41 页。

⑨③《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 1 号，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第 122 页。

㉔《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 303 页。
㉕ 法国陆军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370 页。
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 305 页。
㉗《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0 页。
㉘《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 1 期，126、128 页。《辛亥革命》七，第 339 页。
㉙《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 1 期，第 129 页。
⑩《湖南反正追记》，第 245 页。
⑩《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 307 页。
⑩《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275 页。
⑩《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376 页。
⑩《辛亥革命》七，第 342 页。
⑩《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2 页。
⑩《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81 页。
⑩《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 1 期，第 131 页。
⑩《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3 页。
⑩《党人三督传》，第 57 页。
⑩《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2 页。
⑪《辛亥革命》五，第 344、308 页。
⑫《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15、116、69 页。
⑬《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9 页。
⑭《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54 页。
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375 页。
⑯ 法国陆军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370 页。
⑰《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78 页。
⑱《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179 页。《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75 页。
⑲《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194 页。《厚庄日记》1911 年，未刊稿。
⑳《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332 页。
㉑《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207 页。
㉒《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314-315 页。
㉓《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9 页。
㉔《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510-511 页。
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397 页。
㉖《辛亥革命》八，第 330 页。

⑫《辛亥革命》七，第97页。
⑱《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32页。
⑲[日]沪友会编，杨华等译：《东亚同文书院旅行记》，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0页。
⑬《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14页。
⑬《叶圣陶集》第1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9、50页。
⑬《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28、82页。
⑬《缘督庐日记钞》，第117页。
⑬《陈英士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7年，第15页。
⑬[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1895—1912），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824页。
⑬《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25、472页。
⑬《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4页。
⑬《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75、876、659页。
⑬《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7、120页。
⑭《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92页。《辛亥革命》八，第331页。
⑭《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45页。
⑭《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76页。
⑭《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史料》，第147页。
⑭《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56页。
⑭《郑孝胥日记》三，第1355页。
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257、259页。
⑭《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3页。
⑭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40、141页。
⑭《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1页。
⑮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02页。
⑮《缘督庐日记钞》，第230页。
⑮《郑孝胥日记》三，第1355页。
⑮《缘督庐日记钞》，第228、229页。
⑮《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57页。
⑮《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22页。
⑮《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147页。
⑮《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48页。
⑮《张竞生文集》下卷，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357页。

⑮⑨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269页。

⑯⓪《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39页。

⑯①《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399页。

⑯②《郑孝胥日记》三，第1387页。

⑯③《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61、74页。

⑯④《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85页。

⑯⑤《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377页。

⑯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181页。

⑯⑦《辛亥革命》七，第115页。

⑯⑧《张人骏家书日记》，第141–146页。

⑯⑨《辛亥革命》七，第120页。

⑰⓪《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传记文学杂志社1968年，第23页。

⑰①《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203页。

⑰② [瑞典] 马悦然著，李之义译：《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85页。

⑰③《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8页。

⑰④《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195页。

⑰⑤ 转引自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⑰⑥《缘督庐日记钞》，第225页。

⑰⑦《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98页。《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7页。

⑰⑧《郑孝胥日记》三，第1355页。《缘督庐日记钞》，第228页。

⑰⑨《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162页。

⑱⓪《湖南反正追记》，第256页。

⑱①《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第58、26、32、33页。《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34页。

⑱②《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246页。《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0页。

⑱③《荣庆日记》，第203页。

⑱④《东亚同文书院旅行记》，第76、73页。

⑱⑤ 陈文斌《生平记》手抄件。

⑱⑥ 周开庆编著：《四川与辛亥革命》，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64年，第286页。

⑱⑦ 陈文斌：《生平记》手抄件。《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14页。

⑱⑧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255页。

⑱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第 96 页。

⑲⓪ 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第 239 页。

⑲①《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 104 页。

⑲②《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315 页。

⑲③《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73 页。

⑲④《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26 页。

⑲⑤《郑孝胥日记》三，第 1401 页。

⑲⑥《湖南反正追记》，第 259 页。

⑲⑦《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26 页。

⑲⑧《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8 页。

⑲⑨《郑孝胥日记》三，第 1381、1383-1384 页。

⑳⓪《缘督庐日记钞》，第 247 页。

⑳① [法] 博里斯·马尔坦，张宇凌译：《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儒勒·乐和甘——中华帝国混乱年代期间法国驻华领事》，岳麓书社 2005 年，第 77 页。

⑳②《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1 页。

⑳③《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 110、169、171 页。

⑳④《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 213 页。

⑳⑤《口述历史》第七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 年，第 14 页。

⑳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 214 页。

⑳⑦《口述历史》第七期，第 14 页。

⑳⑧《近代史资料》总第 53 期，第 75 页。

⑳⑨《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3 期，第 171 页。

㉑⓪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411 页。

㉑① 岑春煊：《乐斋漫笔》，《近代稗海》第一辑，第 106 页。

㉑②《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69 页。《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40 页。

㉑③ 郭沫若：《少年时代》，第 240 页。

㉑④ 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第 217 页。

㉑⑤ 郭沫若：《少年时代》，第 236、237 页。

㉑⑥《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59 页。

㉑⑦《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43 页。

㉑⑧《惺庵日记》，《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 221-222 页。

㉑⑨《辛亥革命》四，第 496 页。

㉒⓪《近代稗海》第一辑，第 107 页。

221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273页。

222《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69页。

223《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47页。

224《辛亥革命》五，第454、477、483、488页。

225《近代稗海》第一辑，第107页。

226《四川与辛亥革命》，第185、186页。

227《郑孝胥日记》三，第1380、1381、1382页。

228《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34-35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412页。

229《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77页。

230《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史料选译》，第350页。

231《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4-117页。

232《陶庐老人随年录》，《近代稗海》第十二辑，第401页。

233《吴宓日记》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8页。

234《缘督庐日记钞》，第255页。

235《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三卷，第542页。

236《郑孝胥日记》三，第1407页。

237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212页。

238《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92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182页。《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7页。

239《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8页。

240《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03、204页。

241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273页。

242 [英]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张士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8、215页。

243《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04、305页。

244《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134、135、136、197、149、185页。

245《郑孝胥日记》三，第1390页。

246《汪荣宝日记》，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1137页。

247《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158、159、161、188、192、193页。

248《奉天三十年》，第221页。

249《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11页。

250《奉天三十年》，第221页。

㉛《韬养斋日记》影印本；《荣庆日记》，第196页；《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700页。

㉜《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344页。

㉝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104页。

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350-351页。

㉟ 颜惠庆著，吴建雍等译：《颜惠庆自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2页。

㊱《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343-344页。

㊲《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485页；《近代稗海》第一辑，第457-458页，474页回忆又说是10月15日在北京西车站动身。《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2页。

㊳《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8页。

㊴《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93页。

㊵《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763页。

㊶《汪荣宝日记》，第1024页。

㊷《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62页。

㊸《辛亥革命》五，第429页。

㊹《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81-82页。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108、269页。

㊺《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3页。

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310页。

㊼《张知本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9-20页。

㊽《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16-217页。

㊾《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94页。

㊿《辛亥革命》五，第455-456、402页。《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18页收有此折。

(271)《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5页。

(272)《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33、434页。

(273)《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01页。

(274)《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32、433页。

(275)《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72页。

(276)《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784、817页。

(27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2、99页。

(278) [英] 丁格尔著，陈红民等译：《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

㉗⑨《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5、574、571页。
㉘⓪《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1页。
㉘①《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62页。
㉘②《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50页。
㉘③《颜惠庆自传》，第92页。《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8、79、217页。《我的前半生》，第15、19页。
㉘④《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1页。
㉘⑤《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350页；《辛亥革命》五，第445页。
㉘⑥《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65页。
㉘⑦《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3-564页。
㉘⑧政协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82页。
㉘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3页。
㉙⓪《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1页。
㉙①《那桐日记》，第700-701页。《荣庆日记》，第197页。《韬养斋日记》影印本。
㉙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775页。
㉙③《那桐日记》，第706页。
㉙④《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82、83页。
㉙⑤《那桐日记》，第702、703、704页。
㉙⑥《辛亥革命》五，第508页。
㉙⑦《近代史资料》总25号，第510页。
㉙⑧《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46页。
㉙⑨《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54页。
㉚⓪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273页。
㉚①《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1页。
㉚②《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7、566-567页。
㉚③《辛亥革命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75-176页。
㉚④《汪荣宝日记》，第1034页。
㉚⑤《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58页。《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771页。
㉚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1页。
㉚⑦《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㉚⑧《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137页。
㉚⑨《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71、563、577页。

⑩《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 99–100 页。
⑪《辛亥革命》五，第 479 页。
⑫《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8、559 页。
⑬《那桐日记》，第 705 页，后改为债券。
⑭《郑孝胥日记》三，第 1372 页。
⑮《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335 页。《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编，第 358 页。
⑯《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17 页。
⑰《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7 页。
⑱《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335 页。
⑲《绍英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第 263 页。
⑳《荣庆日记》，第 201 页。
㉑《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7 页。
㉒《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87 页。
㉓《辛亥革命》五，第 317–320 页。
㉔《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三卷，第 62 页。
㉕《绍英日记》，第 268 页。
㉖《那桐日记》，第 707、708 页。
㉗《绍英日记》，第 269 页。
㉘《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 3 期，第 171 页。
㉙《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三卷，第 472 页。
㉚《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74 页。
㉛《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326 页。
㉜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294 页。
㉝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294 页。《那桐日记》，第 706 页。《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87 页，没有提到毓朗。
㉞《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85 页。《绍英日记》，第 264–267 页。
㉟《荣庆日记》，第 201 页。
㊱《缘督庐日记钞》，第 244 页。
㊲《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 353–354 页。
㊳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298 页。
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466 页。
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319 页。
㊶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309 页。

㉞《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70、571页。

㉞《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72–173页。

㉞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309页。

㉞毓盈：《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12页。

㉞《汪荣宝日记》，第1121页。

㉞《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134页。

㉞《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90页。

㉞《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404页。

㉟《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136页。

㉟《郑孝胥日记》三，第1388页。

㉟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7年，第31页。毓盈：《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12页。

㉟《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66页。

㉟《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93页。

㉟《郑孝胥日记》三，第1390页。

㉟《我的前半生》，第27页。

㉟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载杨绛整理：《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41页。

㉟《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375页；第七卷，第408页。

㉟[日]川岛浪速：《肃亲王》，《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378、379–380页。

㊱《辛亥革命》八，第551页。《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73页。

㊱《我的前半生》，第31页。

㊱《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76页。

㊱《我的前半生》，第31页。

㊱秦国经编著：《溥仪小朝廷逸事》，南粤出版社1986年，第47页。

㊱《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76–577页。

㊱《缘督庐日记钞》，第253页。《艺风老人日记》，第2449页。《郑孝胥日记》三，第1396页。《湘绮楼日记》，第3161页。

㊱《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15页。

㊱黄仲岂（逸民）《辛壬闻见录》，《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㊱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99页。

第六篇　谁覆清廷？

1911年11月21日，不忍看着清朝垮台的恽毓鼎在日记中痛言：

“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三妖之中，尤以第一种为诸魔之母。”

他的观察是准确的，留日学生、新军、立宪派，确是结束清朝的三个主要力量，也是晚清最后这些年成长起来的新兴力量。11月26日，他说：“此次乱事皆成于留学生，背负国家，荼毒生灵，天道犹存，此辈断难幸免。”追根溯源，他认为“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①

在此之前，6月26日，武昌学生朱峙三日记说：“省城各学堂、新军有知识者，均同情排满革命，当局正设法制止。”②

10月27日，广东道台左绍佐日记说：“风潮之起，不知其所自。孙汶倡为革命之说，宗旨以排满为主，康、梁则以保皇为说，皆与政府反对。其根芽在庚子以前，尚隔于海外；自庚子后，变政之事行，送子弟赴东西洋游学，内则各省征兵，于是学生被其煽惑，新军受其影响，而内面乃始骚然矣。迄今学界、政界、军界，皆有人焉。”③

处于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这些人，都有这样的看法。11月7日，严复给莫理循写信，归纳目前这场起义的远因和近因，第三条即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④

11月27日，高拉尔德写信给法国陆军部长也说：“中国的革命首先植根

于军官和从日本回国的学生中”。[5]留日学生是这场革命的推动力，新军将领、军官中有不少留日士官生，立宪派中也不乏留日学生。这年4月29日，广州黄花岗起义两天后，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濑川向小村外务大臣汇报：“这次举事之革命党，都是年少留学生，其人员大约不超过三百人，其中曾在日本的人超过半数。”[6]

一、学生

当武昌革命初起，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从上海赶到武汉，10月24日，他到黄鹤楼下访黎元洪，但因黎军务繁忙而不得见。他发现：

> 革命党员在本部任要职者不少，日本留学生甚多，有帝国大学、同文书院、高等农林学校等在校学生。各种事务采取合议制，并无特别杰出之人物。军务以外之事，似决定于革命党之留学生之手。[7]

黑龙会《时事月函》编辑北一辉以特派记者身份赶赴中国，10月底抵达上海，11月1日至18日，他给黑龙会发出13封信，后来又发出36封电报，他的判断是：“革命运动的核心为留日学生”。他不懂汉语，在中国只能和懂日语的人来往，从上海到武汉，跟随宋教仁到南京、镇江等地，一路上从未感到语言不便。不要说革命阵营的重要人物陈英士、黄兴、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学生，在武昌都督府，他目睹留学生如潮水般的从日本赶回来，晋见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他感叹说，这是“留日学生同心协力主谋的革命”。

他写信给黑龙会的友人清藤幸七郎：“看这些留日学生的干部们，他们的思想如同日本人，他们的神色也如同日本人，他们这种提起空枪准备抢夺敌军弹药而勇往向前跃进的动作也如同我们日本人啊！……日本的教育造就了中国的革命思想，多的时候甚至有一万五千名留日学生，以及前后将近数

万的留日学生，皆是来自四万万中国不同阶层成员的代表子弟。”[8]

北一辉自述：“亲眼见到在上海秘密机关出入往来的几乎全是日本留学生。袭击机器局前的队伍集合，义士们穿的都是立领铜扣服装。听到武汉首义成功的消息后，络绎不绝奔往各省的革命义士，昨天还是住在东京神田公寓里的士官学校寄宿生或无故逃课的学生。所以，留学生服甚至被戏称为革命服。而且，不仅在上海，即便在日本东京也能耳闻目见此等景象。”[9]

留日学生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及陆海军的主要职务，在临时参议会的38个参议员中，至少有10人曾留学日本。有人自南京到上海，对郑孝胥说，“革党中皆日本学生用事，排旧人，排西洋学生……”[10]虽然，内阁总长中王宠惠、陈锦涛、伍廷芳是留学美、英出身的，张謇、汤寿潜等为科举出身，但政府中次长以下以留日学生为主。北一辉、宫崎滔天等日本人都欣喜地发现，在政府各机关中讲话无需翻译。

留日学生潮水般的回国，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报告中留下了一些记录：

11月15日　今晨七时半日轮春日丸（Kasuga Maru）到达日本邮船会社码头。三等舱有131名中国乘客、二等舱19名。他们都是学生，都没有辫子，有的穿校服，有的穿西装，有的穿和服。其中大多数住到汉口路和松江路的客栈去了。（《申报》11月17日报道，“沪军都督昨据东京同志报告，谓有留日学生二百数十人，已乘春日丸启程回国。到沪后分居各处，不日即须踵前投效，以襄军事。”）

11月16日　昨天日轮厚田丸（Atsuta）从东京和千叶县载来70名中国医科学生，他们是从门司上船的。他们都没有辫子，有的穿西装，有的穿制服，只有一人穿和服。他们在上午九时半在海关码头登陆。

11月30日　29日山口丸（Yamaguchi maru）自日本来，泊汇山码头，载来中国学生88名。他们来自横滨、神户、门司和长崎，都穿校服，其中没有红十字会人员。

同日晨八时从日本开来的还有香西丸（Kosai marn）停靠在日本

游船会社码头，载来横滨、神户、门司及长崎的中国学生178人。他们有的穿制服，有的穿西装，大多数来自横滨，计137人。还有七名中国妇女看来也像学生。有些住进日本旅馆，也有的住在中央区和老闸区的华商旅社。

本月从日本来的学生总数已达1244人。还有四百多将陆续来沪。

12月1日　上月30日从日本来的久立丸（Hitachi Maru）在海关码头靠岸。旅客中有从横滨来的53名中国学生和从神户来的三名学生，他们都穿校服。

12月4日　本月2日“春日丸”从日本来，上有从横滨来的中国学生53名，另有三名妇女。从神户来的有三个男的、一个女的。从长崎来的是30名学生、一名妇女。

12月11日　12月9日下午一点半，竹前丸从日本驶抵日本邮船会社码头，从横滨、长崎载来61名中国乘客，全是学生。

12月13日　昨天西京丸（Saikio Maru）从大连抵埠，载来中国乘客100人。

宫崎丸将于今日上午九时左右到达。船上乘有20名“敢死队”队员。该轮将在中流下锚，在海关码头下客。

12月14日　167名中国学生从各大港口搭乘从日本来的裤青丸昨日抵埠，其中有横滨“敢死队”的86名中国人。他们转乘两只本地船去法租界，现在住在“靖江公所”。

12月17日　昨天有中国乘客67人，全是学生，从日本乘香西丸抵沪。其中17人是来自横滨的敢死党，这些人是到法租界去的。[11]

这些记录虽然只是些干瘪的数字，我们虽看不到那一代留日学生年轻而热情的面孔，听不到他们踏上祖国时的心跳，却可以从中体会他们一波一波潮水般涌回来的时代氛围。

11月22日，湖南籍学生黄尊三等由东京动身，赴新桥乘火车，八时至横滨，即时上船，九时船即开行，同行的有二十多人，“三等舱均占满留学生，船中高谈阔论，喜气洋洋。船主对余辈特别优待，虽坐三等舱，均开二等伙

食。同人在船上或演说，或看电影，或听留声机器，颇为快活，不觉旅中生活之苦。”11月27日他们一行到达上海。

10月31日，他还在日本：

> 自9月22日起，至10月31日，此四十日中，课事如常。唯四川铁路风潮日形紧张。革命潮流亦随之播荡，日甚一日。留东革命党人，向内地进发者，日有多起，不久或将有大事发生。果尔，则余亦将从此逝也。

11月2日，他从报纸上知道武昌革命军占领省城，“阅之，欣喜欲狂，绕室彷徨，不知所措”。他出门到各处探听消息，共议归国之计，12时才回来。“一夜翻来覆去，不能合眼。天将明，始模糊睡去，梦魂颠倒。时而梦入革命军，奋斗于炮火之下；时而梦占领南京，开庆祝大会，醒来时天已大明。”

第二天，他说，“革命党闻讯，纷纷归国”。他也想去武昌观看形势，友人多劝阻，等上海占领后，一同归国，否则危险实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旅费无着，只好暂为观望。当晚他又去外边探听消息。[12]

陕西籍学生马凌甫回忆，他在东京听到故乡起义的消息：

“精神异常振奋。自恨‘身无彩凤双飞翼’，不禁有‘日近长安远’之感。

这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数约万人，……没有以各人不想插翅飞回祖国。……最大的困难是路费无着。”

他们在留学生总会开了一次会，决定向中国公使馆请求发路费，不获准，决不罢休。决定之后，他们就向使馆进发。使馆人员说，公使不在，去银行为大家借款去了，请大家先回去等待。没有人相信，一直等到夜半，不见一个使馆人员的踪影，他们在大礼堂集会，有人在台上大声疾呼说：“公使既不得而见之矣，我们就宣布他弃职逃走，不承认他为我国公使。”大家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高呼革命胜利万岁。

他们成了无人管理的学生，变卖自己的衣物，像潮水一样地回国了。[13]

朱芾煌在东京得到消息，立即东渡，冒险北上，往来于彰德、京、津之



蒋介石（右）和张群（左）从日本回国，张群穿的是学生服

间，三次上书袁世凯，兼说其子袁克定，许袁以总统之位，以推到清廷为目标。他曾冒死到武昌游说，途中为北军所获，差点被杀。胡适后来在任鸿隽那里读到朱芾煌日记，称他所上袁世凯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14]

张群和蒋介石也从日本偷渡回国了。张群记得，当时蒋穿着的是和服，他穿的是日本学生服。他们从高田乘火车先到达东京，再乘火车到长崎，最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到达上海时，他口袋里只剩下一块银元。他们当时在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见习，如果48小时内不能归队，就要被当作逃兵。“连毒药也都买好了，这是准备在万一之际，就得自杀，的确是有舍生就死的决心。”在同期62名实习生中，他们被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列名告发私自潜逃回国的三人之一，另一人是陈星枢。[15]

他们投入沪军都督府，张群任军械科长，蒋介石任团长。

那一刻的留学生，不论是参加了革命党的，还是目睹了那场革命的，都很兴奋。

11月4日，黄尊三日记说，“留学生之在东京者，几全体罢课，到处开会庆祝。总会亦于是日开大会，研究回国办法。到会者数千人，群情汹涌，一致主张归国，为革命军后援”。

11月15日，他得知上海已入革命党之手，“江浙为之动摇，革命势力有一日千里之观，余于是决计归国。斯时民党要人，均已离东京赴上海，留学生亦纷纷归国”。他借到30元，衣服书籍又典质了30元，共得60元路费，到邮船会社买船票。结果一星期内的船票早已售尽，非等到下星期一不可。他无法，只好静待。

11月18日，他得知家乡湖南独立，归国之念更为急切，终于买到22日的船票，“以无论如何，不能再为耽误”。有人告诉他，同人中想回国而无路费的人很多。连日传来云贵、广东等省独立的消息，他“闻之甚喜”、“闻之喜极”。11月21日，他动身回国的前一天，从报上知浙江独立，南京震动，将军铁良有出走的消息，“喜极”。[16]

11月下旬，任鸿隽从日本到上海，先到武汉见黎元洪，又成了南京临时总统府的秘书，连家书都无暇顾及。直到1912年2月5日，他才写信告诉家人：

旧历十月自东京归，为蜀军事往武昌与黎都督商议一切……适值各省代表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先生因约隽到宁，为司秘书，刀笔鞅掌。瞬过一月，不及作书告家，……但俟和议告成，南北两政为合并时，或可遂吾归家之愿。

3月9日，他在家书中说，自己并无从政之意，“只是为义务心驱使”。[17]

在日本大阪工业专门学校求学的张廷谔，听到革命消息，立即束装返国，参加滦州起义失败，辗转逃到烟台，做了黄县县长，当时他20岁，等到宣布共和，他进天津高等工业学堂再过学生生活。[18]

1911年11月10日，胡恒望、胡祖烈写信给胡适：“自东南光复以来，东渡诸学生皆以无资斧纷纷回国。”12月12日，胡嗣昭给胡适的信中也说：“日本留学生已多数回国，想由无官费所致。”[19]

杨树达回忆，那年他到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上课才一个多月，武昌革命军起义，“官费无着，别日本返国”。[20]

11月15日，黄尊三日记说，“公使与留日监督早已不知去向。各省官费亦停”。仅湖南的官费、自费生留滞东京不下数百人，“欲归无资，欲留无费”。[21]

多数留日学生的思想都倾向革命，阎锡山自述，出国留学前山西巡抚等大员谆谆告诫他们：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入歧途。但他到了日本，“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益谂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此时距他到日本仅三个月。与他同时参加革命的留日学生有李烈钧、唐继尧、罗佩金、张凤翙、黄郛等人。[22]

这年2月19日，黄尊三他们在早稻田大学讨论中俄伊犁问题，吴少仙演说，“吾人今日报国，唯有二途。一、就时事之重要者，专心研究，着为论说，以忠告政府而警醒国人。二、运动资政院或咨议局，或陆海当局，遂行改革之目的”，说时声泪俱下。黄尊三则说，“中国国事至此，除断行革命外，一切都是废话。革命重在实行，文字鼓吹，已非其时。吾人唯一方法，

只有大家归国革命而已”。[23]

革命的消息传来，他们当然要归国参加。任鸿隽自述，“抛弃一切书籍行李，挈小箱毅然上船，为归国投军之举，尤平生未有之乐事也”。12月28日，黄尊三说，自东京来到上海，“旅馆伙食尚无所出，甚至零用车钱，亦无处取借”，等到天变冷了，他还穿着单薄的和服，连御寒的冬衣都没有，整日奔走在风雪中，想要添制，却无奈双手空空。可见他们的窘况。

12月7日，袁世凯信赖的幕僚王锡彤记着，“时河南乱机四伏，留学日本归来之学生，殆无一不主张革命者”。谋河南独立而被杀的张钟瑞就是他儿子在日本的同班同学，他儿子也参与此谋，“届时得免”，又到上海谋北伐。[24]

不仅留日学生为这场革命所激动，留学欧美的学生也不例外，不光那些加入了同盟会的学生，就是胡适这样的普通学生也是如此。10月12日，自武昌消息传到康乃尔大学，胡适的心就被国内的革命所牵动。10月30日，他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三川独立，尚未可知；桂林长沙俱成战场；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何时乎！”[25]

11月21日，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起，得到其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赞同，联名给伍廷芳发电报，呼吁召开各省代表会议，制定宪法。当地的《康乃尔太阳日报》做了报道。[26]

在威斯康辛大学的梅光迪后来写信对胡适说，“自此次起事以来，颇有热诚红十字会，捐及军需，已集二百余金，以迪之贫乏亦认每月担助军需十五元（自正月起），至少者亦认三元或五元。此同人对于祖国之情形也。”[27]

民国的诞生令胡适欣喜不已，他给胡绍庭的信中说：

> 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现官费留学生皆有朝不保夕之势，然吾何可哉。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28]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回忆，“当时中国学生不属于任何党派。作为中国人，他们关心祖国的幸福。一般说来，很少表达政治见解”。武昌起义的

消息传来，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他回忆自己有好几天对学习毫无兴趣，迫切地想通过报纸了解情况。他知道革命不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在我的印象里，起义这样有力，革命肯定会成功。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反应。后来，政府派兵到汉口与起义军交火，我们消沉了有好几天，我们屏住呼吸，急切地等待着消息，希望尽管有镇压措施，革命仍能成功”。[29]

12月25日，顾维钧和两个学生起草一份电报，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名义给袁世凯，“国家的安危系于尊驾的决定。中国或将有其华盛顿。愿尊驾垂思之”。耶鲁、密西根、芝加哥、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同学会都附议，并愿意分担电报费。后来做过清华校长的曹云祥时任《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主编，在1912年1月号的社论内称只有袁世凯能确保中国的安全和繁荣，称其为“中国的加富尔”（意大利建国的英雄）。留美学生的立场并不一致，由此引发一些争论和纠纷。早在1911年10月17日，胡适听说袁世凯接受朝廷任命，就称“此人真是蠢物可鄙”。1912年1月17日，23名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胡适、赵元任等联名发表公开信，抗议这个社论，他们认为袁是个小人、奸臣。胡适在《康乃尔世纪》1月号发表《中国要共和》一文，直指袁世凯为小人、奸臣，与公开信的表述完全一致。“中国只不过是追随这个世界上澎湃、不可抗拒的潮流。它在亚细亚大陆敲响了自由钟的第一声，我们预祝那悦耳的钟声响彻大地的每一个角落。”[30]

1月19日，梅光迪接到胡适来信，当即回信，也认为“该报主笔 [曹云祥] 太无耻、太无胆，不足代表留美全体意见”，“外人不知中国内情，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在吾人当力与之辩，今某等反从而推波助澜，真非中国人也。”[31]

留美学生韩安写信给英国的吴弱男，告以全美学生集议要求美国政府联合各国严守中立，希望留英学生为之声援。吴弱南是章士钊的妻子，章时在爱丁堡大学求学，与吴稚晖、杨昌济、曹亚伯、石瑛等人天天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变化。

自10月13日早得到革命消息以来，吴稚晖极为简略的日记留下了他们活动的痕迹，他与留英乃至法、德、比等国的中国学生不断书信联系，给国内发电报，跟新闻界联系，到唐人街、会馆演说，有时写信到深夜，他甚至

试图策反正率“海圻”舰访英的海军将领程璧光。他日记中提到的人包括薛仙舟、蔡元培、张继、张静江、石瑛、章士钊等，他们之间讨论的重心都是如何帮助国内的革命。

杨昌济写信给吴稚晖，“弟在此亦无可为计，惟与行兄 [指章士钊] 商议多发几个电报而已。有相知者告以弟之所见，冀可以少助舆论之势力”。

章士钊则每天必两三次给《民立报》发电讯。当他得知清廷向英比等国借款，10 月 31 日给吴稚晖写信，“此大危机，宜设法阻止”。他建议以留英中国学生的名义给英国议会打电报，呼吁他们反对，理由为：一、此时借债必含有政治上之意味，有关系各国必起政治上之干涉；二、利息重、折扣大、负担过大；三、将起革命党仇外之心。他认为“那时以凶猛之手段反对，当可取消”。

石瑛得知日本可能会干涉中国革命的消息，给吴稚晖写信：“我辈不得不注意，一面解释西人疑窦，一面预防日本干涉。”他在另外一信中说，土耳其革命时在巴黎设有机关，得到法国的帮助很大。“我国此次革命，亦当于欧洲有一外交机关，最好则设在伦敦，以预阻满奴招外兵剿乱及日本乘势干涉。我辈似宜先联合学界之良者，商议此事。”王星拱等写信给吴，如发电报需用，身边已有五英镑现钱可助。[32]

同样是在 10 月 13 日，蔡元培在德国报纸上看到武昌赵义的消息，“为之喜而不寐”。10 月 18 日，他在来比锡收到吴稚晖来信，回信说：“报纸中于得汉阳、汉口等消息外，又确有长沙及广东、安徽军人起事之说。其时弟胸中一方面愧不能荷戈行间，稍尽义务；一方面以为大局旦夕可定，日盼好消息，或无目前自尽国民分子义务之余地。”他得知袁世凯出山，“十分乐天观生一顿挫”。得知吴和留英学界的活动，他深愧自己“数日来之寂处无为”，柏林留学生界的情况也一无所知，19 日凌晨四点钟他动身去柏林。他一到柏林，见到同学俞大纯、李倜、顾孟余等，知道初得武昌捷报，柏林学界就开会演说，给国内发电报，“开会时，除一汉军籍外夕，无一汉学生不到，演说时，听者无不力表赞成”。柏林学界无不渴望自由，他们已公推数人与新闻记者交涉，已作文数篇送登各报。

24 日，他写信给吴稚晖说，他们准备发一个电报给上海报馆，大意是

"外国均赞成吾党，决不干涉，望竭力鼓吹，使各地响应"。被德国电局退回，说是"语涉妨害治安"。他们改用骈文式，才发出去。"闻六岁宝宝昨有遁出之讯，虽未必果确，然亦不远矣。"[33]

张继在法国，武昌革命起，各报都大字登载，中外人都兴奋。一天，他与几个华人路过工人区，忽有三五个法国人，从饭店出来，特脱帽向他们欢呼"中国万岁"。11月，他与十多人取道意大利回国。[34]

张静江那时在法国，与吴稚晖联系不断。齐如山回忆，大家兴奋极了，纷纷回国。他弟弟齐寿山不是同盟会的人，也与他们结伴归来。章士钊依靠孙中山给他的130英镑，一家四口于12月24日由英返国，到上海时，身上只剩下两个英镑。

就读于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瑞安女子学院的宋蔼龄，素来抱持"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却在上海热衷于排英文戏为新政府筹款，连他父亲都有点惊讶。宋嘉树写给孙中山的英文信说：

> ……我将到南京拜访你，不知能否携女儿同行。……我们在1月24号之前不可能来，因我女儿在排练业余戏剧，23日晚将在一家中国戏院上演，她每天要指挥排练，必须在场。纯收入将用于帮助军政府。演出要用英语。那些可望参加演出的人都在美国受过教育，非常适合演这样的戏。这种表演即使在上海，也完全是新潮的，此事之新奇，我想不会不吸引这个城里的中国人和外国人。
>
> 我女儿在大学里是戏剧俱乐部成员，在国外她搞过大量她称为"戏剧技巧"的东西，不过她觉得我们的群众不会欣赏"为艺术而艺术"，且即使在上海这也算太高雅，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她宣布打算组织一场音乐会并演出一两个戏剧时我是何等惊讶。我告诉你这些想必令你感兴趣，并令你得知我们这个城市里女共和者们的热情和才智而高兴。[35]

如果说留日学生热情地呼唤了这场革命的到来，留学欧美的学生则热情地响应了这场革命。在袁世凯身边也聚集了早年留学欧美或日本归国的学生，

留美幼童有许多人得到重用，包括唐绍仪、蔡廷干、梁如浩、梁敦彦……曹汝霖、杨度等留日学生也为他重用，他们并不排斥共和，对清廷也没有多少感情。

国内学生的热情一点也不亚于留学生，无论是亲身参加的，还是目睹了这场革命的。没有他们的回应，这场革命几乎难以想象。

10月12日，上海中学生陆澹安从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事消息，“不觉抚掌称快”。[36]

同日，苏州中学生叶圣陶得知消息，“自由之魂既其返，吾民之气当昌，其在此举矣。望之望之”。从此，他日日盼着好消息，“盼望之殷，恨地球不快转两周”。他听到好消息，则“心滋喜”、“心甚喜”、“乐又何如”，没有好消息，则常常“懊恼甚”。他为苏州士兵无动静而着急，他为南京起事之信不确而郁闷。11月2日，苏州光复前夕，他在日记中为素来号称“文教之邦”的江苏还无动静而感到羞耻，认为这是一般少年之咎，自己也是少年，什么也没有做，唯有以这一卷日记消释块垒，可叹也可怜。

那些日子，他写的诗《杀北虏》，作的文《送中国赤十字医队赴武汉救受伤军民序》，都与革命有关，看到报纸上革命党人的檄文，他在日记中赞叹“纪律严密，深合乎文明进军之举。智仁勇三者，党人盖兼有之矣”。[37]

那年开学不久，在湖南湘潭教会学校读书的蒋廷黻听说武昌发生革命，“约一周后，长沙也起了一次骚动。接着，校中谣传革命将波及到湘潭。益智的学生有时也谈革命，但我们承认我们不了解革命了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到城里亲眼去看看革命的真象”。[38]

福州少年萨孟武自中秋以后，“天天希望革命发生，这种希望与其说是排满，不如说是小孩子好奇”。[39]

在浙江富阳县城的郁达夫：

> 我也日日的紧张着，……有几次在秋寒的夜半，一听见喇叭的声音，便发着抖穿着衣裳，上后门口去探听消息，看是不是革命党到了。……[40]

少女陈衡哲在上海目睹正在发生的大事件，“我清楚地记得那儿每个中国人的激动兴奋。我一个表哥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到城里的中国辖区打听最新进展，因为那时候事情的发展既多又快”。[41]

重庆独立，11月22日，当地海关税务司斯泰老写信对安格联说，“现在全城的绅士，特别是学生，都欢天喜地”。[42]

不仅南方学生，北方也是如此。10月22日，刚从北京到上海的云南人周钟岳日记说，“在京闻武汉失守，市面虽震扰，而学界人多有喜色”。[43]

北京顺天中学堂临近毕业的梁漱溟以后回忆，因为武昌起义的消息，“到处人心奋动，我们在学堂里更呆不住”。他与同学甄元熙，经常在一起秘密讨论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不久就秘密参加了京津同盟会。[44]

他的同学张申府直到晚年还无不遗憾地说，1911年是改变他生命的一年，也是改变许多中国人生命的一年。他虽然是同情共和革命的，但那一年，他回乡结婚了。那个冬天，梁漱溟忙于为革命党秘密运送军火，而他只能暗中为《民国报》写稿。[45]

在山西太谷，孔祥熙办的铭贤学校，第一批到娘子关前线参战的学生有5人，第二批、三批到阳泉、榆次折返的有二三十人，他们回校都被视为英雄。[46]

河南法政学堂的徐其愉回忆，武昌消息传来，“全校震动，学生们不待听课完毕，即一窝蜂似地跑到院中，议论喧腾。忽然在南楼明柱阴处，见到一条标语，用铅笔写在白纸上。有一同学很滑稽，拿住标语，振臂高呼：‘不甘为满奴的人们起来了。’尾声拖得很长，众皆大笑鼓掌，经久不息。适闻摇下课铃，这位同学又高呼：‘向前开步走！’众又哄然鼓掌，鱼贯而出，一直走出大门，掌声犹未停息”。[47]

保定各校停课，育德中学变成了保定一带革命的总机关。“燕晋联军大都督”的关防是同学张海珍所刻，安民布告三种也由王则雍先生预先拟就。[48]

华北协和书院师生策反驻通州的毅军，七个营中有四个营运动成功，实力最强、姜桂题最亲信的统领陈某及他的亲侄儿、外甥都在内，议定武昌军政府先发军饷两个月，他们就潜入北京，逼清廷逊位。因军饷未到而一再改期，最后事情败露，名册被搜去，书院师生除了在旗的，几乎都签了名。姜桂题不看名单，当着院长美国人的面丢在火炉里烧掉了。学生蔡德辰和姜桂

题的侄、甥、某统领被杀，书院解散，学生遣送回籍。[49]

黑龙江省城中学以上学生两千余人齐集咨议局，要求宣布独立，独立宣言是学生联合会起草的。[50]

虽然清华学堂学生吴宓坦承，“当时对革命事业，既未参加，且甚不赞成”。但他在10月18日的日记中也说，不愿看到革党失败，“然其斫损英杰、沮伤元气，夫岂吾人之初望哉？”

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到他当时的观察和心迹。

10月15日，他听说“革党此次极为文明、极守秩序，商民人等毫未受及扰害”。

25日，“鄂事惶惶，殊未知结果何如？……将来时局如何，实未可以预卜也”。

26日，他说，“能经此一番离奇变迁，目睹而心识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幸事也”。“吾尝读历史及诸种小说，至末世乱离之际，戎马倥偬、颠沛流荡，则谓人之生彼时者，不知其心境如何？今乃亲得闻之，吾他日或亦目睹而身受之乎？他年结果，此时殊难见端倪也。”[51]

10月23日，江苏巡抚程德全致电内阁：“自武昌失陷以后，访闻长江一带无数少年纷纷渡汉。”[52]

这些少年以学生为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留下了一些零星的记录：

11月14日，今晨南洋丸（Nanyang Maru）已经启航去汉口，上有头等舱旅客20人，其中10人似为军人；二等舱旅客30人，三等舱150人。去沿途各城市的乘客有350人。

11月15日，今晨新沪轮（Sinwo）启航去汉口，载有头等舱旅客14人，都是些返家乡的士绅，还有三等舱旅客49人。其中12人看来象参军的，他们没有辫子，有军人气质。还有约150名去沿途各城市的旅客。

11月17日，今晨开往汉口的襄阳丸……去汉口的三等舱乘客中

许多是没有辫子的。

11月22日，今晨德和轮（Tuckwo）去汉，旅客中头等舱10名，二等10名，三等50名，其中半数没有辫子。船上有七名土兵，身穿褐色斜纹布军装，佩红色带子。他们并无武器。

11月25日，今晨秀和轮（Suiwo），开往汉口，搭客有头等舱10人，二等25人，三等40人。大约30人无辫子，包括五名日本来的学生。[53]

到12月18日，钦其宝还在上海给盛宣怀写信："汉口已作中立地，沪上之赴汉者，日有数千人，江轮几无容足。"[54]

早在这年4月29日，成都将军玉昆家书中说："……长江一带，军学两界半多革命，谋为不诡，恐不久必有大军务，决非承平之象，岂不终抱杞忧之念也。"[55]

7月2日下午，两湖总师范学堂学生朱峙三与父亲谈起现状也说，"各学堂革命学生甚多"。[56]

"少年纷纷渡汉"的伏笔早已埋下。

10月30日早上，陆澹安在上海民立中学，看到同学庞亚青在黑板上贴的留别书，才知他和其他两个同学，及同志数十人投笔从戎，"共往武昌去矣，为之钦佩不置"。[57]

商务印书馆商业中学刚毕业的练习生王振民回忆，武昌消息传来，他和秦乐钧、徐祖正决计脱离商务印书馆，从军参加革命，他只有18岁，秦20岁，徐16岁，他们联名给总经理写留别书，当夜上了太古轮。"及船过黄石港，因离汉口已近，我们到甲板上去散步，只见满船乘客，群集甲板，倒有百分之八十是去武昌参军的，青年学生占了一大半，里边也有壮年和中年人。众口纷呶，都已公开地在畅谈革命，不再隐讳，也可见当时人心的振奋了！"[58]

上海精武体育会有人倡议到武汉去参加革命，许多人当场签名，卓仁机也是其中一个，"我便和好几十个青年动身前往。船过南京时，有十几位第四陆军中学的学生上船。沿途经过安庆、湖口、芜湖时，也有很多学生上船"。[59]

与二哥一起在钱塘高等小学堂读书的蒋复璁回忆，“那时二哥对我说，如果父亲不来接我们，他就等杭州光复后，立即去参加武昌的战争，那时候已经有学生军参战了”。[60]

陶希圣在河南省第一中学求学，中秋之后开封所得的消息是“武昌匪乱”，他们一小群同学又在城北沙堆里会谈，“认为南洋新军之中，湖北的新军是优良的部队，纵令武昌有匪乱，湖北新军有力量弹压。那一定是革命起义！”他随兄长辗转回到故乡黄冈后，两个兄长在一夜间悄悄走了，到了天明，大家才发现，“大约是到武昌投军去了”。他因为年龄不够投军，甚为懊恼。[61]

张奚若在上海读书时有个同学周起孟，是河南南阳人，在他看来平日是一个心气和平、与世无争的人，居然也跑到武汉去参加革命。[62]

12月19日，王锡彤到河南彰德，发现袁世凯家里的两个女教习已告假离开，都是参加革命去了。他感叹：“盖革命之风气沁入青年男女脑中矣。”[63]

各地纷纷出现学生军，许多影响未来历史进程的少年身影在其中闪现，这个名单上有张治中、白崇禧、黄绍竑、刘峙、陈铭枢、蒋光鼐、唐生智、何键……

朱春驹回忆，10月11日早晨，武昌陆军小学的学生编为学生军。统带是他们的国文教员刘先生。他被编入第二营，背上子弹带，拿起比他还长的步枪，奔往操场集合。他们的国文教员，前天还在课堂上出过《仿讨武曌檄讨革命党檄》的题目，很关切他，对他喊道：“同胞！你拿不动步枪，背马枪。”[64]

刘峙在武昌南湖的陆军中学，革命使他兴奋得连一点小病都好了。他参加了学生军，但接下来的情况令他失望，“甚至我们担任守卫革命总机关的同学，也都得不到饭吃。回到学校，亦是空空如也”。他不得已，历尽艰苦回湖南家乡去了。[65]

11月5日，吴宓听说黎元洪在武昌招兵，有一位仅13岁的童子前往军中投效，他母亲哭着送他走，旁观的人也都哭了。有人觉得他太小了，劝他不要去。儿童厉声说：我此行将要尽驱胡虏，为我父祖复仇，岂能以我年幼而阻我此行呢？吴宓称，其言之也痛，而其志诚壮，不要说我族无人。如此看

来，则光复大业或者有希望，相比之下，我等碌碌无行，有愧此童多矣。[66]

从南京到武昌参战的沈铸东，住在都督府隔壁的方言学校，目睹了住在校内的一百多童子军开会，有一童子不过十三四岁，登台演说革命的意义和目的，并说后生可畏，鼓励大家立功。他们都受到感动。[67]

12月2日，湖北襄阳绅士张玉衡的日记说："府县城隍庙及文庙等处，皆设有桌凳写名簿招兵者，闾左卖菜娃未几亦穿军装，挂指挥刀，从者数十人。"[68]

武昌起义的消息刚一传到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的学生就蠢蠢欲动，要往武昌前线去。

学生潘朕凡留下了当时的日记。10月16日，他们急欲前往武汉，无奈校规森严，平时除礼拜日外，不得越雷池一步，何况于此风声鹤唳之中，防范尤严，他们只能在那里干着急。

17日，虽然去武汉的事仍是无机可乘，但让他们感到可喜的是，校长见大势所趋，态度有了改变，已向队、排长示意，如学生家属有电报来请假者，即可照准。因此以电报请假的，一天就有百数十起。

18日，正发愁怎么去武汉的他，也靠了一纸电报而得以成行。他先发一个电报给家乡的朋友，要对方冒充家属名义给他来一电，说家有要事，望速回。以此请假，无有不准。因电报到校，都是用铅笔翻译，用了还可借给其他人，只要揩去来处地名及某人收等字，比如上海某人先要请假的，就填上海来，某人收。所以，一份电报，可用六七人之多。校长岂有不知之理？不过故作不知罢了。

20日，潘朕凡一行乘大阪（日商）船动身，岸上警察对他们送行的和上船的，"望之微笑，似有会意，毫不加以盘查"，他们深以为幸。

21日，船在长江中，虽波涛汹涌，风浪很大，但他们志在复国，急切想赶到前线，只觉得船行得太慢，丝毫没有感到风波之险。

23日，船到九江，下午即乘大阪岳阳丸（日商）去武汉。轮船的买办也是有心人，不但船票免费，晚上还炒了几个佳肴送给他们。[69]

殷公武回忆，他在陆军第四中学，与李章达、陈铭枢、蒋光鼐等同学闻武昌起义莫不欢欣鼓舞，每晚到鸡鸣寺秘密会谈，几天后在下关搭日本轮船

去武汉。

二三天后，他们同学又续到了二十余人，共三四十人，组织学生军，自成一队，由李章达、陈铭枢、蒋光鼐几位同学分组照料，曾随黄兴渡江参加汉阳保卫战。[70]

陈果夫也是陆军第四中学的学生，随黄兴到武汉。

1895年生在江西鄱阳县，当时就读于南昌陆军小学的周雍能回忆，“南昌光复后，军事学校学生奉命维持治安，我这个十七岁的陆小学生亦荷枪巡街，颇为自得”。[71]

张治中本来在扬州巡警教练所做警察：

> 霹雳一声，武昌起义。不久的某一天晚上，扬州也燃起了光复的火焰。……我非常兴奋，参加了热烈的游行。
>
> ……我看见上海组织了学生军，预备参加北伐，自己非常地兴奋。……我在街上看见一群一群的学生军，挺着胸脯，雄赳赳，气昂昂，……欣慕万分。
>
> 经过一定的程序，我进入这学生军了，达到了我的热烈的希望。[72]

11月11日，叶圣陶日记说：“沪上组织有学生军、学生北伐队等，投入者极多，诚以天分中之负担，人人应肩也。苏地亦有发起者，而我校中则寂无其人肯投笔从戎。我校素以雄健称，而若此，对入军之学生同胞当愧死矣。”[73]

在桂林中学读书的区维琳那年19岁，得悉武昌起义，欢欣鼓舞，喜满心怀地参加了北伐学生敢死队。[74]

1893年生于广西桂林县南乡山尾村的白崇禧，16岁考入广西省立初级师范，他与陆军小学的旧时同学多人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中派人守住桂林的北门城口，要他回家。为他所知，乃将武器装具托交同队的同学，穿便衣从西门出城，绕经老人山、溜马山往北门城外与大队会合。[75]

李宗仁在广西陆军小学，还有三个月就要毕业了，他想参加学生军北伐敢死队，去学校报名，为时已晚，没有报上。[76]

比李宗仁晚考入广西陆军小学的黄绍竑参加了，他记得，学生军北伐敢死队共有 128 人，夏威、白崇禧都在其中。“当我兄弟参加学生敢死队时，族兄曾秘密电知我家。我母亲非常着急，主张电追我兄弟回家。我父则曰：‘彼平日已大谈革命，这时何能再阻止其参加，听其自去可也。’”

他们只训练了一个星期就出发，归赵恒惕指挥，出发时桂林各学校排队欢送，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慨。到湖北孝感，不满两月，行军三千余里，整个过程学生军无一落后的，即生病的也绝少，军纪方面比其他军队一般都好。[77]

白崇禧回忆，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系私人志愿组成，不受国家薪饷，学生自备费用，每人七九步枪一支、子弹 150 发、毛毯一张、黑呢外套一件、水壶饭盒杂囊等物。到汉阳附近蔡甸前线，“我于夜间放哨，因天气寒冷，风雪交加，瞬时变成雪人。但我初上前线，内心兴奋无比，其热诚足以御外迫之寒气”。黎元洪“知我们穷困，特犒送酒肉，津贴每一学生十元银洋。我们为保持不受政府津贴之清誉，仅领其酒肉。”[78]

各省学生意气风发，纷纷参加学生军，区维琳记得有广西的白崇禧、黄绍竑、夏威、俞作柏，福建的张贞、吴石，安徽张治中、戴戟，湖南刘建绪、刘建常等人。22 岁的陈辅丞正在福州教会办的正学院读书，听说要组织学生军，欣喜非常，第二天早上就去报名，他记得还有女生 18 名。到上海期间，大部分给养由福建商会负责。[79]

福建师范学校毕业的陈明经当年 18 岁，投笔从戎，短暂受训后就出发，在“万象”轮上与他同舟的有吴石、张贞、陈长捷等人。

刘航琛在泸州中学念书，当地独立之后，因无书可念，大家就组织学生军，想要北伐，泸州中学参加此一运动的有一百多人，他是其中之一，自己聘请教官，自己买枪，自己买子弹。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正预备北上，清帝宣布退位，学生军也就自动解散。[80]

陶菊隐只有 14 岁，在湖南明德学堂读书，“由于学生参军的人数很多，都督府决定先成立学生军一营，驻扎又一村讲武堂内。我的年龄虽不及格，但因身长合乎尺度，前往测验时居然也被吸收了”。[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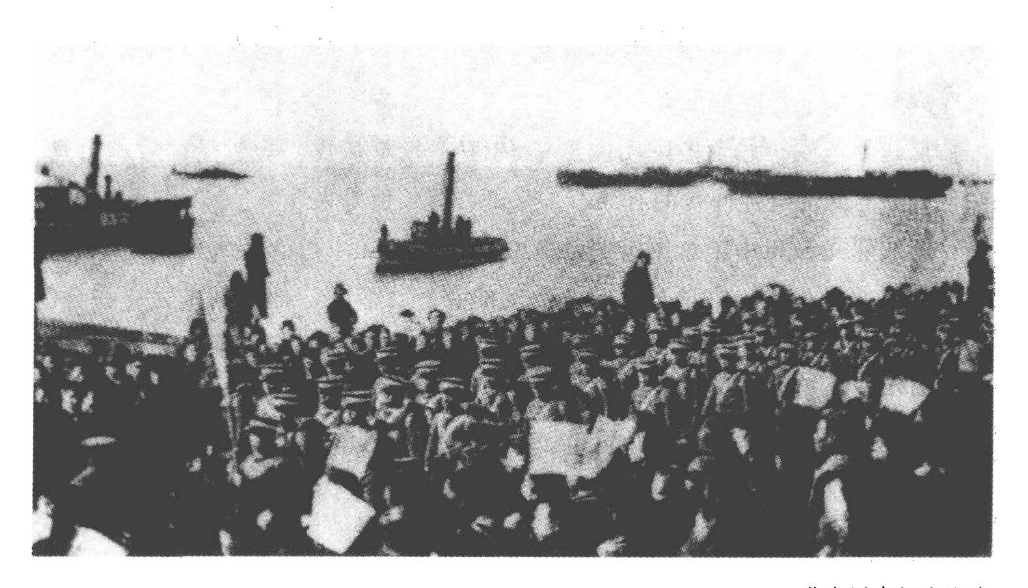
长沙的中学生毛泽东决心去武汉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从同学那里筹了

一些钱，就在这时湖南独立了，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组成了，当中就有唐生智。多年后，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他一共当了半年兵，每月有军饷七元。[82]

左舜生和同学去报名参加学生军，数百人挤在都督府，席地睡了一夜，无人理会，也没有吃的，就自动走散了，也无人追出，这是革命给他的最初印象。[83]

湖州光复主要靠湖州中学的学生军。刚在湖州府中学堂毕业的邱寿铭便参加了学生军。

陈雪涛记得，"中华民国学生军团"在上海创立，招生广告一经报刊登出，没有几天，就招足了一千多人，"时风声所播，声威大振，沪杭一带惶惶不可终日的人心，为之大定"。他本名陈豪，是京师大学堂第一次医预科剪发学生，与他同轮到上海参加学生军团的有在日本学陆军的田颂尧等，随熊克武回四川的向传义、吕超等，还有东京回国的留学生邹鲁等。当时沪杭敢于大胆派出所有军事实力开赴南京前线，就是因两地各驻有学生军一队，可起到了震慑地方、安定人心的作用。[84]



学生军在烟台登岸

田颂尧回忆，学生军团中多系苏浙中学以上学生，多数自愿出资制备军服，借枪操练，重视军事术科和野外演戏，在西湖地区进行野营操练时，上海商务印书馆曾摄制照片，印在明信片上。[85]

“沪军北伐先锋队”不到一个月就招募新兵3000人，运送到山东登州。学生队由上海和江浙各中小学学生所组成，因开学在即，纷纷请求回沪，只好将学生队送回上海。[86]

在安徽，韩衍以陆军小学、测绘学堂和尚志学堂的学生为中心，成立了青年军。[87]

广东紫金县的光复，就是初级完全师范速成班、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学生首先起来响应，组织学生军，并向各处活动。[88]

四川忠县，回乡的中学生和邻县奉节、大宁的学生在巫山成立学生军，称为“学生军北伐炮兵队”。[89]

福建泉州的学生军，是泉州府立中学堂学生发起的。

当武汉危急时，湖北陆军中学的学生组织学生军助战，每次都在都督府集中，饱餐一顿后出发。黎元洪必与他们一起吃饭，并相约胜利归来再见。等到学生军回来，清点人数，减少了十之二三，得知其他人都已报国，他呜咽涕下，下令学生军只任巡防城市秩序，以补保安团队不足，不许再开赴前线作战，然牺牲已重大矣！[90]

赵景深回忆，“辛亥革命那年我只有十一岁，刚从武昌回到芜湖，听说武昌四川旅鄂中学的同学很有些是从军阵亡的，其中一位黄麻子尤为英勇云。的确，他在学校里时候，体操的成绩最好，平时也最喜欢运动。”[91]

12月31日，朱峙三日记说：“学生军虽有三分之一为真学生，余人予似在武昌见过为小贸或提篮卖物之小流氓，想见招学生军时流品之杂。”[92]

学生军中可能并非都是学生，但毫无疑问，学生军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张治中、白崇禧们的军旅生涯都由此起步。

少小真称五尺童，也思尚武学从戎。短枪手执如临敌，文战当年孰比雄。

——《海上光复竹枝词》

19岁的顾颉刚是苏州公立中学四年级学生，苏州独立，市民组织“巷团”，在街头巡逻，他有时也去参加：

巷团没有枪，只是一手执棍棒，一手提灯笼。学团为了有枪弹，所以大家就练习打靶；学校的杨柳树变成了靶子。……九月份天气在江南是雨季，几乎天天下雨，我的国文老师胡蕴（号介生）是一位南社社员，爱作诗，为了歌颂革命，一口气做了三十首七律，题为“秋风诗”，我现在只记得一句：“洗兵雨盛满街流。”我们作了学团和巷团，天天晚上巡逻，雨打风吹，常常满身湿透，成了落汤鸡，但少年人怕什么呢，由它去。[93]

11月5日，他的同学叶圣陶日记说，学校创办“学团”，今晚开始巡街：

晚膳后即穿校服，黑衣黄裤，臂膀之上围以白布，背荷枪，弹匣刺刀缠腰。既而列队于操场，队整而后出。……途中居民对我亦无荒谬之言惊异之状，镇静如此，亦未可谓无程度也。

巡街回来，只见月色皎然，他坐在草地上，心脾都爽。“如此大纪念日，天公何忍示人以阴雨，故特呈此一丸好月也。”

高等巡警学堂的“学团”与他们一起列队上街。

11月7日晚饭后，他们荷枪列队巡街：

月色白如昼，树影清爽，高寒逼人。偶有红灯一点出林隙，则似在此天然之风景画中，另添一景。村狗无声，游鱼低喁，如此风光，如我装束，顿思战场而有此月色，定当拔剑起舞一回也……

半夜后，他又佩指挥刀，与其他四个荷枪的同学，再次出去巡街，至凌晨才归。

11月10日，苏州“学团”组织已极完备。总机关设在巡警学堂，团长为

该校教员王君，给他们颁发了肩章，上书“苏城学团”，下书“公立中学”，他也取了一副缝在操衣上。

当晚，他们列队出巡。

11月11日，他说，“办学团所以保卫地方，使军士得尽力于外，无内顾之忧，则我侪虽不从军，亦少尽天职矣”。

11月12日，苏州中学本来有36人报名参加学团，听说学团须补助军力的不足，将来可能临阵，许多同学害怕，甚至有人主张解散学团。当夜列队巡街只剩下16人。

11月19日，“学团”解散，高等巡警学堂、农业中学、浸会中学、元和小学都到苏州中学合影，并最后一次联合巡街。他在日记中认为这件事虎头蛇尾。[54]

在江阴任小学教师的章砚春回忆：

> 彼时省县学校，先后停课，旅外学生纷纷回来，倡议组织青年团，一呼百应。
>
> 彼时各校学生之制服参差不齐，颜色各异，为了整齐划一，议制团员制服。各居民踊跃认捐，集得数百十元。随即至天章绸布店半现半赊，购取布料。成衣店本无工作，遂昼夜赶制，遵期缴货。于是各团员形式整齐，精神百倍。

管劲丞的《掘港光复记》说，当地独立后，“商学团”成员中的一部分学生，组成“共和演说会”，发行《共和演说报》。[55]

贵阳邮政司都德哈写信给英国驻云贵总领事额必廉，贵阳光复时，“所有的学校都参与此事，学生们领到枪支，担负巡逻”。[56]

“学团”、“青年团”，虽未像学生军那样踏上战场，但我们可体会到当时整个社会的空气，就是更小的孩子也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11岁的赵景深时在安徽芜湖：

> 刚光复不久，我也加入一些小同学们所办的童子军。当时我们

的童子军实际上只是一种新鲜的游戏，大家都穿便衣，由我那童心未退的小叔叔做军长，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叔叔做了两个大而且圆的纸灯笼，红字上显出我们的队名，晚间到空场去操练，便把灯笼点起来架在空场上。我最短小，老是排在最后。后来居然还发下几支鸟枪或汽枪，把中间一扳，便能发出枪声；但并没有放过子弹，也没有打过人。除了操练之外，便是查夜，常到沿河的小饭店里去查反动分子，好像办得很认真似的。[97]

12月29日，叶圣陶日记说："先锋队适在上操……继见儿童一队，裁巾为旗，削竹作刀，一差长儿作司令长。谓为革命军龙虎风云之事，乃亦映入于儿童之脑髓，致为此有意味有纪律之游戏，至可喜也。"[98]

广东少年黄药眠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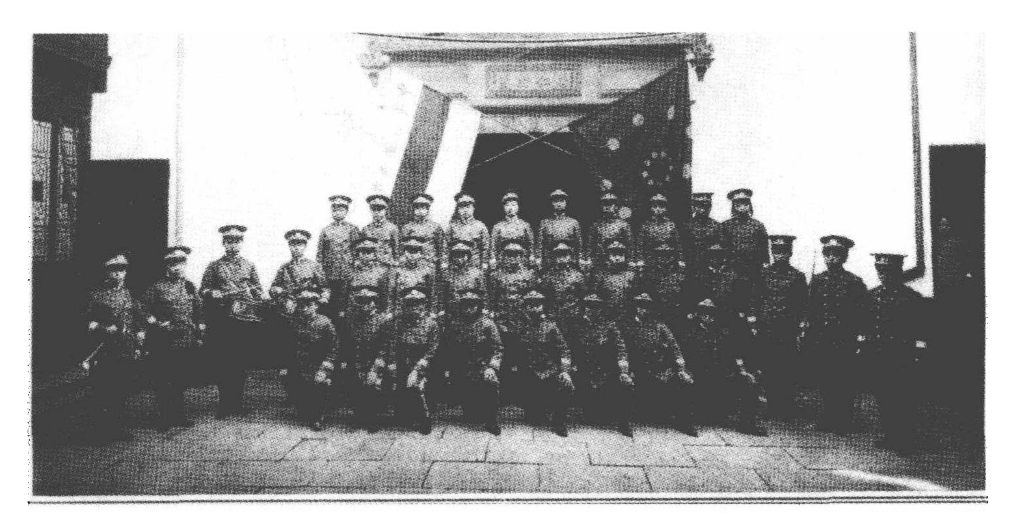
……我们小孩，八九岁左右的毛孩子就拿着木棍当洋枪放在肩膀上，自己口里叫着喇叭的声音，"嗒嘀的嗒嘀的"，踏着"一、二、一"的脚步，三三五五列队往来。我有时自己一个人，拿着一根长棍子，在屋子里的天井旁边，叫着"冲呀！杀呀！"往来奔走。

同时我们这些小孩还三五成群，各自一堆，用水混合泥土，做成小小的弹丸。然后约定一天，大家决战，双方都各找好一个掩护身体的地方，互相用土弹投掷。哪一派的土弹丸投尽了，哪一派就算是输了，然后又互相扭打混战一番。……

这是辛亥革命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想在孩子们的生活上的反映。[99]

在宜昌，八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天操练，以各种武器（有些武器是木制的）武装起来，并自称为"敢死队"。在英国领事馆外面的坟场里，在邻近的小山上，他们被教以各种进攻和防御的战术。[100]

女革命，志灭清，摒弃那粉黛去当兵。誓将胡儿来杀尽，五种族合大群，俾将来做个共和民。



上海的女子国民军

> 女革命，武艺精，肩负那快枪操练勤。步伐整齐人钦敬，联合军攻南京，你看那女子亦从征。……
>
> ——《女革命军》[101]

歌中唱的是当时女学生起来从军的情景。美国传教士汤姆森说：“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一群女人拿起武器走上前线。还有很多女性组成了红十字救助队伍，主要在广州、武昌和上海等城市。”[102]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报告记录：

> 11 月 10 日　乍浦路附近有所女学校，有些青年妇女来学中文和英文。据报有些女孩子已经组织起来支持革命，学校外面有一张通告号召妇女们参加她们行列。
>
> 11 月 21 日　北山西路九十号设立了一个妇女革命团体的分支机构。它的章程说任何妇女愿意参加的，须付一元，凡愿去南京或任何别的作战地点的，她的名字将报往十六铺总部。
>
> 11 月 25 日　吴淞来的 400 名士兵昨晚七点半离开北站去镇江，同去的还有女学生军 14 人。

12月1日　昨天下午二点到四点在新西门外的一块空地上，40名女革命党人召开大会，号召参军。大约有男女300人到会，有40名青年妇女应募，他们几乎都是湖北人。他们说不管是否发到武器，都要去攻打南京。

12月27日　天津有一妇女来沪，她欲为革命军招募女兵500名，目前正在寻找房屋以成立司令部。[103]

顾颉刚回忆，那时女子从军的有龙韵兰、曹道新、张淑贞、尹维峻等。吴淞军政分府组织“女子北伐光复军”，招军四队，报名的人踊跃如流水，加入敢死队的有八十多人。上海南市尚侠女学又要组织“女国民军”，辛素贞给沪军都督陈其美写的信上有“匹妇亦肩一国，伟忱可振千年”的话，陈其美回信：“红颜黑铁相见于革命之舞台，使花家女儿不能专美”，发给军械，招第一队500人。隔一天，又有葛敬华、张卓群等18人组织“女子军事团”。南京鏖战之时，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的队伍里有30个女子，她们成了正式的士兵，就是“女国民军”。[104]

陈英士发出的《组织共和国体通电》提到，“并有女子国民军30人，业已编入行间，巾帼从戎应不乏梁秦其人也”。[105]

11月22日，叶圣陶日记说：“沪上有辛女士等发起女子国民军，又有某某女士等发起女子军事团，其旨皆在进取，已蒙沪军政府批准，允给枪械。……直捣黄龙，须眉巾帼当共与有分矣。”[106]

天津女师的学生沈亦云回忆，她当年18岁，从家乡嘉兴到上海参加革命，与几个学校的朋友不期而遇，有天津女师的、上海爱国女学的、北京女师的，也有苏州振华女学的倡办人、胜家缝纫女学的，她们组织了“女子军事团”，借了一处停办的女校校舍为集合处，分为四个小组，战斗、看护、募饷、缝纫。这个“女子军事团”只是在做制服和募捐上略有成绩。她们一群人大半未满20岁，“在沪在宁，同人一律睡地铺，穿黑色衣，吃青菜豆腐大锅菜，自备零用”。女子军事团的章程、文告都出自曾孟朴的妹妹曾季肃之手，被她们推为团长，后期辞职，大家推沈亦云担任。“女子军事团”解散前，她去沪军都督府，与黄郛认识，以后结为夫妇。[107]

11月26日，《申报》报道，前日李燮和派出女子敢死队50名，到南京助战，“闻此队女子勇猛异常，一洗柔弱之习。又闻该队以攻取金陵为目的，故又称为‘荡宁队’。”[108]

就此事，周作人的说法正好相反：“光复军兴，海上女子竞言北伐，金陵一役，背负逃归，从此女军人之风亦以戢矣。”[109]

不甘雌伏亦称雄，北伐居然有女戎。

——《海上光复竹枝词》

12月2日，盛先觉到吴淞军政分府访李燮和，他事后写信向梁启超汇报，“内附有女子北伐队，觉曾目击焉”。[110]

12月23日，湖南凌盛仪日记说：“沪中女子军队已领枪，誓将北伐，亦为革命时不多见之局也。”[111]

陶菊隐说，欧阳雅文在南京组织了“女子北伐队”。[112]

“广东女子北伐队”随广东北伐军出发，还有女子炸弹队，曾到过徐州前线。[113]

12月18日，钦其宝写信给盛宣怀说：

女子北伐军亦有千人，据云此系供前敌之作乐。全军覆没，意中事耳。

……传闻张勋在徐州与革开仗，连胜六次。女子敢死队三百人为前敌，第一仗已被张军打死二百九十八人，仅存两人回沪。闻上等人家之女，有十分之三，并有父母不知者，此亦天地间之雁气所钟也。[114]

这个传闻缺乏其他旁证，女子敢死队并无战斗力则是事实。

12月21日，恽毓鼎听说有“女子北伐队”，在日记中斥为“狂荡妇女”：

上海妇女组成一队，共六百人，欲举旗北犯，为程逆 [程德全] 批驳。此等狂荡妇女，必不能孝翁姑，必不能安其室。世之欲张女

权者，必先身受其妻女之害。[115]

林纾的小说《金陵秋》中讲到福建、广东女子参加北伐女学生队，断发易装，乘轮船出发，中途遇到风浪，“呕吐淋漓”，数十人到了上海，“病态支离，弱不能举，经人招待于上海某逆旅小楼中，狂呻终日，有泣下者”。[116]

同龄人陈衡哲对女子从军就不赞成：

那时候也正是我早年做一个骑白马、举白旗的女战士的热烈愿望可能从梦想变成现实的时期。当我认识的几个女孩加入了“女子敢死队”或“女子北伐军”时，我对她们此举的明智性和成功的把握相当怀疑。看到我没有像她们那样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她们到上海阿姨家来看我，想说服我参加她们的行列。看到我不愿改变自己的主见，她们开始责难我，说我“不爱国”，当时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男孩或女孩都会力求避免这个可耻的指称。

几乎没有一个女战士实现了她们杀敌的愿望，“女子北伐军”也从不曾渡过黄河。这些女孩中的一些很快成了护士，由此让自己对革命更有用，另外一些成了争取女子选举权者，在革命成功后活动了几年。在这些梦想成为女战士的人中，不少人发现自己根本举不起枪，更别说用枪了，很多人因为这种体力上的弱点像孩子一样痛哭。[117]

1912年1月，世居澳门、创办了《镜海丛报》的葡萄牙人飞南第写信给孙中山，由孙眉转交，“应该尽快下令停止招募女兵（Chinese Amazons）。如同您也意识到的，她们毫无作用的，只能把事情搞乱”。[118]

2月16日，伟晋颂在南京给朱尔典写信：“昨天中午，通过专门施放礼炮和举行军事检阅，正式庆祝了清帝退位事件。……总统骑着一匹中国小马，由一名穿着半西式制服的马夫牵引，参加了游行，有一大批随员陪同，但他似乎不如一队女战士那么引人注目，她们几乎完全吸引了少数旁观者的兴趣。”[119]

南北和议告成，柏文蔚将女子北伐军五百多人，全部改组为实业学校，名为“崇实女学校”，请20岁的杨步伟做校长，校址设在南京中正街，李鸿章女婿张佩纶的宅子里，分刺绣、染织两班，每日除上课两小时外，其余时间学手工，成绩甚佳。[120]

二、新　军

1910年，法国大将DE NEGRIER访问中国后，预言满清危在旦夕，“其论据则为满清派遣学生至外国留学，使革命部伍增强，军事改革对清甚为不利，新军恐不免为革命党所利用”。[121]

武昌出事之前，1911年9月16日，高拉尔德写给法国陆军部长信里说：“新军，正如我在所有的报告中陈述的那样，是完全靠不住的……”

一个月后，武昌果然出事，他写信说：“然而明显的敌人也许并不是对政府最有危险的，最可怕的是那些隐藏在参谋部和政府部门的人，他们期待着在向他们的党提供了所有的服务后公开叛变。到处都不可靠，新党在所有的衙门里都有信徒。”[122]

法国人并非危言耸听。仅陆军部、军咨府就有许多革命党人，包括蒋作宾、何成浚、李书城、黄郛、曾昭文、耿觐文、陈之骥、吴经明、孔庚等。蒋作宾时为陆军部军制司司长，“极力主持整编军队，分赴各地校阅，汰旧留新，俾同志等得以乘间而入，期以五年，汰尽旧式军阀，替以有革命思想学生。至辛亥革命前，所有袁世凯之爪牙，旧督抚之鹰犬已汰除泰半，如雷震春、倪嗣冲、段芝贵等皆已先后参革，曹锟要求保一头品顶戴而退休，张彪、何宗莲等亦正设法撤换，段祺瑞亦调充江北提督。新军中革命思潮渐次蔓延”。

亲贵载涛、铁良、良弼等也想以留日士官生替代袁世凯的旧人，给北洋军换血，良弼将同学吴禄贞介绍给载涛，吴又将蓝天蔚介绍给锡良，他们都


黄郛


蒋作宾


蓝天蔚

在北洋新军中掌兵。各省督抚对留日学生也很重视，使他们大量在各省督练公所、各级军事学堂及新军各镇协充任教习或军官。

主持军队的满人寿勋、荫昌等对蒋作宾言听计从，当他们得知蒋是主谋革命者，喟然叹息说："革命党人之可畏，清廷大势去矣。"蒋自认为，再有二三年，由新军中的同志主持发动革命，情况则会大不相同，而武昌突然起事。"斯时也，吾陆军同志，见各方布置尚未达到原定计划，然时机已至，不肯放松，各方同志，亟起分途策动。"[123]

李烈钧由云南督练公署派出参观永平秋操，一到武汉，即发现岸上情形特殊，兵士荷枪来往为数极多，原来武昌起义已经三天了。他到北京，吴禄贞邀集在京同志数十人，设宴款待他，痛饮极欢。次日，朋友见面时，都问他南方情形如何，他回答："武汉气势甚壮，而力量薄弱，极为可虑，宜早举动以为响应。我等须努力，武汉不足恃也。"蒋作宾当即分配工作，征求他的同意。他答："余等以身许国，事急矣，尚择工作之肥瘠耶？"蒋说："如此甚好，现重炮队无人指挥，君乃习炮科者，请任重炮队司令。"次日，他即动身南下，由津至沪，再由沪抵九江。[124]

随荫昌出发、担任前线副官长兼总执法官的陆军部军法司长丁士源回忆，10 月 12 日参谋长易迺谦派蒋作宾乘车到保定，发给南下各镇协子弹，"蒋作宾湖北人，恐武昌难禁炮弹，乃将炮弹列车，列于第五十一列车。而京汉铁路又系单轨，故第五十一列车，直至九月一日 [10 月 22 日] 始通过孝感。故前方各炮队虽有山炮野炮七十二尊，而实弹止有二十五个。此事均由丁士源于二十六日 [10 月 17 日] 到达信阳兵站查明，故立即电调禁卫军炮兵一营，由吴金声营长率全营并多带炮弹南下。"[125]

曹汝霖回忆，北军到了汉口附近，"检点军装，有携炮没带炮弹者，有带了炮弹与炮膛不合者，转展配换装运，费时一月有余"。载涛也说："及听到前线作战缺乏炮弹应用，我立即派遣禁卫军炮标流带美金声带领炮以一营，配带应需实详，专车抢先赶往。"[126]

至此，蒋作宾无法再留在陆军部，辗转南下武昌。

军咨府科员兼官报局副局长李书城随吴禄贞到保定，忽然接到载涛电令即日回京，命他同科员黄郛赴南方与革命党人"商议罢兵言和办法"。他与黄

郛即日携眷出京。他们于11月2日到达汉口，从各方来汉阳参加作战的留日陆军同学有曾继梧、程潜、程子楷、唐蟒、曾昭文、王孝缜等，南京陆军中学来的有蒋光鼐、陈果夫、陈铭枢、李章达等数十人。[127]

陈之骥说，“革命军兴起，在北京的革命党人纷纷南下。据我所知并能记忆起来的就有黄开元、曾可楼、黄郛、何澄等多人。黄郛、何澄到了上海参与了陈其美革命军务，黄为参谋长，何为二等参谋，事已披露于报章，可是这里的军咨府仍然照旧发给他们的薪水。黄、何二人的图章交给我托为代领。”[128]

廖宇春也说，“当是时也，北洋各将校学生，亦均纷纷南下”。[129]

曾为鄂军都督府外交局长的黄仲垲说：“自战争开始以来，北军屡易将领，其干部人员多日本陆军留学生。凡南人之服务于陆军部、军咨府者，咸谋充差赴前敌，以便逃归南军。初借名差委，渐至不告而行。以致北军军事机关为之一空，而武昌军政府因是人材济济称一时之盛。”[130]

程潜为四川新军参谋官，北上看秋操，车抵彰德，得知武昌起义，到京知秋操停止，立即决定南下。[131]

南下议和分代表之一蔡金台给赵尔巽的信里说：

> 尤可笑者，台等到沪，其都督[指陈英士]派招待员十人同止于旅次，盖阴监之也。此十人中，即有三人乃军咨府派在前敌侦探者，可笑。[132]

10月20日，高拉尔德给法国陆军部长报告说：“军队中隐藏着很多革命军官，在知识阶层也同样如此。”[133]

11月4日，广东官员左绍佐在日记中感叹：“最奇者，自京城及各行省，皆若有革命党暗伏，窥伺于其间，或一日数惊，或迁徙逃避，或盛加防备。而革命党人，或即在官界，或即在军界，或即在学界，查之不胜查，搜之无从搜。谁秉国钧，乃至祸如此之烈哉！推原始事，当有受其咎者。可为长太息者也。”[134]

湖北新军的革命气氛浓厚，万耀煌参军不久，就参与发起“群治学社”，他们在酒店、运动场都放言无忌，甚至喝酒猜拳也喊“要革命，要排满，全福寿”，官长不便去酒店，就是去了也熟视无睹、听而不闻。后来他们觉得“群治学社”为人注意，改为“振武学社”，等到“文学社”出现时：

> 竟然各单位都选出代表开会，队有队代表，营有营代表，标有标代表，每队都有若干士兵同志，他们虽不许官长参加，但对于官长也毫不顾忌，军队内部已发展到如此不安的程度，要是一经发难，谁能阻止！[135]

新军协统黎元洪并不是革命党，但武昌起事之前，革命党就有推他为临时都督的提议，只是他本人不知。当时加入革命团体的都是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连个管带也没有。大家真正属意的人选吴禄贞远在北方。万迪庥回忆，辛亥暮春三月，在洪山宝通寺开各标营队代表大会，蒋翊武嘱刘九穗约他同去，路上蒋告诉他：“今日之首脑会，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他答：“黎非同志”，刘笑着说：“早知老弟反对，开会时必有争辩，所以先为告知，可寻一空坪休息，详为解释”。休息时，刘说：“革命党人，均系士兵或正副目，下级官不多，中级无人，前蓝天蔚任三十二标时，曾推渠为都督，现蓝远隔奉天，党人知识，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且黎平日待兵较厚，爱惜当兵文人，又属鄂籍将领，只要推翻满清、革命成功，似无不可。再湖北举义期间，决定派人往说吴禄贞，届时吴必设法领兵南下，与之合作，推举吴为都督，最为适当。”

到洪山宝通寺，他们上了宝塔，孙武、张振武、蔡济民等人都在，联席会议上，蒋翊武提议推黎元洪为都督，间或有代表反对，或问是否同志，刘九穗做了解释，“各代表轻轻拍手，点头赞成”。会议没有留下记录。[136]

孙武也有回忆，曾开过一个会决定推黎元洪为都督。[137]

万耀煌时在保定军校，听到传闻武昌起义后的都督是黎元洪，“这也是意料中的事，记得有一次在洪山秘密会议时，就有人作此主张”。[138]



黎元洪（右一）在战地

居正回忆："革命在秘密时代，曾推举刘仲文 [公] 为都督，刘英副之，亦有议及黎元洪者。"[139]

熊秉坤说到工程营起事之初，随行的不过 40 人，其余仍在营内吆喝。到楚望台夺子弹，是他发布的命令。命令发出后，他精神上极不自在，因以责任重大，稍有差池，即功亏一篑。"军中生活，士兵以官长为依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之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盖士兵临时加入者居大多数也。"[140]

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在楚望台被推为总指挥，张振武曾提议以他为都督，他回答："此事万不能行，兄弟资望太浅，即以湖北军队而论，多数尚未响应，而带兵官位居我上者必不肯服从，即与我同级者，亦未必悦服。欲收新军全体来归之效，非借黎元洪资望不可。至于各省，若闻革命军领袖系一小官，必少附和。吾辈欲革命速成，借黎元洪之名以号召天下，一则可使各省可表同情，二则使外人不敢轻视。"[141]

吴兆麟是有见识的，曾被共进会被内定为湖北都督的刘公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显示了他的风度。张知本说，"惟刘以武昌处四战之地，必须举义谙晓军事者主持大计，乃于事发后谦不就任。……武昌首义能支持至全国响应，

黎之出任艰巨，实为关键所在”。[142]

黎元洪与革命党确无渊源，也不赞同革命，但对清廷并非没有看法。少女时代见过黎的杨步伟说：

> 你也许可以说他固执或是过分谨慎，但是说句公道话，那些怪他太胆小甚至说他反对革命的人根本不识他这个人。因为我记得他跟我们住在花牌楼的时候他当着我们说话才不特别谨慎呢。他对祖父和父亲就那么明说，那腐败的清朝快点亡了好。他想就是屋子里一个小女孩儿在旁边玩也没有关系。[143]

黎平日对革命党也颇为宽容，“日知会”被巡警道冯承钧破获后，会员另谋组织“振武学社”，在潘康时的连部开会，司书杨玉鹏也参加了。其后黎发现这个组织，只是要潘离职，没有深究。所以，革命党人对他并无恶感。[144]

湖北新军有一镇一混成协，分归张彪、黎元洪统领，而黎因为对士卒宽厚，声望较高。他被推为都督，从被动到主动，他的资望确实足以号召。后来，许静庵听说，荫昌南下路过彰德，对袁世凯说：“武昌系乌合之众，无人主持，不难扑灭。”袁答以“湖北以黎元洪为将，何谓无人。”[145]

此时，有人对胡石庵说：“黎元洪竟为革命党首领，真出人意外，所有租界之洋人皆拍手称奇。”[146]

“黎元洪在武汉不仅军队信仰他，士绅、百姓也对他有好感，汉口租界，外国领事也早闻其人。所以二十一日黎元洪的布告一出，武汉人心大安，清廷为之惶惑震惊，过去领导革命者是孙黄，现在居然连清朝的新军协统也参加革命，各省新军遂闻风而起，汉口领事团立刻承认武昌都督府为交战团体，这些都与黎出来领导关系至大。”[147]

10月17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写信给外长说：“黎元洪都督，……此人身材魁梧，仍属年富力强。他在日本的军校里学过五年，英语和日语都讲得相当不错。他比中国的大多数将官都更聪明些、更有知识些。”[148]

长期流传的说法，黎元洪是从床底下拉出来的，胡汉民称之为“床下都督”，这是以讹传讹。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说，黎元洪被士兵找到时，

“避入房中”，受逼而出。这一点，他 10 月 20 日写给老师萨镇冰的信里也不讳言：“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149]

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 1912 年 3 月向海关总署报告：

> 黎元洪一参加革命就明确表示他的行为决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完全是为了革命大业，因为他愿意从属于海军提督萨镇冰和统制张彪。在任何事上他都显示出稳健和敏捷，他很快就受到士兵和百姓们的崇敬，因为他们确信了他的忠诚和诚意，外国人不久也完全信赖于他……[150]

黎元洪确曾劝说张彪反戈，以种族大义相责，并愿以都督相让，信中有“相知既久，而忽相仇，余心甚为谦然”。张彪回话：“我受大清厚恩，朝廷无论对我如何处置，我只有接受，替我谢谢宋卿的厚意，希望他好自为之。”

当时，张彪的次子张学骞就在黎元洪的部下。[151]

黎元洪出身北洋水师学堂机械科，是严复、萨镇冰的学生，甲午海战时为定远舰驾驶，投海获救，两次到日本考察学习，从海军转入陆军。10 月 15 日，总税务司安格联写信对苏古敦说：

> 我认为海军将继续效忠皇室，并成为巨大力量的来源。因为他们将使水上交通不致中断。如果他们变了，局势就很糟了。[152]

清廷也以为有海军的配合，攻克武昌不成问题，萨镇冰的舰队一到汉口，10 月 17 日的北京《政治官报》就刊载消息说：萨镇冰有电到京，“人心大定，学部亦发布命令，通饬各学校学生，照常上课”。

萨镇冰是第一届派往英国学海军的，与严复同学，海上经验极为丰富，喜读有关海军的外文新书籍，每天看中英文报纸，明了国际情形。他精通英文，英文函件都是他亲自撰写，不用秘书代笔。他待人谦和，对下无骄傲暴躁之态。[153]

黎元洪连写了两封信给萨镇冰，口称“夫子大人”，劝说老师反正，其中说：“师一出，不但名正言顺，而实较胜于汤武。……满汉存亡，系于师台一身。”萨镇冰只是回信“彼此心照，各尽其职”。他的部属中赞成革命的不少，亲信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收到哥哥来信，也心有所动。舰队官兵推汤芗铭向他提出起义要求。他最后决定悄悄离开，听凭舰队易帜。海军倒戈给清廷是沉重一击。

10月12日，反对革命的叶昌炽听说武昌出事，在日记中说：“革党屡起屡踬，非有新军终不得逞，养虎堂奥，谁之咎欤？吾辈处危墙之下，安能瓦全。”[154]

黎元洪的先例影响了各省新军将领。福州的第十镇统制孙道仁本不是革命党，10月下旬，他部下的协统许崇智加入“军警特别同盟会”，之前大批士兵、下级军官已加入。11月5日，在台江的“夹板船会议”上，和孙道仁有交情的洋行买办蔡展庞出面设宴，许崇智等要他倒戈，一开始他很犹豫，经告以全镇官兵已加盟，各方援黎元洪例，推他为都督，他只得顺从。

孙道仁是攻打太平军的功臣孙开华的儿子，是世受皇恩的人。福州将军朴寿认为他绝对不会参加革命，当有人透露孙部已全部参加革命，朴寿还坚决不信。待到福建举事前，孙道仁好言劝他识大体，明大局，不要过于固执，他这才知孙已变，将其软禁。总督松寿要他立即释放，以免扩大事端。[155]

当时福建新军中的革命空气由这一件事可知，朴寿的捷胜营，枪都老式，炮无一尊，起事前他向总督要求拨炮十尊，总督批给督练公所“速照办”。所里文案委员吴其骏急忙办稿送专管军装的参谋俞绍瀛拨发，俞问：“你办这件稿，要不要命？”随即把原件锁进了抽屉。几天后旗营遭炮击，只有挨打的份。

在独立后的各地，有革命党背景的新军军官（管带、标统、协统）纷纷出任都督，如陕西的张凤翙、山西的阎锡山、镇江的林述庆、安徽的柏文蔚、江西的李烈钧、浙江的蒋尊簋、成都的尹昌衡等，另有不少新军高级军官被临时推为都督，如云南的蔡锷、九江的马毓宝、南昌的吴介璋、福州的孙道仁等。长沙、九江、西安起来响应武昌的都是新军主动，加上会党的力量，会党也是通过掌握新军士兵发挥影响。

陕西西安，10月21日晚，张凤翙和张伯英、钱定三在二标一营营中商定第二天举事，张伯英是炮兵营右队的排长，张凤翙是协司令部参军官兼代二标一营管带，钱定三是一标三营督队官。次日早九点，他们三人，还有炮营左队队官朱叙五等与各会党开会决定当天12点起事，同谋者多有难色，张伯英表示愿先发难，回营召聚士兵，空手攻取军装局，夺得枪械子弹，“势极危而兵极勇”。此时，满城中嫁娶如故，他们第二天攻入时，筵席尚在。随后，张被推为大统领。西安举事就是新军中下级军官主动的。[156]

山西太原驻有新军一个混成协，阎锡山回忆，“大半为我与我的盟友或同学所统率”，他19岁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三年后到日本学陆军，从日本回来，初派为山西陆军学校教官，三个月升为监督，为了实际掌握新军，经种种努力，他获调山西陆军第二标教练官 [中校团附]，一年后升任标统。他与赵戴文、温寿泉等发起“山西军人俱乐部”，表面上研究学术。太原起义“这不是既定的计划，而是受了事实的逼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动”。当天他当上都督，正好是他29岁的生日。[157]

10月30日、11月6日，高拉尔德写信给法国陆军部长，“可以说，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新军”。“革命党：尤其在新军中人数众多。”云南、南昌、苏州、杭州等地，“新军几乎到处表示革命”。[158]

在南方各省陆军中，云南的第十九镇实力最强，军官多为留日学生，水准较齐。他们中有许多人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铁血丈夫团，五个管带唐继尧、刘存厚、雷飚、李鸿祥、谢汝翼已筹划多时，刘存厚自述，川路风潮，因为交通阻塞，传闻异词，他和云南农务学堂教习利用此机，在报馆鼓吹，称赵尔丰已被杀，各司道都被逐，四川已独立，使人心更加惶惑。他又派排长邓泰中等运动各军队官兵，“使军心感触，以便利用”。[159]

风雨连宵意若何，秋深江上有龙过；
心宁草木甘同腐，气作星辰岂易磨。
略水侵山嫌地少，拨云挑雾见天多；
人间富贵尘沙视，肯为功名效枕戈。[160]



安徽都督柏文蔚



江西都督李烈钧



镇江都督林述庆



福建都督孙道仁


山西都督阎锡山


第十九镇统制张绍曾

10月23日，唐继尧写下这首诗，传达出他们当时的心声。谢汝翼回忆，10月24日，他们在刘存厚那里歃血为盟，主张推蔡锷为首，李鸿祥说，“因为蔡锷是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资格较老，且有才干，有眼光，任职协统，阶级较高……一旦起义，他最能掌握全局”。[161]

11月12日，周钟岳从北京回到昆明，由李根源介绍，第一次见到蔡都督，当天日记中说，蔡锷看上去就如一书生，“而豪隽之气，溢于眉宇”。[162]

1912年1月13日，英国驻云南府总领事额必廉给格雷写信，对蔡锷深为赞许：

> 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位卓越的人物，如果他幸存下来，目前的革命在未来几年中很可能获得显著成就。有许多人憎恨他，更多的人敬慕他。我知道，此地的许多绅士和学生，以及许多士兵和临安、开化、广南等东南三府，都是强烈反对他的，但是，由于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以及他本人的无容置疑的才干，他迄今终于设法坚持下来。

我毫不怀疑，只要仍继续掌权，云南府将是平静的。他仍然很年轻，现在仅三十岁。[163]

在同时的留日士官生中，蔡锷与两蒋被称为“士官三杰”。蒋百里先后留学日、德，在军事上有卓见的军事学家，当时已离开禁卫军，以二品顶戴调东北，任督练公所总参议，与蓝天蔚等策动独立不成，招张作霖等之忌，赵尔巽暗中让他速离东北。

蒋尊簋留日归来，担任浙江弁目学堂监督，影响了很多学生，时为广东新军协统，广东独立，推为军政部长、临时代理都督，随后回浙江出任都督。在浙江新军中，吕公望、朱瑞、顾乃斌、童保喧、张载阳等人都担任管带或标统之职，成为独立的主干力量。

1908 年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童保喧，喜读《天演论》等新书，当年 6 月 21 日的日记中抄录朋友寄来的吊秋瑾诗，毫无忌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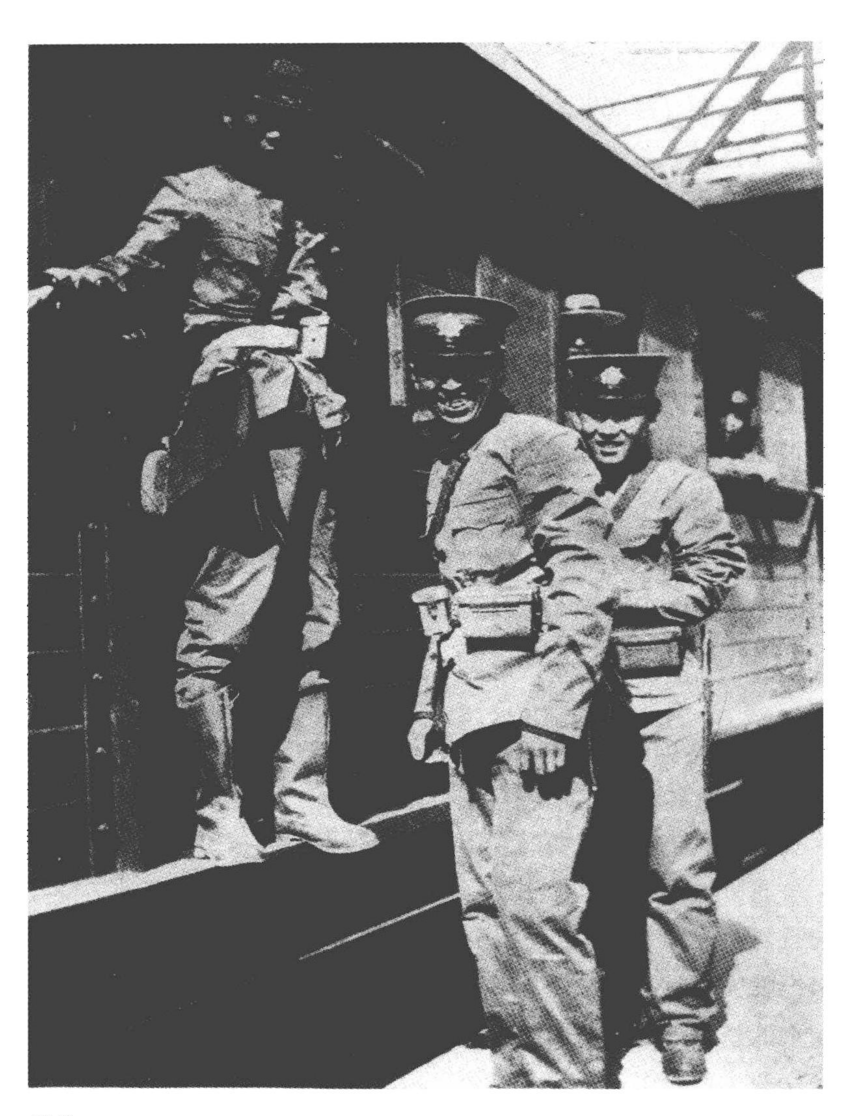
七字冤深三字狱，千秋为侠一秋娘。西泠桥畔离离草，草色殷然暗断肠。[164]

辛亥年他从保定毕业，分配到杭州新军，起事前为宪兵营管带，一度被推为临时都督，因资望不够，昙花一现。

贵州独立，新军也是主动。贵阳邮政司都德哈写信给英国驻云贵总领事额必廉，“我听说武备学堂学生是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并率先发难，新军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接着是炮兵，巡抚卫队和所有学校。据说巡抚命令士兵开枪，但他们拒绝服从命令”。[165]

驻南京的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不是革命党人，但部下的标统、管带如赵声、柏文蔚、林述庆等都是革命党，柏文蔚对他多有好评，称他“亦有心人，故吾人革命行动，得其暗中保护颇多也”。

10 月 24 日，柏文蔚赴南京，“当时徐绍桢正处在进退两难之际，并知其部下军心浮动不可遏抑，心中焦虑万分”。得知他到秣陵关，特派人约他至镇部商议。第九镇中上级军官加入革命团体者极少，平时上下级之间矛盾很深。



新军

“当革命空气达到最高潮时，中上级始恍然大悟，知部下已不听其指挥，而本身已不能为部下所容，故很多私自逃走。留在军中者，只好对其部下俯首听命，表示赞成革命，这部分人全是徐绍桢左右亲信。”[166]

林述庆是第九镇的管带，为策动镇江独立，往来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最终兵不血刃光复镇江，被推为镇军都督，攻克南京也有战功。他的《江左用兵记》记录了这段重要的历史。12月5日，英国领事伟晋颂汇报南京的情况：

> 目前的一切情况都是很安宁的；南京城正在迅速地恢复正常状态。局势中的唯一动乱因素，是徐绍桢统制与林述庆都督以及他们各自部队之间的对立。林述庆都督最先进入南京城，立即占用了总督衙门，自称都督，并且在徐绍桢统制未及入城之前将此事通知领事团，而徐绍桢统制在名义上是他的上级。[167]

徐绍桢是攻打南京的江浙联军总司令。柏文蔚回忆：

> 联军入南京后，徐绍桢经各军公推为苏军都督，而同时林述庆苏军都督布告已高揭通衢，与徐互不相下。于是群情愤慨，已现分裂之象。……林至此居功骄傲，已为各友军所不满，而镇军内部亦反对林此种自满行为。故林自称都督，反响甚大。镇军第一镇且有带队暗投徐绍桢，而林尚不知也。……



第九镇统制徐绍桢

> 由宋遁初 [教仁] 主持会议，一致决定徐绍桢、林述庆任江苏都督皆不相宜。大家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林述庆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徐绍桢任南京卫戍司令。

不过，柏文蔚说：“林虽器小，但对革命是有无限忠诚也。”[168]

各省军事学堂几乎成了革命的温床。

武昌消息一到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总办万廷献集合学生在大操场讲话，强调武昌决不会成功，劝同学们镇静，不要盲从，又说黎元洪是个放鸭子出身的，不会有多大的作为。[169]

他很快就改变了看法，不仅默许学生去武汉，而且亲自前往，担任都督府军事顾问，在黄兴离开武汉之后，11 月 28 日，都督府会议公推他为战时总司令，他坚决不干。[170]

居正回忆，张之洞 1905 年在武昌办陆军特别学堂，不少学生成为革命的急先锋。武昌起义后，张彪下令有捉获特别学生一人者赏 10 万元。[171]

赏 10 万元之说不可靠，到武汉参战的陆军第四中学学生潘朕凡亲眼看见过清军的赏格，他渡江到汉口天字码头上岸，沿江边向花楼街而行，至华洋交界处，以竹篱笆遮拦，只留下一个小门，以便交通。竹篱笆上有“皇皇乎赏格两道”：一是缉拿湖北特别陆军小学学生，如能缉获一名，赏钱五千贯，一是缉拿陆军中学学生，如能擒获一名，赏钱万串，缉获因而致死的，赏钱五千串。其罪状，大意是，国家设立陆军学堂，正所以培植军事人才以捍御国家，谁料附和逆党，甘冒不韪，为此赏格缉拿。[172]

耿翼翘为保定陆军预备大学校入伍生步兵队队长，学生中有顾祝同等。武昌消息传来，保定军校师生跃跃欲动，军校周围都是北洋军队的势力范围，马龙标部闻警戒备森严，入伍生总队长萧展舒怕发生意外，陆军部也担心学生暴动，批令解散应变，员生回籍或归队。11 月 17 日，他到达上海，在街上遇到士官学校同学，由他们介绍加入沪军，洪承点接了四营人，八门山炮，成立二连炮兵，需要懂军事的人协助指挥，请他去做参谋长，扩编为沪军先锋队，开赴南京前线。[173]

保定入伍生队的万耀煌说，“武汉枪声一响，我们平静的心田上立刻蒙受了一阵狂风暴雨，往日热心向学的气氛完全没有了”。他和几个同学南下投奔革命。船抵黄浦江，正是沪军都督府成立当天，马上担任参谋，负责组织督练处，起草了都督府章制、督练处章程。[174]

因武昌新军起事，各地督抚对新军防范严密，不再信任。

10月13日，两江总督张人骏给程德全复电：“糜无数金钱，久经训练之陆军，几等养虎自卫，可胜浩叹，下游应严加戒备，宁省兵力同一单薄，巡防三十余营，分防至千余里之遥，零星散扎，均难抽动。”

10月18日，张人骏接到袁世凯来电：“惟新军子弹不宜多发，械库须加意防守。”[175]

张謇说张人骏猜防新军，令他们移驻城外，每人只有子弹五颗，“新军乃人人自危”。[176]

10月27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向朱尔典汇报：“新军之有异心，人所共悉。上星期为先事预防之计，将枪上机关及子弹拆缴。”[177]

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日记说：“统制徐绍桢以其妻子送至总督衙门作为人质，乞求发给子弹，亦不应。总督曰：新军为用于对外作战者，内乱则可用驻防兵云云。在待遇上，以前厚于新军而薄于驻防兵，今日则完全改变其地位，优待驻防兵而疏远新军。新军之不满虽然达于极点，然以无子弹无资金。不能举事。”[178]

无论防范如何严密，新军第九镇还是被逼反了。

10月17日，左绍佐听说瑞澂要借西兵，洋人没有同意。他在日记中说：“将来仍必借力于西兵，何也？中兵皆新兵造逆者，即新军无可恃以为用也。”[179]

10月18日，日本驻长春领事松原致电外务大臣内田：

……数日前赵总督途经本地时，竟一反常例，不许官兵到车站列队迎接。据闻该师团兵员七八千人中约有三分之一系革命党人，因而风传该军随时均有发动变乱之可能。[180]

江苏巡抚程德全10月25日电奏：“自鄂省兵变，咸谓新军为不可恃，以致军心不安，情形颇为岌岌。”第二天，朝廷下旨，“朝廷于新旧各军，本无歧视，当此事变日亟，正赖推诚布公，以信相孚”。[181]

各省督抚对新军的防范和忌讳并没有因此解除，正是云贵总督收子弹、收枪械的举动使新军提前起义。朱德回忆，他所在的74标早就停止给士兵发子弹。他们借练习打靶的机会，每人暗地准备了四、五发子弹。李经羲调集卫队营、辎重营和两个机关枪连为守卫。结果，讲武堂、陆军小学的学生乃至李经羲的卫队都参加了起义。[182]

陕西为防士兵暴动，收回士兵的子弹，又要把新军调出西安，因此促使他们提前起事。由西安、三原逃到汉口的日本人说，起义的基干为新军第二十二标第二营士兵，张凤翙等军官各利用其地位号召士兵，三四千名新军全部响应。[183]

山西新军也是在调离太原之际领到弹药，发动起义。

在甘肃督练公所测绘科科员张昌荣称，陕西新军光复西安，兰州为之震动。长庚把保定出身的军官佐，目为“洋学生”，阴谋捕杀，以除后患，他以风声紧急，乘隙离职。[184]

11月20日，英国驻华武官的报告说，“最初革命党领导人无疑是依赖陆军的叛变，没有他们的援助，将难以实现其计划，而人心所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他们准确估量。”[185]

三十功名尘土耳，一江冰雪笑渔翁。

——吴禄贞三十自寿诗

北望争期吴禄贞，那堪一出便牺牲。张园莫啜梨园剧，还喜将军得盛名。

——《海上光复竹枝词》

当时北方新军中三个留日士官生出身的将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为世瞩目，两个镇统，一个协统，又在京师附近驻军，对清廷威胁最大，人们

对吴禄贞寄予的期望也最高。早在10月15、16日，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就报道他所带的军队，“其举动不可预测”。可见风声外传，对他非常不利。当时奉天民政司给交涉司一个咨文，要他们照会日本领事馆，“对于统兵大员，遽以不肖之心妄行推测，淆乱听闻，莫此为甚”。[186]

居正回忆，吴禄贞在日本留学时已大露锋芒，“有雄才大略，富于革命思想，在日本士官中倡言革命”。[187]

上海新舞台演出的新剧《吴禄贞》，刘艺舟扮演的吴禄贞出场时，口念道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休，如今共抵黄龙阵，痛饮只有一杯酒。”[188]在熟悉他的人看来，32岁的吴禄贞真是一时翘楚，雄姿英发。

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出身的何遂说：“见到吴禄贞，他的样子很英武，谈吐率直而亲切。”[189]

阎锡山说，“而吴将军之英俊豪爽，肝胆照人，料事之确，谋事之忠，在娘子关之短短一会，在我的心目中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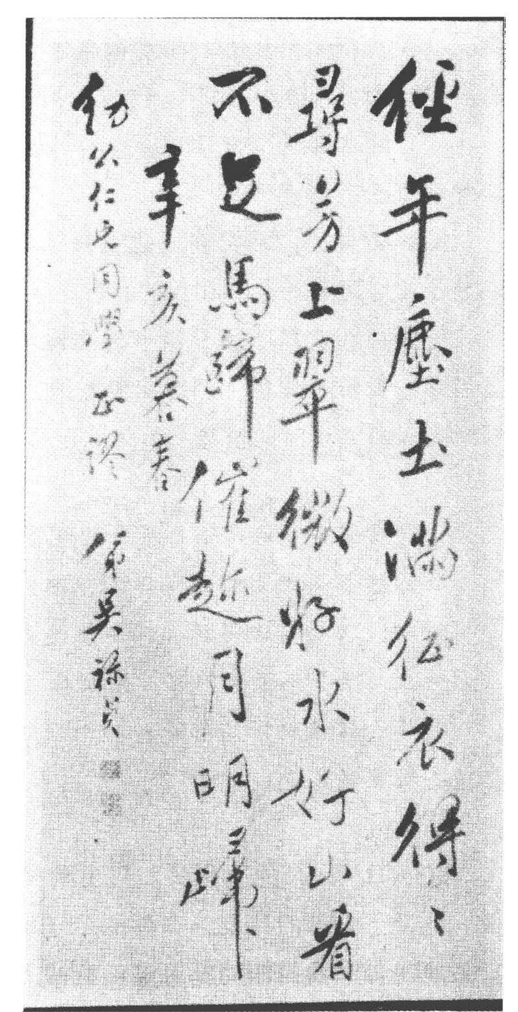
万耀煌在武昌听过吴禄贞的演说，到了保定军校，某个星期天他即以同乡后辈的身份去拜访，“对我很爱护，叫我各事小心”。武昌消息传来，他和同学天天研究当时的情势，认为保定是北京门户，只有吴的第六镇留守：

> 我们早知他是倡导革命的健将，又听说，入伍生总队长萧展舒、兵站总监吴经明都到了保定，他们三人都是湖北人，又是士官同期同学，只要在保定独立，以他的声望，登高一呼，各省新军必群起响应，况且奉天有陈宧、蓝天蔚（第二混成协协统）、石星川、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和他们联合进兵，京畿不战可下，我决定去劝吴起义。

10月15日，他去见吴，只见到吴的随从副官曹文思，是他当兵时的管带，他说了自己的计划，曹要他严守秘密。几天后他再去，曹一见面就神色紧张地说：“我们四周都有巡防营的人监视，朝廷已在怀疑吴统制，你以后不要再来，你上次讲的那些话，统制叫你不要和任何人提起，至要，至要。”万耀煌非常失望，认为吴畏缩。



第六镇统制吴禄贞



吴禄贞手迹

其实，吴也有联合张绍曾、蓝天蔚，底定时局的计划，并不是畏缩。[191]

12月28日，廖宇春路过石家庄，吴禄贞的死事之地，他们曾有过一面之见，吴在京保车上谈论东北间岛事，“以手枪要日人，扬扬颇自得也。人极有材，惜锋芒太露，想其英风飒飒，死事之惨，不觉凭吊低徊，留恋不忍遽去”。[192]

孔庚说，“吴禄贞是个雄才大略辩才无碍的人物，尤其是识见过人，热心爱国。……可惜其才大而疏，稍欠谨慎，终竟为人所算，功败垂成。”[193]

万耀煌也说，“吴才气不凡，志大心雄，惟眼界太高，目无余子，态度傲慢，因此易遭人忌”。[194]

这是他的性格，当然更重要的原因，第六镇本为袁世凯旧部，他虽居统制之位，而不能完全掌控，发生意外，实属必然。

包括外国人在内，无不为他遭暗杀而惋惜。11月9日、16日，高拉尔德两次写信给法国陆军部长：

> 到处都像是在控诉满洲人犯此谋杀罪，但，没有一个人有可靠的凭据。由满洲人组成的那个标因害怕报复而逃散。这件新闻在北京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同时它又激起了新的种族仇恨并重新引发了革命军将进攻北京这种未经思考的恐怖。
>
> 缺少事先计划或者由于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吴禄贞将军的消失，也许说明革命领导者们放过了一个也许是仅有的对王朝进行根本打击的机会。[195]

11月7日，当吴禄贞被杀的消息传到北京，汪荣宝日记说，大家相顾失色，认为北方大局将不可收拾。听说他是被旗兵所杀，“似此满汉相仇必将演成极大惨剧”。[196]

为旗兵所杀只是误传，到底是谁主谋杀吴，大致上有三种说法：

一是良弼等满清亲贵主使说。蒋作宾等持此说。

二是个人私仇说，非袁世凯也非良弼等主使。载涛持此说。

三是袁世凯主谋说。持此说法的最多，袁儿子袁克文和亲信幕僚的记录值得注意。

11月16日，吴禄贞被刺杀后，御史温肃还上奏要求宣布他的罪状，以快人心而伸国法，指控他“跋扈素着，曾游学东洋，归国后昌言排满革命不讳。此次武昌事起，该员首与黎元洪通谋，又东说滦州军队，西煽太原叛兵，截留前敌军械，并欲阻绝南北交通，以抄第一军之后路，皆该员主谋。以至旬日之间，畿甸几于震惊，朝廷为其要挟。旋于正定军次，欲遣人谋杀袁世凯，为其部下侦知，将该员戕毙，赴正定县出首。此事人言凿凿，一查便悉”。

明确指向他为袁世凯部下所杀。

当日，上谕着直隶总督陈夔龙迅速查明，据实复奏。[197]

陈夔龙回忆，吴禄贞之死，“一说为项城遣人暗杀。后虽奉旨命余查办，卒莫得其实在情形”。[198]

袁世凯派出的代表刘承恩、蔡廷干到武昌，黎元洪态度尚温和，军政府其他人对刘、蔡说，“万无与朱温同类之袁世凯相妥协之理，并痛责其谋杀吴禄贞之罪”。[199]

11月25日，远在成都的吴虞在一朋友处看到北京来信，“吴禄贞已为袁世凯所杀”。[200]

王锡彤当时有日记，11月7日，他在彰德，忽传吴禄贞被刺消息，吴军中有人来彰德说：“吴统制调兵来袭袁宅，车已生火待发矣。部下卒皆袁公旧部，闻之愤怒，结合数十人刺吴死，故来告。”他认为彰德为后路粮台，彰德如失，大局将不可问。吴未行而先死，袁公之德泽在军人深矣”。[201]

袁克文的说法与此一致，先得到密报，吴有夺彰德、断后路之语。“吴至石家庄，止不入晋，邀将士拟劫彰德。有先公旧部隶吴军下，闻议愤甚，夜入吴室刺杀之。”[202]

袁克文为袁之子，王锡彤为袁的幕僚，他们都不为袁避嫌，虽无一语涉及袁主谋，但都认定杀吴与袁有关。

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与吴禄贞都是第一期留日士官生，握有兵权，当时屯兵滦州，陈之骥等游说他乘机发动，最初他也慷慨激昂，跃跃欲试，士兵都已上火车，生火待发，临上车时，他却手握车杆，一脚踏车蹬，一脚踩在平地

上，徘徊多时，还是转身跑回了司令部。这是陈之骥亲眼所见。大军会师，直捣京津的计划因此流产，只是发出一个要挟清廷实行政治改革的电报。[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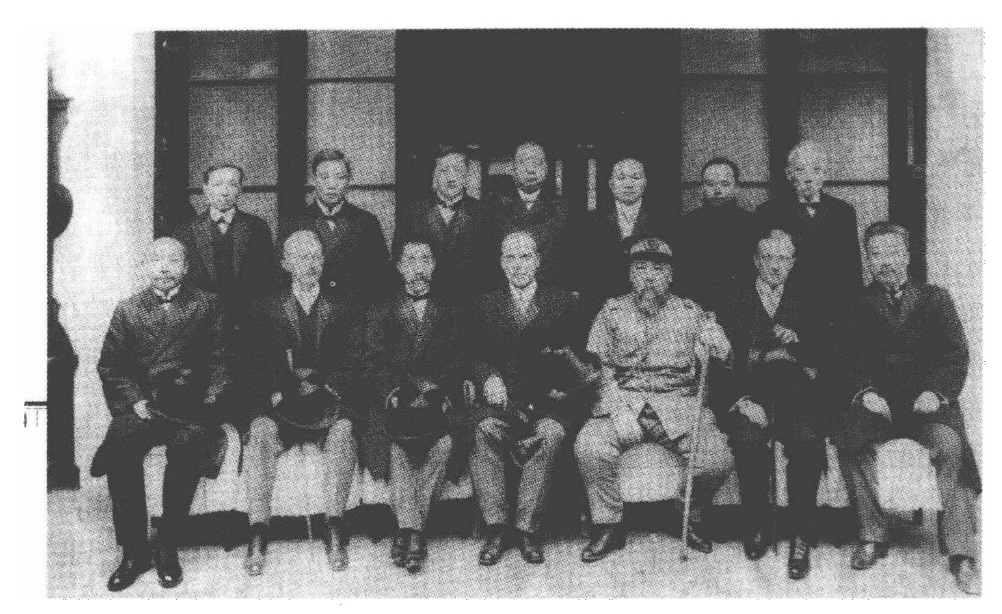
10月29日，他发出的十二条电奏到京，庆亲王面貌失色，两手发颤，顿足说“大事去矣”，会同两协理入奏，摄政王特开密议，各王公大臣都非常惶恐。良弼逐条宣读，读到第八条“皇族永远不得充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亲贵大哗，载洵、载泽、溥伦等极力反对，并提议严惩。载涛、良弼、善耆等主张一方面颁布十九信条，一方面惩办张绍曾。[204]

清廷下罪己诏、颁布十九信条都与此有关。有人问王锡彤：“如此天下可以太平乎？”他答：“战争方始耳。”对方愕然，问何故？他说：“朝廷之所以号召天下震慑群庶者，威信而已。今朝廷失信之事已更仆难数，此诏一出，更示天下以弱。现任兵官尚可迫胁，何人不可以迫胁乎？威严尽失，何以立国？乱事之起，靡有涯已。”两人相对唏嘘不止。[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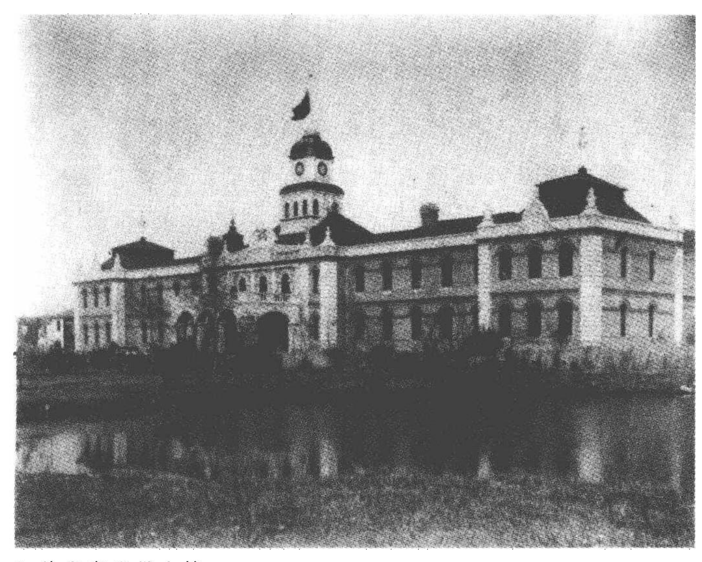
蒋作宾回忆，早有同志刘一清、石星川等人在张绍曾军中密谋。滦州电奏到京，清廷大为震动，派出大员宣抚，他和黄恺元、张华飞等随往，陈其采也在滦州，“共同商议，直捣燕京，实行首都革命；暗为清廷侦悉，先将车辆调去，又将吴禄贞所统之第六镇调至石家庄”，他们只好回京。[206]

11月5日，日本公使伊院集给外务大臣内田的电文中透露了不大为人知的内情：

> 张绍曾提出上奏文十二条，起初只为向北京朝廷进行恫吓。此事起因于袁世凯曾派段芝贵前往滦州向张绍曾进行煽动，张以段氏所谈恰与其本人之功名心以及不愿被调往南方作战等心理相吻合，故而轻出此举，并未经过深思熟虑。不料奏文提出后竟然引起轩然大波，致使张氏本人亦颇为惊愕。对于今后之形势演变，张氏心中甚感惶惑：若与袁世凯共事，鉴于袁氏秉性，将来事成之后，不无革职或遭暗算之虞；果如此，则不如与黎元洪合作，两相呼应，借以牵制袁世凯，迫使官军退出黄河以南，将满清朝廷封闭于黄河以北之地，而任汉人在华中、华南地区建立政权。张氏此时正徘徊于此两者之间，尚未做出决定。本月3日张曾向袁世凯、黎元洪以及



程德全(前排右三)等合影



江苏省咨议局大楼

> 中央政府发出通电，呼吁和平。同日又电请度支部拨款二十万两，现已接到复电准予照拨，但尚未见现款拨下。[207]

张绍曾也有过进军天津甚至北京的考虑，最终都未实行。

他是一个有名士派头的军人，整日除占大六壬卦外，好饮酒赋诗，仰慕梁启超，主张立宪。张国淦评论：“张之脆弱，不足为虑，吴之英迈，则无与敌者，故下此毒手也。”[208]

蒋作宾再次赶到滦州，计划运动张绍曾举兵，正值朝廷11月5日任命他为宣抚大臣后，他准备进京请训，蒋在车站告诉他不可去，并晓以利害，他被说动，誓干到底，要蒋和刘一清拟定进攻首都计划，“布置大致就绪，张绍曾决心不坚，忽为星相家所动摇”。[209]

吴禄贞遇难后，潜入东北的梁启超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张绍曾、蓝天蔚身上。11月11日，他写给女儿梁令娴的信里说：“张、蓝闻确是可人，但其部下如何又不可知，安保其不为吴禄贞者。今一线希望，在求保全此二人，保全此二军耳。”[210]

他的希望迅速落空。此时，张绍曾已被夺去兵权，只有蓝天蔚还在东北带兵，那桐致电赵尔巽：“蓝既热心功名，自应加意笼络。”[211]

蓝的处境极为危险。第二天，赵尔巽在总督衙门开会，决定成立保安会，以应付时局的变幻。奉天关税务司穆厚敦写信给安格联说：

> 在会议进行时，蓝天蔚坐在人群中间，低着头没有任何活动，他穿的是和服。据总督衙门的人说，他是黎元洪的盟兄弟，性情很暴躁，和总督的关系也不好。我记得他曾经和总督有过争吵。我相信在这种场合他很明白严重扰乱治安对他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在平常的时候他似乎是被严密地监视着的。[212]

11月14日，他就被迫离开东北，赵尔巽发出的札文还假惺惺地称：“查有第二混成协蓝统领天蔚，志趣正大，识见明敏，堪以派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事之实情，公众之意见。”[213]

11月22日，他在“西京丸”船上写信劝赵尔巽顺应大势，赵当然不会为之所动。此后，蓝天蔚被南方推为关外大都督，从海路举兵北上，对东北的局势仍有一定影响。

新军共二十四万一千人，其中北洋系约十四万五千人，非北洋系约九万六千人。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北洋系新军装备、训练最好，然而，先有廖宇春南下和谈，与南方达成秘密协议，后有段祺瑞两次通电逼清廷退位，清廷所依赖的新军最后成了葬清的主力。随廖宇春南下的夏清贻说：“所幸北军中人，近来赞成共和，颇不乏人。”[24]并非虚言。

三、立宪派

> 自内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国耻日深，于是海内人士愁愤之气雷动雾结，而政治革命之论出。……惟是筹备宪政以来，立法施令，名实既不尽符，而内阁成立之后，行政用人，举措尤多失当。在当事或亦有操纵为用之思，在人民但见有权利不平之迹。志士由此灰心，异说从而煽动，于是政治革命之望，一变而为种族革命之狂，而蓄祸乃烈矣。……种族革命之异说，既由政治革命而变成，必能餍其希望政治之心，乃可泯其歧视种族之见。

亲眼目睹武昌的火光，六天后（10月16日），张謇在苏州阊门外的惟盈旅馆，连夜替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了这份奏折，参与起草的有江苏咨议局议员雷奋、杨廷栋，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当天黄炎培的日记说，他和沈恩孚、雷奋等去苏州，遇到杨廷栋，一同到无锡，遇到张謇和汤寿潜，又一起折回苏州，商量时局对付法。在惟盈旅馆吃了饭，张謇、雷奋、杨廷栋同去见程德全。[25]张謇自述，他到苏州，程德全完全赞同他速颁宪法、开国会的主张，嘱他草奏，他匆忙吃了晚饭，回到旅馆，“约雷生奋，杨生廷栋

二人同作：时余自书，时属二生书，逾十二时脱稿”。因为睡得太晚，他彻夜未眠。[216]

折中直言，“民气嚣而不能遽靖，人心涣而不能遽收，眉睫之祸，势已燎原，膏肓之疾，医将束手”，呼吁解散亲贵内阁，下罪己诏，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

此时，立宪派的方案还是君主立宪。这一折，代表了他们在体制内的最后一次努力。几年后（1915年），保存了折子底稿的杨廷栋请画家吴湖帆画了一幅《秋夜草疏图》，纪念那一晚的情景。

这一奏折以程德全、孙宝琦等人的名义电京。10月28日，电奏上达，未蒙采纳。[217]内阁阁丞华世奎对张国淦说，这一电奏揭破政治革命、种族革命，说出了向来疆臣不敢说的话，可谓有胆。摄政王不置可否，庆亲王自知才力不足，屡屡乞休，“今日得此电奏，总、协理一同恳求罢斥”。[218]

程德全比张謇小七岁，1910年春天到江苏巡抚任上，正是张謇为咨议局议长时，他对张謇很佩服，极为尊重其意见，给人私信中曾说：“[苏] 士绅学问向占优胜地位，近来东西文明输入，而知识亦愈日新，加以张殿撰謇诸人为之导师，力加提倡，将来吾全国之教育模范，殆将取法于兹。”他们的政见也颇多相同之处，他支持张謇等人推动的立宪运动，参与各省督抚要求开国会的联名电奏，与张人骏的态度相反，曾就国会与责任内阁一事当面辩论。1911年2月18日，他和张謇在苏州初次见面，他们在辛亥变局中的合作基础早已奠定。[219]

11月11日，程德全请张謇到苏州坐镇，信中透露苏州当时也不平静：“弟勉力支撑，现已告竭；公迟迟其行，如有破裂，不敢任咎，祈速命驾前来，即日交代。得公镇抚，不唯各方面疑团解决，且须速商各都督推举临时大统领，方于时局有裨。弟忍死以待，迟恐无及，不忍多言。”[220]

当天，张謇在上海与庄蕴宽、温宗尧、伍廷芳、雷奋、杨廷栋、沈恩孚、黄炎培等商量组织临时议会的事。[221]

程德全会同浙江都督汤寿潜联电沪军都督陈其美，“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提议各省公举代表，在上海集会。同日，以独立各省代表的名义联名发出“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

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

列名的几乎都是立宪派，包括张謇、伍廷芳、唐文治、温宗尧、张元济、汤寿潜、程德全、赵竹君、高梦旦等，虽也有宋教仁、于右任等少数革命党人。

也是这一天，伍廷芳、张謇、唐文治、庄蕴宽联名给摄政王发出一电："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兼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计、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22]

唐文治记得，庄蕴宽将电稿请他署名时，张謇、伍廷芳已签名。电稿文字典雅，他估计是出于张謇手笔。[23]

11月13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向驻华公使代办汇报：

伍廷芳和他的合作者们刚给摄政亲王发了一份电报，……他们正式通知摄政亲王说，中华民族向往过共和国的生活，君主立宪对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他们答应，如果皇帝退位和同意承认新政府，新政府将对亲王和皇族成员以礼相待，并保证他们能平平安安地享用他们的财产和受到他们应有的合理的尊重。……张謇是江苏省谘议局议长。我在谈到美国的某些计划时就已经向您述及过这位要人。如您所知，这是一位著名文人，是值得注意的能处理大量事务的人。[24]

同一天，张謇、汤寿潜等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请转达蒙古各界赞成共和。

13、14日，张謇他们连日在江苏教育总会开会讨论组织临时议会。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由此产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由这一代表会而产生，由此可知，立宪派为创造民国的重要原动力。



汤寿潜



张謇

此时清廷仍对张謇寄予希望，11月17日，他从报纸上看到派他为江苏宣慰使，他在日记中说“何宣何慰耶”？第二天，又知袁世凯组新内阁以他为农工商大臣，“理无可受，拟辞职电”。[25]

张謇在辞职电中表示，自己一向主张立宪但求如日本，不敢望德，尤不敢望英，但如今已经晚了，兵祸已开，“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者”。张勋在南京杀人无数，“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词可宣？”不如将民族纳入共和主义之中，为皇室留点余地，“不为人民遗二次革命之种子”。政体未改，实业无从谈起，“农工商大臣之命，并不敢拜”。[26]

11月24日，朝廷收到张謇电，“辞宣慰使及农工商大臣，仍请改为共和政体”。[27]

叶昌炽在苏州读到这一电，大为不满，认为张謇“指斥乘舆，逼迁九鼎，侃侃而谈，绝无瞻顾，若其理甚直而其气甚壮者。在从前，固名士，固词臣，固诸侯之上客，固乡望之铮铮者。呜呼噫嘻”！[28]

11月25日，张謇收到内阁歌电，促他迅速进京，详细讨论政体问题：“至共和政体，列国有行之者。惟中国幅员寥廓；满、蒙、回、藏及腹地各省，民情风俗，各有不齐；是否能收统一之效，不致启纷争割裂之祸？”他复电反驳：“民主共和最宜于国土寥廓、种族不一、风俗各殊之民族”，“今共和主义之号召，甫及一月，而全国风靡……今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惟北方少数官吏，恋一身之私计，忘全国之大危，尚保持君主立宪主义耳。”[29]

11月27日，他给袁世凯复电：“政体关系人民，应付全国国民会议。以业经辞职并非公推之一、二人，与少数廷臣讨论，断无效力。……应先请明发谕旨，宣布尊重人道不私帝位之意……”[30]

清廷原来还指望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出来挺一把，一再向他们示好，没想到他们在关键时候都转向了共和。10月29日，朝廷给浙江巡抚增韫上谕，“现在人心不靖，谣言四起，汤寿潜既为乡里所重，着赏给四品卿衔，劝谕商民，各安本业”，第二天，又电杭州将军德济，同意浙绅呈请派汤寿潜总办全省团练，设立团练局，官督绅办，保卫治安。11月14日的上谕又派他为浙江宣慰使。[31]可惜他也拒绝接受。

11月16日，他给赵凤昌写信，解释为什么受任浙江都督：

此次返杭，明知火坑，以杭有旗城，可四五千丁。若一相搏杀，伤必相当，坐见万人将流血，乌能无动？……法亦民主，能与美同时承认，他国宜不至为梗，庶中国从此不亡。

他给张元济的信中说：

此次大会，自必议及政体，合众共和，参用美国、瑞士之制，似无疑义，然查美国一换总统，并委任各员而亦一体更动，新旧未洽，即人民受亏，拟请议定换总统时，敕任官自随之而换，奏任者换不过半。委任各员，如无过误，意可不必更易……[22]

张謇写给章太炎的信里说："昔日之言改革者，一味抄袭日本，今日之言改革者，又有一味抄袭美国之势。鄙意法、美皆民主，而宪法不相袭。国势根本不同，未可削趾适履。今以共和为主义，立法不妨参酌法、美，期适于我。"[23]

他们都已在思考新制度设计如何更合乎本国的国情。

作为立宪派的中心人物，张、汤的选择对清廷的打击是致命的。刘厚生听说，袁世凯曾这样回答王公亲贵："你要我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的。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我是办不到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假如你们不满意，我只有向太后辞职。"[24]这种说法虽未必确切，但代表民意的立宪派反戈一击确实使清廷措手不及。

11月30日，曾与张、汤一同创立"预备立宪公会"、担任过会长的郑孝胥说：

武汉乱吼，国人多以排满为心理，士君子从而和之，不识廉耻为何物，于黎元洪何责焉；宜作书一正张謇、汤寿潜之罪，他不足道也。



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左）与朱庆澜



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



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

本来同为立宪派的一员，而今分道扬镳，他对张謇诸人尤为不满。12月22日，报载补张元济为学部副大臣。12月23日，他在报纸上看到张元济的辞职电，其中说“为皇室计，不必争此虚位以致奇祸”，对此大为不屑，认为张元济学张謇，“辞不就可矣，何用鼓吹逊位之说以媚乱党耶”。[235]

朱祖谋、刘廷琛也说，“张、汤乱天下之罪不可恕”。刘廷琛写给魏斯逸的信中称张謇对清廷的罪恶，其实大于梁启超、熊希龄。[236]

恭亲王溥伟慨叹：“呜呼！以程德全、汤寿潜、伍廷芳等，世受国恩，身膺重寄，乃甘心背叛朝廷，不加诛讨，反与之议和。”[237]

1912年1月8日，恽毓鼎得知孙中山在南京“僭称总统”，“伪设行政长官，张謇受实业长职，程德全受内务长，伍廷芳受司法长，陈锦涛受财政长，汤寿潜受外交长。此数人皆朝廷卿贰大吏也，十叶天子不事而事孙文乎？”[238]

他们的转向代表了各省咨议局议员的基本倾向。曹汝霖说，他们本来主张君主立宪，政府不能利用，激成为革命排满之中坚。[239]

咨议局、资政院的相继出现，为立宪派提供了合法的政治舞台。他们主张政治变革，并不认同种族革命。然而，一次次的和平请愿遭到拒绝，使咨议局议员对清廷几乎绝望，张謇替程德全起草的奏折上已作过分析。“原来留京活动的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等回原籍，渐与革命党人互通声气。”[240]

汤化龙为湖北省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为湖南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在社会上都有号召力。武昌首义之初，革命党也曾有意推汤化龙为都督，他拒绝了，劝说黎元洪出来，自任民政长，对整个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湖南的新军士兵听到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也发表反清演说，纷纷欢呼“谭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241]

11月6日，朱峙三从报纸上得知，湖南都督焦达峰被刺，军队举谭延闿为都督，“以众望所归，非谭议长不可”。谭为粤督谭钟麟的幼子，受满清之恩甚重。“此次必如吾鄂之逼汤化龙议长一例也。”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汤化龙倒也并非被逼，他不知情。

11月28日，朱峙三日记说：“四川亦举省议会议长蒲某都督，大概号召人心非有声望不可，与湘省同。”[242]

四川铁路风潮中，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等地方士绅中的头面人物遭到关押，是事态激化的重要因素。成都独立前，赵尔丰曾有意将军权交与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将政权交与邵从恩。邵从恩以国体且改共和，都督宜由民选，省民大会既不能在短时间内召开，则应以省民间接选出的咨议局议长出任。赵尔丰还想以朱为都督，蒲为副都督，邵从恩说，“湖南都督谭延闿亦系文人，若以民选议长而置之副，恐不惬舆情。”最后以蒲殿俊为都督。[243]

安徽、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等地咨议局都在推动独立。11月13日，给事中高润生的奏折说：“各省要求独立，亦多系咨议局议员赞成。是咨议局亦人心向背之所关，大局安危之所系。”[244]

11月7日，广西咨议局议决独立，议长甘德藩等往说巡抚沈秉坤，请他宣布，没有马上答应。他们转而游说有兵权的布政使王芝祥。第二天一早，桂林到处高悬独立旗帜，沈不得已宣布独立。[245]

没有独立的河南、奉天、直隶，咨议局也与南方各地声气相通。河南咨议局多次策动独立失败。奉天独立不成，咨议局议长吴景濂南下，参与了民国的创立。11月24日，他同刘星阁乘火车赴大连，车中遇到弃职南下的东三省盐运使熊希龄，熊劝他到大连后再给赵尔巽写信，劝其态度光明，响应南方。他告诉熊：“赵事不可救药，去信已属无用。”[246]

顺直咨议局推议员王法勤、孙洪伊到滦州访张绍曾，表示第二十镇如宣布起义，经过天津组织政府，咨议局完全担任筹拨军饷，按时供应。另一议员王葆真回忆，过了三天，顺直咨议局约集天津各界士绅百数十人，在河北公园法政研究所开会，讨论时局。警察局杨以德闻讯，派警察到会监视。“我乃大声呼吁我省应当要求宣告独立，许多人热烈鼓掌，警察未敢动手。”次日，日本人办的《天津日日新闻》用头号大字登载他同天津士绅主张宣告独立的消息，并发消息到南方各端口报馆。[247]

11月25日、12月3日，顺直咨议局两次电致内阁，主张共和，请求朝廷早日行揖让，公天下于民。

立宪派转向共和并不突然，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他们一心指望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却屡屡受挫，终于在辛亥冬天的巨浪中放弃了清廷，实则根子早已埋下。

1910年访华的美国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代表团，在与立宪派的亲身接触中，感受到他们渴望建立立宪政体的迫切心情，以及与朝廷之间隐伏的矛盾。大来回国后，在旧金山报纸发表访华报告说：

刚刚成立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会上我们遇到了来自各省的代表。他们都急切地想从我们身上了解到根据我们的政体他们可以如何行动，因为他们希望尽可能按照我们的政体来仿造新的立宪政体。在所到省会，各省咨议局都为我们举行了宴会。

在大来访华日记中，我们可看到辛亥前夜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的裂痕。11月9日，在上海赵凤昌家举行宴会，张謇、熊希龄等在座，宾主共14人，大来对张謇印象尤深，“我在南京见过这位咨议局议长，虽然他不会讲英语，但是通过翻译，我们就立宪政府问题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讨论，目前这个问题是他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他们都迫切地向我们了解我们所知道的各种立法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他们最终该怎么做全然不知。……但是，在中国实现立宪政体的困难要比外国人想象的多得多。官吏与商人之间的感情不很融洽，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最近他们之间的裂痕更加扩大了。这次访问突出地显示了这一事实。离开上海的前两天，我在汇中饭店为上海和其他城市的24位重要商人举行了一次宴会，其中一位客人在讲话中说：以前，中国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聚会。下述商会的总理出席了会议：上海、广州、汉口、天津——中国四个最大的商业城市，其他三个商会由他们的协理为代表。……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充分和自由的讨论，不仅讨论商务也讨论政治。就此而言，这次会议使他们进一步萌发了对满清政府的极大的担心和严重的忧虑，而其中重要的意义在于使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人们对严重的形势统一了认识。”[28]

1911年10月11日，武昌出事的消息尚未传来，上海《时报》的社论《论政治思想与革命势力消长之影响》即说：“其桀骜者则今日为议员已不见容于政府，安知明日不可投身革党，与政府立于对抗之地位。如是则主张立

宪政治之辈日见其少，附和革命政治之辈日见其多。”

流亡海外的立宪派以梁启超为代表，也在积极谋划，试图实现“虚君共和”的主张。10月29日，他写信给徐勤，计划联合载涛，驱逐载泽和庆王，以载涛为总理，即日开国会。还没有选举之前，暂以资政院、咨议局全部议员充国会议员。信中并说，“资政院皆吾党”。11月6日，他给徐勤信中又说：“幸资政院已握一国实权，而议员大半皆同志。”[249]

民政部右丞、资政院的钦选议员汪荣宝逐日记下了这场革命的点滴，资政院坚持政治改革的立场是一贯的，这是清廷骨子里不愿接受的。革命发生正值资政院第二次常年会开会之期，10月25日，议员提出治标、治本策，第二天上奏，惩办盛宣怀、赵尔丰等祸首为治标，治本之策则要求迅速组织完全责任内阁，明年提前召集国会，“内阁国会为行政立法之根本，而宪法尤为行政立法上根本之根本，关系綦重”。

10月27日，资政院讨论、议决三件议案，一罢亲贵内阁，二将宪法交院协赞，三解除党禁。作为三件具奏，当日呈递。[250]

朝廷完全答应了这些要求。10月30日，许宝蘅日记说，昨日资政院三折，又有张绍曾等电奏，持论与资政院大略相同，“资政院三折均裁可，……当此危迫之时，得此明诏，或可使人心稍定。”[251]

汪荣宝到资政院，见到本日上谕四道：

一、引咎自责，二、罢皇族内阁，三，将宪法交院审议，四、解除党禁。他说，“朝廷既有悔祸之心，吾民自有望治之意，流血惨祸或可免乎”。

11月2日，张绍曾等请将宪法交议院，奉旨交资政院起草。汪荣宝到资政院，与同人商榷宪法信条，中午，溥伦、载泽来说，滦州军队电奏，对前两天下达的谕旨“尚多不满，有荷戈西望，不胜迫切待命之至等语，并闻禁卫军亦与滦州联合，岌岌可危……”当时，宪法信条十九条已议定，即交秘书厅誊写，于明日奏陈。[252]

因许多议员请假不到，通过宪法信条时，只有84个议员。

资政院以全体议员名义给张绍曾等二十镇将领电，“时局至此，诚如尊论，非将现在政体痛加改革，不足以固邦本而维皇室”。[253]

11月3日，资政院的奏折说，将宪法十九信条先行颁示天下，“胜于百万之师”。当天，许宝蘅日记说：“资政院奏拟定《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请宣誓太庙，布告天下”，朝廷允准的谕旨就是他手拟。[254]

汪荣宝见到本日上谕，“所有本院具奏宪法信条，悉予裁可，立即颁布。朝廷如此让步是亦可以已矣”。袁世凯的幕僚王锡彤却认为天下从此多事。

11月4日，汪荣宝到资政院，在议长室看到各处来电，“日来外间舆论对于资政院之举动颇致不满，自汉口虐杀事件起，南中民情益愤，无论如何调停，恐终无效。”[255]

在十九信条颁布后，11月5日，资政院又上了一折，要求速开国会，以符立宪政体：“信条既为宪法之标准，则国民代表之确正机关尤应早日成立，以期立宪政体之完成。”所有议院法、选举法由资政院征集军民意见议定，奏请颁布，以便即时选举，在数月内召集国会。

同日，资政院另有一折，奏请明降谕旨，特准此次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此次各省之变，其中类皆抱政治思想，无从展布，激而出此”。当天下达的上谕都允准了。

汪精卫等政治犯获释，流放新疆的温世霖也得到赦免。

11月14日的上谕，要每省迅速公举素有名望、通晓政治、富于经验、足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来京会议国是。[256]

11月6日，在资政院的谈话会上，有议员因各省摇动，倡议采用美利坚联州制度，嗣后各省行政长官由省议会公举，跟汪荣宝商榷，希望由资政院具奏，汪认为现在各省正在纷扰中，无论何等朝命，均不能实行，此举也是无效。[257]

11月12日，他在天津接到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的致议员书，大意为京师现在无事，大局颇有转机，希望各议员早日会集，定次日开会。

11月20日，资政院开会通过剪发、改历案。第二天，恽毓鼎在日记中痛责，“议员见识若此，何值一钱？”他曾听太监说，慈禧太后临终前，忽然叹息说：“不当允彼等立宪。”过一会又说：“误矣！毕竟不当立宪。”（实际上，资政院中直到此时仍有一批站在清廷立场的议员，23日的谈话会上，“尚有多数议员主张痛剿者”。）[258]

11月21日，邮传部候补参议陈毅上了一折，资政院开会已不足法定人数，重要事件应等到国会召集时再议：

乃自武昌告变，畿辅戒严以后，议员纷纷出京，民选一空，其不去者大率别有职司之员。每遇开会日期，其人数多则百有七人，少则八九十人或五十余人，甚至有数省竟无一人到会者。按诸院章，既不符三分二以上之数，推诸事实，更无由征各省民意之同。不符院章，是谓违法，不能征各省之同意，是谓失信。[259]

此前11月7日，钦选议员严复日记即说："数日风信极恶，江浙皆告独立，资政院民选议员鸟兽散。"

11月18日，《时报》要闻刊登"北京归客谈"《资政院之消灭》：

资政院民选议员今岁因武汉起义到者寥寥，后因政府有大借外债以杀同胞之举，使我人民永劫不复，已到者只得照常开院，极力反对借债，至十六日得有法国勾堆男爵来电决计不借与将倒之政府，十七、十八两日，该院稍知自爱之议员皆相率出院，如籍忠寅、李矩、于邦华、陈树楷等则回天津，陈命官、王昱祥等则回济南，孟昭常、陈敬弟等则回上海，易宗夔、李文熙等则拟往来于上海武昌之间，其恋栈不出者皆碌碌无足齿数之辈。妄冀拍袁内阁之马屁，图富贵，以后只当视为清廷之官僚，因民意机关已归于消灭也。

他们在辞职出京前联名上书，"既不能附和同声，自蹈盲从之罪，更不愿依违两可，同贻非法之讥"。[260]

11月24日夜，袁世凯与部分资政院议员会话，十时才散。[261]

11月27日，资政院开议时只剩下30多人，不到会的议员占了大多数，实际上开不成会了。12月6日，《时报》的消息说，资政院议员因国事共济会案未能通过，民选议员多出京，现存议员数十多是钦选，专作政府机关，会多密开，即明开，也没多少旁听者。

12月12日，恽毓鼎日记对资政院表深为不满：

> 武昌启乱始，犹以改革政治为词，今则朝廷从谏如流，革军依然不散，闻风响应，几遍全国，其为倾覆大清明矣。资政院力主停战，只能要挟朝廷，而令不行于革党，直将束手而待亡矣。况乱事不解，日久相持，土匪乘之，外国乘之，涂炭生灵，终归两尽。大清固已矣，我四万万之汉种又何辜？恐资政诸君亦无辞可解矣。[262]

同一天，汪荣宝在天津自拟九条媾和条款："一、改大清帝国为中华民国。二、民国之统治权由国民依宪法组织各机关行之。三、大清皇帝及其继统之子孙永远享有皇帝之高称及荣誉。四、皇帝驻跸热河。五、皇帝于皇室自治事宜有制定法规之权。六、皇族之有爵者依旧世袭。七、皇族除特免兵役义务外，与国民有同一之权利义务。八、皇室经费年三百万元。九、本约与民国宪法有同一之效力。"他说："似此调停君民之间，彼此均可相安无事，实为上策。"

恽毓鼎若知道，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12月22日，汪荣宝接到曹汝霖来信说，"沪议坚持共和……山陕均有电告急，外债又无从借贷"，让他将所拟九条转达徐世昌，忠告袁世凯，他当即给徐写信。

不久（1912年1月15日），汪荣宝在天津读到大阪《朝日新闻》译载的南京临时政府布告，在日记中称许："光明俊伟，可与美州宣布独立文并传矣。"[263]

像汪荣宝这样的资政院议员，从坚持君主立宪转向共和立场，并认同"中华民国"，这是个重要的信号。12月18日，资政院议长李家驹谒见袁世凯，代陈各议员意见，民选议员已放弃责任，纷纷出京，每次开会，钦选议员常居多数，且不能到80人以上，屡以议员不及半数不能开会，哪怕勉强开议通过的各议案，全国又不承认，资政院实际上成了一残废机关。[264]

大来日记中对赵竹君家的那次宴会印象深刻，在上海，"我们每天有午餐和晚餐款待。最突出的是在赵竹君公馆，这一家的夫人们和其他人员都出

席作陪。这是超乎寻常的，我们都非常快乐。”[265]

当天，张謇日记中赞许赵，“而能破费私资为国家社会谋安全之计，同人中尤不多见也”。[266]

赵竹君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十年前（1900 年）的东南互保，他就是重要的谋划者之一，有人说：“四十年间，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267]他在上海南阳路十号的家“惜阴堂”是辛亥时期上海潜在的政治中心，各方力量在这里汇集，沟通意见，达成共识，某种意义上说这多少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经常出入“惜阴堂”的有江苏咨议局的议员黄炎培、沈恩孚、孟森、刘厚生、雷奋，浙江咨议局的褚辅成，张謇、汤寿潜是他的老相识，庄蕴宽就住在这里，革命党的要人黄兴、章太炎、宋教仁、汪精卫、于右任等也到这里来。

10 月 15 日，黄炎培日记说，“晚赴赵竹君之约，商量时局前途之对付方法。竹君招餐”。那天，在“惜阴堂”商讨应付时局前途的方法，定了一些策划。30 日他从镇江回到上海，已是晚上，“集于竹君家”。11 月 10 日，“晚至竹君家”。[268]

10 月 17 日张謇到上海，住在赵家。次日去南京。10 月 22 日，他到上海见赵竹君，第二天夜回南通。11 月 9 日，他到上海住赵家。期间，他多次到上海，去赵家的次数远不止这三次。[269]

赵竹君拟定的五条政见：

> 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
>
> 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
>
> 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
>
> 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
>
> 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这大致上成为南北对话、以妥协方式解决时局危机的基础。

11 月 11 日，熊希龄给他写信：“时局风云，一变至此，中国转机，即在

于是。所虑者，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均属响应，实未能有统一机关。存亡绝续之交，必须组织临时政府，方得外交团之承认。”[20]

民国的诞生，他是幕后的重要推手。当时，许多重大事情几乎都在“惜阴堂”讨论决定的。黄兴从武汉一到上海，张謇等就与他见面。12月2日，郑孝胥日记：“闻黄兴昨日来沪，寄居南阳路，非熊 [希龄] 宅，必赵宅也。报言，程德全昨日来沪，与季直、平书等会议，必因汉阳失败，南京守固，故谋办法。”第二天又说，“革党已陷南京……是夜，程德全、汤寿潜皆至竹君宅中议事，车马甚多。”[21]

12月4日，各省代表会选举黄兴为大元帅，就是前一天在“惜阴堂”商定的。

唐绍仪南下前就致电赵竹君，一到上海，当夜即到“惜阴堂”深谈，“即席定以共和政体为鹄的，谓来日所议，仅斡成此局之步骤耳”。

孙中山到上海，第二天就到“惜阴堂”，“致词谦挚”，说：“革命大业，诸君子功定垂成。……海外消息梗滞，百不得一，请详述之。”[22]

刘厚生当时戏赠赵竹君一个外号，“叫他做民国的产婆。这个产婆，在助产时，很是出力”。[23]

12月17日，已约定第二天南北和议开始，伍廷芳连全权文书还没有，他连夜给赵竹君写信，希望次日午前办好，并建议黄兴的头衔“似可添代办大总统字样”。[24]

“民国的产婆”之名可见一斑。

随唐绍仪南下的议和分代表之一冯耿光回忆：

> 电报技术员姓区，也是个广东同乡，每天有电报来，由区翻译出来就送给唐看……唐看过电报，往往就去打个电话，我们总以为是找伍廷芳商量，却不料是找赵凤昌 [竹君]。
>
> 有一天，区翻译出一件北京拍来的密电，照例递给唐看，唐看过很兴奋，说：“北京回电来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一头说一头挂电话，电话里和对方仍是和过去一样谈得有说有笑，很融洽。我觉得奇怪，就问他：“你有事不找伍秩老，为什么先打电话给

他？”他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我当时不知赵某究是何许人……我又问：“他有何权参与此事？”唐说：“由于后来张［之洞］推荐赵到沪举办洋务，接触江浙两省的时人很多，尤其为张季老所尊重，张、赵交亦笃厚。现在江浙的程雪楼、汤蛰仙和南方的几个都督同赵都有交情。民党中人对国内情形并不怎样熟悉，张是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胡、汪等民党领袖对张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张，而张往往趋而谋之于赵，张每自南通来沪，必住赵家，这样民党中人自然敬重赵了。因此，南方要人如孙［中山］、汪［精卫］、陈其美、程雪楼等有重要的事也来决策于赵。又因他长年病卒，不能下楼，大家为了迁就他，就到他南阳路私邸惜阴堂去会见或开会，在和议过程中每星期当中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兆铭、陈其美等曾在赵家聚会。所以他实际上是众望所归、洞悉全盘局势的南方策士，通过他反而好办事了。”经他这一席话，我才恍然理解。我在唐处所见，差不多天天唐要与赵通电话，赵在当时和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了。[275]

议和分代表之一张国淦也说，伍［廷芳］、唐［绍仪］同乡老友，共和主张，又同在一条路线。赵竹君曾在张之洞幕中，与他们都是旧识，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动甚力。伍、唐借他家，每夜同往聚谈，在议场时，板起面孔，十足官话，到了“惜阴堂”，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到目的，赵参与密议。魏宸组对他说：“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精卫与本人常到彼处，皙子［杨度］则未参加，而袁内阁与唐，亦先有秘密私电往还，均从促成共和着手。”[276]

12月31日，议和分代表之一蔡金台写信给赵尔巽论及江南人物，说赵竹君“乃参谋总长，兼北伐总参谋”，“竹君虽有谋略，而神气猥琐，骨格亦近柔脆。季直［张謇］则双眉常舞，正流所忌。若辈中惟有蛰仙［汤寿潜］尚有厚众朴拙之气，足称任重之品。”[277]

到清廷退位、以袁世凯为总统已成定局，南、北双方在“惜阴堂”讨论袁世凯的第一任内阁总理人选，同盟会坚持非同盟会人不可。列席旁听的赵竹君说，“我是以地主的资格，列席旁听的人，不应有什么主张。……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交替的一个桥梁……我以为只有少川先生 [唐绍仪] 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孙、黄同时鼓掌，此事迎刃而解。[278]

林述庆为北伐司令时，从江北写信给赵竹君，称许他“成事不欲居名”，“先生领袖名流，一言之出，必有风行草偃之也”。[279]

赵竹君逝世后，刘厚生撰写了一篇祭文，稿已遗失，他一直记得其中几句：

> 南阳路北，有楼三楹，先生所居，颜曰：惜阴。惜阴斋舍，满坐宾朋，呱呱民国，于兹诞生。[280]

四、“哥老会的摇旗唤呐”

1919年8月4日，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说：

> 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281]

孙中山、黄兴多次发动的武装起义多与会党有关，孙中山与海外洪门、黄兴与哥老会都有很深的关系。但在武昌起义之后独立的各省中，真正受会党影响比较大的只是江西、湖南、贵州、陕西、四川，有的地方会党还是独立后才起来的。

江西人刘士毅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毕业，武昌起义前夕回家乡



四川都督尹昌衡（左）与副都督罗纶

服务，他说，九江新军和巡防营中都有不少青帮、洪帮的人，洪帮居多，青帮分布在长江沿岸，如码头工人、盐船船夫等。九江炮台要塞几乎尽是洪帮之人。

绰号“马二棒子”的新军标统马毓宝不是革命党，其人私生活腐烂，好鸦片，每天不到十一二点不得起床。其马弁朱汉涛是洪帮中的龙头拐子，为人能干，跟随马有十多年。他暗中与队官刘世钧合谋，由刘包围马公馆，逼马宣布九江独立。由于洪帮的关系，金鸡坡炮台跟着响应，刘一跃为标统，要塞上的一个洪帮头目也做了台长。

南昌新军中也多革命党和青红帮。[282]

卓仁机从上海到武汉去参加革命，“船到九江，靠近码头，看见岸上的人大多数已剪掉辫子，身穿短衫，头上戴有像京戏中短打武生戴的扎巾，额上插有一个三尖牌，耳边挂有一个绒线球，这些人也是当时响应革命的青洪帮人物”。[283]

南昌独立，原新军协统吴介璋就任都督，“地方情形还很混乱，青红帮中人，干涉地方政事，措施困难，急于求去”。[284]

江西的会党叫“洪江会”，属于人们熟悉的青洪帮中的洪帮。

彭程万继吴介璋之后为都督，没有多久，即因“洪江会”猖獗，不安于位而去。[285]

江西陆军小学的周雍能回忆：

> 南昌光复之初，是非常混乱的。据我所知，会党与革命军本身均有责任。江西最有势力的会党是“洪江会”，其原始组织目的是反清复明，不幸到后来沦为鸡鸣狗盗之流。南昌光复后开狱释囚，许多“洪江会”党徒也放出来，会首陈细鬼组织军队自任师长，最糟的是有些人又以加入“洪江会”为荣，出来背大刀、打英雄结，行“同心协力”的礼，事事鱼肉人民，并且骚扰到武备学堂。

彭程万比起吴介璋资望万万不如，能力又平庸，更不能应付局面，“洪江会”就更毫无忌惮，飞扬跋扈。“我曾看到他站在派遣北伐军仪式台上演讲，

话讲不出来，两手直发抖，乡下人没有做过大事，没见过这种大场面，一点办法也没有”。不到一个月，他在11月21日就去职了，马毓宝取而代之。[286]

1912年1月11日，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九江情报称：“据军政府内部人称：此次马都督去南昌，系由于目下南昌、吉安间有自称洪江会之组织，不服从军政府法令，对于往来船舶课税，与东三省马贼相似，军政府对之有采取措施之必要。”

1月25日九江情报，“南昌洪江会与巡警发生冲突，酿成骚乱”。[287]

直到李烈钧上台，杀了些“洪江会”的党首，还动用了机枪，江西的秩序才安定下来，“洪江会”从此销声匿迹。[288]

湖南独立，焦达峰出任都督，他是“洪江会”的大哥，消息传到衡山以南，会众蜂起，大言：“焦大哥为都督，今日我洪家天下矣。”[289]

在湖北陆军第三中学的湖南人龚浩回忆，新军力量有限，就与帮会合作，焦达峰号召帮会而发动起义，“不过帮会原是老湘军遣散后留下的组织，力量在下层社会，因此湖南人心、秩序均感惶惶不安。”[290]

咨议局议员钟伯毅回忆，湖南革命党人起事成功，焦、陈为都督，两人出身寒微，部众多会党分子，“嚣张跋扈，横行一时，湖南缙绅，尤其咨议局议员，甚表不满，隐隐与之对立”。[291]

刘峙从武昌回到长沙，“焦达峰引会党占据要津，大肆抢掠，长沙居民纷纷逃难，我又不得不返回自己的故乡”。[292]

最初还没有都督的印信，焦达峰就在一张纸上写上都督焦令某为某官，下面盖一“四正”小印，四正就是“罡”字，“洪江会”的暗号。他每天委任十多人，长沙城内的庙宇、公廨、旅馆，到处高悬招兵旗帜，流氓、乞丐、车轿担役纷纷入伍，没有军械戎装，胸前拖着长带，高髻绒球，说是汉宫威仪。大盗冯廉直是洪江会的会首，已囚禁三年，出狱就任标统，募集了300人，驻扎湘潭，“寻杀夙仇，氛恶甚”。[293]

当时的混乱情形，小学生左舜生曾目睹，他在都督府只见貌似副官的进进出出，却没有人理会他们。当时，焦、陈杀掉在湖南有声望的黄忠浩，此人以书生而从戎，做过四川提督，卸任回乡，热心教育，曾为湖南省教育会



湖南都督焦达峰



湖南副都督陈作新

会长，武昌起义前三天，巡抚将中路巡防十营交给他统领，不及半月就遭难，湖南人对此很为不满。焦、陈“对自身地位殊感孤危”，表彰黄忠浩“本吾湘豪杰之士，徒以政见不合，不得已乃使之毕命遂志”，其实是怕报复。焦、陈被杀，与此不无关系。[294]

西安随武昌而起义，“消息传得很快，那时哥老会一类的人在活动，他们以鸡毛作传帖，消息辗转相传，十分迅速”。[295]

早在1910年夏天，同盟会和哥老会的人在西安大雁塔有过一次结盟仪式。哥老会在新军士兵中有组织系统，标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联系掌握他们的“哥弟”，各级舵把子中，除了张云山是司号官以外，其他都是护兵、正副目士兵、伙夫，却能掌握自己的组织，力量在同盟会之上。

陕西独立之后，一省出现六都督，还有大统领、副大统领，多为哥老会头目，他们以为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到处增设码头，散发“票布”，广收弟兄。张凤翙虽被推为大统领，哥老会首领张云山日常行文在总都督的“关防”旁，还要加盖“洪会公议”小章才有效。[296]

革命党人张奚若到西安，最感意外的是除了张凤翙之外，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中。张凤翙没有实权，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井勿幕和张凤翙给黄兴、黎元洪写信，交予张奚若带去，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驱除哥老会势力，并给了他一张离开西安的护照，以为可以凭此出城。不料到了城门口，大统领的护照和参议的身份都不管用，兵士不让其出城，说一定要有“大哥”的护照。这位哥老会的“大哥”张云山就是当时的都督之一。他又去找张凤翙，发了些牢骚。张叫秘书去请“张大哥”另发了一张护照，他才离开西安。[297]

张云山想当名将，又想做清官，经常仿照戏台上的包公，在衙门里设铡刀，搭台演讲时，也把铡刀置于台上。[298]他以“秦陇复汉军调遣步马炮工辎各标营队总都督”名义发布《谕民白话檄》：

兄弟是洪字号多年，又入了革命党的。并不是我反教，因为同

是灭旗兴汉，本来不必分，所以重立了一个三合会，是三家合在一起，同办一事。……你若是好兄弟，应该替大哥帮忙安民，教生意人庄稼人都照常好好儿做，安安然然，大家同享太平，也显得我们仁义。……世上顶不敢得罪的是百姓。失了百姓的心，皇上家都保不住江山，况且你们那些草民，还值甚么？我话说完了。你们做好人，便是我的兄弟；你们做歹人，便是贼。王法天理，都不得过去。

檄文右边有毛笔写的“三戒三畏三股合绳三人同心”十二个字，盖有三个红印，除了总都督关防，还有“洪会公议”的印，以及一个“替天行道治国安邦”的印。[299]

据说，张云山自拟过一个官衔：“见官大一级，听调不听选，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景梅九说，滑稽戏词中的“有为王出京来，比官还大，思一思，想一想，王是朝廷”。便是“见官大一级”的意思。[300]

当然，哥老会这些人打仗并不含糊，不然西安早就被升允夺取了。等到共和告成、战事结束，张云山立了不少战功，满足了做“名将”的心愿，决心取消码头，停止开山堂收哥弟。

哥老会头目中有个陈殿卿讨要“钦差大臣”，竟然真的给他颁发了“秦陇复汉军钦差大臣亲卫队统带”的关防。到1912年3月，他自请取消，呈文说：“现共和民国已经成立，自有统一之范围，断不能任各省自为风气，况钦差惟帝国始有此职，按之民国，于名为不合，于义无所取。若稍事迁就，实与政体有违，且贻外人之诮……”[301]

上海光复也有会党的身影，陈英士有帮会背景，刘福彪组织的敢死队就以会党的镇扬帮为主。沪军北伐军总司令兼敢死队总司令张承槱自述，10月17日他潜赴上海，住在北火车站相对的一裁缝店楼上，当时的上海还没有丝毫举动，但他每天接触的都是决心去武汉前线参加革命的。人心思汉，天与人归，他梦想不到在上海有各种各色人等踊跃参加革命，而直接向他行受洗礼的就达三千多人，多为青洪帮的兄弟，其中就有刘福标。[302]

11 月 22 日，重庆反正，街上就出现了打着黄缎子大旗的袍哥队伍。[303]

端方带入四川的湖北新军，杀掉端方，由水道顺流东下，“不知不觉间，兵心大变，军纪荡然，什么哥老会，群英会，大露头角，开堂放票，肆行无忌”。[304]

成都宣布独立，“市民争取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跋扈飞扬，寻仇报复，日有所闻。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

吴晋航回忆，“哥老会中人提倡恢复汉族衣冠，于是头扎英雄髻、身着戏装、腰佩宝剑、脚登花靴、招摇过市者随处可见”。[305]

在成都附近彭县的学生肖华清说：

> 总之“反正”了，据说要恢复汉代衣冠了。……过两天街上便出现有头戴方巾，身穿白色圆领，宽袍大袖衣服的人，我看见一个“哥老会”的人头扎英雄结子，套上一个草帽圈圈，身上亦穿的是白色圆领，宽袍大袖的衣服，足下穿的是满耳子草鞋，他一只手还不住地摇着一把白扇，简直像舞台上的武二郎了。以后陆续从成都回来的人多了，才知道人们的穿着还是和“反正”前差不多，穿汉代衣冠的人才没有了。[306]

郭沫若记得，12 月 8 日兵变发生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各街的江湖派，恢复了《水浒传》上的梁山泊的风光。他们在各街都组织公堂，牛角叉、枪矛、青龙偃月刀、大红灯笼，摆设得十分威武。丘八老爷的一幕掩闭了之后，现在又是陈涉、吴广草莽英雄的一幕登场了”。[307]

尹昌衡出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随即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来，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在他登台的几天内，天天都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客，各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进酒。

周骏就任军政部长，在军政部也挂出一个“大陆公”的招牌来，参谋部的人员要求王右瑜也组织一个“大参公”，王没有答应。[308]

在郭沫若的记忆中，尹昌衡人很魁梧，在武人里面也比较还有点天分，

他能够熬几句章太炎式的似通非通的古文，似选非选的古诗。他是留日士官生出身，曾为广西陆军小学总办，在广西同盟会人办的《南风日报》上论时事，动辄数千言，声誉鹊起，随即入川在督练公所任职，其人性情豪放，有才气，好大言，对学生训话，常以“好马、好酒、好美人”，儿女情长、英雄肝胆自命。[309]

在会党力量比较大的四川，身上有江湖气的都督与当时的氛围倒是很合拍。

哥老会在贵州本来是绝对禁止的，只是下层社会的秘密组织。“等到革命之后，滥招新兵，招安土匪，有人就建议把哥老会组织起来，以作士兵的约束。哪晓得此风一开，形势大坏。因为许多小卒小兵，本来在会中的地位很高，所谓官长的资格差得很远。论起辈分，见着小兵，还要敬一个礼，试问如何统治呢？本来哥老会是个总名，等到开始组织，他们便称为某某公。例如光汉公，复汉公，兴汉公等等，当时都很时髦的。公中第一位是龙头大爷，第二位是圣贤二爷，以下第三第四排下去，到末了一位叫老么。”乌合之众没有纪律可说，所以行不多时，便遭禁止。[310]

“新成立的哥老会，月必数起，开山堂时必迎一次帅印，敲锣打鼓，成员多穿戏装，头扎包巾，两缕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佩刀剑，招摇过市，弄得人心惶惶，居民不敢出街买物，夜里不敢脱衣而睡，不知大祸几时临头。宪政派看见自治派人渐多，也跟着开公口，组织斌汉公。而哥老会丢拐子，作高揖 [皆哥老会内部的见面礼节]，行见面礼的现象，随处都是。”[311]

12 月 13 日，贵阳邮政司都德哈写信给英国驻云贵总领事额必廉，“秘密会社，特别是‘哥老会’令人感到恐怖，到处路途不靖。”[312]

自治学社社员有一万四千多人，其中有许多哥老会人，唐继尧由云南带兵进入贵阳时，就想消灭哥老会。

【注释】

①《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1、562、555 页。

②《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12 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243 页。

③《近代史资料》总 25 号，第 511 页。

④《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781–782 页。

⑤《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378 页。

⑥《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六卷，第 244 页。

⑦《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 37 页。

⑧ 转引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 年，第 128–131 页。

⑨ [日] 北一辉著，董炯明译：《支那革命外史》第六章《置身于革命漩涡中的批评》，未刊稿。

⑩《郑孝胥日记》三，第 1385 页。

⑪《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4 期。

⑫ 黄尊三《留学、归国日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 259、257 页。

⑬《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94–95 页。

⑭《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187、188 页。

⑮ 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岳公闲话往事》，第 9 页。参考黄自进《青年蒋中正的革命历练（1906–1924）》，《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期，第 6 页。李云汉《蒋中正先生与辛亥革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七编，第 1247–1248 页。

⑯《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 257、258、259 页。

⑰《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第 26、27 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 415 页。

⑱《口述历史》第七期，第 155–156 页。

⑲《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 217、220 页。

⑳《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10、11 页。

㉑《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 258 页。

㉒《阎锡山早年回忆录》，第 4–5 页。

㉓《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 235 页。

㉔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75 页。

㉕《胡适日记全编》1，第 148 页。

㉖ 转引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新星出版社 2011 年，第 362 页。

㉗ 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505 页。

㉘《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26 页。

㉙ 顾维钧口述，唐德刚等整理：《顾维钧回忆录》一，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66、73、74 页。

㉚ 转引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第 355-358、363—364 页。

㉛《梅光迪文存》，第 505 页。

㉜ 转引陈哲三《辛亥武昌起义后欧美党人的活动》，《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8），第 1418-1422 页。

㉝《蔡元培书信集》，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第 102-103、105-107、111-112、113-114 页。蔡元培日记，《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第 436-438 页。

㉞《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文海出版社，第 53、54 页。

㉟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 年，第 28、29、31 页。

㊱陆澹安：《澹安日记》上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37 页。

㊲《叶圣陶集》第 19 卷，第 34-47 页。

㊳《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 2003 年，第 44 页。

㊴ 萨孟武：《学生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58 页。

㊵《郁达夫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第 284、285 页。

㊶ 陈衡哲著，冯进译：《陈衡哲早年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第 160 页。

㊷《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64 页。

㊸《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 222 页。

㊹《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685、516 页。

㊺ [美] 舒衡哲著，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年，第 31、36 页。

㊻ 孟天祯《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传记文学杂志社 1969 年，第 122-123 页。

㊼《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225 页。

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 379 页。

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 445、448 页。

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589、590 页。

51《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64、162、171、173 页。

52《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47 页。

53《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55-65 页。

54《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322 页。

55《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 205 页。

56《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十一辑，第 244 页。

57《澹安日记》上册，第 39 页。

⑱《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63页。

⑲《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357页。

⑳ 黄克武编撰：《蒋复璁口述回忆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第24页。

㉑《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21、25页。

㉒《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62页。

㉓《抑斋自述》，第176页。

㉔ 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4页。

㉕ 刘峙《我的回忆》，第4页。

㉖《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85页。

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71页。

㉘《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号，第13页。

㉙《湖南反正追记》，第30—31页。

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73、74页。

㉛《周雍能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8页。

㉜《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㉝《叶圣陶集》第19集，第54页。

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297、298页。

㉟ 马天纲等访问兼记录：《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8页。

㊱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页。

㊲ 黄绍竑《五十回忆》，岳麓书社1999年，第21、22页。

㊳《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8页。

㊴《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1991年，第41、42、47页。

㊵沈云龙、张朋园等《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3页。

㊶《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196页。

㊷ 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2），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19-122页。

㊸ 左舜生：《记辛亥长沙起义》，陈正茂主编：《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下册，第1624页。

㊹《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567、555、557、559页。

㊺《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58页。

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345页。

⑧⑦《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449 页。

⑧⑧《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 356 页。

⑧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 201 页。

⑨⓪ 薛民见：《黎元洪年谱》，《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辑，第 174 页。

⑨① 赵景深：《海上集》，上海书店 1984 年，第 33 页。

⑨②《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12 辑，第 267 页。

⑨③《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中国哲学》第九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第 519 页。

⑨④《叶圣陶集》第 19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第 50—59 页。

⑨⑤《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79、235 页。

⑨⑥《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 205 页。

⑨⑦ 赵景深：《海上集》，第 33-34 页，参考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 175 页。

⑨⑧《叶圣陶集》第十九卷，第 74 页。

⑨⑨ 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12 页。

⑩⓪ 转引冯兆基《辛亥革命与中国陆军》，《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249 页。

⑩① 选自华航琛编、商务印书馆 1912 年出版的《共和国民唱歌集》。陈一萍编：《先行者之歌——辛亥革命时期歌曲 200 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84 页。

⑩② [美] 汤姆森著，朱艳辉译：《北洋之始》，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年，第 29 页。

⑩③《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4 期。

⑩④《中国哲学》第九辑，第 520 页。

⑩⑤《陈英士先生文集》，第 98 页。

⑩⑥《叶圣陶集》第 19 集，第 61 页。

⑩⑦《亦云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第 60-62 页。

⑩⑧《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534 页。

⑩⑨《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 年，第 145-146 页。

⑪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371 页。

⑪①《湖南反正追记》，第 254 页。

⑪②《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 196 页。

⑪③《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320 年。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 2000 年，第 37 页。

⑪④《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321、322 页。

⑪⑤《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5 页。

⑯ 转引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163页。

⑰《陈衡哲早年自传》，第161-162页。

⑱《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102页。

⑲《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487-488页。

⑳ 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第103页；《党人三督传》之“柏文蔚自传”，第194页。

㉑ 张馥蕊著，何珍蕙摘译：《辛亥革命时的法国舆论》，《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三册，第67页。

㉒《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351、355页。

㉓《蒋作宾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0、31页。

㉔《党人三督传》之“李烈钧自传”，第79页。

㉕《梅楞章京笔记》，《近代稗海》第一辑，第457页。

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3页，与此略有不同。《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82页。

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88页。

㉘《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34页。

㉙《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49页。

㉚《辛壬闻见录》，《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25页。

㉛《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77页。

㉜《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357页。

㉝《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358页。

㉞《近代史资料》总25号，第514页。

㉟ 贾廷诗等《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5、23页。

㊱ 万迪庥给曾省三书，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87页。

㊲ 孙武《武昌革命真相》，未刊手稿；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5页。感谢李新宇兄提供。

㊳《万耀煌访问记录》，第26页。

㊴《辛亥札记》，《居正文集》上册，第45页。

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7页。

㊶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转引沈云龙《黎元洪评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第36页。

㊷《张知本先生访问纪录》，第18-19页。

㊸《一个女人的自传》，第102页。

㊹《胡宗铎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七期，第56页。

⑭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87 页。

⑭《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 197 页。

⑭《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 57–58 页。

⑭《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14 页。

⑭ 参考沈云龙：《黎元洪评传》，第 8、11 页。

⑮ [英] 苏古敦著，郦玉明译：《辛亥革命在汉口》，《民国档案》1989 年第 2 期，第 4 页。

⑮《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 52 页；《辛亥革命》五，第 215 页；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 32 页。

⑮《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8 页。

⑮《福建文史资料》第五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123 页。

⑮《缘督庐日记钞》，第 220 页。

⑮《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第 93、58、26、23 页。

⑮《张伯英日记零稿》，《历史档案》1983 年第 4 期，第 42–43 页。

⑮《阎锡山早年回忆录》，第 27 页。

⑮《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365、367、368 页。

⑮《张维翰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八期，第 12 页。《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 13 页。

⑯ 郑学溥等编著：《唐继尧传》，香港 1997 年印，第 264 页。

⑯《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137 页。

⑯《惺庵日记》，《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 224 页。

⑯《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424 页。

⑯《童保喧日记》，宁波出版社 2006 年，第 28 页。

⑯《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 205 页。

⑯《柏文蔚自传》，《党人三督传》，第 173、179、181 页。

⑯《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195 页。

⑯《党人三督传》，第 185、187 页。

⑯《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 70 页。

⑰《湖南反正追记》，第 54 页。

⑰ 转引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 年，第 12 页。

⑰《湖南反正追记》，第 56 页。

⑰《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5 年，第 7–8 页。

⑰《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 31、33 页。

⑮《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33、39页。

⑯《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76页。

⑰《辛亥革命》八，第331页。

⑱《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44-45页。

⑲《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09页。

⑳《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8、9页。

㉑《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三卷，第42页。

㉒《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页。

㉓《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602页。

㉔《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542页。

㉕《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113页。

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三卷，第271页。

㉗《辛亥札记》，《居正文集》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63页。

㉘ 转引《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128页。

㉙《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71页。

㉚《阎锡山早年回忆录》，第28页。

㉛《万耀煌访问记录》，第25-27页。

㉜《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70页。

㉝ 林能士编著：《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活动》，正中书局1993年，第119页。

㉞《万耀煌访问记录》，第25页。

㉟《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370、373页。

㊱《汪荣宝日记》，第1046页。

㊲《辛亥革命》六，第375页。

㊳《梦蕉亭杂记》，《近代稗海》第一辑，第415页。

㊴《辛亥札记》，《居正文集》上册，第278-279页。

㊵《吴虞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页。

㊶《抑斋自述》，第174页。

㊷ 袁克文：《辛丙秘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页。

㊸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195页。

㊹《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三卷，第363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59-60页。

㊺《抑斋自述》，第174页。

㊻《蒋作宾回忆录》，第31页。

㉗《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60 页。
㉘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197 页。
㉙《蒋作宾回忆录》，第 31–32 页。
㉚《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365 页。
㉛《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 12 页。
㉜《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96 页。
㉝《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三卷，第 46 页。
㉞《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 365 页。
㉟《黄炎培日记》第一卷，华文出版社 2008 年，第 23 页。
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659、876 页。
㊲《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71 页。
㊳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273 页。
㊴ 参考朱宗震《程德全：辛亥反正第一人》，《南方周末》2011 年 2 月 24 日。
㊵ 转引《南通张季直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集》，台湾 1966 年印，第 42 页。
㊶《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660 页。
㊷《张謇——故里征稿专辑》，《海门县文史资料》第八辑，1989 年，第 39 页。
㊸ 转引张存武《伍廷芳与辛亥革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七编，第 1223 页。
㊹《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30–231 页。
㊺《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660–661 页。
㊻《张謇全集》第一卷，第 183 页。
㊼《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79 页。
㊽《缘督庐日记钞》，第 231 页。
㊾《张謇全集》第一卷，第 190 页。
㊿《张謇存稿》，第 23 页。
231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276 页。
232《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1058、1059 页。
233《大共和报》1912 年 1 月 6 日。
234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第 192 页。
235《郑孝胥日记》三，第 1361、1374 页。
236《强村语业笺注》、《刘廷琛文稿》，转引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台湾联经出版社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 187 页。
237《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3 期，第 171 页。
238《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9 页。

㉟《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6页。

⑳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449页。

㉑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第243页。

㉒《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第260、263页。

㉓《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88页。

㉔《辛亥革命》五，第491页。

㉕《辛亥革命》二，第458页。

㉖《吴景濂自述年谱》，《近代史资料》总10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04-405页。

㉘ 虞和平、王杰译，张富强校：《大来日记》（选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中华书局1997年，第202、235页。

㉙《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1、362、363页。

㉚《汪荣宝日记》，第1035页。

㉛《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71页。

㉜《汪荣宝日记》，第1038、1041页。

㉝《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三卷，第364页。

㉞《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72页。

㉟《汪荣宝日记》，第1042、1043页。

㊱《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64、104、664页。

㊲《汪荣宝日记》，第1045页。

㊳《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1页。《汪荣宝日记》，第1063页。

㊴《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65页。

㊵ 参考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503页。《大公报》1911年12月6日，参考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50页。

㊶《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79页。

㊷《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4页。

㊸《汪荣宝日记》，第1081、1091、1115页。

㊹《时报》1911年12月20日。

㊺《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第235页。

㊻《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40-641页。

㊼ 转引马铭德《辛亥革命与赵凤昌》，《近代中国》第13辑，上海中山学社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㉖⑧《黄炎培日记》第一卷，第23、24页。

㉖⑨《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59、660页。

㉗⓪《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49、1055–1056页。

㉗①《郑孝胥日记》三，第1362、1365页。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报告记录1911年12月2日，黄兴住在一家旅馆里。《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第71页。

㉗②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第79、76页。

㉗③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2页。

㉗④《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376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71页。

㉗⑤《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361–363页。

㉗⑥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292页。

㉗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359、360页。

㉗⑧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196–197页。

㉗⑨《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69页。

㉘⓪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第182页。

㉘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89页。

㉘② 刘士毅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8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64–65页。

㉘③《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357页。

㉘④《吴铁城回忆录》，第28页。

㉘⑤《党人三督传》之“李烈钧自传”，第83页。

㉘⑥《周雍能先生访问纪录》，第8页。

㉘⑦《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607页。

㉘⑧《周雍能先生访问纪录》，第11–12页。

㉘⑨《湖南反正追记》，第266页。

㉙⓪《口述历史》第7期，第87页。

㉙① 郭廷以、沈云龙等访问纪录：《钟伯毅先生访问记录》，第24页。

㉙② 刘峙《我的回忆》，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4页。

㉙③《湖南反正追记》，第264页。

㉙④《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下册，第1624页。

㉙⑤《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1983年，第15–16页。

㉙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111页。

㉙⑦《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54、155页。

㉘《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 22 页。

㉙ 赖群力注：《张云山檄文》，《近代史资料》总 45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85–86 页。

㉚ 景梅九《罪案》，《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 119 页。

㉛《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 23、17 页。

㉜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246 页。

㉝《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 357 页。

㉞ 陈文斌《生平记》手抄件。

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 137、110 页。

㊱《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 383–384 页。

㊲ 郭沫若：《少年时代》，第 251、255、256 页。

㊳《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 72 页。

㊴ 周开庆编著：《四川与辛亥革命》，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1964 年，第 319 页。

㊵ 忍庐《贵阳光复的回忆》，《越风》第 20 期，1936 年 10 月，第 25 页。

㊶《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 447 页。

㊷《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 205 页。

第七篇　财政困难

一、度支部：库空如洗

1911年10月13日，度支部侍郎绍英日记说，荫昌出兵前，“应领行饷五十万两，即日开拨”。

10月15日，度支部放给银行接济市面银50万两。[①]

10月17日，陆军大臣荫昌给军需司司长苏锡弟的亲笔手谕：

> 臣昨晤度支大臣载，叙及财用艰窘情形，知部库仅存现银数百万。现在出征军费，需用方巨，正拟向外国银行借款，尚不知能否办到。”[②]

10月27日，荫昌的奏折说“粮饷等项前后由度支部领到银一百五十万两”。[③]同日，度支部载泽、绍英等的奏折只是说“部库款有限”，没有具体数字。次日，熊希龄在东北收到北京金仍珠的来电，度支部存款仅200万。[④]10月31日，摄政王对新任民政大臣赵秉钧说，度支部余款仅20万两。[⑤]

11月11日，熊希龄给赵凤昌的信里说：“弟昨至北京，探询度支部存款，只余三四十万，（现在惟有请内币，然闻内币亦不多。）革军稍相持一两

月，不待交战，亦必亡矣。”[6]

12月1日，暂署度支部大臣绍英日记说：

> 部库实存现银九十八万七千一百七十一两二钱六分三厘一毫，辅币七十四万枚。

12月28日，袁世凯对隆裕太后说：“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7]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时的清廷在财政上确实极度困难。

自1900年以来，清廷对外赔款的压力十分沉重，《辛丑条约》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共九万万八千多万两，加上各省教案赔款，马关条约的对日赔款等，总计在十万万两以上，每年实际支付不下于二千五百万两，巨额的赔款以关税、盐税等主要财源为担保。新军二十六镇加上旧军巡防营，军费开支也很庞大，财政收入入不敷出。

宣统三年 [辛亥年] 全国预算岁入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七百两，岁出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缺口在四千万两以上。那些年每年的财政赤字大致都在这个数字上下。

武昌出事前，内阁的奏折称：

> 今我国所最困者，财源则年减一年，国事转日增一日，欲使国事可以进行而财源足以相济，揆诸情实，其道大难。[8]

宣统二年各省试编下一年度的预算，不敷在100万两以上的包括：贵州（105万）、江苏（108万）、安徽（115万）、福建（115万）、广西（137万）、湖南（157万）、云南（193万）、江西（254万）、湖北（539万）、四川（774万）。各省所列岁入中不少省列有协款收入，并无保证。[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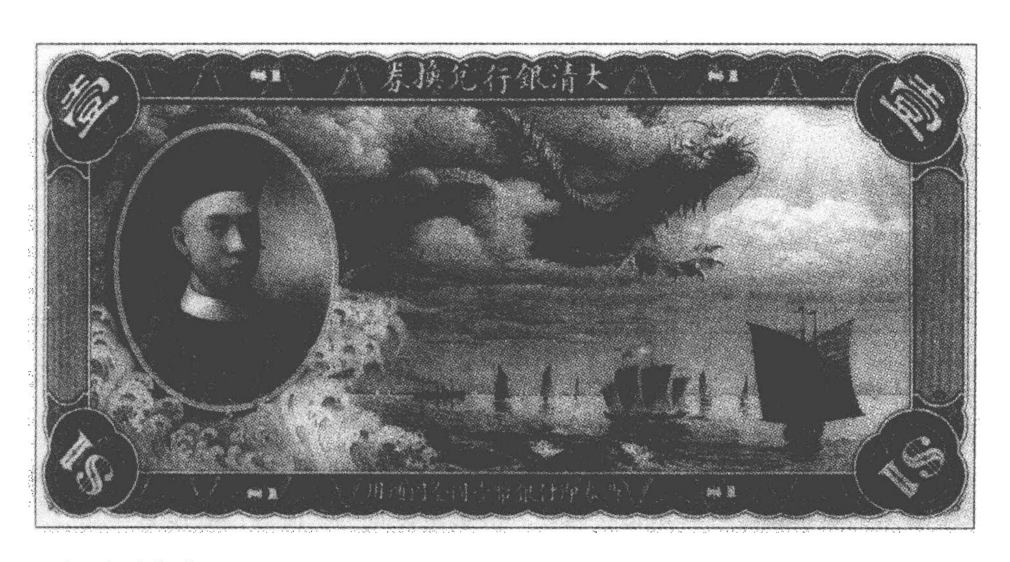
这仅为预算，各省实际的财政赤字只会更大。

武昌起义引发的危机，使得清廷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10月12日，湖广总督瑞澂急电北京内阁、军咨府、海陆军部、度支部、



度支部署理大臣绍英



大清银行兑换券

邮传部，要度支部筹拨银二三百万，以备饷械犒赏等项之用。[10]

同一天，德国人办的英文《汉口日报》说："要扑灭这个叛乱，政府即使有能力，也要付出几百万巨款，同时还要牺牲成千上万的生命。……最低限度，清廷的地位已大为不妙。"[11]

武昌消息传来，各省纷纷要求添募军队，请求朝廷或缓交、不交"京饷"，或要拨款，而度支部无款可拨，同意拨款的极少，即使承诺的也未必到位。各地奏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句是"库空如洗"，朝廷的回复也是如此，"现在部库如洗"、"现在部库同一拮据"、"库款奇绌"。[12]

10月12日，广东张鸣歧电奏，财力异常艰窘，要求将应解京部各款，酌量截留，以济目前之急。14日，谕旨下达："至所请截留京饷一节，着度支部议奏。"[13]

10月17日，湖南要求将应解京的四十四万多两缓解，批准缓解十万两。

10月19日，瑞澂还给载泽发电："兵费紧急，请速拨银百万两，交德华银行电汇。"[14]

10月21日，朝廷收到江西巡抚电奏，"江西财政奇窘，近日商家竞提存款，民间争兑现银，市面支空，非现银不能挽救，请饬部电沪分银行，先借二十万两来赣。至赣省额解各款，请俟防务稍松，再行照解。"内阁奉旨，"着度支部速议具奏"。[15]

10月23日，朝廷要求两江总督张人骏添募军队，又说"部库支绌，无款可拨"，经费自行解决。张人骏与铁良、张勋联名电奏："惟江南财政困难，至今已极，实无可移之款，息借之外债经分别抵还，已所余无几。……惟有仰恳天恩，仍饬度支部保全东南大局，无论如何为难，迅即先筹的款银一百三十万两，分拨应用。"[16]结果只批准先拨二十万两，连零头都不到。

10月23日，新授四川总督岑春煊电奏要添募八营，请度支部电上海大清银行筹拨一百万两现银。10月25日，下旨着度支部迅速筹拨。[17]其实一直没有拨款。

同日，安徽请拨银五十万两以便募兵，朱批由两淮运库借拨十万两。朱家宝后来的奏折说，三次电请拨款，一分钱也没见到，所以没有添募一兵。

同日，浙江要求向大清银行借银二百万两，被拒绝。

10月27日，广西要求拨五十万两以增兵饷，上谕只是“着两广总督量为匀拨”。

同日，会办长江防守事宜调补江南提督张勋奏：“臣非不知部库支绌，鲜可拨济。然江南财政困难，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此次骤增多兵，无款移就。而戎机甚迫，焦灼莫名。”11月4日奉朱批：“所需饷项枪械，着度支部、陆军部迅速筹拨。”[18]

10月31日，河南请求接济四五十万两，上谕批等到借到洋款后拨。

11月1日，天津请借内币银一百万两，上谕批度支部酌量支借。

11月6日，新疆请求接济五十万两，上谕着度支部速议。直到12月24日，新疆布政使陈际唐给内阁袁世凯电说，“迭次奏请部拨款五十万两，藉资接济。至今未蒙汇拨。”[19]

各省要款，少有允准的，即使准的，也不见得到位。各省上奏自借外债，则几乎都批准了。10月12日，张人骏电奏借洋款五百万两，24日又电奏，请加借两百万两。次日，他致电内阁说：“窃江南筹办防务，需款万急。……拟续借洋款二百万两，系出于万不得已之吁求。……再事迁延，万一华洋信用间有中断，尔时告贷无门，势将束手待毙。华洋信用，全视大局之安危。欲支危局，先求足用，帑项告竭，瓦解即在目前。”

同日，他再致电内阁：“……惟各国洋商银行因鄂事未定，均意存观望。近日事机益迫，待用愈殷，宁、苏、皖、赣财政同一困难。欲保东南大局，亟须筹备大宗款项。若各省分批自借，终恐迁延贻误，且难取信外人。为今之计，惟有由中央筹借分拨济用，以应亟需。”[20]

到11月中旬，外债还无着落，他给张謇的信中说：“奈借款至今未到，饷需万急。”直到南京陷落也没有借到一笔外债。[21]

10月20日，山东请向德华银行借银三百万两。

10月26日，福建请借洋款二百万两。

10月27日，奉天请向外国银行借钞币五百万。

11月6日，直隶请向洋行借银两百万两。

这些自请借外债的要求，朝廷几乎都批准了，即使是以地方官产为抵押，两

江总督就是以官产为抵，陈夔龙以直隶各实业官股及烟酒税作抵押，也获同意。但实际借到的只有两笔。10月17日，山东从德华银行借到一百万两。10月25日，直隶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借到一百零五万两。其他借款都未成功。[22]

各地要款的奏折雪片般飞来，度支部无法应付，早在10月21日就在奏折中说，两次拨出现银一百万两，交给陆军部，“库藏业已告竭，情形甚为困难”，东南各省财政困难，亦复相同，“库藏既渐空虚，来源瞬息即罄”，经过商议，“均以现在所有各款，惟有尽数筹付军需拨还洋债两宗。其他各款，只得暂行一律停支，专济急用。并拟通电各督抚，将现在无关紧要之事，概行停止”。[23]

11月15日，袁世凯进京后，对朱尔典说：“最艰困者，乃国库虚空，又无继续收入。”[24]

11月22日，上海《时报》报道，度支部发出纸币百五十万元，交山西、河南、湖北等省军用，因人民不信，不能通用，全数解回京师。

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外债。

10月16、20日，法国驻华武官高拉尔德接连写信给陆军部长：“财政方面很糟糕，如果没有一笔紧急借款，就不能为这个将要长时间、耗费巨大的战役支付必需的资金。”

“政府准备应付最紧急的情况，为了避免混乱导致金融危机，已向市场投放了一部分国库的货币。

政府在想方设法洽商一笔绝不可少的借款以维持军队。骚乱事件所需的耗费及今年的水灾，使政府陷入一种几乎是绝望的境地，它不能不靠外国借款人的帮助来从绝境中自拔。”[25]

由度支部侍郎而暂署大臣的绍英，每天操心的就是借款。

10月16日，他进度支部办事，晚上到载泽府上商量。18、20日他都在加班、议事。22日，他进署，再到载泽府上商量。

10月23日，度支部放款。同日，盛宣怀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说，清廷如果没有钱，实无法再支撑下去，而他感到诧异，为何他们不继续慷慨地供应他们的需要。

朱尔典给坎贝尔爵士的信里提出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借款给清廷，美、法、德国的使节并不完全同意，法国代办坦白地表示，他们的政府已准备好所需的款项，主张迅速采取国际调停。他却认为这紧张混乱的日子，国际调停不容易实行。[26]

10月24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

> 由于东方汇理银行以为期六月利息七厘向大清银行贷款一百万两，恐慌稍为平息。目前户部正努力从四国银行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德华银行、美国财团、汇丰银行] 得到一千二百万两为期一年的贷款。他们准备付八厘或更多些的利息，以皇家敕令作担保。……
>
> 如果政府得不到这笔钱，它将处于可以想象的最严重的困境。四国银行考虑借款申请的唯一条件是：赋予袁世凯同革命党人议和的全权，并进行革命党人所要求的不论多大程度的改革。

10月27日，他给布拉姆写信说：

> 俄国公使廓罗斯昨天来看我。……中国人还要求俄国银行提供财政援助，但俄国人没给。[27]

这一天，度支部尚书载泽和侍郎绍英、陈邦瑞上了一道奏折：

> 窃自川鄂用兵，征调四集，应需饷械用款浩繁。各省严重设防，一切京饷亦多未能照解。臣部库款有限，势将不支。臣泽日前面奉谕旨，饬借洋款，以资接济。兹由臣部与法国资本团代表男爵勾堆、华法公司代表甘锡雅订借佛郎九千万，或金镑三百六十万，言明年息六厘，九六扣，六十年还清。业经草定合同。虽利息较重，一再磋商，实难减让。军需万急，不能不勉与定议。查定章国债应交资政院复议。此次借款实为非常特别之用，事不宜迟。拟请由臣部先行签押，事后再交资政院承诺。恭候命下，以便钦遵办理。[28]

当天，绍英日记说："加班奏事，为借款事。"

借到巨款的传闻不断，10月25日，汪荣宝听说，"本日借外国债三千万元，已签押。"[29]

10月28日，恽毓鼎听说，"已商借奥国巨款四千万两，以供军需及维持京师市面金融界之恐慌。"[30]

盛宣怀次女婿冯敩干听说资政院决议筹借洋款五百万，专平市面，不作别用。"外人以总理及国务大臣一概辞职，非俟项城到阁签字，则借款不能交割。"[31]

等袁世凯到任，借款也没有成功。财政一直拮据，绍英每天都处在不安之中。

10月30、31日，绍英为借款的事连日加班。11月6日，在资政院谈话会上，有人报告此次借款始末，并详言其利害，讨论许久，不得要领。[32]

11月9日，绍英加班奏事。11月13日，他又加班奏事，袁世凯到京。11月16日，袁内阁任严修为度支部大臣，未到任前由绍英暂署，这一暂署，绍英想辞也辞不掉。次日，他值日，先见袁世凯，面陈借款之事。

他并不知道，11月8日在巴黎东方汇理银行举行的法英德美四国银行团已通过一个决议，由于局势不明朗，暂不考虑借款给清廷。11日，英国银行团的汇丰银行代表阿迪斯写信给坎贝尔爵士说，"四家银行一致认为，他们在目前紧要关头的态度应像各自的政府一样，保持中立。他们认为，介入一场结果尚不明了的冲突是不明智的，以财政援助来加深内战的恐怖是不得当的"。

英国政府的立场，11月14日格雷外长给朱尔典的信中已说得很清楚："我们不可能插手中国革命事业……曾有人问我对有关贷款给满清政府之意见……我答称目前似不宜贷款给中国政府。鉴于此，本人尤其认为不宜贷款给中国革命领导者。我们一向极为审慎，迄未资助任何一方，因为支持任何一方，皆可能导致另一方的中国人产生排外暴动。"[33]

司戴德说了一句话："四国银行团决定了皇朝的命运。"[34]

11月18日，安格联在北京写信给墨贤理："政府没有钱，供应的来源全部被切断，除非能借到外债，否则危机迟早一定发生，不过我以为借款几乎是不可能的。"[35]

对于借款，资政院也有反对的声音，所以，11月20日，御史温肃在奏折中指控："战事方殷，筹饷为急，值此库储支绌之际，非借款以救目前，则前敌立形饥溃。乃该院必反对之。是何居心？"[36]

11月22日，资政院收到驻京军队给议长、议员的匿名信一件，"以要求通过借款事件，多胁迫之语，有云一月无饷则寸磔汝等以充饥"。汪荣宝在日记里感叹："呜呼，资政院真众矢之的矣。"[37]

前一天，法国驻华公使代办斐格写给外长的信中分析："……政府的处境仍是不稳定的。到处都没钱，国库空虚。因而，放在新内阁面前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借一笔款子。有了这笔借款，它就能继续下去，维持秩序和拖垮革命军。"

11月27日，清军已重新夺回汉口、汉阳，高拉尔德写信向法国陆军部长报告："问题的关键仍然在财政形势方面。由政府签署的一项借款使它能够维持它的军队、购买武器装备及支付官员的费用，同时将帮助它保持北部中国，并等待有利时机慢慢夺回那么统一和强大的南部各省。"[38]

能否借到外债的关键，并不在于资政院是否通过。

11月29日，绍英到内阁，说明邮传部来函商议铁桥事，及外务部复电事。午后他到资政院，外债事已付表决通过，只须将法文合同与中文核对妥当，关于第九十三款进款担保的事。

铁桥，是指特许克鲁索钢厂修建一条武昌到汉口横跨长江的大桥，这家公司据说与勾堆有利害关系。实际上勾堆没有钱，他的如意算盘是乘清廷危急，急需巨款，他签定这个合同，然后利用这个合同在巴黎证券市场发行债券，募集资金。不料法国政府不同意，此事泡汤，对清廷打击沉重，绍英他们长久的辛苦也都白费了。

11月30日，绍英到内阁会议还兴冲冲地报告借款通过，袁世凯说即可签字，其附件铁桥事应由邮传部与魏武达商办，外务大臣胡惟德已电复驻法使臣，告以借款已经资政院通过，转达勾堆备款。当晚，魏武达、甘锡雅同松道瑞来度支部，办理借款合同签字的事，续借六千万法郎，约合银二千万两，六厘息，九六扣，实合九二扣，因有扣回佣钱等款。第九条称，以中国普通进款担保，当与商明，加二十三字注语，"其担保数目以足敷此项借款每年应还之本息数目为限"。法国人同意，并将法文添注在上次借款三千万合同的

第九条，法国人也同意，致函度支部声明以足敷每年应还之本息数目为限等语，另有附件为包办各项税款佣钱等费之事，各存一纸，核对妥当，绍英和魏、甘三人签字。夜已深，他以酒点招待他们。据说第一批款十天后可交。在场的除了度支部的下属，还有币制局局长陆宗舆也在照料用印等事。[39]

12月1日，斐格向法国外长汇报："帝国当局则已在战争中倾尽了最后的资财，必须不断地求助于借债。如果它能通过这个办法获得资金，我们从此便能希望它克服当前的困难，建立新的立宪政体。"如果勾堆借款真有所结果，袁世凯便能得到急需的款项，"从而得以结束战斗，那么，他的感激对象应是我们"。[40]

这一天，绍英一早就到内阁请袁世凯看借债合同，袁令函达邮传部办理附件铁桥事，爱国公债的事资政院也已议妥，令度支部办奏会同内阁具奏。晚间，外务大臣胡惟德等三人来找绍英，为修正汉文合同事，他们说，"合同九条、十三条已经修改，余款大致不差，亦可无须修改，俟明日资政院开会，可与诸议员陈述。"然而，从胡惟德口中，绍英听到了不妙的消息，"因英国反对，此次借款恐将不成，且邮传部铁桥附件未经签字，亦不能即照会法使也，应请邮传部速为签字为要"。

次日，绍英即上折提出请病假，并请另简员署缺，想由此脱身。他在日记中透露心迹：

> 计自光绪卅一年 [1905年] 十一月十二日奉旨署理侍郎，嗣经补授侍郎，暂署度支大臣至今，历时六年，时局变迁，不图至此。署度支大臣将及半月，竭蹶从事，艰窘异常，倘借款无成，实无善策。闻内币尚有存储，第讨领不易，不知将来能办到否？臣力竭矣。如此次假期届满，只得再请开署缺，以免贻误大局也。

他虽请假在家，当晚为了资政院修正合同的事，两位下属还是来找他。好在汉文修正，魏武达尚已同意，将外务部译底交他们带回署中抄写，以便于明日备文送资政院。第二天，上谕下达，只同意他赏假三日，不同意派人署理。当晚又有人来找他为核对汉文合同事。

12月4日，有下属来找他谈筹款事，当办札文两件，为劝谕盐商捐款事。又办电三件，一为饬总厂赶铸铜元事；一为提现存天津银行长芦盐商津浦铁路债票，即英国金镑票计值二十余万，变价解部事，此事分电大清分行、长芦运司；又拟向开平矿务局英商借现银一百万两，或五年，或十年，或有款随便归还，如借银款，利息约一分二厘，如借金镑，约一分，尚可磋商。由商务总会或大清银行出面借款，以开平矿务局报效五万两、煤厘税八万两抵还。借银款还银款，借金镑还金镑，不折不扣。无论哪种借法，必须禀明制台、劝业道并度支部立案。他先派人去商量，等有了眉目，再报告内阁核办。

当日，袁世凯派人来绍英家探病，如他病愈，假满速为销假，并谈北洋王交涉司借奥三十万金镑事。当晚，他接到下属电话，资政院已通过汉文合同。外交大臣胡惟德来电："借款应办之件均已办迄，惟接法国驻使来电云，现在英美德法俄日会议，中国借款概行拒绝，业经公决定议，勾堆之借款，该国政府势难赞成，勾堆拟自向英国与资本家商议办法。"寄予厚望的"勾堆借款"竟然落空，他心里的难过可以想见，"外人既不借款，国事将不能支，惟有因病续假，以免贻误"。[41]

12月6日，汪荣宝接到曹汝霖来信，"法国借款已成画饼，两合同均已签字，而法政府来电言，英、美、德、法、俄、日六国连约决定不借华债，真是致命伤。京师仅余十日之粮，过此必将生变"。[42]

当天，绍英假满上班。因借款不成，度支部副大臣陈锦涛辞职，12月7日，外务部左丞周自齐补授度支部副大臣，绍英日记说："周君通洋文外交，可为度支部庆得人也。"

第二天，胡惟德告诉绍英，英国银行已肯商议借款，袁世凯嘱周自齐前往接洽商借，又令办豁免钱粮说贴及顾全放饷之事。晚上，有下属来找绍英谈借款、劝捐事。[43]

12月11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意见是不应向袁世凯贷款，"不向双方提供财政支持，骚乱会解决得更快。……应强烈地劝银行不要贷款"。[44]

同日，总税务司安格联写信给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说："北京政府的困难是缺少经费。"[45]

斐格写信向法国外长汇报说：



王公大臣与外国使节在一起

应当承认，在目前的形势下，领导度支部是一项相当地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个部很难找到一个最后的正式任职者。[严修缺任期间] 由绍英署理，但他从任命之日起便请了长假。

绍英一直想辞职而不得，只有经常请假。

正是财政困难将双方逼向了南北议和这一步。12月7日，高拉尔德向法国陆军部长报告，“每一个党派都在与最尖锐的财政困难搏斗：失去往日财源的政府正在设法签订借款协议……政府希望用借款来维持自己并削弱没有税收这一办法的对手。……其他列强国好像还没有决定是否帮助袁世凯以避免王朝的崩溃，即签署惟一能够解救王朝形势的借款协定”。[46]

在绍英任上，对外借款始终不成。12月17日晚，他到世续处，向内务府借款十万两，世续说几天之内可到库。

当天，袁世凯对日本公使说：“目前北京政府财政困难已达极点，首先令人担忧者，辄为军队饷源问题。……本人正在焦思苦虑，务期筹得少量借款，以济燃眉。”问他要借多少，他说少则二百万两，多则四百万两。

12月21日，唐绍仪对来访的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和参事官松井说：“如果北京方面终不妥协，致至交涉破裂，北京财政较革命党方面更为窘迫，故其地位必更加困难。”[47]

南北议和开始后，对外借款更没有希望，因为南方代表拒绝承认给清廷的任何贷款。12月29日，许鼎霖给赵尔巽的信说：“目前病在无饷。果能得饷，北军可操胜算。革党甚畏北军，所以百计阻挠外债也。”[48]

南北议和之前，伍廷芳于12月3日致电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呼吁美国停止向北京提供任何借款。美国传教士汤姆森肯定伍廷芳，“他还做出并宣布了革命过程中最英明的一个决定：如果外国人借钱给清政府，而革命者最终获得了胜利，他们将不会承认这些借款。这的确是一个致胜因素，因为当时很多外国财团，尤其是俄国财团非常希望清廷能够维持现状”。[49]

因为南方的反对，袁世凯从四国银行团借款三百万应急的计划也落空了。

12月24日，朱尔典与庆亲王、袁世凯在外交部大楼会谈时，有各省以三个月时间选出三名代表出席国民会议的方案。庆亲王说，政府方面由于财政

困难，所建议的三个月期限是非常难捱的，并询问如果这个建议被接受，是否能得到外国的金融援助。朱尔典没有明确答复。[50]

绍英深知财源枯竭，无力一战。12月28日，以召集国会决定政体的诏书下达，他在日记中写道："窃思国事危迫已极，为人臣者，无法补救，忧痛何如，惟愿天心垂佑，如有转机，或定君主立宪，或可一战而胜，诚为天下幸福，否则共和政体恐不能办成，已召糜烂瓜分之祸，大可惧也。伏惟上天有好生之德，当不致战祸不息，仍享和平之福，不禁馨香祝之。"[51]

12月29日，唐绍仪、伍廷芳第三次会议时达成协议，在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之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借之洋款，也不得再借新洋款"。[52]

第二天，唐绍仪给内阁去电陈述南方的各条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清政府不得借债"，许宝蘅称："其词旨之偏拗，无理已极，阅之甚愤。"[53]

这一天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唐绍仪提出："八旗军饷每月就要三十万，无债不能济急，且双方均须借债，例如借五百万，两方分用，各二百五十万。"伍廷芳不同意。[54]

1912年1月6日，朱尔典写信给格雷说，农历十一月的头四天内，至少必须有七十万两的款项，供立即支付军饷及军事装备之用，而满足这笔需要，从天津铸钱局得到的现款中，仅有二十八万两的结余可以使用。此外，这个估计不包括其他或多或少的极为必需的费用在内；有人计算，按照已经缩减的标准，维持清朝行政当局两个月内的最低款额为三百万两。靠发行"爱国公债"获得了一百万两左右。据说，从皇族成员的捐献中，另获得了两百万两。[55]

等到皇宫的八万两黄金到库，1月14日，绍英再次表示想辞职：

> 时事危矣，既无力挽回，亦只有因病辞职，以免贻误大局，计自暂署度支部大臣两月，筹款维艰，智穷力竭，现在虽库款尚敷一月之用，而军用浩繁，终有饷项难继之一日，愧悚奚如。

他当即办折，次日起请假五天，假满再请开缺。等到假满，又赏假五天。1月24日，他奏请开缺，未得批准。正逢50岁生日，他写诗一首《五十生辰志感》，"本知天命原无息，夙夜兢兢善自全"，他这个暂署度支大臣真正是

受命于危难之际，“夙夜兢兢”，而他的全部努力最终化为乌有。[56]

仅仅1月29日，清廷从奥国瑞记洋行借到七十万镑，维持北京市面之用。[57]

借款无着，未独立的北方几省要么不再上交赋税，要么财政窘迫，不断求助，清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1月20日，英国武官递交给朱尔典的调查报告说：“目前帝国金库缺乏金钱，各省纳贡实际已停止。”[58]

12月7日，法国武官高拉尔德向陆军部长报告，“每一党派的首要的和最根本的问题都是财政问题。政府现在只能获得三个省的税收，由于维持作战部队和购买武器弹药，国库已空。”[59]

12月30日，朝廷致电尚未独立的北方各省要款，到1912年1月1日，只有山东复电拨银三万两、洋三万元，黑龙江复电筹洋三十万元。[60]

那也只是纸上的答复。

河南、新疆、甘肃等地要款的电报不断。1911年11月15日，河南道员祖谦等给袁世凯电，从前军饷就地筹集，“而今筋疲力尽，屡次电省无款”。

11月25日，张锡銮受任山西巡抚，上奏要款：“……凡此急需之项，非有现银百十万两不足以资分布。无米之炊，实深焦灼。”他要求度支部先行拨发银四十万两，携带前进。当日奉旨“着度支部酌量迅速筹拨”。[61]

11月26日，河南巡抚宝棻奏：“现值军事未平，大局未定，经费则困难万状，用款则日益发生……”筹备饷械，需款较多，奉旨只有“该部知道”几个字。[62]

12月2日，陕甘总督长庚再次致电内阁度支部，“藩库存饷仅支一月，有支无收，危急万状”，要求度支部速拨百万，由归绥、迪化分起汇解。

12月19日，他电内阁请代奏：“虽蒙度支部允拨借款，但远莫能致，难济急需。……无论如何为难，务恳度支部先由票号汇寄银五十万两，暂济燃眉。”

1912年1月9日，长庚再电：“惟甘库如洗，兵饷不能接济，万分焦灼。无论如何为难，先设法凑银六十万两，即奏请内币亦无不可，分拨北京天成亨三十五万两、协同庆八万、蔚丰厚十二万、大德恒五万，电兑到兰州。”等比利时借款一到，即可将这60万扣还。

1月19日，陕西汉中镇总兵江朝宗奏处境可危，饷械尤属支绌，不光绅民不肯捐输，地丁钱粮也都不纳，屡次呈请督抚派兵济饷，未有回应。他不知长庚、升允同样缺钱。[63]

1月24日，河南巡抚齐耀琳给内阁代奏电：“库款已罄，罗掘无从。事机危迫。前经节次电请度支部筹拨四十万，实系万不得已……”[64]

那时，北京的各部衙门也因经费匮乏而半瘫痪。

1911年10月24日，消息灵通的莫理循写信给布拉姆说：“财政恐慌就要在北京发生了。国库贮备的白银不足一百万两，可以肯定，它无力支付官员的俸禄。……”10月26日，他写信给山西大学的北欧传教士新常富，“政府被吓得不知所措。它陷入了最严重的财政困境”。[65]

10月31日，赵秉钧接任民政大臣，向摄政王载沣面奏京师情况，并提出接管民政部事务需要现银约七十万两：“摄政王无精打采，头脑似已完全混乱，毫无定见，只懵然答称：关于经费开支问题，希与泽公商谈，现度支部余款仅二十万两，如此数目，实恐无法筹措。”

次日，日本公使伊院集致电内田外务大臣：

> [11月1日]目前民政部需款数十万两，甚至赵氏本人尚无一套官服，故其本人当亦需款甚急。倘若对方提出要求，最好根据情况，做为极秘密之措施，暂由横滨正金银行支行予以恩赐性之接济[当然也要附加相当条件]。

11月3日，内田回电：“政府认为此时应尽量与袁世凯一派保持密切联系。民政部所需款项，暂作别论；关于赵秉钧个人用款问题，拟与正金银行商谈，必要时可适当予以接济。”[66]

这一天，清华学堂学生吴宓听说本校近日经费非常支绌，因为度支部连军费都难筹措，更无余力来筹教育费。10月24日是本校平常向度支部领经费的日期，就没有领到，“其近日之支绌可知”。他又听说现政府讨论将各国赔款暂停半年，则本校经费骤而停止，所以有本校停办之议。“实则必不至此，

而经费之支绌则确事也。”[67]

法部候补员外郎冯敩干是盛宣怀次女婿，想出京却没有路费，等到11月9日，才得到三百元。[68]

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后，11月15日朱尔典给格雷的电报说，袁面临极大困难，“最艰困者，乃国库虚空，又无继续收入，故政务之执行与军队之补给，皆无法推展”。

第二天，袁世凯身边的蔡廷干告诉莫理循，“财政状况太糟，外务部没有钱支付职员工资，商务部将不得不关门大吉”。[69]

11月26日，上海《时报》消息：“度支部支绌已极，京内各部院经费用款先由内币拨借济急，俟借款交到，然后如数偿还。”

12月5日，绍英听到过庆王拟求领内币以发月饷之说。[70]

12月11日，法国驻华公使代办斐格写信给外长说：“由于缺乏经费，各部人员都跑光了，部里空空如也。只有外务部、内务部和军事部门还在坚持有组织的工作。”[71]

12月16日，《时报》的消息说，“北京财政匮竭，所有各部薪水本月已概不发给”。

12月27日，资政院总裁李家驹对蓝公武说，和议无成，行政经费到1912年1月4日已尽，借款难以指望。[72]

皇宫内帑

1911年10月24日，莫理循给布拉姆的信里说：

> *皇室丝毫无意要动用其积累起来的价值达一千多万英镑的财富[在1900年就达九百万英镑以上，从那以后，特别是前几天，又大大增加了]，这时朝廷也预见到不得不离开北京的可能性。*[73]

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隆裕太后从10月20日起即不断动用皇宫的内库。10月20日，隆裕太后下旨发帑银二十万两，赈湖北难民。

10月24日，隆裕太后发内帑二十四万两，赈直隶、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湖南、广东诸省饥民。

10月27日下达的上谕说："现在湖北用兵，军饷浩繁，着拨出宫中内帑银一百万两，由内务府发交度支部，专作军中兵饷之用。"[74]

第二天，恽毓鼎日记说："隆裕皇太后发内帑一百万两充军饷，此举为历史所无。"

11月3日，隆裕太后旨发内帑十万两，赈四川难民。

11月7日，隆裕太后召见摄政王、阁臣及诸亲贵，流泪斥责他们："汝等执政不及三年，使大局阽危若此，举朝直无一忠臣。予决与宗社共存亡，不离一步也。"她拿出账簿一册给摄政王看："先太皇太后储蓄之款，尽载册中。计黄金十五万两，白银二百万，予不留分毫，可拨金八万，银百万，充军饷等用。"诸臣赧然而退。[75]

当天，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

> 皇宫被迫交出它的部分财富，总数约达白银五百万两。是皇太后，即先帝的遗孀交出这笔财富。当国家处于这样严重的困窘状态而一个如此无知无能的妇人竟掌握着一笔如此巨大的钱财，真是可悲可叹。[76]

11月16日，朱尔典给格雷的信中说得更详细：

> 由于这个国家的前途可能受到财政问题的很大影响，所以注意到这件事是很有兴味的，即关于已故慈禧太后所积攒的内帑，人们听说过许多而真正知道的却很少，现在终于被用来支付清政府目前的费用，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有三十三箱金条，约合银三百万两或折合四十万英镑，已由内廷交给度支部，并由该部存入汇丰银行本地分行。约占全部金条的三分之一已经出售，并转交陆军部，以供购买军火和支付兵饷。
>
> 除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将内帑用于政府所需的事例之外，没有任

何事情能够比它更有力地说明急迫的财政困难情况。大部份金条所附印记表明，它已储存四十多年没有使用；庚子赔款和近年来任何其他紧急需要都从来没有动用过。人们认为，现在所拿出来的款额仅占已故太后所遗留下来的财产总额中的一个很小的比数，但是，从对此事所作的调查中不能得出任何准确的情报。[77]

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之初，靠的就是这笔款。朱尔典后来还说，袁一直依赖皇宫中收藏的财宝。[78]

12月20日，郑孝胥日记说："宫中存款已尽出，约九百万两，可支至十二月初旬耳。"[79]

12月27日下午，赵秉钧跟日本人说，要让隆裕太后和皇族了解实际情况，"应将唐绍仪与政府间之往复电报全部呈阅，同时将官、革两军实态、各省动向以及缺乏军饷、军械与财政窘迫等各方面实际情况，详细列成表册，由各部大臣连衔启奏"。

第二天，袁世凯面奏隆裕太后，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战也无把握。当天下午，袁告诉日本公使伊集院：

至于皇室意向，……皇室方面对万事俱已放手，已决心在不得已情况下听任采用共和政体，毫无其他办法。……若按本人意愿，只要有军费，就要继续战斗，……目前财政状况窘迫已极，毫无办法可施。今晨在内廷会议上，本人已提出上述意见，谈到设法筹措军费问题，皇族中竟无一人应声。贵公使日前向庆亲王苦劝之结果，好歹捐出十万两，其他皇族尚无一人响应，实堪叹息。[80]

美国传教士汤姆森也听说袁世凯对外声称：如果可以把所有国库收入交给他，他就可以继续战争。清廷拥有数亿美元的国库，他也只是从庆亲王那儿拿到了10万元的帮助。[81]

1912年1月1日，几天前刚交了爱国捐一万元的荣庆在日记中不无乐观地写下："军士奋勇，亲贵认捐，业已备战。"[82]

之前，1911年12月2日，安格联给蒙自关税务司谭安的信中说：“只要有人有钱，袁世凯能把整个中国夺回来。不过他是不希望流血的，因此结果将是协商解决。”12月11日，安格联给苏古敦写信说：“北京政府的困难是缺少经费。”[83]

其实，袁世凯从来没有打算与南方军队拼命，他只是想要逼出亲贵的存款和皇宫的库存，外国人无法洞察他的心思。

1912年1月2日，隆裕太后召袁世凯人对，“现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84]

同日，日本公使伊集院向内田汇报：

> 另据可靠途径获得消息称：今日皇太后已从内帑中拨出金块三百万两，充作军费，并且秘密商定，其他皇族亦将分别捐献军饷。[85]

几天前（12月31日），在唐绍仪、伍廷芳的第五次会议上，分配由南京造币局运到通商银行的一百万元，南方坚持要三分之二，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对话：

> 唐：四十万元一日即尽，旗兵饷多未发。伍：内帑甚足。唐：八万黄金，已尽提出矣。[86]

1月3日，绍英日记：“皇太后交下金八万两，当收部库。”[87]绍英是经手人，所记最为准确。

第二天，上海的郑孝胥从外文报纸上看到，“……清政府今日宣言，隆裕太后已复出私蓄二百万两，加以其他所筹之款，足供两月军饷之用。”[88]

这则消息不准确。

1月5日，莫理循写信给布拉姆：

> [袁世凯] 他星期二又从皇太后处得到三百万两银子，这个数目在必要时可以支付军队和政府人员两个月的薪饷，供政府开支六个

星期则绰绰有余。毫无疑问，在袁的完全同意下，十五位将军向皇室的每个成员发出了警告信，要求他们对国家的需要作出贡献，贡献的方式就是认购爱国公债。利用这种方式，又取得近三百万两，因此，就财政而言，袁世凯获得了足够三个月开支所需的钱。……我相信他对十五个将军所发出的通函是事先知道的。[89]

1月6日，朱尔典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写信：

我从可靠方面获悉：三天前，袁世凯阁下从宫廷得到八千根金条，每条重十两，大约等于二百八十万银两，此外还有许多白银，足以使总数达到三百万两（约合三十七万五千镑），他立即兑换所有的金银，供政府使用。正像我从前所说的那样，宫廷内究竟还有多少金银财宝，那是不可能查明的。……

不管朝廷掌握的财力是否可以指望达到公众所想象的程度，目前已有的现款无疑地大大增强了总理大臣处理危机的实力。它也消除了人们担心北京在今后三四个月内因政府缺乏现款而垮台所产生的无政府状态。

也是在这封信中，朱尔典说：

北京报纸最近吁请人们注意，通过及时地贱卖在此地宫廷内找到的珠宝、瓷器和古玩，可能得到几百万两。他们已经向一些外国人提出建议，目的在于变卖盛京皇宫内收集的瓷器和古玩；并把这些收入作为皇族侍从和较贫困成员的补助金。[90]

早在10月23日，朱尔典给坎贝尔爵士写信：“据说有大量宫廷的宝物，已采取最后的办法，付诸拍卖。”[91]

大约这只是一个传闻。

1月8日，高拉尔德写信给法国陆军部长：

清廷的财政形势略有好转，袁世凯从朝廷获得了几百万钱款。……

至今人们仍把袁世凯的游移归因于他的财政窘况，这种窘况由于从朝廷获得了新的经费——大约五百万银两——而暂时摆脱，并且袁希望爱国借款也能汇集大致相等的数目。[92]

1月12日，郑孝胥看报得知，"太后出帑金八万余两，值银三百余万，以作军用。西报云，此项藏金尚系一千八百七十余年所贡，有广东、湖北封条；若内廷悉出所藏，可敷清还赔款之用云。北京各银行分买此金，以德华所买为最多"。[93]

1月13日，奉天关税务司穆厚敦写信给安格联：

总督的秘书也对我说，瑞记洋行一个人从北京来，前天和昨天曾对皇宫里的金银进行估价。秘书还说这恰好说明政府的财政是何等困难。[94]

外务部参议颜惠庆回忆，当"心地善良、头脑简单的隆裕太后"质问为什么掌握有全部军队的内阁不采取军事行动镇压革命？他们总是推托："国库空虚，饷糈匮竭，兵马不发。"

于是，皇室不得不一再地拿出窖藏金银，交给度支部大臣，向银号钱庄兑换现款。

据说，紫禁城内某处庭院，埋藏着大量的钱财（有关埋藏地点的图纸，由一位外国顾问收藏着。他收集有大量的中文书籍、地图和手稿），庚子年间，甚至连专事搜掠的八国联军都没有找到它们。此时，人们又试图发掘这些财宝，但其藏处依旧是个谜。总之，隆裕太后几乎把大部分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可还是无济于事。许多京师旧臣对这种卑劣的勒索非常愤慨。[95]

另一位外务部官员曹汝霖说，袁世凯“恐宫中内帑，留为后患”，以军饷无出、前方军心动摇不能担此重任为词，奏请辞职。隆裕太后没有阅历，哪里能看破，袁既以军饷无出为辞，不能空言慰留，又无它法筹措，遂将慈禧太后历年积蓄的金条尽数交出，共有三十多箱，合银六百万两。这批金条，都是督抚关道等所进的贿赂，每条都粘有臣某恭呈字样，他曾目睹，其中就有袁世凯自己进呈的。[96]

这些内帑换来了票面总额值二百六十万两的优字爱国公债券，交给了内务府。当时不懂事的小皇帝溥仪后来说：“据最保守的估计，实际数目比票面还要多。”当冯国璋总统任内，内务府的世续让徐世昌将这些债券拿走了。他听说，袁世凯出山不到一个月，先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把摄政王挤掉了王位，“然后，以接济军用为名把隆裕的内帑挤了出来，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压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的手里”。[97]

蓝公武写信给梁启超说，袁世凯的计划已着着进行，“表面所筹得之款，虽近七百余万，大约可望之款，(变卖宝器（此事恐难实行)，勒捐亲贵，以及各处挪移。)约有两千万左右……总之，北方足支持三月。”[98]

即使拿到了这笔巨款，袁世凯还是认为没有钱，不能战，只能和。1月14日，绍英日记说库款可够一个月用，他到内阁时，袁说，“欲战则兵少饷绌，欲和则君主立宪宗旨难保，惟有辞职，请上另简贤员办理”。[99]

载泽对太后说，“袁世凯称库款支绌，军饷不足，实则筹饷种种名目，如爱国公债，如短期公债，及向亲贵大臣勒捐等项，现已筹有一千余万，钱已到手，因何不战?”[100]

1月16日，袁世凯等全体内阁成员合词密奏，要求改为共和，其中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财政困难：

> 然而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酬款之法，罗掘俱穷……财赋省分，全数沦陷，行政经费，若如捕风，搜讨军实，饷源何出，惟鲁惟豫，满目疮痍，地方素瘠，就地筹款，为势所难，常此迁延，必有内溃

之一日。……[101]

在1月19日的御前会议上，溥伟和载泽说起冯国璋请发军饷三月，情愿破贼，太后说："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溥伟奏："库币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102]

2月14日，退位诏下达后，袁世凯告诉莫理循，"他最大困难是财政上的困难"。迫切需要各国对民国的承认，以便得到借款。[103]

当时他至少需银118万两，而国库仅有17万两。[104]

二、独立各省：纸币、勒索与募捐

武昌首义前曾被共进会推为湖北都督的刘公告诉记者："革命军夺取武昌城后，发现藩库有600万两银子，其他各衙门一共发现大约400万两。"[105]

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日记：

> 10月18日，革命军现有军资300万元，正在铜元局、官钱局铸造货币。
>
> 10月25日，叛军着手募集五分利息额面五元之军事公债2000万元。[106]

这些数目不如杨玉如提供的可信，10月12日，吴兆麟、蔡济民等同往藩库铜币局官钱局点验，藩库实存银120余万两，铜币局存银元70余万元，银80万两，铜元40万串。官钱局存铜元200万串，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2000万张，银元票240万张，库银20万两，银元30万元。总计存款约4000

万元。[107]

参与首义的胡宗铎也称，张之洞设造币厂，当时省库存有现洋约4000万元，仅汤化龙、胡瑞霖知悉。

湖北的府库确实比较充裕，军官、士兵的军饷都能支付。詹大悲在汉口成立军政分府，就在军务部领了军费30万元。

武汉的兵工厂、被服厂、皮革厂，库存枪支有二三十万，各省援军都是空手而来，一切武器、装备全由湖北供应。[108]

不光枪支，外地如九江军政府经费拮据就靠武昌的帮助。12月6日，九江海关税务司穆厚达给安格联信中说：

> [马毓宝都督] 他自己的负担很重。在11月底时，他还请武昌黎元洪接济他20万两银子以应付军需，据他说没有从本口岸得到什么税款。[109]

李烈钧回忆，黎元洪任命他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兼中央军总司令，派员犒军，除赠他所带的军队10万元外，又赠他私人用费数万元，以表慰劳之意。他固辞不得，尽以所得犒劳部属。[110]

从广西带北伐军到武汉的赵恒惕也回忆，南北和议后，他所部奉调南京，临行从黎元洪都督处暂借军饷五万元，供军队开拔之用。到南京下关，领到饷额，立即寄还，黎元洪为之惊讶不已。军事纷乱之际，军队借饷如数归还，事无前例。[111]

像湖北这样的情况，其他地方十分少见。

谭延闿的幕僚唐乾一记录，湖南由藩库拨银成立了官钱局，当独立时，清查铜元票发行600余万串，银元票发行16万余元，银两票发行240万两。统计10年间之营业，当赢200余万，而实数亏240万。[112]

陕西独立，组织陆军中学的学生队占领藩台衙门，保护藩库中的存银70多万两，趁火打劫的游民劫掠了盐店街一带的银号，仅"天成亨"一家就失去现银10多万两，他们几次图谋劫掠藩库，因为防守严密，没敢动手。[113]

上海独立时，江南制造局提调李平书得知不久前刚从江苏藩库领到库平

银10万两，放在租界的一个空屋，在他家隔壁，派了四名局勇在那里看守，外人不知。11月4日一早，沈缦云、王一亭和他商量筹饷救济之策，他说有这笔现钱，大家喜出望外，赶紧取出，运到东方银行，换得申规银10万9400余两。[114]

这几乎是上海唯一的大笔库存现银，其他的一无所得。

11月18日，逃入租界的上海道刘燕翼在《申报》发表启事：

> 沪关经理公款，向系遵照商部奏案，放存庄号。近以上海金融恐慌，迭奉宪饬维持市面，并无现银存库。所有各庄号领存公款之存折、存票、押据、押件及蔡前任移交各件，现因大局未定，与领事团议明，已于九月二十六日全数送交领袖领事暂代收存。……

后来有人写信给孙中山："前沪道刘燕翼移存比国领袖领事署官款计：库银325万3550两1钱2分1厘；又规银88万8643两5钱5分6厘，洋例纹银2万520两。另上任沪道蔡乃煌移交时，实短370余万两，以押款暂抵。"[115]

1912年2月15日，中华协济总会查明，刘燕翼在各商号存放的公私各款，梅恒裕南号10万两、隆昌增2万两、徐仓记2万两、梅莪记2万两，共有存银16万两，票据都交给了比利时领事。[116]

1911年11月7日，租界警务处收到中华民国军政府来文二件，其中第一件就是要求捕房逮捕制造局前总办张楚宝，此人现在租界避难。来文指控他从制造局携走并继续占有白银70万两。[117]

杭州独立时，马叙伦便去刻了一颗"浙军都督府都督之印"，带着封条，把大清银行和布政司、盐运司等衙门都封了。[118]

其实，这些衙门都没什么库存。当时高尔登为财政司长，章天觉从上海去，两人见面时，正好一个叫吴间的求见，"衣枣红宁绸大袖单马褂，蓝色宁绸围龙花夹袍，年约六十余岁，长须留辫"，自称山东蓬莱人，任藩库大使已两年余，目睹光复，拟辞职回乡，移交库存。他们随吴到了库所，"库在藩署左厢，深邃不可名状，四周墙堵之高，仰首不能望其巅。深夜，但觉幽暗如鬼

域，虽秋月清寒如水，亦凄其难耐”。库门三重，都坚固异常，叩之如铁，不输于时下的水泥钢骨。等到第三重门打开，只见两边木箱，依墙而叠，两边都有80多箱，箱外铁皮包，左为银锭，每箱3500两，右为银元，每箱5000元，约计银30万两，银元40多万元。其他铜元角洋，堆积如阜。铜元角洋用纸包裹，钱串贯以绳索。照册接收无误。第二天，吴间又来要一个签收的正式公文，赠以路费银元200元，财政司拿不出来，到库中取出一箱银元。[119]

浙江是财政大省，藩库的这点库存实不足道。

原本广东的财政收入仅次于江苏，岁入2700多万两，每年上交朝廷的各款项就达1700多万两。独立时，全城官库，仅得万元，胡汉民查知两广总督张鸣岐临去时发龙济光部军双饷，而与属吏席卷其余以逃，且告人说：“革命党即得广东，不守三日也。”[120]

张鸣歧先期电汇50万到上海，他父亲收到后还有回电。各司道大员也都纷纷携银逃走，运司、提学司、提法司都将库存的钱取出，换成汇丰银行的银票。11月8日下午，督练公所参议吴锡永、总办吴晋、军械局长王为毅三人密议，将所存军饷十数万互相均分，逃往香港。[121]

四川藩库本来还比较充实，成都独立之后发生兵变（12月8日），“在这一天一夜中，藩库所存的800万两（也有说600万两、400万两）生银全遭洗劫”。[122]

12月1日，同科进士葛霞仙与恽毓鼎聊天，“论及贵州岁入不及三十万金，平时全仗各省协济，今亦如盲如狂，学人称独立，新党之无意识若此！福州素以贫瘠著，尚会臣到任时，藩库只有银五两，会臣来书谓无日不度除夕，而新党不知也。既独立，乃大失望。经费一无所出，电催外府县解地丁银，皆不应”。[123]

两人私下所谈确是实情。12月20日，锡金军政分府总理处日记记载：“接沪都督电：福州已独立，唯饷绌兵单为可虑耳。”[124]

福建将官钱局改组为中华福建银号，发行纸币，先后发行过“台伏票”和“毫子票”，前者称“台新议平七钱重钞票”，每元折合台平钱七钱，后者称“福建通用银元票”。[125]

孙道仁向日本台湾银行借款300万元，做为军政经费，1912年2月借到

日元50万元，以省内盐税、内地常关税、茶税和福建省造币局财产为担保，日息0.28%，为期两年。[126]

贵州贫瘠，独立之后，靠贵州官钱局发行的纸币维持市面，军政府张贴的布告说：

> 从前官钱局发出纸币，军政府一概承认兑换现银，尔等务必照常使用，不得妄听浮言，自取扰乱。一切买卖完纳粮税，皆宜仍旧通用。

1912年2月，唐继尧率滇军进入贵阳，将官钱局改为贵州银行，发行过兑换券100万元，并借得27万两现银，准许原来官钱局的银、钱票兑现。[127]

各地独立之后，几乎都遭遇财政困难，也无一例外地想到发行纸币。

西安成立“秦陇复汉军军政府”，与商务总会商量，将秦丰官钱局改为秦丰银行，所有“陕西官银钱号”的银票一概停止使用，另外发秦丰银票，以资周转，因当时印刷困难，将所存旧银票加盖“秦丰银行”的印章，背面还印有“秦陇复汉军大统领”晓谕等字样和图章，陆续发出了200万两。同时，发行只能流通交易、不能兑换现银的“秦陇复汉军”军用银票，原计划发100万两，因军民不乐用，发行到50万两即行停止。

当时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有秦丰字银票，还有商会发的同心字银票，为数尚有百余万串。等到各钱庄、票号开业之后，秦丰字号发生挤兑纠纷，虽经出示保证兑换，并派兵弹压，还是难以平息。尤其是每日所付之款，多为军人兑去，商民人等执票不能取钱。最后将军民兑换的时间分开。究其原因还是市面上对纸币的信任不够。

想尽了办法，财政方面仍捉襟见肘，劝捐助饷引起民怨，发行公债效果也不理想。半年当中财政最为困难，“剜肉补疮，煞费苦心”。[128]

上海独立，首当其冲的是财政问题。

11月5日早上，各路敢死队不下千人，纷纷索饷，李平书答应先为他们筹一个星期的伙食费，每人发了一元，共发洋一千多元。[129]然而募集到的经费对于数量庞大的军队只是杯水车薪。

有一天夜里，陈英士在“惜阴堂”，接到于右任的告急电话，民军正在闹饷，要围焚都督府，他都不敢回去。[130]

后来他对熊希龄说，在上海“无一事不需现款，无一日不坐愁城，百孔千疮，万分支绌，而沪上一隅之地，关税则恐掌于外人，厘赋则多归于苏省，此地乃销金之窖，无处筑避债之台”。[131]

上海光复，大清、交通、通商几家大银行并没有接收。沪军都督府只是照会大清、交通两行：

> 上海为华洋通商巨埠，……深恐惹起意外，……所有沪上官设银行司事人员，概行仍旧，以资熟手。其向来该银行分发钱票，亦需照常通行，毋须止兑，致碍市面。

交通银行沪行商股代表提出，官款“无论清政府、民国政府来提取，一律不付”，沪军政府也没有坚持，仅通过接管的上海电报局在其存款项下提取少量款项。[132]

当时，主客军云集上海数万人，嗷嗷待哺，每天财政部没有开门，数以百计的人就在门口包围，都是来要钱的，声势汹汹。沈缦云作为财政总长吃尽苦头，他担任经理的信成银行垫款，不足则毁家继之，前后垫款达30余万两，仍不足。[133]

他儿子沈焕唐说，信成银行实为上海光复经费的源泉。此言不虚。沈亦云回忆：“为发沪军军用票而致破产之信成银行即为周家产业，……上海商家为革命直接损失之巨，以周氏为最。”[134]信成银行，以周舜卿出资最多。

11月10日，《申报》等报纸刊登《财政总长启事》，沪军政府保信成银行。信成银行支援革命的经费前后总计银32万3000余两，并洋6万7千余元（包括办《民立报》）。1912年1月，沈缦云申请报销这些费用，呈文中说，上海独立，戎马仓皇，楚歌四面，沪军军需，各地接济，无日不有，“缦云罗掘俱穷，勉支危局，任事匝月，无一时一刻不在惊涛骇浪之中”，都督府的财政依靠信成银行挪借巨款，而信成之所以能借给他，因为有前清沪道公款26万余两存于该行，他要求将这些款相抵。因为道署的各项契

据都在比利时领事那里，实际上无法报销。[135]

11月23日，宗方小太郎日记记着："本日经美国传教士之手以银17万元贷与上海革命军军政府。该款所有人为美国某律师云。"[136]

这笔借款未见其他记录。为解决财政困难，11月10日陈英士筹备设立中华银行，苦于无款，得知杭州藩库存有一笔现金，大喜，马上致电汤寿潜索要20万两，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汤就商于陶成章，陶说"容缓商"。汤就让高尔登发电婉拒，高要汤的手令。陈面责高，高则拿出了汤的手令。陈后来面责汤，汤说陶成章不允。[137]陈英士决意杀陶，与此不无关系。

11月14日，《民立报》报道，中华银行股本暂定500万元，分100万股，发行公债票、军用票，兼收商民助饷。11月21日正式开幕，发行"中华民国军用钞票"，共有四种面值，五角、一元、五元、十元，背后为英文，有沈缦云的英文签名。

11月29日，陈英士通令中华银行所发各种钞票，务须一律通用。可见当时人们对这些纸币存有疑虑。钦其宝并不知情，12月18日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现革军用钞票甚通行，亦一恨事。"[138]

这一天，公共租界的警务报告附有一份传单，原张贴在福建路452号油店门上，号召各界向南市沿浦久大码头的中华银行购买股票。该银行力筹股本500万元，每股票面五元，实售现金二元五角。据说对股东或许不再有其他的募款要求。在《中华银行简章》后面附有收股处，包括南市、北市的信成银行、民立报馆、神州报馆、申报馆、新闻报馆、时报馆、东方银行、兴业银行、时事报馆、瑞康颜料号、四明银行、大生纱厂等多处。[139]

可见中华银行的招股并不顺利。

自1911年11月6日到1912年1月17日，沪军都督府陆续支用前清江南造币厂寄存通商等银行的款442584两298钱，轮船招商局以各埠栈房、市房等财产担保，向汇丰银行借款150万两，其中40.23万余归沪军都督府使用。另外，还调用轮船水脚30万8542两2钱3分，电政局未还的有75000两，通惠银行提用20万两，十多家钱庄借款数目不等，未还。中华银行65万多两。四明银行，以四万元公债票做抵押借近四万两。[140]

10月27日，杭州独立前，海关税务司铁士兰给安格联写信："据传商会收到几份革命党领袖的布告，'……商业可以照常进行，只有政府银行将被接收，必要时将增加它们的资金。'"[141]

杭州独立之后市面恐慌，金融阻滞，"推其原因，皆由富家大户，纷纷提现，或赴省外，或即家藏。尤不堪者，竟以大宗现款存入外国银行，遂致现钱益少，周转不灵"。仅仅逃到上海的官员就有170多家，其中劝业道董元亮一人即卷逃公款20多万。[142]

12月6日，浙江军政府通告发行军用票，面值一元、五元两种，使用效力与市面上通用银元无异，准许交纳赋税及一切公项。原暂定发行额50万元，结果发行了210多万元，次年5月兑现。[143]

蒋尊簋为都督时，以浙江丝绢和国库证券160万元为担保，向礼和洋行借到600万马克。

宁波光复，军政分府发行的钞票没有信用，财政部长张传葆煞费苦心，无奈只好去找海关，请他们收税时准用钞票，以十日为期，可以去军政分府兑现。人们见这个钞票海关都可以通用，信用当然就没有问题了。[144]

11月9日，广州光复，次日到大清银行点收存款，现银只有14684两，银纸11280元。[145]

当时，新军及旗营等部，军饷急需20多万，而库中几空。胡汉民的着急可想而知，他给龙济光写信："所有藩库存在查款项，经贵提督力任保管，无任感佩。现军政府用费浩繁，应请如数解交军政府。"他并交代向港商商借款40万，许以三个月倍数偿还。11日，他派人盘查官银钱局时，发现库存纸币1200万，这些纸币张鸣岐曾发行于市面，发生纸币风潮，不能流通，张从汇丰银行借款收回存库。胡汉民决定加盖军政府财政部的印发行，要求商会承认通用。[146]他以都督身份发布的第一个布告就是为此：

> 广东军政府业已成立，广东官银钱局，仍隶本军政府之下，所有从前发出银票，以后仍由本军政府担任兑换，各商民等自可照常行使，不必疑虑。广东独立为始，从前居民迁徙过半，市面萧条，

元气未复。银票为金融所关，凡属国民皆有维持之责；倘有捏造谣言及妄自扣折者，是为社会公敌。[147]

加盖军政府财政部印戳的银元票，有一元、十元两种面值，第一次提出275.2万元以应急需，后来又两次提出各500万元，在市面流通。靠了这笔钱，广东才得以勉强支撑。（根据财政司报告册，共有纸币13832175.11元。）

到1912年初，为维持庞大的财政支出，广东发行新纸币620多万元，加上旧币有2000万元。

新发行的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通用银票，可以随时兑换现银。

广东装备北伐军用了287万多巨款，支持外省有39万多元。[148]

到1月上中旬，广东即因光复后大量发行纸币，导致纸币信用日下，商民拒用，官银局出现挤兑现象。[149]

士兵的军饷主要是十元的小额纸币，市面上却不愿收，士兵经常为此与饭馆和店铺老板大打出手，许多店铺纷纷关门。1月25日，陈炯明颁布了一个强行流通纸币的命令，但丝毫没有改变局势。[150]

南京本来就缺钱，张勋逃走时带走了剩余的一点库存。南京攻克之后，属交通银行的通州源大、刘桥安福仁记、右港和祥丰三典存现，镇江大清银行及各庄存款都被民军提取，交行镇庄也被民军提取现款两万元。[151]

各路民军进入南京，秩序很乱。12月19日，江苏省议会议长张謇日记说："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欲设置民事须客军出发，欲出发客军须财政数十万。"次日，张謇出面由各商会筹集20万元，"不足尚多"。[152]程德全任江苏都督，即筹备江苏银行，发行钞票50万元，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种面值。

江苏许多地方就是因为财政问题而宣布独立的，11月26日，回到常熟故乡的徐兆玮写信给人："大抵此次独立，半为财政问题，金融恐慌达于极点，非独立无以自存。于是绅以是说，官以是应，一二革军乘之，而众响应矣。吾邑并无革军一人，直自变耳！……所虑者，南北坚持，劳师縻饷，暴骨如山，用财如水，不以兵死亦饥死耳！"[153]

12月16日，日本汉口领事馆得到九江情报，“当地军政府发出告示，为解救当前经济界之困窘，特许可旧政府所发行之官票流通，并劝告使用革命军新发行之钞票。……闻当地革命军目下正在上海印制新钞票”。废除厘金本来是革命军迎合舆情之举，曾一再声明，“但因目前正值财政困难之际，对茶叶、酒、糖三项仍须课税”。

1912年1月9日九江情报，“自革命以来，货物运输，一时完全断绝，通过鄱阳湖南之货物皆属军需品，故无厘金可征。迩来厘金局对于由内地运来之货物仍然抽税，只比从前税率减低二成，而检查甚严，商人多感不便”。

1月11日九江情报，“军政府新设民国银行，以为军政府之金融机关，发行大量新纸币，其数额虽不详，但因随军政府资金之需要而发行，不免有滥发之弊。民国银行之纸币虽亦声明可以兑现，但每人每次只限兑一元，且时间极短，手续极为麻烦，实际等于不兑现纸币。闻市场上对此已打高率折扣”。

当时江西发行的纸币印有马毓宝的头像，2月10日情报，“目下九江军政府为发放年终兵饷，需现银十二三万元，业向南昌都督府请求拨款，但尚未见汇来”。[153]

重庆光复之初，即派向楚带武装兵两人即到大清银行和浚川源银行进行接收。因为蜀军政府尚未成立，无法正式盖印接收重要簿据，向楚在皮包内取出一张印有“向楚”二字的大红名片作为收据，将两个银行重要簿据几十本一并带走。当时两行库存白银共计270万元，有此现款，则军政府的一切开支便可无虑了。两行被改组为大汉银行。[154]

云南独立以后，“需用尤繁，又兼汇兑不灵，银根奇紧，市面恐慌，日甚一日”，1911年11月27日，法国外交部长致信陆军部长说：“在云南府，尽管有些令人不安的传言，但仍然是平静的，因为军政府还有钱。”[155]12月31日，云南都督府财政司、实业司呈请成立“云南全省公钱局”，发行纸币，并附上纸币样张五种。[156]

1912年1月13日，英国驻云南总领事额必廉写信向格雷汇报12月份云



江西发行的纸币之一



江西发行的纸币之二

南的情况：

目前，军政府感到焦虑的一大根源是现款问题，或者确切地说，是缺乏现款，以前的劝业道台、现任军政府参议在不久前告诉该省邮政司考夫曼先生说："省库中的现款仅够用到即将来临的农历二月初，大约是公历三月中旬。……现在，他们打算发行总额为50万元的纸币，而且还谈论到按照外国方式发行公债以及政府举办彩票。[158]

2月9日，富滇银行成立，发行纸币300万元，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为通用银圆券。

2月1日，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情报说，武昌市面铜元缺乏，交易诸多不便。商务总会特发行铜钱百文票面之小票，每元银元折合小票十二张，即一吊二百文。此种小票已印四十万张，目下与银元或纸币兑换者每日约五百吊文。现仍在续印，拟共发一百万张。此种小票系强制通用，并无准备金，实际上是一种不兑现纸币，在武昌城内依都督府的威令流通市面。军务部同时也发行二百文票面的钱票，以补铜元的不足。[159]

5月3日，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接收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之后对记者说，他调查各省官钱局发出的纸币，及起义后发出的军用票，票额达到三亿三千多万元，"准备毫无，且滥发犹不已"。[160]

海关税项更休题，安得吾人共核稽。赔款未清聊借口，总缘国势未能齐。

——《海上光复竹枝词》

度支部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关税岁入合计4213万9586两，扣除赔款、洋款和经费，"关余"为2239万8817两。这是一笔巨额收入。

长沙独立后，湖南军政府于1911年11月1日照会当地海关税务司伟克非：

至所收税银，应即存储大汉银行，军政府决不动用，贵税务司亦不得动用，或受他处命令移拨。应请将此情形申明总税务司，此后长沙关税款，无论何项开销，非经军政府给文允准，均不得擅动。

第二天，伟克非回复不同意："此税款甚有关系，似宜用总税务司名字交存汇丰银行，或请由领事官转交汇丰亦可。"

当天，军政府回复："查税款关系重大，现既统归军政府，可即以军政府名义存储汇丰银行。"

伟克非坚持用总税务司名字，军政府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以"湖南税关"名义存款，动用时必经军政府允许。伟克非寸步不让，拿出英国领事做挡箭牌。军政府无奈，只好同意，只是表示不能擅自动用。

11 月 12 日，总税务司安格联对伟克非的坚持非常满意：

长沙当局竟然这样讲道理，我很高兴……我尽力设法派炮舰到长沙，给你道义上的支持，并请朱尔典发电报指示长沙英国领事支持你。我们的电报都要经过革命党的手，因此我发电报给你时，故意这样措词，叫他们看了心中有数。[10]



总税务司安格联

这已是赤裸裸的威胁。

江海关所征税银，一向由税务司按日解交大清、裕丰两银行，汇总后解上海道。上海独立之后，上海道刘襄孙函请江海关税务司，将每天所收各税勿交银行，一概代存海关，等大事稍定，再归还道库。[11]

税务司墨贤理指示将常关的税款每日送给他，用总税务司名义存入汇丰银行的税款帐中。[注]

11月5日、8日，《光复报》报道，吴淞独立，“惟吴淞常关及捐局皆听候上海新关税司酌示”，“江海关所收之税银，现以总税务司之名义存入汇丰银行中，此盖仿照汉口之办法也”。[注]

11月11日，安格联写信给墨贤理，“各关的税款大部分保全了”。[注]

11月23日，朱尔典给格雷写信说，当长沙就税款问题交涉的时候，他电令长沙领事，向军政府说清楚：“税款实为外国债券持有人的财产，若革命党动用，可能与列强发生纠纷。”[注]

这一天，重庆关税务司斯泰老写信向安格联汇报重庆独立情况，“我准备在海关里设立一个收税处，并且与收税处的人会同保管税款”。安格联做了这样的批示：

> 你应尽最大努力取得全部海关税款，并汇往上海我的税款账户，用各种说法劝导当地政府像其他地区一样把税款交给我保管。……向他们说明，拒绝把税款交给我保管，将是错误的和不明智的，迟早将引起外国的干涉。

也是这一天，上海几家外国银行开会通过，经公使团修改，形成了八条“税款归还债赔各款办法”，本来以总税务司个人名字存款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至此变为总税务司可直接处置关税。经由公使团照会清廷外务部，与度支部核复，咨行税务处，12月6日交总税务司遵行，“本处查各海关税项暂由总税务司统辖，以备拨付洋债赔款，既经度支部核准，自可照办”。[注]

从此，南方独立各省，包括即将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都不可能从海关得到“关余”，这些税款由汇丰等几家外国银行保管，由外籍总税务司支配。

11月27日，张謇写信给许鼎霖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还乐观地说：“东南各省，皆财赋所自出，以海关税项言之，十之八九已归民军；以盐斤税厘言之，亦得十之七八。”[注]

陈英士给唐文治等人的信里也同样乐观：“各关洋员暂守中立，俟北京

光复，一体由我接管。”[169]

任职外务部的颜惠庆对此深感遗憾：

清政府在风雨飘摇中铸成了一个大错，它未制订充分的防范条款，就指令海关总税务司，负责保管全部关税收入。按照旧例由英国人出任总税务司的海关虽然俨然已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但其职权仅限于收税，而且税款收后，必须立即交给称作道台（后来称海关监督）的中国官员，由他们负责保管。武昌起义后，一些道台已弃职逃跑，还有些人被革命军免了职，清政府急于重新任命一些人，接替他们。当时的关税收入大部分都用于分期偿付“庚子赔款”及其转化的外债和利息。在行将垮台之时，清政府竟然把原来道台拥有的权力，也拱手交给了英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

此后，中国政府失去了对这项主要税源的掌握权，在很长一个时期，反而受控于总税务司。英国人攫夺了许多权力，包括可任意决定巨额税款存放的银行；毫无疑问，中国银行绝对享受不到这种特权。从前来自海关罚款和吨位税的钱，历来都用作我国驻外使、领馆的经费，此后，也悉被总税务司席卷而去，用于支付赔款和外债。[170]

12月7日，法国武官高拉尔德向陆军部长汇报，南方独立省份，“对资金的需要会导致他们对存在外国银行中的海关收入做出令人遗憾的举动”。[171]

1912年2月14日，朱尔典给格雷的信附有黑德爵士的备忘录，“革命派首领们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的主要困难是款项问题。他们在一些条约口岸又企图接管常关以及邮政局的行政管理，英王陛下驻南京、福州、芜湖的领事必须和他们的同事们一起，向临时当局提出非正式的抗议……”[172]

南方独立各省对于眼皮底下的海关无能为力，无论财政如何困难，也动不了海关税款的一分一毫。2月7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鄂省沙市、宜昌、江汉三关，年收税款三四百万两……自鄂省起义，所有关税银两，均归外人掌握，毫未缴出……况此项税款，抵还洋款外，为数尚巨，竟听外人掌

管，既失权利，后损国体。……今又接蜀军政府来电，商问重庆关税办法，情形与鄂一辙……”孙中山的复电显得无奈：“此事正在注意办理交涉，惟必俟各国承认民国后，方有结果。”[173]

10月29日，宗方小太郎到九江，得知招商局“江孚号”从上海开来，被革命党没收现金三万两。[174]

11月2日，英国驻长沙领事翟比南给朱尔典写信：

> 革命军所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关闭各城门，向所有的主要绅士和其他富户征收捐税，不管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那些被特别指名勒捐的人，是过去曾为满清王朝明显效劳者的家庭，如曾国藩、左宗棠和其他人的后代。据说曾国藩的后代已被迫捐五十万两。[175]

有关曾家的传闻不确，当年60岁的曾国藩女儿曾纪芬自述：

“是时省城民党搜刮军饷，被其强提存款者甚多。而吾家历年亏空一无存款，幸免此厄。”[176]

长沙设立筹饷总局，各地设分局，编查富民，以百分捐十之法筹得三百多万元，导致怨声于道。主持者周震鳞引以骄傲，实则百分捐十也有弊端，一家有田值银一万而负债在一万以外，按这个办法应捐一千。又如，有田值一万，而有存款十万，因无法调查，按例捐一千即可。又或家有十万，贿筹饷员千金，而以一万上报，只要捐一千。筹饷员下乡，派兵捕人，后到的还要击以铁链。[177]

浏阳卢云庆父子被勒逼致死，湘潭袁某捐了两万多金，才免于收取不动产。[178]

1912年元旦，有人给王闿运来信说，“革党欲提书院经费”，问何以应对，他回信“告以不可与贼盗论理”。[179]

湖北襄阳自光复到取消军政分府，70多天中用钱19万多缗（一千文为一缗），而军饷占了十分之八，行政费仅十分之二。将富户分为上中下三则，依则认捐，数达卅多万，实缴仅十分之一。均州首富户苏清泉心怀观望，久无

动静，派去劝捐的人，一怒之下将他家的财物装上几只船，将人也拘押，军政分府下令放人，并将田宅契券还他，他最后捐出四万多缗。当地财政的困难从军政分府 12 月 4 日给黎元洪的电中可知："银钱缺乏，铜元尤少，官票不能畅用，军需紧要，务恳先拨铜元十万串。"[180]

山西独立之后，祁县的渠楚南家之所以同意借银 40 万两，先给 20 万，就是前去筹饷的学生在他家门口放了几枪，渠老先生大恐，央人说："再不要放枪！家里小孩害怕，我早想帮助军饷的。"[181]

这与阎锡山的回忆有点出入，当时军饷无着，大家商议向富户百家募银百万两，他说："光复之初，人心未定，与其找百家，莫如找一家，向祁县渠晓洲一户借银四十万两，指定委员三人往借。"临行时，他交代："须言词恳切，晓以大义，动以利害，事必须成功，切不可过伤人情。"委员回来复命，渠一开始有点为难，经再三说明，"慨然应允"。[182]

陕西库款已空，新款无着，军政府给每个公务人员不论级别，一律每人每月发生活费银五元。将省城各当铺中旧存的银器首饰收集融化，也不过两万，又将省城与关中各县当铺的"皇本"没收（清政府把一部分公款放在当铺生息，称为"皇本"），得到约 60 万两。大约在 11 月下旬，有人建议向各县富商大户劝捐助饷，在扬州有大盐号多处的吴怀先家，在四川有当铺三四十号的刘三省堂，都是百万以上的富户，但家中存银不多，两家合计捐款不到 10 万两，其他人家认捐也不多，招来一片怨声。[183]

12 月 24 日，远在江苏常熟的徐兆玮接到友人 12 月 12 日的来信："山陕情形极为野蛮，掳掠富绅不可理喻，恐非武汉所能操纵。"[184]

对各地军政府来说，使用没收、逼捐这些手段是他们开拓财源、维持局面的主要举措之一，尤其在富人云集的上海。吴淞独立时，宝山县令胡调元被拘，交出银币两万，用来赏军。[185]

11 月 15 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记录：

> 现对城厢内外所有寺、庙、庵、观都被要求能按照它们的富有情况捐献军费，否则就要派部队驻在里面。二日来已向城里各商号征集军费二万元，以支援革命军。

11月16日，“按向例每年阴历十月初一举行的城隍庙庙会，今年未获革命军批准，他们要组织者拿出六万元来才准举行”。

12月17日，上海《新闻报》报道，革命军政府向当地店铺分发一千面旗子。收到旗子的店铺，每户收洋一元”。[186]

中华民军协济总会文牍科的邱寿铭回忆，经湖州分会与总会联系，将上海的湖州籍富商、逃官请到湖州会馆开会，有一百多人出席，南浔的刘澄如答应捐10万元，庞莱臣捐5万元，其他3万、5万、一万五至数百元不等，总计在百万以上。这些捐款并不是自愿的，沈田莘先认了5千元，最后加到2万元。有人不肯认捐或捐得少了，工作人员当场起而大骂，甚至掏出手枪，有的人直到黄昏才让回家。做过金坛知县的逃官蒋澜江就是不肯捐，到他家劝说也不成，给他施加了很大压力才捐出巨款。

这个协济总会以陈英士为首，募款对象为拥有巨款潜居上海的前清官僚，或住在上海的各地商人地主，经总会和分会联系调查后向他们动员筹募军饷。如有抗拒情形，即行逮捕，押缴募集的款子，由总会交给沪军都督府。[187]

1912年1月20日，锡金军政分府“接上海协济会来电，请速查封唐姓家产”。第二天，就有两个协济会委员到无锡，“赴九丰面粉公司查唐锡晋产业”。1月29日，又接沪军都督照会，“知照协会派员来锡查抄唐宗愈私产事”。次日，“接中华民军协济会移文一件，为查封唐宗愈私产派张公威来锡接洽”。2月9日，“收协济会公文一件，查封唐氏产业，派人到锡收管”。2月21日收到沪军都督公文一件，为唐宗愈被封房产事。2月25日，收苏都督批文，唐姓查封产业后候沪都督办理。3月7日，“发沪军饷协济会照会一件，为唐姓事。发苏、沪两都督呈文两件，会同民政长呈复唐氏查封产业应抵本地账款”。[188]

1911年12月23日，北京《京都日报》曾刊登《国民注目请看盛宣怀也有今日》消息，12月13日夜，苏州巡警总监奉都督府命，连夜查封盛家财产，发下都督府的封条多张，查封高师巷久大典当，西城桥济大典当，申衙前济大当栈，同福利洋货铺，同赐茂南货铺，西中市盛公馆，胥门外盛家弄租房，电报局房屋，留院及新宅花步别墅等处……盛氏在苏州的财产不止此数，如鸭蛋桥洋房，已改名美孚洋行；金阊孤儿院也将盛宣怀的题额铲去，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

托名红十字会字样；其余良田万顷，中市及马路一带租房何止千数百幢，听说管租簿契折的崔姓司账经理早已藏匿。当留园查封时，崔避匿不到，洋布南货等铺的存货也都寥寥。久大、济大各典房屋都是盛家的产业，现也捏称租房；盛许氏的金银珠翠寄顿在寺院的，更无从追究。[⑱]

12月18日，钦其宝给亡命日本的盛宣怀写信：

> 现革党将富户极意搜刮。苏州自庄思缄〔蕴宽〕到任后，各富户咸有戒心。闻前日将有田者查明注册，勒捐巨款，如不遵者，一律充公。于是人心大愤。
>
> 上海自陈其美为都督，终日花天酒地，连纳三妾。一月之间，花酒有二百余台之多，并所用均系无赖，动辄诈人。……
>
> 留园仍有革据，并欲卖钱以贴军用。

12月25日，庄畹玉在上海租界写信给盛宣怀说，“我在格利[哩]饭店时，革党暗嘱马夫如能将我拖至华界，即酬伊一万两，倘敢暗通信与主人，即立刻枪毙”。她托朱子[志]尧出面与革党私下调和，愿意交10万元，军政府不同意。据朱说，至少要20万元才能谈妥。她却担心陈英士的权力不足，即使交了这笔钱，别处又生枝节。“此事准由众师爷出名，你只作不知。”

同月，庄畹玉还有一封信讲到盛家被勒捐的事，住在苏州中市的盛宣怀父亲盛康第四妾许氏被勒索捐洋12000元，许氏允1万元，革军仍不满意，尚未了结。“革军捐饷一层，……我意拟捐助一次，无论苏、沪、常、浙，只要是我们产业，统要退出保护，方肯出钱。即使出钱，亦要除去‘助饷’二字，只能附中华银行股份……电局均被革军占住，实因官办名目不好。幸招商局改归商办，未被硬占，然不知明年利息尚能照付否。长江航路已不能行，水脚吃亏不小。”[⑲]

12月2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报告记录，26日下午，有一华人到密采里旅馆，将敏亲王请到上海县城某宅，观赏新近自汉口带来的贵重古玩，亲王当即请住在北四川路104号的日籍律师菊池(Kikuchi)陪同前往。随后，他们被引到离城门很远的一所房屋，进去后即发觉陷入罗网，那里并

无任何古玩。此时日本人被强迫与敏亲王分离，有人且以暴力威胁，强令其宣誓决不在领事馆或其他地方泄露敏亲王被扣之事。日人无奈之下签了誓约，然后由几个持有手枪的人押送回北四川路越界地段寓所，还阻止其去密采里旅馆或日本领事馆报告敏亲王失踪之事。这些持枪人终夜守卫该日人住所，几次拦截他为报告此事而派出去的送信人，直至第二天傍晚该日人才终于将此事设法通知了日本领事。诱骗敏亲王去上海县城的人系革命军人员。该日人听得他们对敏亲王说他拥有财产250万两，但亲王只承认8万两。敏亲王一直被扣押到27日夜，并在威胁恐吓之下交出了大笔款项，又签了一张华比银行的巨款支票后才被释放。但这张支票至今尚未兑现。

当天陈英士在都督府召开会议，设法筹集款项，以便继续开展军事行动。会议决定没收并出售坐落在宝山的盛宣怀的若干房产。[191]

一个多月前，陈英士就盛宣怀的家产一事，电复常州军政分府，只是主张封禁：

> 盛氏家产，此间格于租界，尚未办理。浙、苏闻已由公没收。鄙意盛氏卖国，罪非一案，历年办理外交，何次不损公肥己，应将该氏家产封禁，待将来获案审定罪名，再行区分，较为公允。现即收没私人财产，似未足以折该家属之心。[192]

12月29日，日本留学生黄尊三去沪军都督府探视一个被押的人，门禁很严，再三交涉才得进入，先不知此人究竟何事被拘捕，只知非有巨款，不能取赎，后来才知是为捐款的事，“盖当时之都督府，财政无出，陈英士为筹饷起见，不能不取之南北阔人。对于北来官僚之有资财者，尤为注意，即某公亦几几乎不免”。[193]其所为几乎明目张胆。

就在这一天，陈英士以有人举报“捏造吞匿”等罪嫌，下令拘捕大清银行经理宋汉章等，对外通告说：“查大清银行即前清政府银行，所有该行款项，除商股外，皆系民国公款。”[194]

1912年1月3日，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绑架宋汉章等两人“目的在于勒索金钱”，“与伍廷芳博士的初步交涉并无结果，董事会决定向领事

团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采取措施保证将此两人放还租界”。

他们对全面强征革命经费以及向租界内的富户施加压力索取捐款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正受到商会逼迫的金承熙夫人一案，董事会指示向商会递交抗议函，指出任何强迫方式都将受到抵制；并进一步决定致函领事团，希望写信给革命党首领，就以上问题全面进行交涉。督察长报告了另一案件，一户李姓家庭被罚款达1万元。此案需要捕房进一步侦察，对于此款子的收据以及巡捕前去了解情况的牯岭路上那幢房屋内的居民，捕房应予以调查以求确定此一勒索案的作案人”。

1月5日，在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特别会议上，讨论了“革命及勒索案”，宣读了就此问题致领袖领事的信件草稿，并批准发出。[195]

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于1月2日写信给朱尔典：

> 在我上一份报告中提到的向南京商界强制征收20万两税款的成功，鼓励军方图谋继续采取灵活办法向公众募集银钱。现在，他们已发布命令说：这座城市内所有租赁房产的人应向军方预付今后三个月的租金，当农村重新恢复秩序而且他们的财政状况允许的时候，军方将把该款偿还房东。这项强制性的借款如果可能实施的话，比向商人强迫征税甚至更加不受欢迎，因为所有的人都受到它的影响……[196]

1月8日，高拉尔德写信给法国陆军部长：

> 南方党使用没收忠于王室的官吏财产的办法寻求其财政收入。……
>
> 南方党是否拥有可观的资金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企图借款和颁布严厉措施，如通告所说将忠于王室的官吏财产充公，强迫商人缴纳捐税等。[197]

1月13日，上海法国领事的报告中说，“银钱行号老板、富商买办都曾解囊捐助，目前，他们之中许多人肯定已经觉得新政府这一包袱不胜担负

了。”各银行的存款急剧下降，1911年10月13日，存款总额达840万元，白银2440万两，5900锭。到1912年1月19日只有680万元，1780万两和1836锭。这些银钱行号虽然大多设在公共租界，但无法制止军政府官员为谋取银钱越来越不可告人的手段，法国领事报告“在公共租界里，秘密绑架大金融家的事件就发生了数起，敲诈勒索等事更屡见不鲜”。[198]

早在1911年11月14日，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就得到过九江情报：“在庐山之端方等诸大员别墅已被全部没收，即将举行拍卖，该地警察总办目下正奉命调查中。”[199]

广东省军政府的因粮规则，即有充公这一项，“把一切官有产业和反抗军政府的官吏、富豪的家产充公”，但是从这方面得到的收入十分有限，财政司充公的罚款仅2666.4元。[200]

1912年1月26日，钦其宝在上海写信盛宣怀说及，招商局开股东会时，要将盛氏所有股票悉数充公。他列举南方独立各省招兵之事，“计算兵费，每月需洋一千余万元，而所捐之饷，不及十分之一，是以到处用强梗手段，搜刮各富户财产。然各富户之财产有限，而革党之耗费无穷……”[201]

1月28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程德全发布《保护财产令》，第五条称：“现为清政府官吏，而又为清政府出力，及反对民国政府，残杀民国人民，其财产在民国势力范围者，应一律查抄，归民国政府享有。”[202]

直隶总督陈夔龙“腼颜虏廷，虐杀民党，为民国所不容”，他在浙江的家产被浙江军政府宣布没收，有大屋一所、田地一百多亩、存洋25900余元，并通知财政部管理。[203]

有人在杭州西湖的别墅被军政府强行没收，给孙中山写信求助。[204]

1月10日，《申报》报道，江西欧阳武强迫吉安县的商董认捐，七家共认71000元，才保命出险。李烈钧强迫富绅危士修认公债10万元，他不答应，就被下狱，以抗命增罚20万，他服毒死在了狱中。[205]

2月14日，朱尔典给格雷的信附有公使馆三等秘书黑德的备忘录，革命派试图接收海关、邮局受挫，“加倍努力从一切可能的方面获得借款及强制性的捐款。除了其他人的财产之外，前清朝驻伦敦公使李经方侯爵的财产被芜湖临时当局所占有，他们正在征收租金及占用那些祖传的财产，直到原物

主被说服向革命派支付大量捐款为止”。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经理控告，革命军多次上他们的船，或捕人或以危禁品为借口拿走中国旅客的私人财物。一名旅客被强行拿走了450两银，他出面才退还了这笔钱。[206]

广州独立，胡汉民发出的第二个布告就是希望社会捐款：

> 嗣后官绅商民，有愿助军用者，或输诚报效，或暂时息借，均经知照总商会代收，掣回凭证，以昭大信。

岭南学堂学生组成了协助军政府筹饷队，走上社会，他们发出的《岭南学堂学生劝捐军需启》十分动人：

> 今日有敢打敢死者出矣，无如出无完衣，行无现粮，虽有死心，终无死所。然则人出头，我出手；人流血，我流汗；人捐命，我捐钱，亦何为而不可。

他们四处演讲，沿门劝捐，许多商店、银号包括港澳的在内都为他们代收捐款，许多报纸为他们刊登筹饷通告、捐款名单。到1912年1月19日停捐，2月4日刊登《散队要告》。据报纸上刊登的捐款名单不完全统计，就有6914人或团体、商号捐款，但所捐数目很小，最大的一笔1000元，上百元的都很少，大多数是一元以下。根据军政府财政司给他们的收条，合计募集捐款40963.3元，金银和金银首饰84件（其中金器62件）。[207]

官立女子师范教员等七人亲到咨议局捐助民国军军费，有捐金指环的，有捐金耳环的，有捐现银的，慈善会一开，几天内就募捐了10多万。[208]

到1912年5月底，广东军政府收到的捐款共142万7698元，其中海外华侨捐款32万7000多元。[209]

1月13日，英国驻云南总领事额必廉写信给格雷，云南军政府发布告示，要人民向政府提供捐款，结果得到了两万元。[210]

1月26日，汉口日本领事馆情报，汉口商务总会发起向一般人民劝募，

发起人包括宋纬臣、蔡辅卿等，都是当地商务总会董事，宋说，他们募得 7 万多元，武昌募款办事处捐款约 45000 元，合计 11 万 5000 元。

“武昌革命军在事变当时曾有各种货币、块锭约 400 万元，经过四个月至今几已全部用尽。现届阴历年关，甚感开支不足，因此一再计划筹措军费。据绅商谈，武昌都督计划以当地商民刘万顺、韦紫封等约价 300 万两之私有土地为抵押，向前湖广总督设立之湖北官钱局借债 300 万两，由武昌都督担保其本息。”[211]

上海是当时经济最活跃、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募捐活动最多，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撑最为有力。张园成为向社会公众动员捐款的一个重要场所。

1911 年 11 月 29 日下午，黄尊三到张园参加国民大会，“到会的有数千人。朱熙、吴黑兰等演说，主张组织北伐军，从事北伐。临时捐款颇踊跃，夫人小姐们将随身所带金器捐助者不少”。他身上只剩数元，也乐捐一元，以表赞同。[212]

12 月 2 日，沪军都督府在张园召集财政大会，绅商学界、各银行经理不下千人参加。黄郛演说财政困难，讲到几天前与沈翔云奉命带洋三万去前线慰劳各军，众将士感激涕零，人人愿为前锋。他说，身赴前敌的是有名的英雄，接济饷项的是无名的英雄。普法战争时，许多法国人将宝爱的结婚戒指都捐了出来，军心大为振奋，大战而胜。中国人所藏金银珠饰比西方人还多。陈英士演讲时说：“民军本负铁血主义，血我自备，铁则请诸公共筹之。”大众狂呼拍手，当场索笔、索纸的、口报的、写名字的，不到半小时就认捐四万多元。[213]

第二天，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总巡勃罗斯向总办作了详细报告，与上述《民立报》的报道各有侧重，他说这次会议是讨论筹集军费的问题，出席会议的人中有许多本地商界领袖、外商银行买办、本国银行家以及外商洋行的买办。伍廷芳说，现任财政总长沈缦云已去内地劝募，之后还将去南洋募捐，当前财政问题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黄郛发言谈到了军事行动中的财政困难，清军就没有这种困难的处境。上海光复时，各衙门竟然不名一文。在制造局内只存有银三万两，这笔款子

他们不能动用，因为必须留作工人的工资。他说沈缦云已经竭尽全力，现在仍在尽力张罗。

广东人温钦甫发言说，在广州的广东同胞一天之内就募集了40万两银子，要成功地建立一个共和国，必须有铁和血，也就是士兵和武器。陈英士再次发言，赞同温君所讲铁和血的言论。募捐活动开始，认捐约四万元，当场交现款数百元。[24]

同日，樊芬在上海给东北的赵尔巽写信：

“武汉总司令黄兴来沪，筹添饷械，昨在张园开酬饷大会，来宾千余人，程都督亦到会，临时捐集三万余金，众情颇为踊跃。”[25]

这一天下午，张园又有集会，为选举“共和建设会”会长，约有600人出席。陈英士的代表黄郛在致辞时讲到了军政府的财政困难，请求出席者为军费捐献。他讲完就有几个人站出来捐钱，唐六琴、张侠琴女士各脱下金镯一副，但他没有收下，他说自己是来出席大会的，不是来征集捐款的，凡愿捐助给军政府的，可以把捐款送往沪军都督府或交给司库朱葆三。

12月5日下午二时半至四时，革命党在张园举行会议。“会上十一人演说，其中妇女二人，激励国民大力支持革命军向北京进军的打算，以便最终推翻满清。他们要求大家为革命军费捐款。一个名叫朱勇 (Tsu Yong) 的演说者，为了表示热忱，用小刀在手背上深深割了一刀，血流如注。这把小刀看来是他有意带在身边作此用途的。另一个名叫鲁汉 (LuHan) 的演说者，照他的样，割破小指。这种戏剧性的举动博得与会一千人左右的响亮掌声。……响应演说者的号召，约得捐款计一千元。”

12月7日下午，大约600人在张园集会，讨论创立“中华共和促进会”，有九个人发表了演说，有人提议为士兵募捐皮衣，让他们穿着北上。会上捐献了一小笔钱。[26]

12月30日，《民立报》刊登广告，1912年1月6日女界数百人将在张园开音乐大会，留美文学博士史凤宝女士发表演说，留美音乐博士史凤珠弹琴，其余各献歌曲，入场券每张售洋一元，全部捐为军用。会场经费由她们自己承担。[27]

1912年1月14日，《申报》报道了“张园筹饷游览大会”。

募捐助饷结成团，肩上斜披布一端。酒肆茶寮咸走遍，男儿为国敢偷安。协赞争看女界兴，唇枪舌剑愈堪称。百般柔语人披靡，不助些微也不能。

——《海上光复竹枝词》

上海曾出现许多募款团体，沈缦云发起的“南洋募饷队”，上海储蓄同志会与镇江商团公会发起的“中华国民馈送军食联合会”，胡寄梅、虞洽卿、袁恒之发起的“节费助饷会”，邵廷玉发起的“售物助饷会”，陆清远等发起的“女子募饷团”，伍廷芳夫人、沈缦云夫人等发起的“女界协赞会”，共募得一万五千元，给南京临时政府一万元，给沪军都督府五千元。

还有李征五、姚勇忱等人发起的“国民自助会”，目的是收集各方面为革命军筹募的捐款，因现银难募，劝助皮衣、皮棉衣以充军用。“沪宁北伐义勇军”也直接发传单募捐，以募集巨款、专充军需为目的，赞助人包括于右任、沈缦云、朱葆三、伍廷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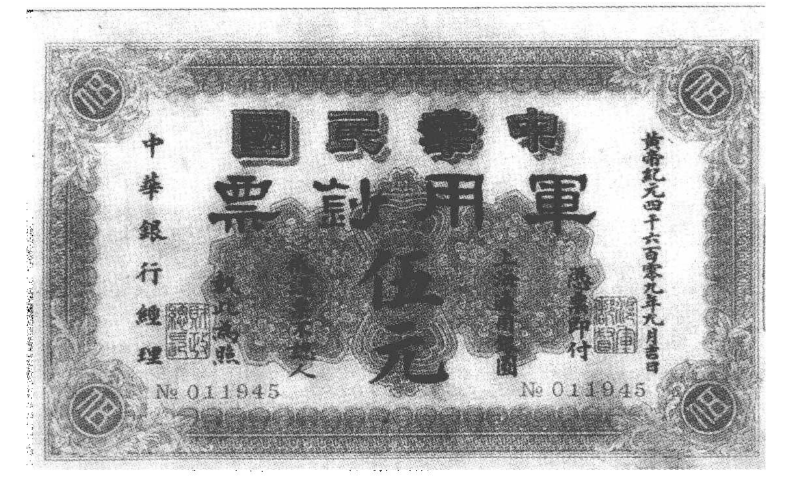
1911年12月8日，“上海军事募捐团”出发前刊登广告，各佩徽章，携带军政府盖印的收据，分头劝募。方椒伯回忆，上海工商界的顾馨一、荣宗敬、陆伯鸿、沈联芳、虞洽卿、傅筱庵等人都出钱出力。工商界发起一个协济会，以协助革命，接济军需。另外还有一个军事募捐团，召集工商界青年（大多数是商店学徒）一百多人为团员，每天分队向全市各街道里弄按户募集零星捐款，他也参加，早晨出发，至晚归队，逐日将所收捐款，解交财务部门，为期一个多月才结束，共募款五十多万元。

“当时在上海商界各帮中以宁波、广东两帮最大……各商帮均能出钱出力，踊跃输将，为数甚巨。”[218]

12月13日下午，四个军事募捐团成员在汇山码头被公共租界的探员扣押。他们身佩有字的银色徽章，在熙华德路挨店挨铺分发传单。当他们在一家鞋店时，一探员上前盘问，他们回答是为革命事业收款。他们被带进巡捕房问话，他们称不收现款，只记下愿意捐款人的姓名和认捐金额。他们另有一本册子，上面已记下认捐人的姓名。“他们用此方法即可知晓谁人已捐款，谁人没有捐。他们还持有一份官方文件，盖有叛军钤记，说这就是他们



中华银行发行的军用钞票之一



中华银行发行的军用钞票之二



中华银行发行的军用钞票之三

的凭据。一本册子里已记了八十人的姓名，各人认捐的金额不一，总计达119元。另一本册子里记了八十一人的姓名，这些人有的拒绝捐款，有的说已经捐了。……被扣之四人中，三人说是操棉布业，另一人说从事保险业，他们都居住在公共租界。”[219]

1912年1月3日，《民立报》发表短评《筹饷之苦》：

筹饷之事，极其重大，乃听青年男女出入茶楼酒馆，与夫商肆店家，逢人辄劝捐资，几于应接不暇。噫，吾为之哭。

1月6日，“军事募捐团”发表取消启事，“中华民军协济总会”作为统一募饷机关。

有人甚至要创办一个“捐辫助饷会”，“以提倡剪发变价，捐助军需为宗旨”，“收发积价至百元，即送军政府，并登录报章，以便稽查”。1911年12月4日在租界散发传单《论今日之发辫宜捐助军需》，呼吁大家慷慨捐助军饷，以助民国军需，“经济宽裕者固不待言，而贫困者将从何而捐助欤？……同人等因创一捐辫助饷会。凡诸君已剪者，乞将发辫送至本社，给以收条为据。在捐者一无所损，而军需则大受其益”。

12月5日，在繁华的上海街头，南京路、河南路、福州路上，烟纸店、棉布店、南货店、绸缎店、大华药房、平和洋行（买办）外面都出现了支持革命运动的捐款箱。租界巡捕要求他们把捐款箱搬到店屋去。他们已照办，警务报告称，这是应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朱葆三的要求，由外滩的华安保险公司经理分派给他的朋友们的，他也是平和洋行的买办。[220]

1912年1月22日，《申报》的“清谈”栏目有文章：“然而今日某团，明日某团，名目既多，手续不一，益以演剧筹饷之券，临场售物之捐，使应募者几有应接不暇自势，此大不可也。”[221]

一些报社、公益团体、旅馆乃至小学生都加入了劝饷行列，但所得十分有限。继沈缦云为上海财政总长的朱葆三在辞职呈文中说，“大宗的款，全数无着，而所入关税，又须解缴苏省。而每月用款之所，数逾百万，除上海招集军队，采办军装，以及行政经费，均须筹解外，而各省援鄂、攻徐、援

皖、攻鲁与夫北伐诸军，率皆取道沪上。有时饷械告匮，又应随时供给，责任艰难，两月之间，所入饷捐，为数有限，支出的款项，约计二百数十万元，辗转筹借的有六十多万元。”[22]

> 筹饷何如演剧良，入场券早印端详。先期持向人前卖，销数多还仗女郎。一派柔情假也真，动言君是热心人。助捐看戏原无损，费此区区究不贫。戏券谁人卖得多，让他名妓善张罗。一般相好先摊派，怎敢推辞唤奈何。
>
> ——《海上光复竹枝词》

演艺界的募捐演出十分频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报告记录：

> 11月30日　昨晚福州路一家戏院为革命军筹款举行义演。从吴淞来的一位军官向观众致词，讲到革命军迫切需要款项以支付军饷。当他讲到这点时，有人把一百元掷到舞台上。那晚戏院满座，除开支外，共得1800元，将送往吴淞充作军费。
>
> 12月7日　昨夜，福州路丹桂舞台举行义演，捐献作革命军经费。共获款1350元。观众不很多，热情很低。在湖北路上的戏院也有捐助作红十字会经费的演出。听众也不很多，获款334元。
>
> 以上两处的观众大概都被这种义演打动了心。昨夜在十六铺新舞台也有这种义演。[23]

江西代表吴铁城到上海，因九江缺煤，兵舰急需供应，向上海请求接济，陈英士答应帮忙，承当地慷慨的煤商拨了一部分煤斤，得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并请十六铺新舞台的夏月润、月珊兄弟剧团和名伶潘月樵，专门为他们九江海军演剧筹款，也筹了一笔钱买煤回浔接济。[24]

12月7日，《申报》刊登新舞台演戏助饷广告，接到吴铁城等人来信，九江为海陆军荟萃要地，需要接济，除了联合各界筹款，希望他们设法帮助筹集。“本舞台极表同情，特定本月十八（12月8日）晚开演改良新剧。入

场券每张售洋一元。是晚所演戏资，悉数汇交九江军政分府，听候拨用。”

同一天，《申报》还刊出中华民国学生军鸣谢潘月樵等演员的启事，新舞台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等助他们军费500元，并定于二十日晚登台演剧，所得归军需。“以新世界之新国民入新舞台，日新又新，共命维新，愿为新国民祝万岁。中华民国学生军全体披露。”[25]

陈雪涛回忆，当时社会人士对“中华民国学生军团”支持最大，奔走最力的就是新舞台的演员潘月樵（艺名小连生）、毛韵珂（艺名七盏灯）、夏月珊、夏月润等人。冬至前夕，他们为本军团专场义务演出拿手好戏，并当场募捐数千元。[26]

一场演出能募捐数千元，很是少见。

12月10日夜，福州路群仙 (Chuin Si) 戏院为革命党募捐经费举行义演，有名歌女六名参加演唱，招来大批观众，得捐款635元。

12月12日夜，福建路宁桂戏院为城内革命军捐募，举行义演。观众寥寥，仅得193元，除去各项开支160元，剩下33元作为军饷。

福州路丹桂戏院也为吴淞革命军举行义演。观众颇多，得841元，除500元支付各项费用外，剩下341元作军饷。

12月15日夜，汉口路大舞台为革命军募饷举行义演，观众甚多，收入1575.9元，交城内都督府。从城里来的三名军官向观众作富有激情的演讲，指出革命军财政危机在迅速激化，呼吁大家踊跃捐款。

12月16日，《民立报》刊出北伐联军总部为四舞台汇串演出助饷启事，四舞台全部演员将轮流合演各种新戏，包括何家声、小子和、七盏灯、月月红、明月亮、小连生、盖叫天、夏月珊、夏月润、三麻子等。

当晚，大富贵戏院为革命军募饷举行义演，观众颇多，得款379元。

汉口路大舞台也举行两场义演（下午晚上各一场）。两场义演都有相当观众，约收入2000元。

第二天的《新闻报》报道：“在伍廷芳夫人要求下，本地三家戏院：汉口路大舞台、湖北路大富贵、南市新舞台，将把义演收入悉交革命党。”

12月19日夜，汉口路大舞台举行义演，观众极多，票价收入共1735元，此款将捐献给革命军作为军费。

12月23日夜，福建路一戏院举行义演，观众尚多，票价收入348元，将全部捐赠革命军作为军费。

12月24日晚，福建路戏院举行义演，观众尚多，票价收入共489元，将全部捐献给革命军作为军费。

12月27日，大舞台再次义演，票价收入共617元，将全部捐献革命军作为军费。

12月29日夜，在福州路一戏院义演，票价收入共1182元，将全部捐献革命军作为军费。[22]

1912年1月14日，《申报》还刊登了"北伐铁血团演剧助饷"的广告。

看戏是当时普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中学生陆澹安常在日记中提及，他到丹桂第一台、歌舞台、群舞台等处观剧。[23]

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报告对这些义演记录如此详细，显见十分重视。当时所演剧目有不少是新编的，与时事密切相关，歌舞台1911年11月25日演出的是《广州血》，12月3日演出《川路血》，12月16日演出《得武昌》，12月26日演出《攻破南京》；丹桂第一台11月25日演出的是《汉族血》，第二天演出《嘉定三屠》，12月2日演出《扬州十日》，12月12日演出《江阴屠戮记》，12月25日，演出《秋瑾》；群舞台12月20日演出《烧饼歌》；大舞台1912年1月18日演出《鄂州血》；商办新舞台将吴禄贞、蓝天蔚、黎元洪等都搬上了舞台。[24]

宋蔼龄在上海排新戏，也是想为革命筹集经费。

刘艺舟在山东烟台等地演戏为革命筹款。1911年12月21日，东海关税务司安文写信给安格联：

> 大约两星期以前，从大连来了十三位冒险家，估计同前些天被直隶总督杀头的戏剧演员有关系。至少他们的领导人之一是在天津有些名气的演员，名叫木铎 [刘艺舟]。他们自称急进党。……他们立刻登台表演，筹款接济革命，并进行宣传。木铎的演出轰动一时。[25]

12月26日，苏州中学生叶圣陶与两个同学闲谈，说到军饷缺乏，有一个

同学说，“我校中同学可排演新剧，得资助饷；虽一粟之于沧海，然心可少慰矣”。他闻之大喜，就准备编写脚本，以时事寓劝化之意，先在苏州演数日，再到周边各乡去演出，既可以推广教育，又可以募集捐款，这是个好办法。但又想到此事的难处，同学当中口才好的人很少。[20]

在无锡，锡金军政分府总理处日记：

> 1912年3月1日
>
> 开明社会团查炜、贝澳两君到府述及拟在无锡演剧三天，以开通社会为宗旨，允其任保护之责，唯地址应由该团自行择定，招待，售券本府不必过问，助饷一事听其自愿。
>
> 3月4日
>
> 南京中华民国商学青年军队联合总会会员庞子俊、杨诵卿二君来府，拟在无锡演剧助饷，借用戏园，答以自行与该园主商量。[21]

包括上海的那些义演在内，所得捐款十分有限，却让我们看到演艺界对这场革命的热忱，渲染了革命的空气。

三、南京临时政府："急不择荫"

孙中山空手而归

1911年12月26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

> 我国革命之首倡者，实推孙中山……近复于外洋筹划军饷，迭有巨款运进。全国人心中之第一任总统属望此公矣。昨日由美抵沪，沪上人士均喜跃如狂，并无法以致其欢忱。……[22]

人们之所以“喜跃如狂”，一个重要原因是以为孙中山从国外带回了巨款。

南下的奉天咨议局局长吴景濂听说，孙中山在美国募有美金千万元，兵船十只，“如在宁组织临时政府举伊为临时大总统，可将钱及船献出，为政府用”。[234]

陈其美在上海发行的中华银行纸币，不能在租界流通，日夜祈望孙中山有即日归国之讯，“或能挟外款以俱来”。[235]

当时盛传孙中山将携带巨款回来，军队所急需的就是钱，“江浙联军诸将既新胜虚骄，而轻黄兴败将，尤有大欲以望于孙文”。[236]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报告，孙中山抵沪后，“朝夕接待大量内外客人来访，门庭若市。……据传孙氏携回许多活动经费，但其数额并不会太大，（一说五千万元)”。[237]

12月27日，在上海议和的唐绍仪电请袁世凯代奏：“又值孙文来沪，挈带巨资……且闻中国商借外款，皆为孙文说止各国，以致阻抑不成。……”[238]

12月29日，法国驻华公使代办斐格给本国外长写信说：

“北政府的国库越来越空，而孙中山却肯定将给上海当局带去一定资金。如果事情又是这样的话，这个优势将弥补共和军在军事上的劣势。”[239]

早在10月26日，蔡元培在德国写信给英国的吴稚晖，请他与孙中山联系，筹款向克虏伯厂购买射程九千米的新式大炮，每尊约五万马克，八尊需要四十万，折合美金约十万元。他以为孙中山筹这点钱“当亦不难”。[240]

几乎所有人都寄望于孙中山在海外借来了巨款，蔡元培说：“中山先生自海外归来，到上海，诸名流当然欢迎，但彼等所最希望的，是孙先生借到了一笔很大的外债，可以充军费。”[241]

当人们翘首期盼的孙中山在上海登岸，无论记者还是革命党人最关心的是他带来了多少钱。记者迫不及待地问：“外传孙先生由外国带了一大笔款回来，是吗?”他的标准回答是：“我没有带来大笔款，可是带来了比钱还重要的东西，我只带来了一种革命精神!”[242]

人们的失望可想而知，转而寄望于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能借到巨款。12月21日，孙中山即对胡汉民、廖仲恺说过：“然一俟临时共和政府成

立，则财政无忧不继，因有外债可借，不用抵押，但出四厘半之息，已借不胜借。”[263]

上海财政总长朱葆三与孙中山商量财政问题，他就说，“革命最重要者为精神，有精神则不怕革命不成；革命告成，财政的问题即可解决”。[264]

12月27日下午，孙中山的代表陈宽沅在张园集会时发表讲话：“一俟临时政府成立，孙博士即能从外国传教士那里获得大笔借款。”[265]

1912年1月5日，莫理循给《泰晤士报》的布拉姆写信：

> 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266]

张謇预计新政府每年的支出至少须有12000万两，缺口大约在8000万两之款：

> 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着，……能否于新政府成立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267]

孙中山在海外一直努力借款，借款始终不成。1910年2月14日，孙中山致信容闳，希望从美国银行借贷150万至200万美元，作为活动经费。[268]

1911年10月14日，《纽约时报》刊登《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大曝光》称，银行家们并未被说服。11月中旬，孙中山在伦敦《滨海杂志》（The Strand Magzine ）发表《告世界书》：“中国革命运动目前的状况，恰似一座干燥树木的丛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腾起熊熊烈焰。这火星便是我所希望得到的50万英镑。”[269]

11月21日，孙中山离开伦敦，转赴巴黎，法国内阁总理克里蒙索接见了他，并表示极大同情。11月23日，他与法国东方汇礼银行总裁西蒙面谈借款的事。西蒙表示，四国银行团的态度一样，只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全国都承

认和接受的正规政府，他们才能在财政上帮助革命党。[50]

12月20日，马君武在《民立报》发表社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说："在美国与摩尔根商借千万，不须抵押，已将签押矣。摩驰电驻汉口美领事，诘□□□问孙君与武汉事有关系否。□答以无关系，于是摩尔根之约不成。"[51]

意指孙中山在美国借款不成，是为黎元洪一语破坏。10月31日，孙中山还在纽约，电告已到伦敦的美国人荷马李："黎元 [洪] 的宣言是难以解释的，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久持。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们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贷款是必需的。"[52]

孙中山向外国借款向无成功，只在华侨当中募到一点捐款，他回国之前，那些捐款大概用于购买武器、飞机，订购军舰，所以他手中没有钱。

山田纯三郎回忆："12月25日，在香港至上海船中，孙文对我说：'你在三井那样的有钱处工作，帮助搞点钱吧！'我问：'究竟需要多少？'，'越多越好'，'一千万、二千万都可以。'听了这话我目瞪口呆。自己是个小职员，当然搞不来那么多钱。孙文看我面有难色，就鼓励说：'你还没有去干，怎么知道干不成呢？'"

到了上海，山田向三井银行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说明情况，藤濑提出与孙中山面谈，藤濑代表三井提出，"如果汉冶萍能够华日合办，三井方面可以拿出五百万来。"[53]

12月5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致信驻华公使馆代办：

> 我从我的英国同行那里得知，共和政府曾从中国南方收到相当多的资金。这笔资金将用于解决最初的财政困难。但是，金钱问题仍然是革命运动的明显障碍。不过应当注意到的是起义的省份一般地比北方各省富裕，从这些省取得较多的收益是可能的。这些收益大致能与满清王公在北京积累起来的财富相抗衡，它当然将用作战争金库。[54]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赵秉钧所说更符合实情，12月7日，日本《朝日新

闻》驻北京记者神田正夫给莫理循来信，前一天赵对他的一个朋友说：

但是革命党的财政匮乏和北京政府一样灾难深重。一旦共和政府建立起来，人民的捐税负担会比现在更重。甚至就这一点而言，共和政府也不可能统治中国。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筹措外债使国家免于破产。国家的安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借款的成功。[59]

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黄兴就在上海积极借款。

12月7日，法国武官高拉尔德向陆军部长汇报：

每一个党派都在与最尖锐的财政困难搏斗……在革命者方面，他们不能够征收已经被自己取消了的捐税，只得求助于他们的拥护者们半自愿提供的捐助。

……每一个党派的首要的和最根本的问题都是财政问题。……革命党人已快耗尽从美国和马来亚列岛的中国富有侨民那里筹集来的捐款，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征收取消了的赋税，而且，对资金的需要会导致他们对存在外国银行中的海关收入做出令人遗憾的举动。[60]

12月5日，黄兴派何天迥赴日筹款。12月17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转高洲领事致电内田：

黄兴将于新政府成立之际就任临时大总统。为此，曾向三井公司要求提供借款三十万圆，言明在一个月内归还。已有张謇及其他实力人物出面担保。希山本劝说，不取抵押，予以受理。

12月21日，驻南京领事铃木给内田电：

据三井公司职员谈称：该公司已同意向黄兴提供贷款三十万两

[圓]，以为组织临时政府之经费，限期一个月内还清……昨日，张謇在本地表示愿出面担保，日内将在上海签订合同。

12月19日，有吉从上海写信给内田：

在这些革命党人中，黄兴本是曾经崭露头角、较有声望的人，但尚未居于统率全党的地位……最近黄兴一派热中于筹措资金，试图以一切可能的手段获得外国借款。有人说，黄等因在汉阳遭到失败，在其他方面又无显着功绩，因而想通过筹得资金的途径以提高其声望。看来这种说法还是合乎实情的。还有人说，最近黄兴等人已经认识到徒赖军人、缙绅等的援助并不可靠，因而迫切希望募得兵勇，自行统率。其所以多方筹措资金，看来也包含着为此做准备的意思。[246]

张謇曾对黄兴说："临时政府一旦不成立，无以坚国内外之信仰，则民军根基不固，革命事业终未由进行。今联军攻下南京，众意属公，于义不容辞。若需财用，余当惟力是助。设公能自募得债款，余誓以个人财产信用为之担保。"黄兴令人以张謇担保四处募集债款。日本三井银行听说有张謇担保，派人表示愿以上海通用纹银三十万，无条件无利息贷给中国南京临时政府的代表人黄兴，期限一个月。[247]

这笔数目不大的借款靠了张謇的担保才成功。张謇签字的担保书说："兹因黄君克强为中华民国组织临时政府之费用，向贵行借用上海通行银元三十万元。约定自交款之日起一个月归还，并无抵押物。如还期不如约，惟保证人是问。……"[248]

1911年1月26日，还款日期到了，张謇日记说："三井索借款，须保险之证，此事颇难。"[249]经商量，这笔钱又续借半年。

莫理循评价张謇，"他是个巨富，真正的工业先驱。正当盛年，大有前途"。[250]

1911年11月20日，黎元洪通电各省都督，推张謇长财政，各省都复电

赞同。黄兴也想请张謇出任财政总长，但张謇拒绝了，只是起草了一份《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预算按月需一千万两，每年的缺口八千万两。他对赵竹君说，自己不愿担理财之名，则牺牲一身而无益大局。生财一面，或可勉强一时，答应出任实业总长就是因此。

另一个人选，就是以理财闻名的熊希龄。早在11月11日，熊写信给赵竹君，认为南北双方的存亡都系于财政。清朝方面，因度支部存款已经不多，他料想无须多久，必然陷入困境。而南方革命军也有缺点，兵非久练，“加以财政支绌，市面吃紧，再无转机，彼此均困”。他说，“长江既通，何以不鼓励贸易，经营税饷，此非筹统一财财政之法，不足以支持也”。[262]

熊希龄是赵竹君推荐给黄兴的，孙、黄看重他的意见，请他起草施政纲领，他也认真拟订了一份财政计划。李书城说，黄兴推荐熊为财政次长，“以各省代表反对而止”。[263]真正的原因还是孙中山反对，他对胡汉民说：“财政不能授他派人，我知澜生（陈锦涛）不敢有异同，且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264]

在莫理循看来，陈锦涛“是现代中国人中最有财政知识的人。据我所知，他在柏林会议上结识的外国银行专家，如大卫·巴倍尔爵士，德国人顿伯格和美国人詹克斯等对他的印象都极好”。[265]

孙中山不愿让张謇、熊希龄出任财长，就如他不愿让伍廷芳做外长，而坚持要王宠惠来做。陈锦涛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他们在美国即熟悉，孙中山常与他和王宠惠等一起讨论外交、财政问题，所以认为他“不敢有异同”，驾驭得了。当然，他也不是都听孙的。1912年2月29日孙下达总统令，认定上海的中华银行为商业性质，国家补助一半。“其办法如日本银行之对于正金银行。如目前无现金，给以公债票一百二十五万作抵。”3月3日，他却呈文不同意，“今中华银行创设未久，规模未备，设立之时，不过为一隅发行军用钞票之机关，非以外国兑换为目的，则与正金银行办法迥不相同。况目前部款，既绝无来源，各省又纷纷请助，安有余力以办外国汇兑之经营”。[266]

宫崎滔天回忆，1911年12月31日孙中山去南京前一天，问他“能否借给我五百万元?”[267]次日，当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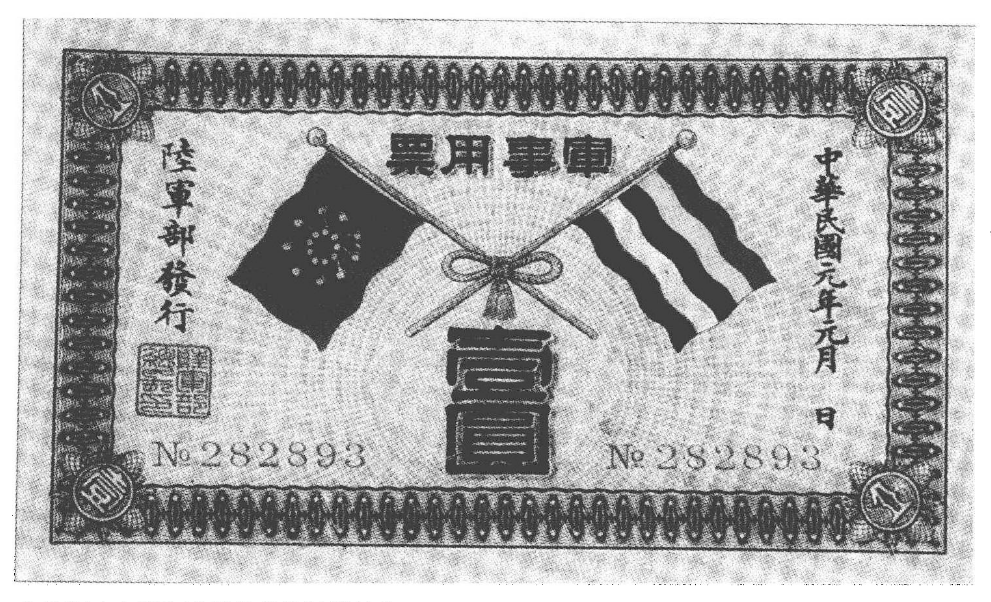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军用钞票之一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南京军用钞票之二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发行的军用票之三

陈英士拨交的开办经费银元一千元，只有胡汉民从旅沪的广东同乡会馆紧急借来的一笔钱，《南京财政部收支报告》说，这笔来自广帮的借款，共银元1244元、规平42万1500两。[268]

这笔借款说好月息七厘，四个月内如数归还。1912年5月23日，南京临时政府已结束，孙中山告诉上海广肇公所、潮州会馆已知照财政部，届期归还借款。他们电询熊希龄，没有答复，急得给孙中山发电。因为孙的亲自过问，6月5日熊才复电，“广、肇、潮商款，久应归还，因借款未定，以至延期，甚为抱歉”。直到1914年，仍有三十多万两没有还清。[269]

1912年1月，陈英士要朱葆三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向商人刘锦藻借款，刘以两处房产押借了二十万元，说好六个月归还，直到年底都没有归还。[270]

当时，蓝公武写信给梁启超：“孙中山并未携得款来。南方财政窘迫异常，虽设有种种劝捐勒捐之法，均无效力，如苏省以收田赋招民反对，已成不得了之势，南方之败，可立而待。”[271]

这不是危言耸听，1月30日，孙中山给参议院的咨文也说，“如今中央财政，匮乏已极，各项租税亟难整理”。

陈锦涛对胡汉民说：“余为部长，不如前清之司员华贵多矣。”[272]

陈锦涛多数时间都在上海，在汉口路设立了财政部办事所，专门负责借款。1月31日，他致电孙中山和财政次长王鸿猷，要他们节约用款：

> 苏路款内，已由中华银行解现值日金三十万元。今再由中华银行解捐款十万元。计二十天，共解六十余万元。现存沪款无多，请撙节。[273]

张謇《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说，两淮盐税收入有一千万两。事实上，这也是外债的担保品，1898年清廷有一笔一千六百万英镑的英德借款，就以盐税为担保，并交海关管理。1月20日，金陵关税务司卢力飞给孙中山送来备忘录：“中国的对外信用目前尚未遭受影响，但是除非还本付息事宜按原规定迅予恢复、过去短拨款项由合同指定各方早日补足，否则对外信用势难长此维持下去。上述各盐局现已归军政府管辖，在目前情况下，动用当

地税款的有关当局，可能不容易看到这个问题对于全中国人民的重要性。如果税款不再拨付，可能危害革命事业，甚至引起列强某种形式的干涉。”

很明显这是在威胁。

2月1日，张謇以盐政总理身份回复外交部，主张由外交部会同财政部通电光复各省，“查明各该省所收盐税已经指抵洋债者共有若干，并饬千万不可擅行挪用，以免引起外交困难问题”。[274]

两天后，两部即通电各省。2月4日，锡金军政分府接到江苏都督府令，“嗣后盐务统归盐政总长主持一切”。[275]

当时，各地军队强取盐款的现象十分严重，2月10日，张謇给陆军总长黄兴的咨文列举黎天才、张承樾、柏文蔚等将领或取盐，或直接取盐款，仅在下关盐店取走的就值三万四千五百元。[276]

张謇《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说，独立各省代表都在南京，将每年大致预算数目及短缺八千万两告诉他们，问他们自明年起，每省能担任多少万两，务必确实回答。其实他也清楚，“即以江苏一省而论，除盐务所入可归中央外，断不能另有供给中央之余力，江苏如此，他省可知。通计各省财力稍强者，除江苏外，惟浙江、广东二省，其他各省不求救济，已属万幸”。他给赵竹君的信里说：“假使政府即日成立，其所设财政部长者，亦不过管理江苏一省之财政而已。”[277]

他没有想到即便江苏一省也控制不了。财政部要将江南造币厂收归中央政府，江苏就不同意，要财政部每月给补助费三十万两，声称欧美共和国制度，总统无变更地方财产之处分，宜归中央的是事权，不是财产。财政部称，“造币事业，全应归诸国有，不独事权，即地方分权如美国，也不闻造币厂的财产，为地方所有”。[278]

2月7日，日本人佐原笃介自上海给莫理循来信，“南京的共和政府根本不稳。它没有固定财政来源，也不能控制其治下各省的财政。事实上各省自行其是，也不希望有什么中央政府，特别是关于财政，然而财政总长陈锦涛却在设法取得控制权”。[279]

3月20日，《临时政府公报》刊登的财政部《各部院三月份概算书》，“至本部收入的款，向以全国赋税为大宗。自光复以来，各州县经征款项，应

划归中央政府者，虽早经本部通电催解，而各省迄未照解前来，一直收入亦无从概算”。[280]

陈锦涛的辞职报告总结说，“各省支绌，纵或实情”，“地方中央，界限混淆，虽有从前应解部款，现亦藉词推诿”。[281]

湖南谭延闿的幕僚唐乾一说，1912年春，湖南现金颇缺乏，却将定铅砂的银款一百万两全解中央，回扣按九五算约可得八万余两，参与其事的人分文未收。[282]

不过，当年7月20日公布的《南京财政部收支报告》（截止4月30日），共收入银元866万65元5角7分，规平银896万475两7钱1分1厘，其中没有来自各省的上交，大笔的来源都是借款，还有发行军用钞票，收到的捐款只有银19万4517元7角4分，规平16353两9钱5分4厘，南京收的杂税仅有可怜的银元2941元。[283]

地方政府中，只有无锡上交过银洋2500元，以备北伐之用。但是，1月15日，当陆军部长黄兴给锡金军政分府来电，“欲向无锡筹措军米”。17日，他们明确回电，“声明购办军米须汇现款”。[284]

财政部给各省发电，“中央担负太重，财政竭蹶自不待言，贵省如能设法，希望不分内外，于岁入项下，速即通筹拨解，以应急需，能解若干，迄先电复”。

四川复电：“各厅、州、县内应丁粮等项，无从催收。”大致上代表了各省的状况。[285]

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后来在自传中说，“各省方忧自给不足，遑论供给政府”。[286]

孙中山写信给章太炎：“而环视各省，又无一钱供给。”[287]

相反，南京临时政府给各省的拨款，有账可查的即包括，沪军都督银元115万元、规平93万两，湖北都督规平111万1695两7钱9分，山东都督银元20万两，银6万两，关外都督银元5万元，规平10万两。[288]

山西南桂馨回忆，他到南京见孙中山，南北和议已成，向比国借款也签了字，他要求财政支持，孙中山拨付山西善后费100万元，由他和乔义生等五个山西代表代领，存入中国银行并声明非有山西都督电并派专员来领，不能支付。[289]

不过，在财政部收支报告上只有山西代表乔义生拨借规平银3755两的记录，并注明“孙总统令拨借未还”。[280]

胡汉民自述，安徽都督孙毓筠有一天派专使到南京，需饷奇急，向临时政府求助。孙中山即批给20万。他奉令到财政部，金库里仅存十洋。陈总长在上海，次长彷徨无策。他从粤北军款中提取6万多，再从其他地方凑齐了10万元给安徽。而安徽专使看到孙中山批的是20万，一下子减了半数，还以为是他克扣。[281]

4月17日，南京临时政府已结束，陕西都督张凤翙因“饷项奇窘，危急万分”，来电求助，因袁世凯方面回复等外债借到，才能酌济，所以他请南京无论如何为难，设法接济。

马相伯曾向孙中山建议：“地必有契，换契必有税，建议将全国公私土地普换共和新契，田一亩征一角，地 [房圃基地] 一亩征换契税四角，至少可得契税五万万元，足供军饷而有余，还不包括一切契纸费。”[282]

在各省各自为政的情况下，他的主张虽好，实行起来恐怕难度很大，所以未见实施。

军费支出

美国记者麦考密克听南京临时政府的官员说，每天要花费100万元。这只是南京一带与津浦路北伐军的费用，其他还不算。

南京临时政府三个月的总支出大约二千多万元，主要是军费支出。

外国人洞察南方财政困难更甚于北方。1月2日，天津《大公报》刊登《南军财政困难》：

> 兹闻外交团对于我国南北最近之情形，其意见大致谓：北军财政虽属困难，尚可以支持，
>
> 若南军则殊堪危惧。盖以南军一意进取，并未筹及统一机关，以济饷源，若再延数月，势必不给，大局实为危险。各国以局面未定，不能借款，则其他捐募筹款，又岂足恃。[283]

胡汉民自传说：“军饷更为重要问题。”[294]

1月29日，朱尔典给格雷写信：“伍廷芳对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承认，到1月底以后，革命派无钱支付军饷。”[295]

当时，海军经费共支出银元47万2903元7角6分8厘，规平13万3455两4钱4分，在整个庞大的军费开支中只是个小数目，陆军的支出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黄兴曾为军费无着而吐血，有和议“惟有割腹以谢天下”之语。1月6日，他即写信给张謇，“目下财政部初立，陈［锦涛］公虽去上海，恐外款非即日可能到手也。……派人去天津之说，亦是要事，刻惟苦无款耳”。[296]

1月27日，英国武官韦乐沛中校的报告称，“据说革命党资金短绌，似乎很快就要开不出军饷了”。[297]

2月5日，孙中山给锡金军政分府的批文说：“现在中央财政极感困难，而整军北伐，在在需款，殊深焦虑。”2月11日，他回复谭人凤也说，“目下筹集军费，最为第一要着”。正是在财政极感困难、借款无成的情况下，南北双方才达成了和议。

李书城回忆，南京十多万人的军队，因军费困难，不得已将伙食改为稀饭，等稀饭都维持不了，将南京城的小火车向日商抵借二十万元，暂时维持。

“每个士兵的背上都负着一捆稻草当作雨衣，状似一群难民。”[298]

军咨府的冯耿光以北方和议分代表之一南下，他见到的南方民军士兵，隆冬天气，“大部分都穿着单衣，有的穿着毛织面、红里子的‘一口钟’，看得出是临时在市上买来的，也不过三元钱一件，单薄得很，所以士兵们瑟缩伛身，显不出一点威武”。[299]

3月17日，陈锦涛为四国银行团的借款告罄、无法支应军费写信给黄兴：

> 本部款项奇绌，……未收到四国银行二百万之前，曾许公三百万，今三百万尚未尽付，而二百万已竭。此中底蕴，非细查本部账目与面罄一切，未易晓然也。是以欲解释此点，请钧部派一熟悉账目之人来亲睹一切可也。……各事可以缓图，今日之款，应全用诸军事与维持秩序。

3月24日，陆军部给财政部来文，月底将至，各军队、学校、局、处都来催要经费，“本部实无再为展缓之计。应请贵部查照前数拨交，免误军需，是为至要”。

因为军饷匮乏，4月11日，赣军在南京哗变，身为南京留守的黄兴4月30日给已辞职的孙中山等发电：“惟饷项各款，亏欠至千万元之谱，坐困无策，焦灼万状。”

陈锦涛虽说：“惟各部院成立伊始，用度实繁，纷纷来部请领者，几有日不暇给之势。”[300]

其实，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支出中，行政费用和其他费用所占比例很小，交通部只用了银元12096元，实业部17338.9元，司法部24974.265元，外交部12090元，法制院8879.3元，花钱较多的内务部也不过53000元，花钱最少的教育部仅7160元。工作人员的薪水都很低，总统府从秘书长到到录事，一律每月30元，食宿由政府供应，不分官级，一律平等。其他行政支出如此节省，军费支出仍不堪重负。

仅仅几个月，陆军部就支出银元872万6783元，规平50万8950两，南方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撑新生的南京临时政府。

3月28日，《民立报》社论《南京陆军部支出概算之感言》：“据财政部三月份支出之概算，总数975万中，而陆军部支出者，至893万，此至可骇异者也。”[301]

留日学生黄尊三的日记说，南京政府一钱不名，军队不能养活。“中山先生以贫民式之总统，应付颇属困难……闻之甚为国家前途抱无穷之忧也。”[302]

从发行内债到发行军用票，南京临时政府想尽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

1月8日，经参议院议决，发行中华民国八厘公债，以一万万元为定额。1月11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写信给朱尔典：

> 由于大家认为举借外债是办不到的，所以总长们作出的决定是发行一亿元的内债，利息八厘。据宣布，这笔公债的收入除满足政府的急迫需要外，将用来建立一种金本位的新货币。他们发表这项

通告的目的，无疑是要使那些可能认购公债的人具有信心，因为如果这些人认为这笔款项将花费在战备方面，那么，对购买公债将采取极审慎的态度。我认为，发表这项通告的目的，还在于使外国人对新政府进行全面改革的决心具有深刻的印象。[303]

孙中山在兴中会时代的同志谢缵泰的弟弟谢缵业写信给财政总长，就推销公债提出一些建议：

1、我建议派一个有影响的犹太血统的欧洲人，到美国和欧洲，在这些国家的富有的犹太侨民中推销公债。

2、此人应确保他能够签名同意照价收购五百万美元债券。

3、财政部长应提供给此人一份签名具印的委任状，随一份签名具印的发起书，这就使其能作为特派的推销员前往。

4、财政部应公布买债券可以存储的银行的名字，以使此人推销债券时并不经理现金。

5、如果此人不能在财政部规定的时间内售出一定数量的债券，摊派给他照价收购的数目就不能无限期地拖延。

6、回扣二十万美元3%，五十万美元3.5%，一百万美元4%，五百万美元5%，依次类推。

陈锦涛的回信反应并不热情，只是说：

推销员或担保收购者至少必须担保卖出一定数量的债券，并保证这项重要工作的安全。

我认为，担保应抵押相当的保证物，如地契之类，或银行存款、良好的商业用房等。[304]

海外募款，曾派汤寿潜为南洋劝募公债总理，以林文庆辅助，前后还派过多人分别到澳洲、日本、南洋等地，几乎都没有什么收效。

国内收效也微，“且其时民国基础未固，人民应募，不免有所观望”。[305]

胡汉民感叹：“千万之公债，虽通过参议院，而未尝得一钱以应急。”[306]

除了各省领去的公债——陕西都督30万元、安徽都督50万元、贵州都督10万元、广西都督100万元，实际卖出的公债仅仅银元16万6655元5角7分，规平27073两8钱1分。[307]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当时南京发行的军用票共三种，一为中华民国军用钞票，有一元、五元面值，由财政部担保，凭票即付；一为中华民国南京军用钞票，有一元、五元面值，财政部担保，三个月后兑换；一为陆军部发行的军事用票，有一元、五元面值，上面有交叉的十八星和五色旗。

无论财政部、陆军部还是各省发行的军用票都缺乏信用。财政部发行的南京军用钞票条例称，三个月后，准持票到南京中国银行支付通用银元。然而，不过两天，2月1日，南京商人就呈文，“惟连日以来，宁垣军人多以军用钞票，纷向各商店兑找现圆，或交换货物，致起支吾，日有数处。昨今两日，钱业、米店相率停市”。

当天，财政部发出告示，为活动金融、体恤商艰，由江宁商务总会设立临时兑换所，“凡各商号收存此项军用钞票，必须兑换现洋以资周转者，准携带店号图章，前往该兑换所照数兑换。此外，军民人等只许持票到各商店买物，不得径向兑换所要求兑换现洋”。

江宁商务总会的呈文说，纸币的信用已被前清的大清、交通、裕宁等官银钱号摧残殆尽，“现在该各号发行之纸币无处兑现者，就南京论，当不下数十万元，民间之视纸币，固已畏如蛇蝎矣”。[308]虽然新政府信誓旦旦称决无此弊，但人民还是深有顾虑。

2月1日起发行的陆军部军事用票，原定六个月后兑换，十天后（2月11日）就设立了“军币兑换所”，允许兑换现洋，“每人以两元为限”，结果第一天兑换所就被挤倒，派兵弹压都压不住，只好放开兑换，为此每天要准备10万现大洋。[309]

江宁商务总会转达商人们的不满：“盖此次纸币，由军人用于商等，固不敢不为收受，由商等转用于他处，则他处必以不能兑换及限制南京字样相推诿。而商等又无特别武力，足以强其收受，是明虽行用纸币，其实不啻吸

收商等之现银与货物，而供公家之用者也。”[310]

2月18日，陆军部咨请交通部要求沪宁铁路各站收取军用票，咨请财政部要求南京、上海各中国银行，无论上海、南京的军用钞票一律兑换。财政部于2月23日在上海中国银行内设立军用钞票兑现处。2月26日安徽都督柏文蔚急电孙中山，因为庐州商人拒收军用钞票，请财政部去设立兑换处，使能流通。

军用钞票最初只打算发行100万元，实际发行499万元。

孙中山给章太炎信里说：“每日到陆军部取饷数十起，军事用票，非不可行，而现金太少，无以转换，虽强迫市人，亦复无益。”[311]

到3月22日南京临时政府已在办理善后，陈锦涛还在上海致电孙中山及陆军部、财政部说，南京军用票每天兑现十多万，今日由中国银行借二十万，专备此用，“现已计穷力尽”。[312]

借外债：“急不择荫”

除了借外债，别无他路，而巨额的外债又迟迟借不到。1月26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等，“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数，操于借款”。[313]

远在美国的容闳最担心新政府的财政问题，特地找了解美国政府税收情况的律师阿瑟·西普曼帮忙，计算一下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需要多少经费。西普曼的计算结果是一年需要1.6亿美元。

容闳把西普曼的见解寄给老朋友孙中山参考。同时，他给孙中山写信说：

> 至于资金——美国是最宜寻求外国贷款之地。有关建立一个贷款方式之事，我以为大多数纽约银行家及保险公司的意向是发行或部分发行中华民国公债，宁可违反关税，也要尽可能以一个相对低的利率。[314]

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各国都不愿借款给南京临时政府。

1月14日，查·马圭尔从南京给莫理循来信：

美孚石油公司过去一贯并现在还在向革命党提供资金。目的是保障他们获得在陕西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现的油井的租让权。该公司的布雷克两天前从上海到这里会见孙中山总统。他们的长时间的会见刚刚结束，就宣布革命党得到达四千万两银子的资金。[315]

这个消息未见变成事实，整个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都没有借到巨款。1月18日，叱咤上海的富商哈同抱歉地给孙中山写信："关于以南京的不动产抵押贷款的事，我发现这里的银行家目前不愿意考虑这种打算。我会把这事放在心上，等有适当的机会出现。"[316]

京津同盟会曾给孙中山、黄兴来电：

有某国人，愿个人名义借我巨款，息利照普通例扣算。附加条件：关于军用品，须许以同价卖物先约权。

2月23日，与孙中山有旧交的广东富商刘学询写信给他："现有西商可以认借一千万两之数，年期可以宽舒，息金亦能公道，且在沪可以交款。如钧处有意筹借，请示意，以便与之接洽。"[317]

这些也都是说说而已。日本朋友宫崎滔天对孙中山的评论不无道理："以为只要身居大总统，就自会有数亿万元的钱款自动飞来。……他只是一位单纯的革命家，疏于财政手腕。"[318]

黄兴身边的李书城回忆：

某晚，黄先生约我同见孙先生，询问向英、美借款事有无头绪。孙先生当时正在看外国报纸。他放下报纸，回答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党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我就职以后，曾向他们要求借款，并已电催过几次，昨日还曾发电催问，请他们实践诺言。……"黄先生出来后，默默无言，心中似乎很着急的样子。……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一直到总统府取消时，外国借款还是杳无回音。[319]

1月26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并转省会暨铁路公司：

前文在外洋，本与数处有成议，乃各省代表必要临时政府，此“临时”字样，断难使各国立即承认，数处虽有成议，亦因之而阻迟，故现时借款必当以私人名义，尚不能用国家名义。[320]

1月30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给朱尔典写信：

现在内阁每周集会两次，仍忙于财政问题，而未顾及几乎所有其他的事情。毫无疑问，政府十分缺乏现款，因为它以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财产作抵押募集款项的计划已经显示出这个情况。它在国外借款所作的努力显然是不成功的，所联系的那些外国金融家们提出的条件是民国必须首先获得列强的承认。它已经欠付军队的大批饷银，除非它能够迅速得到现款或实现和平，军队的士气，肯定将受到很坏的影响。[321]

三个月间，来自外国银行的借款共849万5414两1钱5分，包括从三井洋行借到144万2500两（汉冶萍股票担保）；华比银行455万2914两1钱5分；四国银行团善后借款第一次垫款200万两；捷成洋行50万两。这些外债几乎都是在南北议和达成之后到位的，也就是说，在2月12日清帝退位前的四十多天里，南京临时政府处于极度的财政窘迫之中，这是不得不选择议和的主要原因。曾有人提议以沪杭铁路为抵押，向美国借款700万元，但因汤寿潜的反对，未能成议。[322]

当时，南北两方财政都极为困难。各国既未承认南方政府，除日、俄两国因想乘机渔利，曾向南方接洽借款外，其他国家并未跟南方政府有任何借款接洽。[323]

在南京临时政府迫切寻求借款时，心怀叵测的日本表示愿意借款，以江苏铁路收入和股票为抵押，从大仓洋行借到一笔300万日元，与江苏军政府、沪军都督府分享。三井银行愿意借1000万日元，但要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

另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愿意借款500万。这两笔借款的条件都很苛刻，牺牲利益甚大，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孙中山焦头烂额，最后只得作罢。他向章太炎、黎元洪解释是“急不择荫”，向章太炎解释，“犹如寒天解衣付质”，向张謇解释，也是“譬如寒天解衣裘付质库，急不能择也”。陈锦涛的辞职呈文说，“至于借债一事，明知其危，但砒能杀人，亦可起病”。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第二天就责令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向日本借款，遭到拒绝。1月20日，南京直辖各军将领姚雨平等17人以“中华民国军界全体”名义，给轮船招商局写联名信，言辞充满恫吓，“请即日将该局抵押一千万两，暂借于中央政府，以充军用，由政府分年偿还，其利息亦由政府任之。望见信后四十八句钟内赐覆！”姚雨平他们的背后是黄兴、陈英士。

1月26日，钦其宝在上海写信盛宣怀，招商局将开股东会，到场的都是革党，其宗旨是要在招商局借银一千万两。[124]

2月1日，股东会在张园举行，实际到会4396股，只占全部四万股的十分之一。会上提出向日本借款一千万日元，年息七厘半，交款五年后，分十五年偿还。[125]

会上宣读了将领们的联名信。陈英士发言说：“民军已光复十余省，民国政府业已成立，惟专制政府尚未推翻，所恃者军人之热血耳，但有热血须有器械，器械非以代价交换不可，有热血更须有军饷，尤非筹大宗款项不可。筹款之法，至今日已势穷力竭，一言以蔽之曰借款而已，然借款必有信物，万不得已始有借招商局虚抵之说，众公深明大义，当能赞成。惟余可于诸公前发一誓，诸公如尽力助民国政府，他日政府必不负招商局之股东。”

当天，陈英士电告孙中山、黄兴，“代表各股东全体承认，无一反对”，称许他们热心爱国，深明大义，顾全大局。[126]

然而，未到会的股东并不承认，“各股东又函电交驰，对于此举，多所疑虑，以致此事久悬未决”。2月10日，招商局董事会就南京临时政府借款的事召开特别会议，陈英士、汪精卫作为政府特派员到会。温钦甫代表招商局董事长伍廷芳出席发言：“此次民国政府，借招商局产抵押外债，有不可不赞成之理由。凡属国民，皆当表同情于政府。外间股东有异议及反对者，皆因未明借抵之方法。”

南京政府开出三项条件：此项借款，本利都由政府偿还，不使招商局受丝毫损害；招商局如承认此次借款，民国当承认招商局为民国国家邮船公司；扩张其外洋航路，予以相当之补助津贴。[527]

董事会通过汪精卫起草的以各董事名义致各股东的广告稿。次日，汪致电孙中山、黄兴，还比较乐观："招商借款可济急，并可在四国借款公司设法。"

直到2月13日，清廷退位诏书下达后，北京邮传部给招商局电报，要求认真保管财产、款项、册籍。借款毫无指望。次日，陈英士致电孙、黄，对此深为恼怒。[528]

如果说，轮船招商局抵押借款未成主要是股东不同意，加上英国汇丰银行的反对。那么，以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为条件对日借款的流产，则是来自各方政治力量的反对。

汉冶萍公司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日本觊觎已久，当时签定的草约第一条就是要将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组为华日合办有限公司，新股本三千万元，日本入股一千五百万日币，其中五百万借给南京临时政府。盛宣怀在这家企业占有半数股份，此事本来就是躲在日本的他主动，表示愿为民国筹款，目的想借中日合办来保全他的产业。在1月17日前，孙中山对于中日合办不大同意。但到了1月26日，孙、黄比盛宣怀还急，黄兴致电盛，责备他心存观望，叫他与三井洋行即日将借款办妥，"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

谈判过程中，日本三井洋行陆续交来共200万日元（折合1422500两）。2月9日，陈锦涛致电孙中山称，三井今日下午交期票50万两。实际上只是盛宣怀借三井之手提供的借款，2月10日，他给李维格的信中说："阁下面告，款交三井公司，取三井收据，而三井转交中华政府，取中华政府收据，自属极妥办法。倘无三井间接，面子、骨子均不妥。"[529]

此事引发巨大的风波，2月7日，章太炎听说此事，即问实业总长张謇，张直言："有之，吾亦不得不辞职矣。"赵凤昌、熊希龄等都表示反对。[530]

2月11日，连汪精卫都致电孙、黄："汉冶萍日人附股，关系民国前途，祈作罢。"2月13日，章太炎写信给孙中山，指责孙、黄"为私卖国产之人"。

2月13、14、17日，黎元洪连电反对，“汉冶萍矿与海陆军前途关系至重，利权之损失，犹其次也。”临时参议院质问违法借款案，2月18日接到孙中山回复，已取消合股，“仍用私人押借之法，借到二百万元转借于政府”。22日，参议院再度发出咨文质问：“汉冶萍是否皆可用私人押借？所谓私人，究系何人？政府既取消五百万元合股之议，又转借二百万元，系用何种手续？其条件究系如何？”[331]

最有力的反对者是张謇，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尤其坚决反对，并辞去实业总长。他说：“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而我则煤铁之富，甲于五洲，鄙人尝持一说，谓我国铁业发达之日，即日本人降伏于我国旗之下之日……民国建设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至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贻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喧笑？……至中日合办之说，则万不可行，未可因其以借款之故，稍予通融。”[332]

汉冶萍借款无果而终。

早在1911年12月13日，黄兴派往日本筹款的代表何天迥抵日，与日本财界多有接触。当时日本的阪谷芳郎提出建立中央银行来解决财政危机，可委托日本人筹办，资本一亿日元。

1912年1月10日，孙中山同意日本帮助中国建立中央银行，要求日本短期内提供一千万或二千万日元的借款。有关情况在阪谷芳郎、涩泽荣一的日记里有多次记录。直到2月8日孙中山来电取消这一计划。[333]

孙中山回国之初即求助于山田纯三郎，与三井物产公司就借款问题多次商量。有一天，山田接到森格在三井物产打来的电报，和宫崎滔天一起译出，大吃一惊：“如果有把满洲交给日本的打算的话，就提供两个师的武器和二千万日元。”这就是日本的“满洲收买案”。[334]

2月3日，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会见三井洋行的森格，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作陪，森格当面透露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的意图，如缔结满洲密约，日本则可给予中国革命特殊的援助。

孙中山坦言：“最近革命政府之财政匮乏已达极点，缺少财源，无以供

应军队，几陷于完全破产之境地。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倘或有幸，此刻能获得防止军队解散之足够经费，余等即可延缓与袁议和，俟年关过后再进一步筹措资金，而继续排袁……倘或不幸，在五天之内，即至九日，旧历年关之前，意欲筹得之一千五百万元经费，如仍无成功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只好在革命政府未倒之前，掌握机先，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一时让与袁世凯，除此别无他策。”[35]

孙中山当即致电益田孝，同样说得很清楚，“因财政穷乏，在中国旧历年前若无一千五百万日元则不能作战，革命政府将陷于混乱。与汉冶萍公司五百万日元借款成立，故以招商局担保向日本邮传会社，与英、德、美国一千万元借款交涉正在进行中，若五日内借款无望，则万事皆休，孙、黄即与袁世凯缔结和议，将政权让袁。孙同意满洲租借。故日本为防止革命 [军] 解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日元以外，如立即借一千万元，则与袁世凯中止和议。”[36]

孙中山同意租借满洲为条件获得二千万日元贷款，要求在2月8日前得到保证，17日前一千万现金到位。2月5、6日，他又两次致电森格，催促日方在2月9日前答复，与袁世凯的媾和协议延期到2月9日止。此事传到山县有朋的耳里，他心目中“满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没有必要用金钱收买”，表示反对。何况，当时满洲不在南京临时政府手中，即使签了协议，也是一纸空文，西园寺内阁最终取消这个计划。[37]

“满洲收买案”只有日本方面的史料，详细内情无法确知，但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上陷入极度的紧张，不是什么秘密，当时一般人也知道。胡适在美国收到二哥的家书：“现在财政支绌，已达极点。”[38]

汉冶萍借款、轮船招商局借款无非为了取得那救急的一千五百万元，借款失败的结果，就是南北议和的达成。

谭延闿的幕僚唐乾一回忆，和议未决时，黄兴多次给谭来电，“今日南北胜负全在款项之有无”，希望以湖南各锑矿抵借一千五百万日元，“词意迫切，不能不许。然其条约损失甚巨。谭延闿以民未蒙福，而国已失利，持重未发也”。等到和议达成，此议取消。[39]

胡汉民回忆："财政部日借债，俄债千万，几有成议，为参议院所拒否。"[340]

2月27日，参议院开议向俄国道胜银行借款150万镑合同，以全国赋税担保，只有14人到，不足法定人数，其中八人同意，议长林森即宣布通过，引起反弹，湖北的三位参议员因质问无效而辞职。江苏的参议员也都辞职，认为"各省在南北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各省赋税俱归各省迳收，未便任由现政府随意指抵"。江苏都督庄蕴宽根据临时省议会来信，指责"此举无异以全国土地、人民拱手授人……可为共和二字痛哭"。陈锦涛回顾此事，"乃华俄借约，大启纷争，指担保为抵押，败事机于垂成"。[341]

不过，此时南北和议已成，借款是否成功已无关整个大局。

当南北军方在上海秘密和谈时，夏清贻说，因为不论南北两方都面临财政艰窘、军火匮乏、人心厌乱、外交棘手等问题，战争的延长，除了列强坐收渔利，对南北双方都一无好处。[342]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前来接收，"时南京理财部存留之现款仅三万元，而发出军用手票之数已四百万；若非在沪上借四百万现款与之兑换而遽行北来，不足以保持政府之信用"。这是他到北京后对记者说的。[343]

6月10日，熊希龄给黎元洪及各省电中自述，3月29日接任财政总长时，"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东张西罗，寅食卯粮，危险之状，不敢告人"。[344]

北方财政同样枯竭，靠外债度日，以理财著称的熊希龄无力回天，7月14日即辞职而去。

【注释】

①《绍英日记》，第234页。

②《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82页。

③《辛亥革命》五，第335页。

④《熊希龄先生遗稿》（1），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256页。

⑤《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56页。

⑥《赵凤昌藏札》第107册，《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55-1056页。

⑦《绍英日记》第247、265–266页。

⑧《宣统政纪》卷六十一，转引王寿南《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廷之反应》，台湾《近代中国》1990年10月，第8页。

⑨ 转引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财政的崩溃》，《辛亥革命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3–184页。

⑩《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70页。

⑪《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54页。

⑫ 转引王寿南《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廷之反应》，台湾《近代中国》1990年10月，第9–10页。

⑬《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72–173页。

⑭《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13页。

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83页。

⑯《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44页。

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86、187页。

⑱《辛亥革命》七，第218、104–105页。

⑲《辛亥革命》六，第115页。

⑳《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44、45页。

㉑《张謇存稿》，第533页。

㉒ 参考王寿南《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廷之反应》，宓汝成《辛亥鼎革之际中国外债透析》，《近代中国》第七辑，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第75–77页。

㉓《辛亥革命》八，第306页。

㉔《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102页。

㉕《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351、358页。

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100页。

㉗《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765、768页。

㉘《辛亥革命》五，第298–299页。

㉙《汪荣宝日记》，第1033页。

㉚《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5页。

㉛《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25页。

㉜《汪荣宝日记》，第1045页。

㉝《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97、96–97、102页。

㉞ [美] 李约翰著，孙瑞芹、陈泽宪译：《清帝逊位与列强》，中华书局1982年，第506页。

㉟《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59–160 页。

㊱《辛亥革命》五，第 497 页。

㊲《汪荣宝日记》，第 1062 页。

㊳《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35、376 页。

㊴《绍英日记》，第 241–245 页。

㊵《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36 页。

㊶《绍英日记》，第 246–247、249–250、253–256 页。

㊷《汪荣宝日记》，第 1075 页。

㊸《绍英日记》，第 258、260 页。

㊹《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 135 页。

㊺《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40 页。

㊻《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40、385–386 页。

㊼《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284、302 页。

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 354 页。

㊾《北洋之始》，第 13 页。

㊿《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 176 页。

(51)《绍英日记》，第 267–268 页。

(52)《辛亥革命》八，第 84 页。

(53)《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86 页。

(54)《辛亥革命》八，第 85 页。

(55)《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316 页。

(56)《绍英日记》，第 270–273 页。

(57) 转引《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三辑，台湾“国史馆”1974 年，第 40 页。

(58)《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 113 页。

(59)《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385 页。

(60)《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87 页。

(61)《辛亥革命》六，第 106、197 页。

(62)《辛亥革命》七，第 370、372 页。

(63)《辛亥革命》六，第 107、108、113、123、120–121 页。

(64)《辛亥革命》七，第 385 页。

(65)《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765、766 页。

(66)《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56、59 页。

(67)《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81 页。

⑱《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225 页。
⑲《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795 页。
⑳《绍英日记》，第 256-257 页。
㉑《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编，第 240 页。
㉒《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381 页。
㉓《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765 页。
㉔《辛亥革命》五，第 336 页。
㉕《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5、559 页。
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775 页。
㉗《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126-127 页。
㉘《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 188 页。
㉙《郑孝胥日记》三，第 1372 页。
㉚《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331、335 页。
㉛《北洋之始》，第 49 页。
㉜《荣庆日记》，第 201 页。
㉝《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68、40 页。
㉞《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87 页。
㉟《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337 页。
㊱《辛亥革命》八，第 93 页。
㊲《绍英日记》，第 268 页。
㊳《郑孝胥日记》三，第 1377 页。
㊴《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25 页。
㊵《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317 页。
㊶《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 100 页。
㊷《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399、400 页。
㊸《郑孝胥日记》三，第 1382 页。
㊹《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305 页。
㊺《颜惠庆自传》，第 96 页
㊻《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97 页。
㊼《我的前半生》，第 80、28 页。
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377 页。
㊾《绍英日记》，第 269-270 页。
⑩⓪《张竞生文集》下卷，第 349 页。

⑩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299—300页。

⑩《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3期，第172页。

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883页。

⑩ 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8页。

⑩《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52页。

⑩《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32、39页。

⑩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79页。左舜生《记辛亥武昌首义经过》，就采信这个数目。

⑩《口述历史》第七期，第57页。

⑩《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17页。

⑩《党人三督传》之“李烈钧自传”，第83页。

⑪《口述历史》第一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51-52页。

⑪ 子虚子：《湘事记·财政篇》，《湖南反正追记》，第100页。

⑪ 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7、41页。

⑪ 李平书：《且顽七十岁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11月6日，《光复报》报道，制造局存款共现洋六万元、现银十万两，惟城内道库尚未盘结，约有十余万。《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36页。

⑪《孙中山藏档选编》，第205页。

⑪《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80-281页。

⑪《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51页。

⑪《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73页。

⑪ 章天觉手稿《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163页。

⑫《胡汉民自传》，《党人三督传》，第45页。

⑫《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462页。

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71页。《口述历史》第七期，第14页。

⑫《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2页。

⑫《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22页。

⑫ 马传德、徐渊编著，孙戈译：《辛亥革命时期的货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⑫ 转引《近代中国》第七辑，第89页。

⑫《辛亥革命时期货币》，第80页。

⑫ 康寄遥、朱叙五、席肇儒《秦陇复汉军军政府临时财政措施》，《陕西辛亥革命回

忆录》，第 119–123 页。《辛亥革命时期货币》，第 53–56 页。

⑫⑨《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 145 页。

⑬⓪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总 53 号，第 76 页。

⑬①《陈英士先生文集》，第 135 页。

⑬② 转引魏振民《辛亥革命爆发后四个月间的交通银行》，《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99 页。

⑬③《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 159 页。

⑬④《亦云回忆》，第 61 页。

⑬⑤ 沈云荪《支援革命经费的上海信成银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 566 页。

⑬⑥《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 53–54 页。

⑬⑦ 章天觉手稿《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第 163 页。

⑬⑧《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322 页。

⑬⑨《历史档案》1981 年第 4 期，第 38–39 页。

⑭⓪《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462–465 页。

⑭①《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71 页。

⑭②《申报》1912 年 2 月 29 日第六版《浙江之逃官录》，参考朱志骞《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台湾知音出版社 1992 年，第 63 页。

⑭③《辛亥革命》七，第 140 页。

⑭④ 孙振麒口述，毛翼虎记：《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件史实》，《奉化文史资料》第三辑，第 5 页。

⑭⑤《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458 页。

⑭⑥《胡汉民自传》，《党人三督传》，第 45 页。

⑭⑦《近代史资料》1961 年 1 号，第 459 页。

⑭⑧ 邱捷《广东军政府初期的财政状况》，《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第 205、210 页。

⑭⑨ [美] 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第 56 页。

⑮⓪ 法国领事馆通信，广州报告 1912 年 2 月 1 日，白吉尔《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二辑，第 178 页。

⑮① 转引魏振民《辛亥革命爆发后四个月间的交通银行》，《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98 页。

⑮②《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662 页。

⑮③《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79 页。

⑮④《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595、606–607、607、625 页。

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83 页。
⑯《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379 页。
⑰《辛亥革命时期货币》，第 76 页。
⑱《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421 页。
⑲《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616–617 页。
⑳《申报》1912 年 5 月 9 日二版《财政总长之政见》。
⑴《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00–104 页。
⑵《申报》1911 年 11 月 7 日《刘道不忘税银》。
⑶《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54 页。
⑷《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135、137 页。
⑸《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58 页。
⑹ 转引朱志骞《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 153 页。
⑺《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65、336 页。
⑻《张謇存稿》，第 25 页。
⑼《陈英士先生文集》，第 13 页。
⑽《颜惠庆自传》，第 94 页。
⑾《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385 页。
⑿《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466 页。
⒀ 转引朱志骞《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 168–169 页。
⒁《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 43 页。
⒂《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120 页。
⒃ 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 1986 年，第 47 页。
⒄《湖南反正追记》，第 103 页。
⒅ 转引朱志骞《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 211 页。
⒆《湘绮楼日记》，第 3153 页。
⒇《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 4 期，第 103、111 页。
⑱ 景梅九《罪案》，《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 99 页。
⑱《阎锡山日记》1931 年 2 月 17 日，九州出版社 2011 年，第 8 页。
⑱《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122–123 页。
⑱《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81 页。
⑱《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207 页。
⑱《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56、57 页；1981 年第 4 期，第 37 页。
⑱《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 568、567 页。

⑱《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30页，1989年第1期，第3、5、8、24页。

⑱ 转引《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33页。

⑲《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321、227、320页。

⑲《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48页。

⑲《时报》1911年11月24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18页。

⑲《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262页。

⑲《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29页。

⑲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80、581页。

⑲《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448页。

⑲《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399-400页。

⑲ 转引自白吉尔《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二辑，第192-193页。

⑲《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71页。

⑳ 邱捷《广东军政府初期的财政状况》，《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第194页。

㉑《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323、324页。

㉒《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页。

㉓《申报》1912年2月5日第六版，参考《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63页。

㉔《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第206页。

㉕ 转引《南京临时政府问题之研究》，第208、211页

㉖《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466、467页。

㉗ 段云章整理《辛亥革命时期岭南学堂协助军政府筹饷队》，《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29-230页。

㉘ 大汉热心人辑《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总25号，第452页。

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第200页。

㉚《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421页。

㉛《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611页。

㉜《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259-260页。

㉝《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616-620页。

㉞《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74页。

㉟《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349页。

㊱《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75、79、80页。

㊲《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651页。

㊳《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560-562页。

㉑⑨《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34页。

㉒⓪《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76–77、78页。

㉒①转引《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209页。

㉒②《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七版，《朱葆三辞职书》。

㉒③《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70、79页。

㉒④《吴铁城回忆录》，第32页。

㉒⑤《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668–670页。

㉒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557页。

㉒⑦《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30、33、35–36、37、40、46、49、50页。

㉒⑧《澹安日记》上册，第44、48、50页。

㉒⑨资料来源《申报》，转引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138–139页。

㉓⓪《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91、292页。

㉓①《叶圣陶集》第19卷，第72页。

㉓②《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9页。

㉓③《叶圣陶集》第19卷，第72页。

㉓④《吴景濂自述年谱》，《近代史资料》总10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㉓⑤章天觉手稿《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第165页。

㉓⑥《辛亥革命》七，第55–56页。

㉓⑦转引自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00页。

㉓⑧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293页。

㉓⑨《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47页。

㉔⓪《蔡元培书信集》上册，第114页。

㉔①《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9年，第304页。

㉔②《吴铁城回忆录》，第35页。

㉔③《孙中山全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568页。

㉔④方椒伯《上海工商界支持辛亥革命锁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562页。

㉔⑤《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48页。

㉔⑥《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823页。

㉔⑦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版，第169页。

㉔⑧《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11页；《孙中山集外集》，第557–559页。

㉔⑨《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558页。

㉕⓪《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 563 页。

㉕①《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247 页。

㉕②《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 544 页。

㉕③ 转引自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第 242 页。

㉕④《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37 页。

㉕⑤《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08 页。

㉕⑥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383–384、385 页。

㉕⑦《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190–192 页。

㉕⑧ 黄仲垲（逸民）《辛壬闻见录》，《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 31 页。

㉕⑨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 171 页。

㉖⓪《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663 页。

㉖①《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24 页。

㉖②《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 47 页。

㉖③《黄兴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222 页。（当北京政府成立，参议院中的激进派议员反对熊为财政总长，黄兴多方劝慰始得通过。）

㉖④《党人三督传》，第 58 页。

㉖⑤《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24 页。

㉖⑥《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414、415 页。

㉖⑦《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157–158 页。

㉖⑧《党人三督传》，第 56 页；《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 72 页。

㉖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334 页。《孙中山藏档选编》，第 211、214、335 页。

㉗⓪《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317、326 页。

㉗①《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377 页。

㉗② 转引《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 33 页。

㉗③《孙中山藏档选编》，第 190 页。

㉗④《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35–136、139 页。

㉗⑤《民国档案》1989 年第 1 期，第 4 页。

㉗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365 页。

㉗⑦《张謇全集》第一卷，第 235、236 页。

㉗⑧ 转引《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 96–97 页。

㉗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64 页。

㉘⓪《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285 页。

㉘㉑《申报》1912年4月9日。

(282)《湖南反正追记》，第102页。

(283) 转引《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72页。

(284)《锡金军政分府总理处日记》，《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29页。

(285) 转引《历史教学》1990年第1期，第20页。

(286)《党人三督传》，第61页。

(287)《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85-86页。

(288) 转引《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74页。

(289)《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152页。

(290) 转引《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74页。

(291)《党人三督传》，第59页。

(292)《孙中山藏档选编》，第206、188页。

(293) 转引《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199-200、188页。

(294)《党人三督传》，第61页。

(295)《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84页。

(296)《黄兴集》，第99-100页。

(297)《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202页。

(298)《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202页。

(299)《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365页。

(300)《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84、289、285页。

(301) 转引《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220页。

(302)《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262页。

(303)《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453页。

(304)《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25页。

(305)《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17页。

(306)《党人三督传》，第61页。

(307)《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76、72页。

(30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88-389、387、390页。

(309) 转引《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68页。《历史教学》1990年第1期。

(310)《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92页。

(311)《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85-86页。

(31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89页。

(313)《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1-42页。

⑭《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13、15页。

⑮《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833页。

⑯《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99页。

⑰《孙中山藏档选编》，第205、202页。

⑱ 近藤秀树著，杨季青译，薛虹校：《辛亥革命与宫崎滔天》，《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250页。

⑲《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98页。

⑳《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页。

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460–461页。

㉒ 参考《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71–72页。

㉓ 参考陈三井《中山先生与美国》，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5年，第106页。

㉔《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323页。

㉕ 转引《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212–214页。

㉖《陈英士先生文集》，第2、108页。

㉗《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05、306页。

㉘《孙中山藏档选编》，第193、196–197页。

㉙《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31、235、244页。

㉚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370页。

㉛《孙中山藏档选编》，第193、195、201页。

㉜《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38–239页。

㉝ 参见《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第203－217页。

㉞ [日] 矢次一夫《谈我们在野人士的外交》，《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三辑，第97页。

㉟ *森格1912年2月8日致益田孝信，*《孙中山集外集》，第168页。

㊱《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5页。

㊲《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三辑，第97页。参考《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136–137页。

㊳《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21页。

㊴《湖南反正追记》，第102页。

㊵《党人三督传》，第61页。

㊶ 转引《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84页。

㊷《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65页。

㊸ 转引《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69页。

㊹《黄兴集》，第217页。

第八篇　创立民国

一、君宪还是共和？

在川西华县，肖华清初上小学时，每逢朔望要向石印的慈禧太后、光绪帝画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后来又要向着摄政王抱着宣统皇帝的像行同样的大礼。有一次举行这个大礼之后，一个同学说："假如宣统皇帝坐在金銮殿上哭起来了，怎么办？"另一个同学说："叫宦官在午门外去买一根麻花糖，不是就把他哄住了么？"①

1911 年 10 月 22 日，湖南谘议局议员黄翼球、常治到巡抚衙门，劝巡抚余诚格俯从民意，宣布反正。他回答："这又怎么对得皇上起呢！"常治说："甚么皇上，是一个这样长的小孩子，他晓得甚么！"以两手约作尺许长示意，巡抚无言以对。②

10 月 24 日，蔡元培在德国写信给吴稚晖，称宣统皇帝为"六岁宝宝"。③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廷逊位那天早晨进宫的侍卫武官唐在礼看见：

> 溥仪生得很清秀，只是看上去天庭虽还饱满，口鼻生得迫近，下颏尖促。我心里就想："这个小皇上到底不是个福相。"④

在清朝陨落的时刻，宣统帝还是个幼儿，这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1911年11月7日，以翻译《天演论》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留英学生严复写信给莫理循，充满忧虑地说：

> 他们［南方革命党人］允许目前这个王朝在法律上存在呢，还是干脆将其废除代之以中华共和国呢，还是他们相互战斗直到最后，而以一个中国的波拿巴为最终结果呢？现在没有人敢于预言。
>
> 直截了当地说，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像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⑤]

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发表在英语世界影响巨大的《泰晤士报》上，希望西方舆论可以影响中国的政体选择。当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南下议和之时，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提出一个调停方案，“拟向双方建议一定时期采取君主立宪制，限期至现今皇帝年满二十五岁为止，届时可视皇帝之才德如何、学问如何，以及民智程度如何，由国会研究决定君主还是民主政体”。这个方案也告诉了黎元洪。[⑥]

12月31日，随唐绍仪南下的蔡金台写给赵尔巽的信中也提到：

> 轮过镇江，英领来谒，是夕即有宣统姑任二十五年，限满再定去留之议。经同人愤争，乃姑允电商项城［袁世凯］。项城因其为英领之词，持以询英使朱尔典，乃绝不承认。于是限年之议寝，而坚持民主之说兴。[⑦]

在南北和议时，这个方案没能正式提出讨论。伍廷芳在和谈时甚至指出：“且清帝本非中国之人，据君位已二百余年，使中国败坏至于如此。”[⑧]

所以，当时有人提出以孔子后裔为皇帝的想法。11月30日，张謇写信给汤寿潜：

> 昨有美人詹美生来言：中国今日政体似尚以君主为宜。若不愿满人，何不举衍圣公，而总理为之办事？此说极有思致。一免延长战祸；一去满可达党人之目的；一依滦州军士之十九条，君权已有限；一真世界在英、日君主之前；一可表明党人心迹；一满人心理或较平；一外人亦必愿意；一都城可即建于兖州，亦颇适中。[9]

12月16日，日本公使伊院集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谈后出门，朱尔典追出来，刚接到英国外务大臣的绝密来电，要给他一看，其中说："当前官、革双方在保存满洲朝廷基础上达成协议，迨已全无可能，做为此时之解决方案，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望即与日本国公使进行密商。"

朱尔典说："此说虽难免沦为空谈，但总愿聆阁下有何高见。"伊院集表示所见略同。并问，"英国外务大臣为何想出如此方案。英公使说，日前本使曾获得情报，伍廷芳等人中曾有人唱出此种论调。本使当即作为情报电告本国政府，仅供参考。此事之起因，恐即在此"。

第二天，伊院集往访袁世凯，将英国公使透露的革命党方面有意拥立孔子后裔为皇帝之说，作为世间风说告知，并问："上述风闻，阁下是否认为可行？阁下心目中是否另有其他族系或人物可以拥为君主？此外还有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说，还有由汉人组织摄政会议之说，众说纷纭，真伪难辨。"

袁世凯对拥立孔子后裔之说断然加以否定，"此种荒唐论调实不值一笑；单纯可以拥为君主之族系人物，不但无从寻觅，容或有之，而废黜现今皇帝另立新主，其结果只是在实质上成为共和政体，且会惹起更多纠纷，无论如何，不能考虑；至若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说，只是一纸空论，此种政治已成为历史陈迹，可言而不可行；只是组织摄政会议，本人倒是极为赞成。事虽极关机密，如遇万不得已情况，本人或将决心按此办法进行。日前推徐世昌、世续为太保，辅弼皇帝，就含有几分此种意味"。[10]

12月11日，伟晋颂在南京写信向朱尔典报告，原江苏谘议局议员、新任



宣统小皇帝



孔令贻

江苏省外交司长马相伯认为："即使决定政府的形式采取君主立宪，革命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意延续目前的王朝。如果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皇帝，他们的选择很可能是孔子的后代衍圣公孔令贻。"

但朱尔典于1912年1月4日给格雷的信里说："使衍圣公登极的建议不会获得很多人的支持；认为他的姓名对恢复和维持国家统一没有很大影响的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我个人与孔公 [孔令贻] 相识，他有五十多岁，是保守阶级的代表。他一辈子生活在山东，不受外国的影响，几乎不适宜作经过改革的和进步的中国的皇帝。"⑪

极力主张立孔子后裔为帝的乃是康有为。向构父回忆，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尚在日本，康、梁急电叫他去须磨，要他回国参与实际政治活动，希望他去广东策动李准（水师提督）和秦秉直（陆师提督）。等他到上海，广东已独立。康有为要他们带信给黄兴，建议立孔子后裔衍圣公为中国的皇帝。大意是种族革命要大流血，消耗国家元气，不如采取缓和一点的办法。我国汉人居多，当然应拥立汉人为皇帝，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为人人所崇拜，故立衍圣公做皇帝，使万民景从，免启争端。以法国大革命为鉴戒，劝勿堕法国大屠杀的覆辙。此信由湖南的谢干青带到上海，要他一起去武昌交给黄兴。信没有送达，以致黄兴未能对此建议加以考虑。⑫

康有为的这封信没有见到，他在1911年11月9日写给黎元洪、黄兴、汤化龙的信稿中主张虚君共和：

> 夫虚君无事无权，不须才也，惟须有超绝四万万人之资格地位，无一人可与比者，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则举国之中，只有二人。以仍旧贯言之，至顺而无事，一和而即安，则听旧朝旧君之仍拥虚位也。以超绝四万万人之地位而民族同服者言之，则只有先圣之后孔氏之世袭衍圣公也。⑬

在《救亡论》一文中，他明确主张以孔子后裔为帝：

> 以中国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

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

……今各省公尊孔氏衍圣公为帝，或曰文宣帝，或曰衍圣帝，迎主北京，或迁都山东、南京、苏州，移资政院从之，即改为国会……

在另一篇《共和政体论》中，他提出保留宣统为虚君，各省公推孔氏衍圣公为监国摄政王，“直出上谕，则汉人为主矣。若欲行总统共和，则称监国总统可也”。[14]

梁启超主张虚君共和，11 月 29 日致电内阁：“仿北魏孝文改拓为元氏例，皇室定姓，改号中国。清字只对前朝，不以对外。”[15]

黎元洪 11 月 17 日接受英文《汉口日报》的采访，记者问及康有为，他强调说：“康有为的事业不是我们的。”显然他不会同意康的这些主张。[16]

黄兴、孙中山他们不会同意，北洋军中廖宇春这些人也不赞成，12 月 13 日，廖与夏清贻、孔文池在南下汉口的火车上一路讨论时局，都认为，如果数年前，清廷能易汉姓、废旗制，实行宪政，与民更始，人心涣散不至如此，酿成革命之祸。“可见一国之君，必有正当之资格，如英、日国民，皆能忠爱发于天性，我国皇统杂出，爱根已除，倘再乏君人资格，不亡何待。现在欲改政体，宁改国体，与其戴汉人为君，又不若易立宪为共和。”[17]

就是王闿运也不会赞同，他在 10 月 21 日的日记中对康、梁大表不满：“康、梁保皇以革命，其计甚狡，惜乎不自量也。狐媚可取天下，鼠窃岂可取耶？”[18]

严复作为南下和谈的各省代表之一，12 月 12 日，从汉口过江，与当年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黎元洪有过一席谈，第二天晚上，他从武汉动身去上海前写信给陈宝琛：

黎诚笃人，初无意于叛。事起，为党人所胁持，不能摆脱。……

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 [袁世凯] 对。盖彼宁以共和而立项城为伯理玺 [天] 得，以民主宪纲 [钳] 制之；不愿以君主而用项城为内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极耐思索也。[19]

北京《京都日报》12月23、25日接连刊登《严复与黎元洪之政见》、《唐黎会晤志略》，报道12日他们的师生谈，严复说中国人民程度不足，实行共和必多流弊。黎不便驳难，由孙发绪代答，“大致谓人民程度不足，由于无良政府以督率之，此次改革正欲增进人民程度，而期渐进于完善。如谓程度不宜于共和，亦未必即宜于立宪。况立宪政体君主万世一系，彼有何功何德，而能永享尊荣如此”。严复说：“我亦尝谓万世一系不合人群公理，但今日之事颇难为力。”孙说：“此事转移全在先生，先生为当代大儒，若著书立说启发国民，程度自然高尚；鼓吹共和政体，则共和政体自必早庆成立。”严复只是说：“谨受教，但鄙人此次南来，总期保全人民之幸福，凡鄙人所能为者，无不尽力为之。”[20]

严复一直坚持国人程度不适合共和，日后甚至提出了一个“共和女性”说，说共和属于阴类，共字又读“恭”，恭顺而和柔之意，引用古语所训，“共和”二字，女性最贱，故列于十四等。他认为今日将这个名词尊为全国名号，岂非大谬？[21]12月21日，他在上海对郑孝胥说：“经此事变，士君子之真面目可以见矣。南方学者，果不值一钱也。”[22]

恽毓鼎日记中多次骂南方士人，其实他们都是南方人，南方也有给黎元洪写公开信、责以君臣大义的梁鼎芬。

当时南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共和，革命党人以创立民国为目标毫不奇怪。10月15日，“中华民国”之称，公开出现在武昌发布的文告中，出任过鄂军都督府外交局长的黄仲岂说，“不知创始于何人，群相习用，以逮于今”。[23]

“创立民国”这是同盟会誓词和革命方略中早就定下的，1907年7月，《民报》发表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正式出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很多年后，鲁迅回忆章太炎时还提及此事。武昌起事前刻的印章就是“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之印”。10月18日，黎元洪照会各领事：“本军政府此次起义之由，全系民族奋兴，改革立宪假面，建立中华共和民国，维持世界和平。”[24]

10月28日，苏州尚未独立，中学生叶圣陶日记即说：“从此以后，……汉族同胞共歌自由，当即有一共和政体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半球之东，乐矣哉！”[25]

11月5日，郑孝胥日记说：“资政院来电，与政府商定君主立宪之法，

上海各会复电，必用共和政体，意存主推翻满洲王室，闻袁世凯意存观望。”第二天，他日记中说：“鄂军及南省则欲推倒满洲，改为共和政体”。[26]

11月16日，黎元洪对记者热情地谈到中国的未来，“描绘了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蓝本而建立的未来的联邦共和国”。[27]

11月22日，镇江独立之后，当地海关税务司戴乐尔给安格联写信：

> 这里的人都赞成成立共和国，上海将举行会议，决定国旗和选举中华民国总统。首都可能设在武昌。我真挚地希望列强不来干涉，因为这会引起对外国人的强烈仇恨。[28]

等到12月16日，廖宇春从武汉乘美利轮船东下，“舟中遥见长江两岸，皆有南北兵哨，……彼此遥遥相对，闻船中人语，皆自称民国矣”。[29]

12月18日，《大公报》刊出江苏省议会的通电：“政体必主共和，以为全国一致之舆论。既欲议和，必先定政体，乃有结果。……希望共和，建设最良之政治。”12月24日，温宗尧写信给莫理循：“实行共和制度是确保消灭朝廷的关键，而且是唯一能满足人民愿望的办法。”[30]

在上海等地，许多以民国、共和为名的团体纷纷出现。

11月16日下午，上海十六铺新舞台开大会，到会的有530人，决定成立“共和建设会”，12月3日，在张园举行成立大会。

11月21日，程德全、章太炎、张謇、赵凤昌等发起“中华民国联合会”。

攻克南京前夕，陈英士发出《组织共和国体通电》，“至组织共和国体一节，除到沪各代表首先承认外，汴直亦有赞成民主之说，数千年之专制毒令，从此逝矣”。[31]

12月7日，约600人出席张园举行的集会，成立“中华共和促进会”，会上有人演说，以组成完全共和国，与美、法齐驱为目标。

12月17日下午，在上海熊希龄的住处开会，到会数十人。在讨论会名时，黄尊三提议：“当此鼎革之时，国体未定，人心动摇，团体名称，宜明白揭示，不宜稍有含混。莫若趁全国人民希望共和之时，即以共和二字立名，较为妥善。”大家赞成，取名为“共和协会”。[32]



唐绍仪



伍廷芳

12月23日下午，“商界共和团”举行会议，约150人出席，朱葆三当选会长。有六人发表演讲，大意说：随同唐绍仪来沪之某些代表均系汉奸，他们企图借钱收买海军军官，使他们投向清廷。这些汉奸的姓名是：杨士琦、许鼎霖及严复等。演讲人要求听众密切注意此等汉奸。演讲人又出示很多来自各同业公所的来信，并说商界均赞成共和。他们也将致函伍廷芳，将商界的意见告诉他，并要求他切勿接受除共和以外的任何其他政体。[33]

12月31日，徐兆玮在常熟给人写信：“共和政体南省狂热已久；北方应有同情，但未知蒙藏何如耳？……人心愤激如此，欲保守旧有主义能乎不能？……大局将变，即以项城之毅力亦难挽之使回。断言之，即专制政体决不容于今日，是也。……”[34]

不用说革命党人，就连张謇、汤寿潜、程德全、赵凤昌这些立宪派，甚至包括岑春煊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更不要说年轻一辈的孟森、雷奋、杨廷栋他们。11月22日，郑孝胥日记说：

> 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于共和实无所解，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扰乱天下，能发而不能收，其祸可胜言乎！[35]

1912年1月21日，叶景葵给金仍珠、朱旭初写信：

> 东南之士夫稍有学识者，无不主持共和。……政体既为公决，大约宣统待遇必优。共和二字招牌，必须挂出……[36]

朱尔典给格雷的信中说，参加南北议和的清方代表回到北京都说：“气氛太倾向于共和，不允许自由讨论。”[37]

1911年12月16日，上海租界巡捕在宁波路墙上撕下的纸条写着：“走狗唐绍仪胆敢来沪议和，一定将他打死，反对打死他的人不是同胞，凡撕下

此通告者也该杀。”巡捕在山东路上也发现类似的纸条。

12月21日晚，四川人王征祥到戈登路李德立的寓所要见唐绍仪，遭到拒绝，甚为愤怒。当时在场的华探说，此人自称革命军，曾在汉阳参加战斗并负伤，左臂还吊着腕带，他要秘书转告唐："纵然将革命党人杀戮至最后一人，他们亦绝不同意任何方式之君主政体。"[38]

唐绍仪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表示："目前最堪忧虑者，在于各省对和谈真相缺理解，竟然妄加抵制。今晨以来，本人已接到恫吓信数封。"[39]

参与和议的北方代表冯耿光回忆，从武汉到上海，下船以后，"很多代表被一般歹徒要挟，硬说'北方代表都是宗社党，不要轻易放过他们'。代表们怕事，就纷纷躲避了"。[40]

罗瘿公几次给梁启超写信说："然平日讲宪政著名之人，在南中行动不能自由。佛苏在沪寸步有人监视；有自北来者，动疑为政府侦探。在沪中而不从革党者，地位极危险……""南中各省代表多系宪友会人，如浙省陈敬第（江苏为雷奋）来缄，谓大势已趋共和，君位一层，开口即遭垢詈，恐不能不并入共和。"[41]

12月21日下午，黄尊三赴"湖南共和协会"的宴会。熊希龄作主人，座中有范静生等人，"静生为北方全权唐君之随员，人颇漂亮，善为说辞，席中演说共和二字由来及意义，并深赞成共和主义，全场为之鼓掌。"[42]

12月20日，凌盛仪在湖南听说，隆裕太后想要带着溥仪出奔，"无地可往，惟有痛哭而已"。[43]

这只是传闻，但当时确有人为溥仪避难联系过美国使馆。

在袁世凯进京前，皇太后和皇帝请求在美国公使馆避难，11月10日，卫理从北京给诺克斯电报，主张允许请求。当日，诺克斯回电，如果其他公使馆不反对，他同意"暂时避难，如果为了保护无辜的生命这是必要的话"。[44]

当年回国考取翰林院编修的留学生叶可梁，也从非正式渠道获得了美国使馆的同意：

> 武昌起义后月余，陈宝琛约我便餐，在座八人，宝熙、李家驹

都在。餐后，陈谈起，有一要事与我相商，谓此次革命，朝廷对于皇帝的安全甚为担忧，想设法保驾，拟托我向美使馆联系，紧急关头可以暂躲一时。当时我只认识美国别士恒公司在京代表义理寿，与使馆接近。李家驹则将与另一使馆［日］进行密商。我与义理寿联系过两次，十余日后彼告我谓美使馆已答应让出二等秘书宿舍给溥仪使用，并计划由天安门挖一地道直通东交民巷，以避免袁世凯的耳目。[45]

此时，南方大势趋向共和已无法挽回。恽毓鼎对袁世凯保留北方半壁为君主制心存幻想，他11月21日的日记中说：

大江以南，四分五裂，一时骤难收拾。唯有全力措注燕、晋、齐、豫、雍、秦、新疆，使乱萌不生，根本盘固，……足食足兵，有备无患，即使危令不行于南路，犹可画江而守，徐为恢复之谋。此事倍极艰难。[46]

同日，徐佛苏访汪荣宝，“主张南北分立说，力言统一主义之不可行于今日”，汪认为他所说“颇有理由”。[47]

12月19日，蓝公武写信给梁启超，听说袁世凯与南方议和不过是借此延宕，“若至万不得已时，则划分南北，挟隆裕、宣统而避居洛阳，以守北方。传说如是，虽未必可信，其能力之薄弱，于此可见一斑”。[48]

1912年1月17日，汪荣宝听说当天举行的皇族会议上也“有南北分治之说”。[49]

曾出使意大利的许珏提出过一个大胆的设想，内阁召开临时国会，将东三省、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甘肃、新疆和蒙藏回部采用君主立宪，至于南方各省热衷共和，不妨听其意愿，设立共和政府，以三年为期，以观实效。通过三年的不同政体，以实践结果来决定以后的方向。如果三年后北方安定，南方扰乱，取消共和。反之，北方实现改革，南北最后仍归统一。[50]

此时，清廷的牌几乎已出尽，决定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民国的主动权已转移到了北方实力派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身上，双方都不愿南北分立。唐绍

仪南下议和之初，张謇对他说："所谓南北议和也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51]民国不是打出来，而是谈出来的。如果说"剿抚并用、以抚为主"只是传统的老办法，那么，走到对话桌上，以和平谈判来解决政治危机，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办法，在中国历史上尚无先例。

议事厅前颇认真，安排西捕辟行人。同居一国开和议，今日君民势已均。

——《海上光复竹枝词》

章太炎曾有共和政府成立后，首先立清帝为大总领，然后"再黜而竟废之"的议论，12 月 3 日盛先觉当面问他，他说，"昔亦诚有是，然今大势已粗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甚嚣嚣，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谈矣"。[52]

马相伯也向孙中山提过建议，外界以溥仪为总统的说法虽极为可笑，"但利用其可笑，而佯与以虚名，则皇室名义可以永消，皇室禄养可以减为总统廉禄（永消皇室，其价万万。不然皇室之名犹存，名存而思利用其名者，难保无人。且迁之热河，恐或有会稽之祸。不如请其移驻南方，由民国择地而居之）。皇室既消灭，则皇室所有应随之消灭，作为共和国有矣。一出一进，国民大可利用以省无数负担，暗中且有朝三暮四之利焉。"[53]

这种方案不可能得到认真对待，就是孙中山同意，袁世凯也未必同意。12 月 6 日，袁世凯在逼摄政王退位后，独掌了大权。整个朝廷的重心发生倾斜，战与和、退还是不退的主导权落到了他身上，次日即决定派唐绍仪南下议和。

12 月 12 日，日本公使伊集院致电内田说，自决定派唐为代表南下议和以来，对袁世凯的意向，外间传说纷纭。"闻昨日 [清国] 陆军部某人曾向青木少将秘密透露云：如此次交涉不成，或则乾坤一掷，断然废黜皇帝，完全同意共和政体；或则效法罗马教皇之故智，使皇帝保持尊荣而置于虚位，不使

其干预一切国政，二者必择其一，袁世凯对此已有所准备。”

他将这些问题当面问袁，并说如果袁主张君主立宪，日本必尽量援助。袁回答，自己始终主张君主立宪。“关于置皇帝于虚位，实质上予以废黜”，他说，按现时民智程度，恐亦很难实行。……如果革命军方面对我方之原则立场始终不予考虑，而一味坚持其共和主张，本人只好发表声明，坚决予以反对。届时，如将双方意见公之于世，让世界各国给与评论，相信任何国家都将对我方之原则立场寄与同情。[54]

11月23日，罗瘿公写信向梁启超报告与袁世凯面谈的情况，袁说“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55]首次出现将君主立宪与共和捏在一块的新名词。

议和代表南下前夕，袁世凯对他们说：“我是主张现在实行君主立宪最为恰当，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56]此前11月14日，袁对汪荣宝等资政院议员阐述自己主张君主立宪的宗旨和理由。[57]但是，袁交给唐绍仪的方案“二十二条”，已不是一般的君主立宪制，而是“君主共和立宪制”，这是袁和外交团商定的：

> 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皇帝改为国王；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包含蒙、藏、青；由各省选举议员组织上、下两院，公选大总统以为行政机关；行政之权统归大总统统揽，国王处宪法上之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国王例为世袭，但大总统以四年为任期；国王及大总统之待遇相同；除大总统外，所有国民皆为臣民；国会为立法机关，无论大总统及国王均不得干预；司法机关为独立，归裁判所管辖；宣战媾和及缔订国际条约并颁布法律等权，操自大总统……

当时，《申报》、《民立报》等报纸都曾刊登。这个独特设计在世界各国不曾有过先例。袁以为南方会同意这个方案。不料唐绍仪一到武昌，黎元洪他们提出的四点建议就是：推翻满清、优待皇室、厚待满人、统一各省。12月15日，汪荣宝在北京听说了这四点，朱尔典给格雷电也作了汇报。唐绍仪到上海，发现保留清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也没有将这个方案拿出来讨论。



唐绍仪（左）和伍廷芳（右）在南北议和时的合影

南北和谈开议，清帝退位成为先决条件，12月20日，马相伯对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说，正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将给予清帝年俸，但为了中国边远地区各藩属如西藏、蒙古等地起见，允许他保留他的名号。不过，政府将是一个共和政府，皇帝作为一个挂名的首脑，而没有任何权力。为了尽量摆脱满清的一切影响，首都很可能从北京迁往武昌。革命派的首领黄兴、黎元洪、程德全及其他的人都赞成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58]

当日，唐绍仪、伍廷芳第二次开谈，伍廷芳说：“我初亦以为中国应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及时。惟今中国情形，与前大异，今日中国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人心如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亦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将来满人亦可被举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故此次改革，必须完全成为民主……[59]

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唐绍仪：

“近日体察各国情形，皆不赞成共和，日本因恐波及，尤以全力反对，如再相持，人必干预，大局益危，亟宜从速自家解决，冀免分裂，况十九信条已具共和性质，君主民主两相维持，即可保全危局，何苦牢守成见，空争名义……”

12月22日，内田顾一的日记说：“世人对唐 [绍仪] 的看法是：若说是媾和使节倒不如说是在争论君主体制还是共和体制较为适当。”[60]

唐绍仪南下前夕公开表示，政体改为共和也可，惟君主之名义当保存，若革命军必要除去君主名目，不得不回京罢议。[61]

他内心却是主张共和的，随他南下的八旗代表章福荣（绶卿）回忆，船至南京下关，他与江苏都督程德全密谈许久，所谈内容虽不知，但看他们亲密的神情，就心中生疑。章福荣写信给朋友：“此次会议，原为南方主共和政体，北方主君主立宪，故要开会彼此商讨二者之得失利害，而我们的北方代表未到开会地点，在船上业已主张共和，这会还开个什么劲！”[62]

与唐绍仪同行的杨士琦曾对亲信说：“我不解唐少川当此时势，为何如此兴高采烈？”[63]

北方议和分代表之一张国淦回忆：“唐代表本倾向共和，惟以清政府关系，不能于会议席上，明白主张。”[64]

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说："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65]

次日，他电致北京内阁，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又有一电称"外人亦不能扶助君主之说"。[66]

当天，他对来访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和参事官松井说："本人原系共和论者。北京当局几乎完全不了解南方真象，从而双方意见大相径庭。革命党坚决主张共和，坚持废弃满洲朝廷，毫无缓和余地。舆论既已如此，不能不认为北京除顺应南方意志外，实无其他解决办法。"

12月22日下午，日本公使伊集院访袁世凯，当面指出："以唐绍仪之立场而论，本应坚持君主立宪主张，但据来电观之，似对共和体制并不反对，且已向伍泄露此意。更有甚者，据松井参事来电称：唐曾公开言明其本人原系一共和论者。"

袁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现今唐绍仪是否果真抱有此种思想，本人尚不确知。……所谈果系出于唐氏本意，想必是唐抵上海后为周围之革命气氛所感染，以致头脑混乱所致。本人则绝无赞成共和之意，此点希勿混淆。"并重申了君主立宪立场。

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内阁仍以共和为词。

这天下午，赵秉钧与日本人高尾谈话："上海会议情况日趋险恶，君主立宪主张已万难贯彻。……情况如照此演进，则实行君主立宪已全无可能，最后结果只能建立共和国政府。"

伊集院致电内田，"赵秉钧上述提议，是否出于袁世凯之策划，也颇耐人寻味"。[67]

12月29日，南下和议代表之一许鼎霖给赵尔巽写信："此次议和，实误于唐大臣过于胆怯。两次开议，皆存逆来顺受之心，是以革党得步进步，不至共和不已。"[68]

同一天，恽毓鼎日记说："绍怡本非善类，平日所行，直同禽兽，岂能

望其忠爱朝廷乎？项城用之，误矣（副使杨士琦亦金人也）。余又为京师商界拟一电，致唐、伍二贼，不认上海和议，交润田，用北京总商会全体名义，托资政院代发。”[69] 12月31日，蔡金台写信给赵尔巽说：“万不料伍甫提及民主，唐即满口赞成。……既因其为革党辩护甚力，一电竟至数千言”。[70]

1912年元旦，叶昌炽在报纸上看到唐绍仪的电奏原稿：“和议一败战端复起，度支之竭蹶可虞，民生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裂必乘，宗社之存亡莫卜。”他在日记中说：“以此恫吓之辞施于君父，陈桥之变、崖山之祸，何一非欺人孤寡，天乎噫嘻！”[71]

1月4日，恽毓鼎日记中再次写下：“唐绍怡之通匪卖国，令人发指。”[72]

章福荣回京后，听说资政院李家驹、达寿等也向袁内阁弹劾唐绍仪在沪赞成共和，来电一味恫吓，实不胜代表之任，请即调回，另派妥员。[73]

许鼎霖在资政院指斥唐绍仪，“何谓议和，直是送礼而已”。[74]

而在英文《大陆报》记者笔下的唐绍仪，“他冷静、充满人性、和蔼可亲，易于接近。当他被任命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出席和平会议时，革命人士感到很高兴，他们认为唐绍仪是一个具有开明观点的、通情达理的、并非对革命毫无同情心的人”。[75]

1月27日，朱尔典写信给格雷说：“极为普遍的看法是，从不隐瞒其共和倾向的唐氏认为，他能够左右北京，并制造一种使袁氏非担任共和国总统不可的形势。”[76]

公电何如密电详，各般条件费商量。待当逊位颁明诏，始信袁公设计长。

——《海上光复竹枝词》

1911年12月29日，斐格写信给法国外长：

在上海聚会的南北方代表一周会谈的惟一结果是明确了共和派代表的不妥协态度和袁世凯派出的代表、他的大使的软弱无力。唐绍仪是否事先就被对方争取过去了，或者说他的行动是否完全听命于妥善

安排的未来？这尚未可知，然而不管怎样，从第一次接触时起，他便显得受周围气氛的强烈感染，仿佛已认定帝国事业毫无希望。[77]

其实不是唐绍仪的软弱，关键还在袁世凯的态度。

这一点，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就已说破：

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78]

12月21日，随唐南下的北方分代表范静生 [源濂] 在湖南共和协会欢迎宴会上说，“北方亦多赞成共和，项城尤为赞成共和。唯一国总不能有两政府，南京非建都之地，都会要以北京为宜，并说明种种理由”。[79]

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知道唐持有共和党人的观点”，“袁世凯派唐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1912年1月24日，他写信给威·伍·柔克义说：“12月里，我有几天呆在上海，那时唐绍仪宣称他坚持共和的理想。我相信袁世凯知道并准许他这样讲的。”[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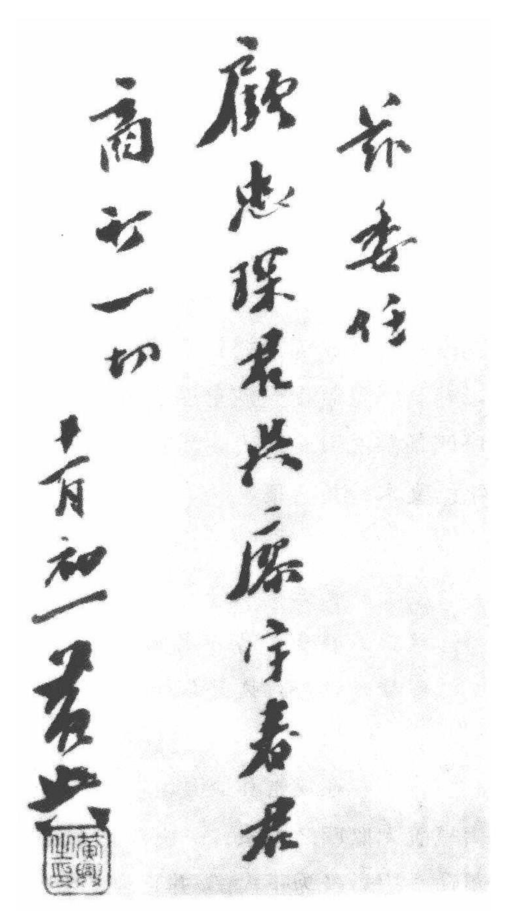
6月28日，朱尔典给格雷写信，“最近，他 [袁世凯] 的敌人散布谣言说，他想要当皇帝。为了对付这个谣言，他发表了一项声明（现附上它的副本），要求所有的人都相信，在革命爆发前很久，他便已信仰共和的理想；请老天爷作证；他绝不辜负国家委托给他的任务。”[81]

当武昌事起，1911年10月14日朝廷起用袁世凯之初，他的幕僚王锡彤和儿子袁克定都主张不应命，王锡彤以为乱事一平，他有性命之忧。他不高兴，说了一句：“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几天之后，10月23日，他对王锡彤又说了一句：“余甚稳健，对于革命党决不虐视，请公放心。”[82]

袁世凯未必有什么共和的信仰，但对清廷不放心则是确实的。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记录，10月15日，袁即派亲信密访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告诉美国外交官：“袁将到京，不久我们会有一个共和国，袁且为总统。”[83]



顾忠琛



兹委任
顾忠琛君与廖宇春君
商议一切
十月初一 黄兴

黄兴给顾忠琛的委任书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记录，袁从一开始就表面一套，暗中一套，似乎令人猜不透，其实只有一条，他既要取而代之，又不想背上篡位的恶名。

当时被披露报端的汪荣宝家书直言："项城并不坚持君主政体，惟所处地位断不能直截了当宣布共和。南中舆论每不谅其苦心，疑忌甚深，不无误会。"[84]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12月15日，斐格向法国外长汇报，"照内阁总理的心腹们所肯定的情况来说，袁确实准备作出一切让步，以获得如此向往的结果，而这只须牺牲明显象征中国统一的皇帝和皇后。"[85]

莫理循在11月16日就已发现，袁世凯的周围，包括其长子袁克定"都是革命派"，11月21日他写信给布拉姆说："他的儿子极端仇视满族统治。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恳求他父亲放弃顽固态度，帮助建立共和政府。我相信袁的每一个将军，甚至一些满人，如良弼，都反对保留清朝。去武昌和革命领导人谈判的两位袁世凯的代表，蔡廷干和刘承恩，都像黎元洪本人一样仇视满人。……就目前可预见的情形，满人将不得不离开北京，永远不能卷土重来，中国的政体将为联邦共和国。"[86]

在唐绍仪之外，北洋军代表廖宇春南下秘密斡旋，如果不是出于袁世凯的安排，至少也是洞察了他的心机，否则很难理解廖如此大胆。廖见过黄兴给汪精卫的信，很可能就是在袁世凯（或袁克定）那里。廖自述靳云鹏和祺瑞段身边的参谋徐树铮、曾毓隽都颇赞成并参与了这一密谋。12月3日他与以靳云鹏等就保皇室尊荣、共和政体袁为总统、优待战时将士、恢复各省秩序四条游说南北，达成共识。12月20日，廖宇春与顾忠琛在上海文明书局签字的文本，共五条：

> 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帝；先推复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廖宇春在秘密和谈时说："中国人民无爱戴君主思想，已非一日，其故一由皇统无血族之关系，一由君主无爱戴之价值。今民军进种族革命，而为政治革命，用意极为正大。"并直言，他们不愿为清帝而战，只要袁世凯做总统。[87]

一確定共和政體

二優待清皇室

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

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

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之秩序

廖宇春

顧忠琛

廖宇春和顾忠琛签字的协议

双方之所以顺利达成协议，是因为各自完成了主要的目标，对南军而言，要的是共和政体，对北军而言，要的是袁世凯为总统。

1912年1月2日，并不知有这个协议的叶景葵从上海写信给赵尔巽：

“一则民党主张共和，初犹散漫，今则已具雏形。袁内阁内实赞成，外犹坚执，双方激宕，必有合尖之日。”[88]

这也是看穿了袁世凯的心思。对于袁转向共和，2月8日，楚谦军舰教练官、同盟会员萧举规上书孙中山，分析袁的心思：

> 如今又变一巧计，实行和议。换而言之，名为赞成共和，实则君主立宪也。彼之所谓褒皇帝尊号而又优待者，即君主立宪之皇帝不负政治责任而神圣不可侵犯之变相也。彼之所谓大总统云者，即君主立宪之内阁总理之变相也。[89]

1月5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我见到袁世凯时，他小声对我耳语：‘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正在热河筹建宫廷。”[90]

1月15日，高拉尔德写信给法国陆军部长：

> 袁这个善于把人们从王朝那儿夺得的权力握到自己手里的政治家，现在好像想要完全取代王朝，人们预料他将迫使皇帝退位。
>
> 当前的冲突也可能就这样迅速解决，中国可能会采用共和的形式，也可能会保持君主政体，但那将是一个新的王朝。
>
> ……在上星期中，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且日益明朗，这似乎使人们把皇族的自动退位看作是极为可能即将发生的事情。
>
> 贵族们缺乏高贵的感情，而人民则缺乏忠诚，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能产生一个没有激起什么感情而仅仅触及利益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法。[91]

同一天，朱尔典致电格雷：

袁世凯的私人秘书告诉我说：中国大部分地区既然都已宣布赞成共和，所以决定立即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因为召开国民大会决定该问题将会拖延时间及带来危险。他说，隆裕太后不久将发布一道谕旨，宣布满清王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处理临时政府工作，直到选举共和国总统时为止。[92]

1月16日，叶昌炽从上海报纸上看到传闻，“朝廷有逊位意，世 [续]、徐 [世昌] 两相赴热河经营行在，信乎？非小臣所敢知也。”[93]就是这一天，袁世凯等内阁大臣联名上奏，要求顺应民心，改定共和政体，“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之可比。……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94]

幼帝溥仪日后回忆，正是这份密奏吓住了隆裕太后：

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是为什么听了袁世凯的话就吓得魂不附体，以至袁世凯退下去之后还哭个不停的原因。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他议。”“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之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给吓昏了，所以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们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的急转直下的变化。[95]

同一天，朱尔典在北京给格雷写信：“过去几天来，关于皇帝退位的问

题，已在此地的官方人士中间随意谈论。”[96]

曹汝霖以为“废帝改制，非袁之初意”，“袁对清室存废，尚在游移，听说策士进言，以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袁才下了决心。[97]

10天后（1月26日），段祺瑞等47将领联名电奏速定共和。

陈之骥回忆，段祺瑞突然通电响应共和，段派靳云鹏去见冯国璋，“冯不知袁的翻天覆地手段，反将靳云鹏大骂，指斥他出主意响应共和，其实是当面骂靳暗地骂段。靳不敢则声，下不了台。当时我住在冯宅西院，冯夫人找我出来劝架，才把靳拉到我的住房，了此一场。”[98]

这一点法国的驻华武官却看穿了，1月29日，高拉尔德写信给陆军部长：

> 袁怂恿将军们向朝廷递交请皇帝退位的申请书，并挑唆现在与他立场一致的共和派发出最后通牒。
>
> ……王朝似乎不再有任何对抗普遍压力的办法，因为日本没有作出人们所希望的支持。满洲军队对未能保护他们的有特权的王公大臣和对中国人可能；同样感到不满，他们可能不太愿意为拯救王朝作出牺牲。……
>
> 当袁把其他列强国的注意力引向日本单独干预的危险用以吓唬日本时，他让四十七名将军向朝廷递交了一份申请书，申明战争不能继续，对王朝而言最好的办法是退位，那样人们将会向它提供好的条件。

他认为，这个联名通电“似乎是在袁世凯自己的办公室中炮制的，并未征求许多签名者的意见。禁卫军统帅冯国璋和天津统帅张怀芝因害怕满洲人的报复，没敢在该书上签名”。[99]

段祺瑞身边的曾毓隽说：“前敌各将领电请退位，系中央授意。……为徐树铮拟稿……内幕如此，而其效力乃至于不可思议也。”[100]

1月27日，汪荣宝初闻此电奏，“殊觉出人意外”，又听说“姜桂题及冯国璋辈，在京分向各王公竭力游说劝其平和了结”。他随即明白，这是袁世凯的布置，“着着进步，机会已熟，解决不难矣”。[101]

梁士诒门人所编的年谱毫不隐讳，段祺瑞等将领赞成共和电，与驻外公使电都是梁士诒策划。[102]

跟随卢永祥在山西为君主制而战的王坦回忆，2月5日晚住在灵石：

> 突然接到北京一份统密电报，文曰："前敌各将领纷纷来电请清帝退位，台衔亦列在内。"我看过这份电报后，一言未敢发，拿起一支香烟就抽。王承斌也不作声，看我抽烟，他也抽起来。卢统领看看我两人，也一言不发地抽起烟来。就这样，我们三人相对无言地呆坐了有两个钟头，谁也没敢谈论这个电报。[103]

可见列名其上的卢永祥事先毫不知情。

2月8日，锡金军政分府接到江北参谋部杨立言、刘文翰来电，"论北军主张共和，难免诡诈"。[104]

2月12日，蔡锷致黎元洪的急电也表示疑惑，"段祺瑞率兵北上，促进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为欣幸。惟闻段夙无种族思想，而与袁世凯关系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当推诚相与，然究竟有无别谋，亦宜密为筹备，免堕奸计而误事机。"[105]

清朝的命运却由这一电决定了，退位是唯一体面的方式。2月5日，苏州少年叶圣陶看了报纸，"则知清廷逊位大致可以有望，北方军队及大臣无不赞同共和国矣"。[106]

二、退位诏书·隆裕太后

到底谁起草了退位诏书？有多个不同版本，百年来尚无定论。

1912年2月6日，天津《大公报》消息，退位诏书的草案于2月2日呈进，执笔者为华世奎、阮忠枢。次日，又有消息称，此一诏书是隆裕太后命



隆裕太后

徐世昌起草的，昨已将草案交袁内阁校阅，袁以此次皇上退出政权，断非历代亡国可比，等将来颁诏时，拟由内阁撰定，请旨颁布。

原新疆布政使王树枏就说："其逊位之召皆世凯所拟也。"[107]

2月22日，诏书颁布10天后，《申报》消息说："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张竞生《南北议和见闻录》称："退位各诏，系学部副大臣张元奇拟稿进呈，清太后交世续、徐世昌斟酌，经徐世昌删订润色，然后盖用御宝。"大概就来源于这个消息。[108]

世传洪述祖早在1911年10月底就起草过一份退位诏草稿。11月21日，洪述祖自天津写给赵凤昌的密函附有此稿，只是说："即日择地与全国国民议宪政。自宣布此次谕旨之后，立即停止战争。……所议宪法，但求于中国土地人民多所保全，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余与皇帝均乐观厥成"。显然，这份草稿还不是退位诏书的底稿。

侍从武官唐在礼回忆：

> 谈到退位诏书，当时我们总以为是袁世凯幕下专拟奏稿的文案阮忠枢所草拟的……据说最早的退位诏书是直隶候补道员洪述祖所拟的。……其后又听说张锡銮也找人拟过一稿交叶恭绰修正，叶迟迟未动笔。而传闻最盛的是南方张季直与赵竹君所拟之稿，用电报传递至京，后经汪衮甫[荣宝]、徐世昌等修改。惟稿内原无"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隆裕阅后再三斟酌，认为："这样下诏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因此她两次提出要"由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并且说："只有这样我才放心，如其把天下交给革命党，叫我束手无策，就不如和他们支持一阵。"因此，就来往商量了两趟，才由袁叫人添写了这个句意。[109]

叶恭绰回忆，逊位诏书，张锡銮早就叫人拟了一稿，大家认为冗长，不满意，交给他修正，他觉得为时还早，就密藏在衣袋中。拖到1912年2月7日前后，他正准备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謇、赵

凤昌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110]

陆丹林《革命史谭》则说：“外间所知道的说优待清室条件，是他 [张謇] 和赵凤昌主稿。名义上是如此，事实上这篇东西和清帝退位诏，都是诸宗元起草的。”[111]

路透社从北京发出消息说，退位谕旨已经颁发，了解内情的莫理循 2 月 6 日给布拉姆写信：

> 这一说法为时过早。……
>
> 这道谕旨正由梁士诒草拟中，昨天他还同我磋商这件事。他认为在十天之内不可能颁发……

2 月 9 日，他又写信给布拉姆：

> 目前已准备了三个文件，1. 退位诏书；2. 皇帝宣布退位的文告；3. 致各国公使馆的通函。梁士诒，邮传部长，正在撰写退位诏书；文告是大约二十位大臣共同写成的，致各国公使馆的通函是颜惠卿博士用英文写的，已经译成中文，目前正由袁世凯审阅。[112]

同一天，李石曾、朱芾煌致电汪精卫：

> 已向袁 [世凯]、梁 [士诒] 尽力交涉，舌战良久，……惟退位事，字样改为“以权位公诸天下”。又清帝退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数字，须改为“大清皇帝尊号源（延）缆（续）如旧”等字。芾思此数字名异实同，似不妨少为退就；为彼留对付清后之地步。据梁云，若民军能照此答复，必能即刻宣布共和。

次日，朱芾煌、李石曾又致电汪精卫说，同见梁士诒，“已将逊位诏拟定呈进，念六或念八准发表”。[113]

南、北之间重要细节的讨论都是与梁士诒进行的，退位诏书的起草由他掌握。所以，朱尔典给格雷的信里说，梁士诒“在这幕企图以和平驱逐统治中国将近三个世纪的一个家族而告终的奇怪戏剧中扮演主要角色”。[114]

那是他最忙碌、最紧张的时期，所以，“退位诏下，一睡两日”。而他门人编的年谱则说：

> 退位诏书是清一代最后结束，原文系由南中将稿电来，该稿为张謇手笔，后经袁左右增加授彼全权一笔而发表（见张孝若书），其所插入语对于后来发生不少影响。末三语为天津某巨公所拟，末一语尤为人所称道，盖分际轻重，恰到好处，欲易以他语，实至不易也。[115]

曹汝霖也听说，逊位诏书由南方拟定寄来，是南通张謇的手笔。[116]

胡汉民自传说：“清帝溥仪退位之宣言，由张謇起草，交唐绍仪电京使发之，乃于最末加‘授袁世凯全权’一语，袁殆自认为取得政权于满洲，而作此狡狯也。先生 [孙中山] 见之，则大怒责其不当；而袁与唐诿之清廷，且以其为遗言之性质，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117]

胡汉民看了张孝若给父亲张謇写的传记，1930 年 2 月 18 日写信给谭延闿转告孝若：

> 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措词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亦以为甚善，照电袁……[118]

早在 1912 年 1 月 22 日，张謇到上海，“知北方逊位诏初三日 [1 月 21 日] 本可下，以南方一电疑而沮焉”。2 月 3 日，他听说袁世凯这一天进宫，“陈说逊位及优待条件”。[119]

几乎所有史书都众口一词认为，袁世凯自 1 月 16 日在东安门外丁字街口遇炸弹袭击之后，就再也没有进宫，凡事交给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他们进宫转述。其实，他至少两次进宫与隆裕太后见面。2 月 3 日，起草圣旨的许

宝蘅日记说："六时起，到公署，总理入对……"[120]"总理"即袁世凯，"入对"就是见隆裕太后，当然是谈退位之事。次日，张謇日记："闻慰廷已有议优待条件之权。"从汪荣宝日记可知，张謇与袁内阁之间有电报往还，消息灵通可以想见。2月6日《大公报》曾披露2月2日就将退位诏书的草稿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同日呈给隆裕太后，胡汉民说的"内阁复电"很可能是张謇对这一草稿的修改稿。

2月11日，张謇日记说，"闻清帝已定逊位而中尼。"[121]当天，袁世凯再度入宫，七时一刻许宝蘅到公署，"唐绍仪、张謇来电，促于今日宣布逊位诏书，总理入对，因优待条件仍有争议，故未发表。"[122]

2月13日，张謇在南通得知逊位诏已于前一天下达。2月15日他在故乡海门长乐，"见逊位诏，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123]

张孝若得到胡汉民的信不久，又听说他父亲的亲笔原稿，存在赵竹君家。"辛亥前后，赵先生本参预大计及建立民主之役。那时我父到沪，也常住赵先生家，此电即在彼处属稿，固意中事也。"[124]

赵竹君的儿子赵尊岳回忆，他父亲叫张謇起草了退位诏书底稿，到京后加上"由袁世凯办理"一语，当时，袁尚为清臣，用"请"不宜，来日将为国家元首，又不宜用"命"字，忽有人脱口而出"由"字如何，他以为一字千金，不可更改。"由袁世凯……"一句中的这个"由"字，确是传递出政权转移的微妙之处。

张謇的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请他记辛亥事，他说曾影印以存其真。[125]遗憾的是在《申报》上找不到这份影印件。张謇本人的日记、自订年谱也找不到任何痕迹。

张謇到底是否起草了退位诏书初稿，迄今仍无法定论。

有人回忆，逊位诏书是经过南方修改过的。诏书末段"……岂不"出自刘厚生的手笔。[126]刘厚生自述这份稿子是他替张謇执笔的，南北议和代表推张謇起草之初，张彷徨于执笔责任，又踌躇于如何落墨，在上海小东门的大生办事处问他怎么办，他答："今天既不是张某篡位自立，而且把政权还给老百姓，这是普天同庆的事，正应慨然承当，何所用其犹豫?"张謇就叫他执笔，他立即动笔，在二三十分钟内草就。张謇默诵一过，略易数字，连说

"可用、可用"，就转给唐绍仪，唐电告北京。

好几个参与清廷机密的老朋友告诉他，电稿到京，袁世凯、徐世昌就交给了汪荣宝，汪读后，就说："张季直为文，力模班史，词句硬碰硬，此稿却婉转庄肃，情见乎词，不类季直手笔，或当另有其人。"汪把末句改"有厚望焉"改为"岂不懿欤"。定稿后送给隆裕太后，隆裕见稿泫然流涕说："我和皇帝决不以一姓尊荣，叫四万万人吃苦头。"她一头看，一头哭，忍泪说道："这里所说的话，都是我心里要说的话。"[127]

为人称道的最后一句"岂不懿欤"，很可能是徐世昌加上去的。12月5日，廖宇春起草的《草莽小臣吁恳皇上逊位奏疏》中即有同样的句子，也无特别之处：

> 何若效法尧舜华盛顿，慨然让位，徇革军之请，改为共和，不但与前圣后先媲美，……化汉满为一族，杜外族之觊觎，实行民主立宪，不血刃而天下平，则陛下之圣功，弥天地，亘古今，岂不懿欤。[128]

唐在礼、刘厚生等人的回忆都提到了汪荣宝，汪入都参与机要是在2月6日。此前，1月19日，他就听说逊位诏书已预备妥帖，三四日必当宣布矣。1月22日，他又听说"内阁拟就上谕两道，一为逊国，一为宣战，阁臣不自擅决，付诸皇族会议，但若采用乙种办法，阁臣即一律辞职"。2月1日，他听说逊位诏书将于2月4日发布。那天，莫理循日记中写道："退位诏书将在2月4日宣布，我生日的那一天！"

第二天，汪荣宝听说逊位诏书已于午后四时颁布。4日，他从《北京日报》看到消息，逊位诏书今日不能发表，有缓至8日之说。2月5日，梁士诒和阮忠枢来信，袁世凯促他入都，襄理阁务。

2月8日，袁世凯内阁已在预备种种善后的文牍，汪荣宝起草了《对北方各省督抚宣言》：

> 此次改革为中国从来未有之变局，非舍故君而代以新君，乃由帝政而变为民政，非但与印、韩诸国亡国败家者不同，抑且与夏商

以来易姓受命者迥异。……吾人同属国民，各有天职，艰难缔造，义不容辞。……诸公爱在前朝，夙膺疆寄，幸各同心戮力，克奏成功，有以慰同胞望治之心，方不负清廷致政之意。

那几天，他参与起草的奏折等文书，在日记中都有记载，如果他参与起草或修改过退位诏书，应该会有记录。退位诏下达前几天，2月9日，梁士诒告诉他，“南中激烈派反对优待条件，议欲杀唐、伍两君，恐生枝节”。他和陆宗舆拟致电张謇设法疏通。饭后，他拟谕旨一道，又拟电两通。2月10日，他到内阁，优待条款已得南方代表伍廷芳电复，略加修正，仍与前案无甚差异，并称迁就已至极点，决难再让，拟即奏请照此宣布，梁士诒嘱他草奏，拟于第二天呈递。饭后，梁要他按袁世凯的意思将奏折修正数处，下午四时脱稿，交给梁，他当晚就去了天津。第二天，他被内阁电话紧急召回北京，梁、阮告诉他，退位诏发表在即，“应办文牍甚多”，袁命促他等速回，当天拟电稿及信稿各两件。期间，他一语未提及退位诏书的起草。2月12日早上，他到内阁，“本日国务大臣入内请旨发表，同人均来此静候，惴惴恐有中变，比及午，闻各大臣到阁，一切照办矣”。[129]

2月10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说：“至优待条件发生于辞位，若云辞政，则十九条已无政权，何待今日。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位字。明日入觐，务恳力持办到辞位二字，即时发表。”[130]

退位诏书是南北妥协的产物，既满足了南方对共和的渴望：“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又满足了袁世凯对权力的追求，“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同时保全了皇室的安富尊荣，“予与皇帝得以退处悠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

这样一份划分时代的文件，当然不可能出自一个人之手，而是经过多次筹商、讨论、修改的。

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布的这道诏书终结了清朝267年的江山，也给中国的王朝历史画了个句号。44岁的隆裕太后作出此举，也让一个朝代和平落幕。第二天，朱尔典写信给格雷说：

作为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七年，而且它早期的皇帝们曾使中国达到空前兴旺发达状态的一个王朝的最后法令，这道告别谕旨是具有某些历史兴味的。不过，虽然为准备这个谕旨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很显然，该谕旨的起草人在宣布把古老的帝国变为新生的共和国时，感到了某些困难。[131]

时在威海卫的英国人庄士敦这样评论：

退位诏书必然会引起研究政治科学的学者们的兴趣。皇帝本身则成了促进君主政体向共和政体转变的桥梁。皇帝直至最后时刻还保持着他的专制，而那包含着皇帝要从政治上消失的共和政体，却是由皇帝自己在最后的诏书中批准产生的。……有人说，皇帝的退位是在灾难性的时刻为了“保全面子”而想出来的一种体面的处理办法。但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的东西却比这更多。

也许诏书的最大影响在于诉诸于全国圣人哲士的智慧，并采纳他们关于政治统治权最终席位的理论。当诏书起草人写到意味着放弃皇权的字句时，他也许会丧失勇气，但是孟子精神指引他写下去了。现在诏书留给我们的是，希望这位末代皇帝在这类重大问题上所遵循的古代贤人的教导，不至于被他的民国的后继者们以轻率的态度来对待。……让这个新中国的建筑师们记住，他们也无疑地必须在遵循和不遵循“古代圣人的箴言”之间进行选择——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的选择；同时，他们不要忘记，他们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幸福，可能有赖于他们所选择的道路。[132]

梁士诒对身边的人说：“当国势危时，清廷所以饵我者甚至。御赐物件前后十余种，又赏紫禁城骑马及赏紫缰等等。”[133]

1911年12月11日，斐格向法国外长汇报：“11月30日的一道圣旨授予各部大臣在紫禁城里骑马行走的权利。这种恩宠过去难得给几位阁老。他们曾想把这种恩宠给了各部大臣后，能提高这种官职的威望。这一算计在现

实面前没能站住脚。”[134]

在宣布退位前的那些日子，隆裕太后不断地给身边的大臣赏赐，从穿的、用的到吃的，显示皇恩浩荡，然而得到赏赐的人并不能挽救王朝的命运。袁世凯、徐世昌、那桐、荣庆、梁士诒、绍英这样的大臣得到的多，许宝蘅这样的小臣也得到过，退位诏书颁布的前两天，他还得到隆裕太后赏给他的绸缎两卷。

1912年1月8日，袁世凯身边的蔡廷干给莫理循来信：

> 今天没有新的进展。好象暴风雨前我们得到一时平静。
>
> 我随函附上一份皇太后作为皇恩每天赐给袁世凯的食品菜肴的菜谱。……每天送两次食物。[135]

隆裕太后是平庸的，在王朝最严峻的危机关头，亲贵束手，无人起来承担，她以一个女子，也许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下台。她在一次御前会议上抱着宣统大哭，说："我悔不随先帝早死，免遭这般惨局。"当她流泪、哭泣时，她就像一个普通的女子，而不像掌握着最好权柄的统治者，那是人性自然的流露。1月28日，当段祺瑞等人的联名电奏到，她默默无言，只是令交给各王公一阅。[136]

因为之前，袁世凯他们的内阁联奏，她已明白，这一天早晚要来。更早在1911年12月28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见袁世凯及各国务大臣，垂泪对袁世凯说："你看着应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总不怨你。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你。"言至此，她禁不住痛哭，诸大臣也哭。她又说："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137]

就是这一天她下旨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决。

1912年1月16日，莫理循写信给布拉姆说，"皇太后在整个这场危机中表现不错。"[138]

在退位诏书颁布前夕，英国《泰晤士报》公开说："皇太后在最近的谈判全过程中，比任何一个亲王显得更有政治家的气质。"[139]

叶恭绰说，"宣布共和，实隆裕所独断。……又宗室亲贵反对宣布共和

者甚多，隆裕均严拒之，或婉止之。……足见隆裕之有决断，实非寻常”。[140]

外务大臣胡惟德回忆，1 月 30 日，她召开御前会议时：

> 亲贵即无持反对论者矣，然仍唯唯其词，皇太后怒甚言：“你们是要我承担耳。”其后宣布共和，乃皇太后一人主持……[141]

退位优待条件的文本往返商讨数十次，每次都是梁士诒和赵秉钧拿着稿进宫，“太后逐字讨论，见解明决，对宗庙灵寝最为注意”。原稿中有“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一句，她担心用“编制”字样，则将来陆军部尽可随意改编，殊为不妥，最后采用叶恭绰的意见，加上一句，“额数俸饷仍如其旧”，她果然同意了。当时禁卫军有不稳的谣传，“且此条不成立，其他无从议及，故隆裕之决断，颇关重要也”。[142]

“隆裕对退位诏书的内容和字句都很用心，每次研究都要细读斟酌字句，而世续则来往奔走”，“由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一句就是她要求加上的，来往商量了两遍。[143]

隆裕太后本名叶赫那拉·静芬，是都统桂祥的女儿，慈禧太后的侄女，1889 年她之所以被册立为光绪帝的皇后，主要是因为她的出身，论相貌她不过中等之姿，与光绪帝也没什么感情。1908 年，宣统接位之后，她被尊为皇太后，尊称为隆裕，她对国事并无多大兴趣。德龄公主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说：

> 现在这位皇太后（隆裕）不关心国事，她知道她不能操纵这些事，所以她也不关心。……
>
> 她是一位温和的、文静的、谦逊的人，有点冷漠。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她不能和她的婶母——也就是已故的慈禧太后相比。
>
> ……她根本不想去控制政府，这点我非常确信。她想要的仅仅是平安而已。事实上，她的一生受尽磨难，虽然她是老太后的侄女，但老太后用一种很刻薄的方式对待她。[144]

在出入于晚清宫廷的美国传教士赫德兰眼里：隆裕皇后长得一点都不好



隆裕太后(右一)与慈禧太后在一起

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她稍微有点驼背，瘦骨嶙峋。脸很长，肤色灰黄，牙齿大多是蛀牙。她十分和善，毫无傲慢之举。我们觐见时向她问候致意，她总是以礼相待，却从不多说一句话……每到夏天，我们有时候会看见皇后在侍女的陪伴下在宫中漫无目的地散步。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她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

1912 年 1 月 19 日，隆裕太后在御前会议上对继续战争充满忧虑，“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临结束时，载泽奏：“今日臣等所奏之言，请太后还后宫千万不可对御前太监说，因为事关重大，请太后格外谨慎。”她答：“那是自然。我当初侍奉太皇太后，是何等谨慎，你不信，可以问载涛。”善耆奏：“载泽所言甚是，太后从先圣孝，今日与彼时不同。”她不语。这是溥伟日记所记。[145]

幼帝溥仪日后回忆，“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太后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早被袁世凯喂饱而又是赵秉钧的把兄弟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却先开了口：共和了，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呵，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可全没有了；咱娘儿们就全完啦。”[146]

此次御前会议上，主战的只有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等寥寥数人。过了两天，载沣转告溥伟：“你前奏对，语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时事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知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147]

载涛回忆隆裕太后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

> 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平日宠信太监张兰德［外间通称“小德张”］，言听计从。张亦居然以李莲英自居，器小易盈，惟知聚敛货财。袁世凯摸清这条路线，专派人密向张联络，袁世凯许以巨额金钱，叫他向隆裕使用威胁利诱手段，说袁世凯如何忠心，但是各省纷纷独立，前敌军队撤不下来，外债无望，饷项难筹，若不答应民党的要求，则革命军队杀到北京，您的生命难保，倘能依从让位，则优待条件如何如何，仍可安居宫闱，长享尊荣富贵，袁世凯一切可以担保云云。奕劻、那桐本来只

认得钱，与小德张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圈套。奕劻在天津买的大楼房就是张的产业。[148]

载润也回忆：“隆裕闻革命军起，惟恐失去太后之地位与享受，初意亦在主战；后因张兰德受了袁世凯之贿，乃劝隆裕共和，谓共和仅是去掉摄政王之职权，太后之尊严与享受依然如故。隆裕信之，遂有逊位之举。……”

袁世凯极力拉拢奕劻、那桐和张兰德三人，以满足他们的贪财之欲，用张兰德哄骗隆裕，用奕劻、那桐挟制载沣。[149]

所以，王闿运感叹“禅让亦以贿成”。

王树枏也说，袁世凯“以重金贿买王公大臣及宦寺左右，朝夕恫吓太后，讽之退位，建民主共和政体”。[150]

所谓飞艇扔炸弹就是恫吓。1911年12月27日，唐绍仪电请袁内阁代奏：“查民军宗旨，以改建共和为目的，若我不承认，即不允再行会议。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近因新制飞艇二艘，……声势愈大。”[151]

外界都有这个传闻，这一天，奉天教员樊德宽给赵尔巽的信里提到：

“袁世凯密约为内应，兼有大总统孙汶带回飞艇数艘，能自空中掷下炸弹，利害无比，指炸何，将不能虚发。”[152]

廖宇春也记得唐绍仪的来电：“孙文归来，新从欧洲运到飞艇两只，预备空中战斗之用。”[153]

飞艇就是指飞机，当时海外华侨确实捐款买了飞机。

12月18日，侯耀从汉口致电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革命军方面] 甚至还声称拥有一架飞机。我知道其中的底细。如果说确实有两个为黎都督办事的英国人在上海买下了一架伐隆厂的飞机，但这架飞机目前在中国却只有惟一的飞机师尚布勒兹先生才能驾驶。这位先生现在在汉口，他已接到了我不许他离开租界的正式命令，以避免作出任何干预当前冲突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行为。”[154]

袁世凯以种种谣诼以相恫吓，“说民军所用新式军械都是从外国购买，坚利无敌，且飞机翱翔空中，来去无端，炸弹一掷则京师立成齑粉。隆裕太后闻

之，惊惧涕泣，不知所措。警讯频传一日数惊。袁世凯乘机劝她逊位”。[155]

旅美华侨赵昱回忆：

> 九月间，芝加哥同盟会萧雨滋、梅乔林、梅光培建议购买飞机，以充军用。经筹饷局核准，至十月初旬，购买寇缔司式 [Cutis] 飞机六架，聘请威尔霍士 [Wilcox] 为飞机师，年俸一万美元。芝加哥同盟会会员李绮庵、余夔志愿从军，学习飞行。十月下旬，我偕飞机师威尔霍士夫妇及李绮庵、余夔回国。十一月十二日 [12 月 31 日] 抵沪时，中山先生派人乘战舰迎接。
>
> ……威尔霍士自称飞行经验丰富，但奉母命，不得凌空飞行，只能教练。……但据唐绍仪对我说：“革命党飞机队抵沪后，袁世凯亦获情报。袁乃据以入奏帝后，故作危言耸听，谓革命党飞机队已抵沪，声称倘不即议共和，行将轰炸皇城。一时寡妇孤儿，意为之夺，乃决定退位。故飞机队对促成共和，其功不少。”[156]

革命党有飞机是真的，但没有飞行员，连教练都不能凌空飞行，飞机压根飞不起来，可这一虚幻的消息用来吓唬隆裕太后却足矣。

在上海讨论优待清室条款，议及岁费时，孙中山脱口而出，“虽岁给一千万何伤”。赵竹君对他说：“此当付国会表决，非一二人所可定夺。”因亡清在即，流亡海外 16 年的孙中山喜出望外，溢于言表。[157]

最后确定年费四百万两。1912 年 2 月 2 日，许宝蘅到公署，国务大臣入对，商酌优待条件，他听说隆裕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也认可。2 月 6 日，汪荣宝到内阁，优待条件已经皇太后亲自改定。2 月 10 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受礼，“慈颜颇为憔悴”。[158]

唐在礼回忆，2 月 12 日天刚亮，他们由东华门到乾清宫。隆裕太后出来以后，胡惟德领着大家鞠了三个躬。这是第一次改变大臣上朝的礼节。隆裕点了点头作为还礼。这时从后面又跟着走出来几个随扈太监。隆裕还礼之后，就落座在正中的宝座上，溥仪坐在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

> 隆裕把预先写好的诏书拿在手里，说：“……我和皇上为了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照议和的条件把国家的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叫袁世凯早点出来，使天下早点安宁吧。”隆裕说着，就慢慢地站了起来，把手里拿着的诏书递向胡惟德，说：“胡惟德，你把我的意思告诉袁世凯，这道诏书也交给他吧。”……这时候当场的空气很肃静，太后脸上露上凄惨的样子，溥仪就呆在旁边。

对隆裕太后说来，这不仅是最后一次颁布诏书，也是头一次改变过去大礼朝见，接受三鞠躬行礼。这也是经过几次三番的商量才谈妥的，所以她能处之泰然。[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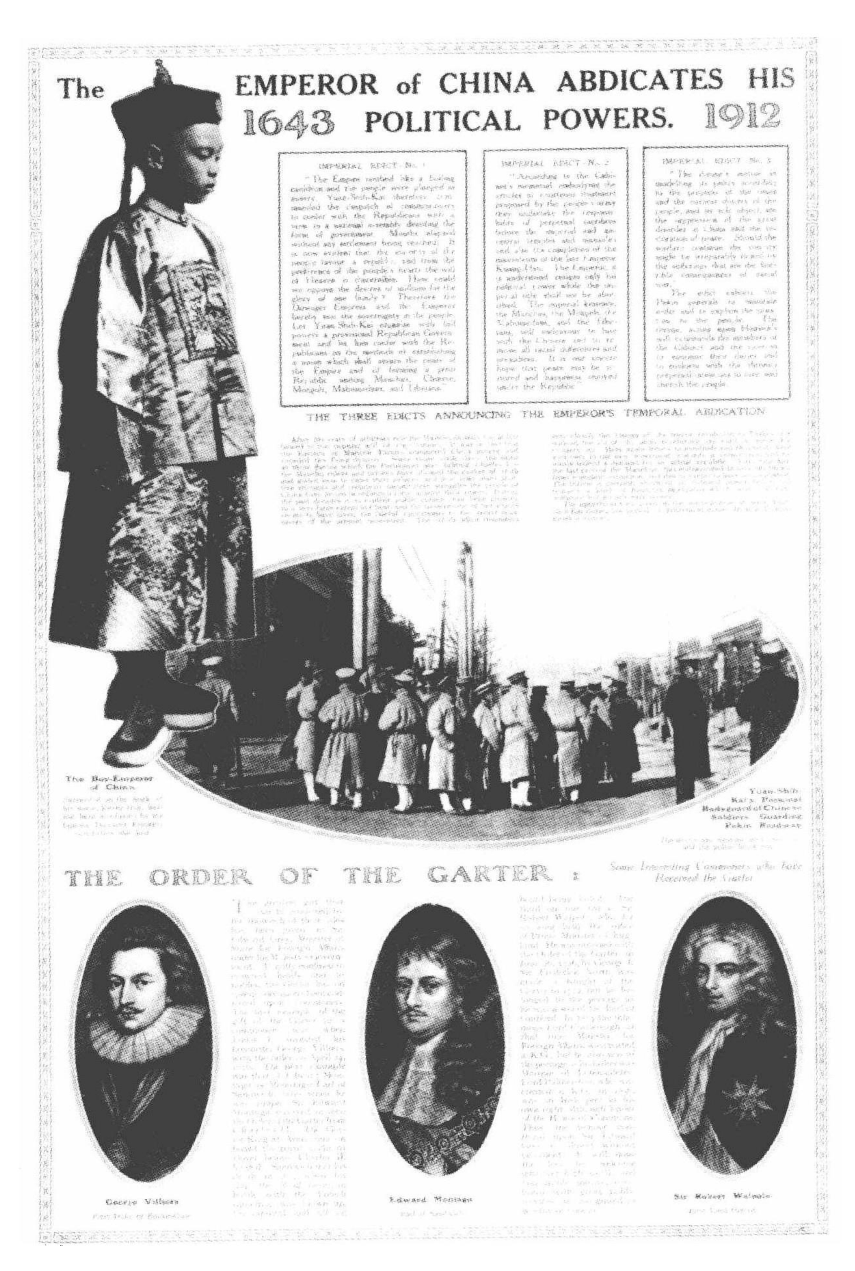
另一位在场的民政大臣赵秉钧对恽毓鼎说到当时情形，隆裕太后提出，要率皇帝退居颐和园，让出宫殿。诸臣都说：“条件中虽有此说，然大内有太庙、社稷坛，内殿又有祖宗圣像，断非民国所敢居住。且大总统只有办事公所，并不能深居宫殿。又况皇太后为天下生灵让退，民国必十二分优礼，万无他意，请皇太后放心。”[160]

叶恭绰回忆，那天早晨还有数人想面阻退位诏书的发布，隆裕太后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等她将诏书盖印发出，就是想阻止，也来不及了。[161]

当天，汪荣宝日记说：

> 大清入主中国自顺治元年甲申至今宣统三年辛亥，凡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遂以统治权还付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开千古未有之局，固由全国志士辛苦奔走之功，而我隆裕皇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让之，盛心亦当令我国民感念于无极矣于戏。隆裕皇太后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下午，他登高楼一望，“匕鬯不惊，井邑无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


The EMPEROR of CHINA ABDICATES HIS
1643 POLITICAL POWERS. 1912
THE THREE EDICTS ANNOUNCING THE EMPEROR'S TEMPORAL ABDICATION
The Boy-Emperor of China
Yuan-Shih-Kai's Personal Bodyguard of Chinese Soldiers Guarding Pekin Roadway
THE ORDER OF THE GARTER:
George Villiers
Edward Montagu
Sir Robert Walpole

外国媒体报道清帝退位

日之文明者哉？”[162]

2月13日，朱尔典给格雷的信中说：

……最初由南方各省发出的实行共和的呼吁，在北方各将领的奏折中得到了反响，直到最后它终于成为全国的普遍要求。朝廷不想从自私自利的动机出发，阻挠国民的意愿；隆裕太后遵循古圣先贤关于天下为公的遗训，将统治权交还国家，并且正式宣布赞成共和。……[163]

2月16日，伦敦《泰晤士报》的社论说：“天子已退位，清朝统治不复存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一些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不能不怀疑，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自从最遥远的历史早期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国政府形式，来代替君主政体？中国，总之就是这个中国，决心要这样做。中国已经高高兴兴地着手做这样伟大的事情。我们衷心希望，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它所切望的进步的稳定的政府。”[164]

2月17日是旧历新年，隆裕太后照常升皇极门内宁寿宫，一品以下人员都在皇极门外行三跪九叩大礼，照常作乐。那桐日记称，这一天风定天晴，气象甚好。

恽毓鼎在家中也面向东北行三跪九叩大礼，他的《辛亥除夕守岁》诗露出的却是易代的凄凉：“疏槐短柏总伤神。”

警察厅用黄纸缮写隆裕太后改为共和政体的诏书，在天安门外供在牌座上。皇城内三殿对外开放，任人游览，进去游览的人却不多。社稷坛对外开放，改为中央公园，只有来今雨轩已落成，其余都未布置，任人游览三天，不收门票，游人不少。[165]

英国武官韦乐沛中校2月2日的报告说：

> 关于直隶省，有迹象表明很可能和平解决，而且据说隆裕太后对此事已作出决定。人们仍可能预料将产生麻烦的那些不妥协分子，是张勋提督驻徐州府（在江北）的部队以及前土匪头目张作霖和冯德麟所率领的满洲巡防队（地方部队），他们已宣称，如果皇帝退位和建立共和，他们便打算进军北京。[166]

然而，退位诏书一下，这些麻烦都没有发生，整个北方几乎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局。2 月 19 日，莫理循写信给蔡廷干："我高兴听到东三省已经同意实行共和。看来目前一切是一帆风顺。"[167]

2 月 25 日，高拉尔德致信法国陆军部长："几个不肯妥协的满洲君主主义者的阴谋，在太后本人的请求下也停止了。"[168]

最后连升允也不得不接受。

这年 9 月 11 日，黄兴抵京当晚，满清皇族在那桐宅中为他和孙中山举行欢迎会，黄兴在答词中说：不过三个月，大局略定，"全赖隆裕皇太后、皇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远追尧舜揖让之盛心，遂使全国早日统一，以与法、美共和相比并"。[169]

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说，"孝定景皇后让出政权，以免生民糜烂，实为女中尧舜，民国当然有优待条件之酬报，永远履行，与民国相终始"。[170]

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后，致书退位的皇室，称誉隆裕太后"天下为公"。

奏事处太监邱和回忆，退位诏下，隆裕太后治事如常例，久不见有人来奏国事，她问奏事处太监："今日何无国事？"奏事处太监回答："国事已归袁世凯，太后但请问家事可耳！"她爽然若失。[171]

载润说："其实，隆裕对共和之意义并不了解，只不过认为是把载沣之政权，移交给袁世凯而已，而在逊位诏书中仍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之语。其后发现民国优待条件与张兰德所言完全不符，遂终日抑郁，逾年而殁。"[172]

不光她不太明白退位到底是怎么回事，绍英也不大明白，他在春节那天的日记说，"况共和政体办理能否妥协，各国能否承认，尚未可知，将来皇上典学深纯，国民思念旧主，友邦推举贤明，未始不可由共和复归帝政，是

在天演物竞出于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逆料，惟祝国运亨通，苟全性命，获免瓜分，是诚五大族国民之幸福也”。[173]

庆亲王更不明白，以为还是他们的江山，只是暂交袁世凯管了。北京兵变发生时，曹汝霖听说庆王也在六国饭店，即去慰问。“他说，昨夜兵丁到我家，竟放起火来了，我只好出来暂避，幸即救熄，想不到全权交给慰廷(袁的号)，他也没有办法。共和开始，兵丁即自由行动，往后怎样办呢？听他的口气，好像以为清室只交袁组织共和政府，清帝尚在，惟没有政权；对于逊位即亡国，似蒙在鼓里。虽是老迈糊涂，然诏书内加上委袁组共和政府一句，故意含浑，妙不可言，真可面面骗人。”[174]

山西太原的刘大鹏则对袁世凯大为不满，多次在日记中写下：“贼臣袁世凯推倒本朝政府，……号令天下，改为民国。”“袁世凯仇视其君，假藉乱党勒逼朝廷下共和之诏，推位让国。”

退位仅仅一年，1913 年 2 月 22 日，46 岁的隆裕太后黯然谢世，她的死让恽毓鼎想起那个古老的诅咒，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都是叶赫那拉氏，当年爱新觉罗在东北崛起，灭掉叶赫部落，其首领布扬古临死时发下毒誓：“将来即生女子，亦必亡满洲以雪恨。”恽毓鼎感叹：“天耶？人耶？清之亡，虽为隆裕，而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 [慈禧] 也。”[175]

袁世凯亲自在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文武官员服丧 27 天，并且派出全体国务员前往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大会，由议长吴景濂主祭，军界举行的全国陆军哀悼大会，领衔的是段祺瑞。紫禁城内，清朝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176]

陆军哀悼大会的祭文由徐树铮起草，当年的逼宫电也出于他的手笔，祭文称：“中华民国者，大清旧日之版图也。大清旧日之版图，胡为中华民国也？则以大清帝廷，宣布共和故。大清帝廷胡为而宣布共和也？则以太后闵同室之操戈，惜生灵之涂炭，俯从民志，毅然从陆军将领联电奏请故。是中华民国成于太后，而以其荣施被之陆军也。”[177]

4 月 3 日，隆裕太后的灵柩奉移之日，因为人太多，“正阳桥栏杆为人多挤折，跌伤、压伤人甚多，有死者”。[178]

曹汝霖回忆：“隆裕太后崩驾，以人民名义，在中央公园开追悼会，政

府派大员隆重奠祭，悬挂各界挽联，都是恭维颂扬之句，可见人民尚不忘故主。惟闻隆裕太后信用小德张，不知亡国恨，在宫中大兴土木，但比慈禧差得远矣。”[79]

片语息兵戈，民国酬恩应第一；

全军为墨绖，深宫弭乱更何人？

这是副总统黎元洪送的挽联。

三、列强中立

退位诏书颁布第三天，2 月 14 日，袁世凯私下对许宝蘅说：“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许说：“此事若不如此办法，两宫之危险，大局之糜烂，皆不可思议，不过此后诸事，非实力整顿、扫除一切不可，否则共和徒虚名耳。”袁又说：“外人亦助彼党，昨日宣布后，借款便交。”许说：“外人決不能不赞成共和，以其为最美之国体，不赞成则跌其自己之价值也。”[80]

袁世凯特别指出“外人亦助彼党”。

早在 1911 年 12 月 24 日，庆亲王就向朱尔典、伊集院抱怨说：“所有在上海和华南的外国人都赞成共和，委实令人痛心。”朱尔典说了一句：“所有的外国公使还有这样的共同的体验，即再没有别的政府会比当今的中国政府更加令人不满了。”[81]

时局演变之中，始终有外国的因素在起作用，不过，列强并没有帮助南方，整个过程英、法、美等国只是保持了中立，也没有以金钱、武器帮助清廷，日本虽蠢蠢欲动，因为英国的反对，也不得不有所节制。可以说，列强听凭了清朝的崩溃。10 月 16 日和 26 日，法国驻天津领事几次写信给外长：

> 我们租界里有好几个中国旅馆，目前那里广州客人往来十分频繁，大多数西装革履，没有辫子，举止诡秘。总督曾让人请求我指出那些可疑分子，并提出可以给我们的警察局长永久性地配一名保安人员。我断然予以回绝，声明我们的法律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交出属于任何党派的政治嫌疑犯。……
>
> 我刚向总督作了一次明确的说明。租界上确实住着一些革命党人。然而衙门一方面答应得好好的，不干预租界的治安；一方面却又派了一些秘密警察挨家挨户地调查居住者的姓名、出身、职业，等等。
>
> 我通知总督说，从今以后，我将让人逮捕和关押那些行为可能有碍市政治安或反政府骚乱的侦探。……
>
> 在别的租界上，衙门的秘密警察已被驱逐出去。

10月25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写信给驻华公使代办："已决定定居在国际租界的道台曾来看过我。他要求我准许他搜查在法租界码头抛锚的中国船只，以便如他所称逮捕那些'歹毒之徒'。我已说服他不要这么做，我对他指出，这类行动纯属无益，并且会引起愤怒，他的同胞中的大多数都可被指责为同情叛乱分子。"[182]

11月1日，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开会，"捕房督察长向董事会口头报告，道台由于担心他个人的安全，曾表示希望对他在租界内及在城内提供保镖或护卫。总董意识到，道台已向领事团作过同样请求。总董认为，这位狡猾的官员很可能想使革命党及其同情者产生西方人是在支持他的印象。为此总董建议董事会拒绝该道台所提出的要求。董事们一致同意此观点。"直到11月15日，"在领袖领事的紧急催逼下，对于道台作为个人公民身份，已由捕房给予人身保护"。[183]

租界在这场风暴中试图保持中立。

1912年1月12日，宋嘉树写信给孙中山："中国传教士团体的普遍意见是赞成我们的共和事业的，除了现为尚贤堂成员的那两个传教士以外。"[184]

在上海主持"尚贤堂"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如将

清政府完全推翻，则危害甚大”，在革命党攻下南京之前，他曾试图斡旋双方停战，认为立宪是最佳选择。而当他看到情势无法挽回，“特往北京晤满洲各王公，劝清帝退位，藉以尽免民生涂炭，保王室安全之微意焉”。[185]

溥伟说，1月27日，美国人李佳白到王府找他，劝他主张共和，“以大义责之，惭而退”。[186]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中国创办了《万国公报》、山西大学堂，著书立说，致力于革新事业，而对革命充满怀疑。1911年12月7日，郑孝胥日记说：“李提摩太所开之广学会反对共和，力言英国宪法之善，于棋盘街张贴广告，革党不敢问也。”[187]

当共和不可阻挡，李提摩太支持袁世凯，认为孙中山让位于袁，“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聪明的一步棋”。[188]

上海《教务杂志》1912年1月号刊登苏格兰传教士窦乐安的报道：

> 有一所教堂为帮助革命军，进行集会，分发文告征募捐款，外国牧师劝告该堂负责人说，不论我们个人的倾向如何，作为教会我们应当持中立态度。外国牧师还说，他提议把征募来的捐款交给红十字会，使双方均能受益。他还说，在祈祷中我们应当求主对双方都能施予怜悯。一位信徒却站起来说道：“这场战争是上帝安排的，它解放我们脱离满清统治的腐败无能，我们就是在这种统治下受难的。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从未有人要求以色列人为法老祈祷，我想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记载。”[189]

当时在华的外交官、传教士看法、心思不一，但保持中立是主流，各国政府也是如此。

容闳写信给孙中山说：“首则英吉利，次则日、俄、法、德，此类除美国之外的掠夺性国家，皆若兀鹰眈眈相视，预备破坏共和，我们知道，这些国家无一是完全对共和国友善者。”[190]

1911年10月13日，武昌起事仅仅三天，日本陆军首相石本新六就在内阁会议提案，“在清朝面临如此巨变之际，我国应如何应变？究竟要安于现

状？还是应考虑出兵先占领某些要塞之地？如果考虑出兵，究竟是先占领何地较为妥当？”同一天，日本陆军的军务长田中义一正式要求海军草拟出兵中国的作战计划。[197]

12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致电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山座，直至今日，仍认为君主立宪为匡济清国时局的最良方案，切望英国政府同意并为此努力。同一天，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对英国公使朱尔典说：“如清国实施共和制度，并进而由此引起更大混乱，日本国不但在实质上将遭受甚大损害，而且在思想界亦必蒙受极大影响。”他进一步想说服英使，“若坐视其狂妄恣肆，甚至坐视其实现共和制度，则将一发不知自制，甚或想入非非，以为万事均可按照彼等之意愿推进。其结果，必然是排外思潮更加泛滥，以致掀起回收利权之狂潮，动辄与外国人作对”。朱尔典只是回答：“看来以袁世凯为大总统，时局或可得到收拾。”英国的方针已定，日本难以扭转。

前一天他们在私下交谈时，朱尔典坦言：“但英国在华中、华南地区拥有贸易上的重大利害关系，故英国政府不能无视南方人的思想感情，甘冒遭受攻击的风险而轻易采取措施，以强行贯彻君主立宪。倘若莫理循等人已将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之类意见致电本国报界，情况将更加如此。”[198]

“四国银行团”的美国代表司戴德提议“由国际银行团出面支持清廷或袁氏”，这个主张得到法、德两国银行团代表的支持，认为这样可以迫使革命党与袁妥协，朱尔典明确反对，理由是：“叛军所占之领土，占外国人民居住及商业活动区域之百分之七十五，任何对叛军敌对的行动将威胁英国人民之安全”，“英国邻近殖民地香港、新加坡之人民亦同情革命，英国若欲影响双方的争斗，将招惹麻烦”。而且他认为满清已腐朽、不可救药，外人只能支持袁氏但不能拯救清朝，而支持袁氏尚非其时。[199]

英国仅仅出于自身的利害考虑，也不愿开罪南方革命党人，在南北破裂和共和制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德国外交部代理秘书写给总理的一份说帖分析，所有住在临时政府势力区域之公私英人，以及《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自始即向共和徒党暗送秋波。驻华英使之态度，因受此辈英人影响之故，于是动摇不定”。[200]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诞生的背后也有英国的推动因素。张一麐回忆，

南京攻克后，他在程德全身边，“一日某国领事来谒程，屏左右言，是夕，都督密语余，明日将往沪请黄大元帅。余曰，何也？答曰，今日某国领事以某公使密电示余，谓南方非另立政府，不能推倒满清。”次日，程即去上海。参谋长刘之洁也告诉他，“近日北方军官某来言，北军要求以项城为大总统，南方先立政府，而后让与项城”。后来他入京，“闻某使以清廷亲贵不足与谋，故劝项城自为之，合前后所闻，则民国成立，由南京政府让与项城为元首，则某国全权公使某为之也”。[195]

某国公使显然指朱尔典，从南北议和到逼退清廷，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日本对中国有更多的企图，在政体上，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出现共和制。12月23日，伊集院对袁世凯说：“日本与贵国关系，与欧美各国单纯着眼于物质利害者不同，万一贵国变成共和政体，我国国民在思想上必受到不少影响。”[196]

12月29日，莫理循给布拉姆信里说：“可靠消息来源，共和思潮在日本有很大增长，天皇担心民国的建立对日本起激励作用。”[197]

同时，日本方面又担心别国在中国多占了好处，日本舆论不断指责德国，就是生怕德国支持清廷，捞取更多的利益。12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向总理汇报：“近数星期以来，一部分中国报纸对德大施攻击。……其主要材料则为德国方面曾以军火及军官帮助清室政府。”“其中尤以日本报纸，或在日本势力下之报纸，煽动最甚。”

12月22日，德国外交部秘书致电德国驻日代办：“帝国政府自中国变化开始以来，即坚持不干涉原则。所有报纸传闻，……实属不确。”[198]

德国代理外交大臣与日本驻德大使杉村面晤时表示：“关于清国时局问题，本人认为，只要不危及外国人之人身及财产安全，即应听任清国人自行解决，外国加以干涉，未必合宜。”[199]

“英国人——他们的议论在上海具有最大的影响——赞成让中国自己选择他们的政治制度，无论是帝制或者共和。”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宣布，“深愿看见在中国人民所要的任何一种政体之下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200]

英国当时的影响力，没有一个列强可比。11月18日，莫理循请汪荣宝等人吃饭，谈及中国的时局，断定日本若得不到英国同意，决不敢单独行动。[201]

1912年1月10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对日本代办表示，外力干涉殊为危

险，而且可能陷中国于南北分裂。[illegible]

但日本没有完全死心，袁世凯告诉黄兴，“其有一时期最为危险，当南北意见尚未一致，逊位诏书待颁之时，忽告有便衣日本人出人宫禁，余闻之大为惊恐”。他想起当初在朝鲜大院君政变事件发生时，也曾有日本人出人宫禁，乘机取得种种权利条件，迫其国王捺押国宝，等到国乱平息而此纸已成铁案。这是他亲眼所见，不寒而栗。所以立即下令撤去禁卫军，换上他的拱卫亲军来守卫宫门，并制发特别门证，凡出入之人不持此证者，格杀勿论。于是宫禁出入始不见有日人踪迹。袁说，明知此举不免跋扈，之所以不辞恶名，毅然为之，是因为国家存亡所关，间不容发，实非得已也。[illegible]

1月27日，法国外长告诉法国驻伦敦、柏林、圣彼得堡、华盛顿各地大使：

迄今为止，六大列强至少分别地表现出了它们不介入的愿望。它们拒绝了对清皇朝的金钱上的任何支持，也拒绝了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任何承认。它们的态度只是在它们侨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才可能有所变化，而侨民的生命财产到目前为止一直受到帝国和共和党人细心的尊重。

法国明确表示了它保持中立的愿望，它表示愿等待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央政权和共和派临时政府的谈判结果，等待国民议会的协商。

英国的意见倾向于共和方面，在关于介入问题上，它不赞同日本政府的看法。日本对美国作了同样的试探，结果得到了与英国同样的回答。

德国以军火形式给了清政府以某种支持，它对清廷仍表示好感，但又在担心局势继续混乱下去对其贸易的影响。

俄国反对任何干涉。[illegible]

四、改用阳历

江西代表吴铁城记得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就职典礼是在夜里十时举行的，结束时，“各代表在半夜里由总统府步行回三牌楼旧咨议局，时适皓月当空，有沿途高歌者，心情兴奋”。[205]

陕西代表马凌甫记得更详细，“虽然忙到半夜，大家都是兴高采烈，精神欢畅。典礼的仪式简单而隆重。……但夜深人静，那里能找到交通工具，只有结队徒步而行。中途有人倡议说：‘我们今天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建成了民主共和国家。这样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喜事，不能不踊跃三百，热烈欢呼。’赵士北马上就在前边高喊口号，大家都跟着欢欣鼓舞地跳跃起来。边跳边喊，沿街居民多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人怀疑是散兵游勇滋扰，也有披着衣服从门缝中窥伺动静的。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当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们余兴未尽，作此有类儿戏的行动”。[206]

江苏代表袁希洛说：“这庄严的典礼以在夜间的原故，南京当时的摄影者未有镁光的设备，不能摄一照片，可惜得很。”[207]

当夜在场的将领耿翼翘说：“中山先生宣誓就职后用广东话演讲，我根本听不懂。仪式很快就结束了，灯很暗，也没照什么纪念的相片。”[208]

任鸿隽随孙中山到南京，出任临时总统府秘书，却未能亲历当晚一幕，因为疲倦而睡着了：

> 到南京天色已黑……和同来的几位朋友闲谈一阵之后，倒头便睡了，次日清早起来，才知道孙先生已在半夜里举行了就职典礼，改元改历，本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209]

为什么要匆匆在夜间举行就职典礼，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原因就是

要改历，必须赶在元旦这一天内。当时，耿翼翘他们“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草率，第二天才明白原来是赶在这天改元，用新历”。[210]

次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份给各省都督发出改历改元通电：

>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决议，由本总统颁行。

居正说，“孙中山建议用公历，一便于记忆，二进于世界大同，三预算年度，减少岁闰麻烦”。[211]

参议院通过改用阳历，议决四条：一、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编印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录存，但吉凶神宿，一律删除。[212]

1911年12月25日，澳洲华侨黄来旺给孙中山提的十条建议中，第一条就是，“如果中华共和国建立，我们应该承认上帝为我们的主。在所有共和国学校和机构中将他视作至上的统治者。还要采用西历”。[213]

这封信还没有送达孙中山手中就已改历。黄郛夫人沈亦云回忆：“改用阳历出于沪军都督府一个参谋沈虬斋［云翔］的临时动议……沈君见其时上海外侨准备过年，触机想到改用阳历，大总统在元旦就职，更加‘作始维新’的气象。以其意告之参谋长黄膺白［郛］，膺白即为陈都督英士起草电南京，这件改元大事就此匆匆而定。”[214]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只是简单地说：12月31日，全体代表到会。孙中山派黄兴与会，“议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元”。经议决第二天起改用阳历。[215]

其实，这个议案的通过也费了一番劲，因为有代表反对，孙中山因此迟迟未到南京。吴铁城回忆：

> 选出大总统后，推举王宠惠、汤尔和赴沪呈递当选证书。在送达证书与就职之间，代表来往筹商各事，颇有争议。其中颁订国历一事，总理主张改正朔，废旧历，行阳历，以新天下耳目。代表中

多有主张维持旧历者，几经辩论，总理坚持，否则不允就职，一时颇成僵局。最后以此在代表会议中讨论，始获通过；那天正是阳历1911年的除夕，讨论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并请即莅京就职。[226]

袁希洛也记得，孙中山当选总统后提出改用阳历案，有代表指出："孔子说，用夏之时。自汉武帝时起，中国即用夏历到现在，已二千年，不可轻改。"袁希洛反驳说："孔子是殷的子孙，他反对周历，当时不能主张用殷历，所以来一个用夏之时。我们始祖轩辕氏，以甲子年、甲子月朔的一天冬至为岁首，而现在世界所用阳历，以冬至后第十天为一月一日，是与轩辕氏所定以冬至为岁首接近，不同夏历正月初一，要后冬至四十五天。"经过辩论，最后决定改用阳历。[227]

1911年12月30日，湖北黄州，朱峙三日记说，"今日县署奉令筹备过新历（年），谓之阳历'中华民国元年'。宣统辛亥总算终了，满清气数二百六十八年已灭亡矣。"

第二天，县署诸人都去寒溪学堂，筹备扎彩过新年。"闻今日为阳历12月31号，即除夕，扎彩甚新丽。"[228]

此时，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还在为改历争论。

1912年1月3日，常熟徐兆玮的日记提到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日改用阳历，以是日为元旦，革命党的机关报《民立报》发表评论说，"[有人] 以为改历大事，不应如是轻率。然不以是改新日月，又何以振兴民气乎？见仁见智，各具一解，一二人之私臆，未可遽定是非也。"[229]

前一天，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致电内田："今日市中遍悬国旗，……革命军定于一月一日起改用阳历。"[230]

1月3日，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的夫人梅布尔从英国写信给孙中山："我们很高兴您的新纪元是我们的元旦。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231]

1月5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写信给朱尔典：

他们特别选定1月1日为总统的就职日，所以民国开始的日期

将同各国每年开始的日子相一致，为政府采用阳历提供一个正当的借口。这一改变虽然是可取的，但却与中国人的感情相冲突，因此一定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222]

1月1日，湖北朱峙三的日记就说："今日为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即西历1912年1月1号。饭后出城，见寒溪学堂贴有新联，彩旗飘扬是为新历元旦。路人观者叹息，谓随洋人过年，行洋礼矣。"[223]

其实，早在1872年创办的《申报》就已将阳历日期刊在每天的报头，很长一段时间，在学校、教会和一些外资企业，阳历、星期、钟点等记时方式都已在应用。阳历很快被许多人接受了，尤其读书人。当天，19岁的上海中学生陆澹安日记说：

临时政府大总统令，改用阳历，以今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故校中停课一日以志庆祝。……途中见沪军都督宣告改朔之告示多张。[224]

苏州中学生叶圣陶正准备上课，有同学告诉他已改用阳历。大家还不相信，打电话去问苏州军政府民政长，果然。"今天是元旦也，"他不无兴奋地写下，"今日为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记，亦于今日始改用阳历矣。"[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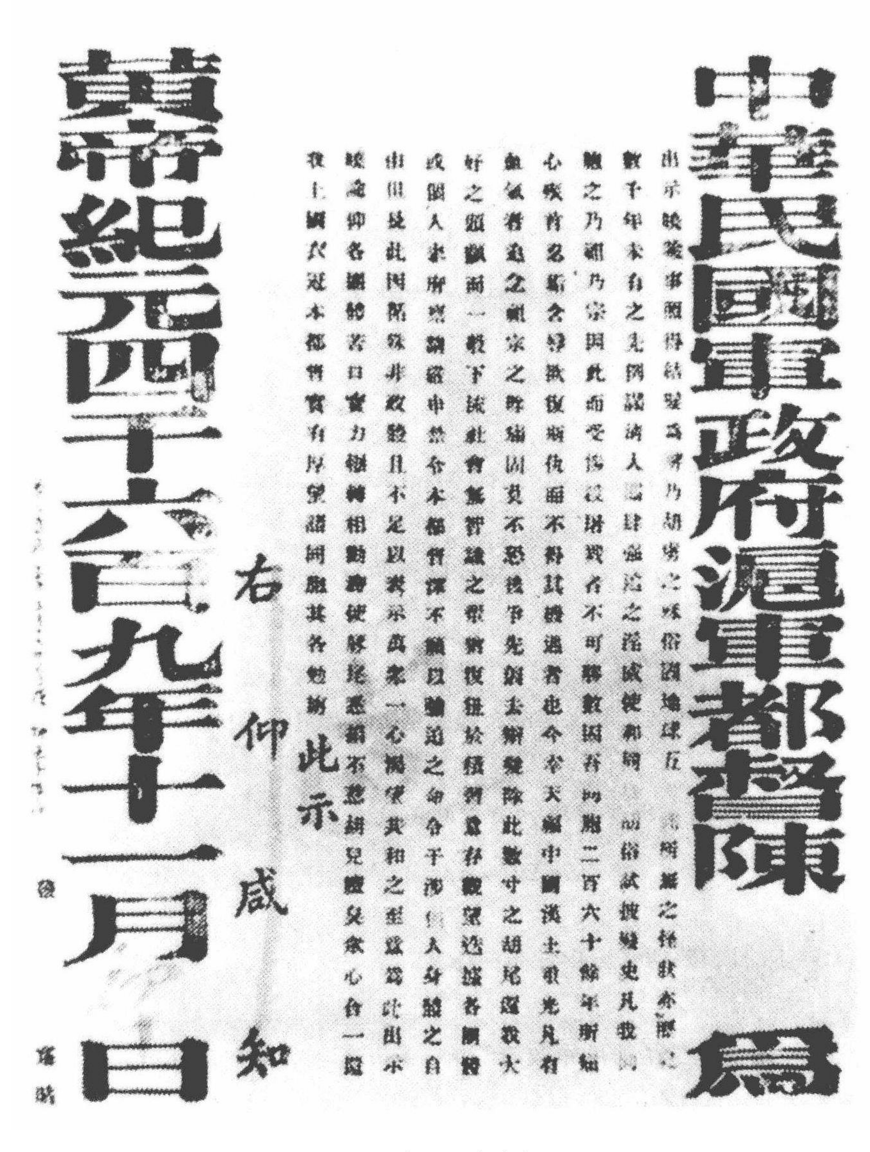
温州刘绍宽称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改用阳历，"以是日为元旦"，但他日记的书写没有马上采用阳历，直到7月1日才使用阳历，而仍附注旧历。[226]

张謇日记说："是日改用阳历，适元年正月一日。……

民国元年正月一日，以名义论既不用阴历，不当复言月，当云某号某日，以号代月。"

1月19日，他在故乡海门长乐镇的家庙行礼，写下一对春联："民时夏正月，国纪汉元年"。他儿子孝若说，上联就是指改用阳历。[227]

四千余载有谁言，黄帝无端溯纪元。民国告成仍改却，暂时重主旧中原。新岁齐刊月份牌，各家争赛画图佳。编年民国和黄帝，


中華民國軍政府滬軍都督陳 為

右仰咸知 此示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 日

有黄帝纪元的布告

竟有仍将宣统排。

——《海上光复竹枝词》

武昌起事以来，独立各地纷纷废弃宣统纪年，多数地方改用黄帝纪年。刘师培早在1903年就在《国民日日报》发表《黄帝纪年论》，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在日本都曾采用黄帝纪年。1911年10月10日后武昌出现的告示就用黄帝纪年。[18]

随后，以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也用黄帝年号，革去宣统年号。[19]

江汉关道齐耀珊投向革命军后，以江汉关名义在汉口出告示，力劝商民照常通用纸币，仅标明月、日，已废去“宣统三年”字样。[20]

10月12日，宗方小太郎在上海就听说：“叛徒使用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九年年号”。[21]

经历了长沙独立的瞿兑之在日记中说：“突闻城中衙署悬白旗，兵士以白缠臂，出示用黄帝纪元。”[22]

11月1日，南昌独立，吴介璋就都督职，“改纪元为四千六百〇九年”，就是以黄帝纪元。[23]

11月6日，郑孝胥在上海，“报纸皆除去大清宣统年号”。

李平书以上海民政长名义出的布告都是以黄帝纪元，11月8日他又出布告：

> 一、各地方所悬国旗，须与本民政府一式；一、即日起用黄帝纪元，不准再用“宣统”字样。[24]

11月18日，陕西张云山发布的檄文，署“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廿八日”。[25]

广州岭南学堂学生协助军政府筹饷，登记簿册使用的时间就是黄帝纪元。

景梅九回忆，《山西民报》已经标中华民国的年号。不过，山西大学堂的瑞典籍教师高本汉离开太原时，阎锡山以中华民国晋军分府正都督名义为他的护照签发的日期即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26]

四川彭县的学生目睹，“四川军政府”成立时，贴出的布告是用“黄帝纪元”四千几百几十几年，而不是“民国纪元”。[27]

成都吴虞的辛亥日记就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纪年，当他得知自这年十一月十三日起改用阳历，无动于衷，第二年仍以黄帝纪年。[238]

广东梅州少年黄药眠到晚年仍记得，革命党人进城后，城门口贴出的安民告示，“内容且不去说，就是后面写的年、月、日也与从前迥然不同了，不是‘宣统三年’，而是‘黄帝纪元四千×百×年’了。”[239]

11月9日，康有为给黎元洪、黄兴、汤化龙的信里主张：“去君主纪年而用黄帝纪年。”[240]

11月29日，梁启超自日本给清内阁电，也主张“用孔子或黄帝纪年”。[241]

张謇替黄兴担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保证书上署的时间就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一月。”[242]

也有的地方宣布独立后，以“大汉元年”纪年，但未见以“孔子”纪年的。徐宝山带兵到江苏兴化，11月19日开光复大会，出示安民，上书“大汉纪元元年”。[243]

四川忠县宣告独立，“临时军政府”的一切文告，都是署“大汉元年”等字样。[244]

11月26日，南京尚在激战，有人向张勋劝降，张勋提出四个条款，民军若能照行，才同意息兵议和，其中第一条即是“仍用阴历及宣统国号”。[245]

改用纪年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换。

维新元旦话今朝，初次新年尚寂寥。十五夜间重补祝，真称特别闹元宵。

提灯盛会到天明，沪上堪称不夜城。但见商团军士众，乡人祗说夜观兵。

——《海上光复竹枝词》

因为匆忙改历，未来得及庆祝，南京临时政府宣布1912年1月15日补祝新年元旦。

这一天，在常熟乡下的徐兆玮日记说：“今日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十五日，各处行补祝元旦之礼。吾乡亦令店铺挂灯，以寓庆祝之意。闻常熟有提灯会，甚盛。上海更铺张扬厉矣。”[246]

上海民立中学放假一天，商团、保安队、救火队、童子军的提灯会，首尾三四千人，队伍绵延数里，观者夹道呼万岁，西方人也脱帽欢呼。陆澹安感慨这是上海从来未有的盛典，他们学校的同学也参加了提灯会，当晚 12 点才回家。[57]

钦其宝在上海给盛宣怀写信，则完全是另一种心境：

> 今日系革元宵，并补元旦之缺，大马路一带均挂旗灯，各店停手一日。……所异者外国人亦封关一日。观热闹者不下万余人，俱兴高采烈。想本朝列祖列宗深仁厚泽，列朝所无，今人心如此大变，实不可解，不禁痛哭。[58]

在苏州，叶圣陶日记说，“以元宵补祝新元，故而停课”，当晚，他们列队提灯，“穿街过巷，观者塞途”，回到学校，“即于门前燃放花炮，观者如堵，爆发声之中杂以‘民国万岁’之欢呼声，乐不可支之狂笑声拍掌声，声声相应焉”。[59]

长沙凌盛仪的日记说：“新改阳历，今为 1 月 15 日。奉孙总统命，庆祝元宵，为补行阳历之纪念，并颁行各条。此后历书所载宜忌，一并删除，以破迷信，惟甲子节气仍开列之，以为农人占验……”[60]

几天后，伟晋颂在南京写信向朱尔典报告：

> 此地于本月 15 日正式庆祝新年。那天宣布为公定假日。为了庆祝这个日子，各街道用那些发给各户主的旗帜鲜艳地装饰起来。下午，总统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据我所知，民国官员都参加了该会，虽然外国人没有出席。公众一般都不注意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商店都继续营业；人民完全像平时一样进行他们的工作。

英国驻云南总领事额必廉的观察大致相同：

> 1 月 10 日，当局贴出一张告示，宣布采用西历，并规定 1 月 15

日开始施行。官方庆祝这个日子，但除了在每家大门口普遍悬挂五色旗之外，人们并不注意这个改变，生意照常进行。现在，人们为庆祝旧历新年正加紧准备，但已出告示禁止燃放鞭炮。[55]

赖债无人不厚颜，动云除夕月中还。今年恐亦难逃却，夜半犹存月一弯。新历收钱到号头，商人欲改乏良谋。倘然力矫从前俗，反说无钱任自由。帐单一纸去纷纷，月底仍然大小分。尚有一般常欠惯，不逢三节没分文。

——《海上光复竹枝词》

对整个社会来说，改历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

沪军都督府商务总长王一亭给孙中山来电，因改用阳历，商家多有不便，希望结账时期还是要按旧历年，尊重习惯，作为过渡。孙中山于1月3日复电：

中华民国纪元改用阳历，前经颁布。惟念各商业向例于阴历年终结账，设骤改章，恐有妨碍。祈即知照各处商会，通知商市仍以新纪元2月17日即旧历除夕作为结账之期。[56]

1月15日，长沙凌盛仪日记说："商界结算，向在阴历腊尽，此次仍如旧例，旧例年关一过，即遵新历计日。"[57]

2月13日，汉口日本领事馆的情报说："民军虽已改用阳历，然仅有官府改，一般商民仍沿用阴历。向例一到年末，市面迅速呈现活跃，热闹异常。本年则商人虽均作形式上之过年准备，但商业仍难活动。由于交通阻塞，对外埠贸易殆已停顿。汉水河口聚集之船舶不及往年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市面萧条之一斑。"

2月10日九江报告，"中华民国虽已改历，一般商业结账仍按阴历，民众积习亦一时难改，因此九江市面目下正忙于结账并作来年之准备"。[58]

2月17日，云南都督府军政部呈文给南京临时政府，一律遵用中华民国元年月日，以旧历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元年1月1日，"惟正朔既改，新旧



创立民国时的传单

接替之间，所有公私文书，及一切关于日期计算之事件，不能不规定标准”，凡公私文契、文约、各种合同、钱债结算并司法上的罪犯处罚，及一切关于日期结算的事件，在此之前所订，尚未完结的，一律按旧历推算。“新订一切契约、合同及一切关于日期计算之事件，均以新历为准。并已制成民国元年新历月日节候一览表，兼附旧历，以资对照。”[255]

到6月22日，苏州叶圣陶日记说“一切商家固犹适用阴历”，他的同学王伯祥因为欠债，端午节前经常早出晚归，到朋友家避债。[256]

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青年史迪威，在广州目睹一个制造于1325年的水钟水滴滴入一串容器而推动浮在水上的一根垂直指针报时，而且“还挺准”。[257]

然而，由时辰、昼夜、四时八节等构成的农耕时代的“中国时间”终究要过去，以小时、分、秒、星期构成的“世界时间”将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即使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不改历，这个趋势也挡不住，由“中国时间”转向“世界时间”，就是与世界接轨的重要环节。[258]

在此之前，北京的资政院在推动剪辫的同时，也在推动改历。

1月15日，长沙凌盛仪的日记说，因为南京临时政府改用阳历，“满清闻之，亦遂于本月十三日改为宣统四年一月一日，事事效颦，殊为无谓”。[259]

这个说法不确，资政院提出改历比孙中山更早。

1911年11月20日，离孙中山回国还有一个多月，资政院议员汪荣宝日记说：在议定剪发案之后，“次议改用阳历具奏案，决议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改为宣统四年元旦”。次日，“剪发、改历两案均已于本日具奏，然未有谕旨发表，闻尚须经内阁会议方可决定云”。[260]

恽毓鼎大为不满，“资政院建议改历 [从日本阳历]。当此分崩离析之秋，救亡不暇，忽为此大改革，惑民观听，愚氓误以为国家已亡，必生变动，是无故而搅扰之也”。[261]

11月30日，国务大臣会议讨论资政院剪发、改历两案时，许宝蘅就在旁边设席记事。12月7日，他说：“资政院前奏剪发、改历两案，今日降旨：……改历事着内阁妥速筹办。”[262]

同一天，恽毓鼎听说“议改用阳历”时，与10天前的反应不同，在日记中写了一句：“地球列国不同历者，唯中国、土耳其、俄罗斯。”[263]

第二天，汪荣宝也听说昨日有旨，“改用阳历，着内阁妥速筹办”。[64]

12 月 9 日，远在上海的郑孝胥得知，“资政院奏议决改用阳历，请旨颁布一折”，又奉旨“着内阁妥速筹办”。[65]

对于剪发、改历，当时就有反对的声音，12 月 2 日，掌湖南道监察御史欧家廉上折子弹劾资政院，奏请剪发改历被列为误国三罪之一。[66]

1912 年 1 月 1 日，郑孝胥日记说：“今日乃西历 1912 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67]

满清官员对于阳历并不陌生，当天，那桐日记称：“今日为西历正月一号”。荣庆日记也记着：“外国正月一号”。恽毓鼎这天午后到德国、意大利、荷兰各使馆及德国兵营、邮政总办帛黎、法博士铎尔孟等处拜年，并贺其夫人，因“西历以今日为正月一号”。[68]

1 月 19 号，翰林徐兆玮的日记自这一天起使用阳历，“今日改用新历纪年。闻宣统将行禅让，南北战争可以罢休，金融机关亦稍周转矣”。[69]

2 月 17 日，旧历壬子年前夕，袁世凯发布公告：

> 现在共和政体业已成立，自应改用阳历，以示大同。应自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 2 月 18 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

次日，那桐日记即说：“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70]

恽毓鼎日记从 2 月 19 日起虽仍用旧历，但注明新历月日，他解释“夹注新历，为对于外人酬应计也”。[71]

同一天，许宝蘅日记说，“知三十日总统布告，自初一日始改用阳历，称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余之日记，仍用旧历记事，以后当加记新历于下。”[72]

> 俗例难教一旦捐，依然旧历过新年。洋人亦解华人意，仍旧封关满四天。
>
> ——《海上光复竹枝词》

曹汝霖回忆，“民国肇兴，与民更始，以宣统四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宣布以后改用阳历。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值此民国第一元旦，自应万民欢腾，共庆共和，岂知今年元旦，竟寂静无声，只有店铺换了春联，民间爆竹无声。后才知因内政部令警察总厅，晓谕人民，从今年起改用阳历，家户店铺应换春联，旧历除夕元旦不许放鞭炮等云，人民误会，以为改了政体，不许再放鞭炮，故元旦寂静无声，不若往年之热闹也。嗣后政府又定阴历元旦为春节，于是过了新年，又过旧年，称阳历新年为官家新年，阴历新年为人民新年。但乡间仍不用阳历，数千年习惯，岂一旦所能改变，况农民适当收成之后，过年为一年一度快乐之时乎”。[23]

当年端午节，恽毓鼎日记说：“阳历虽改，居民之过年过节仍用旧历也。固由习惯难移，亦可见民国之轻于改制，碍难实行也。”[24]

旧历、新历并行不悖，吴宓为自己生日到底以阳历还是阴历来定而无所适从，1912 年 7 月 20 日日记中写道：

> 余之生辰为阴历七月二十日，自阳历采用，遇此等日期乃不能定其采择。将从阳历乎，则于今日犹未满十八年也；将从阴历乎，则芜杂而常无定期。呜呼，余之十九初度诗，亦可以不作矣。[25]

民间继续按照旧历生活，一是因为习惯，更是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业化程度很低，旧历的设置是与中国的农业文明息息相关的。直到 30 年代，沿街都还可以买到旧历的历书。[26]因为一般人尤其农民有这个需要。

曾任同盟会贵州支部长的平刚直到 1929 年 2 月 3 日才改用阳历记事，他在日记中说：“予十七年来之仍用阴历者，以国内伪行共和之故。”

那些不认同民国的遗老不认同阳历则更是一种政治姿态，1913 年 2 月 8 日，山西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写下：“自变乱以来，一切新党竞袭洋夷之皮毛，不但遵行外洋之政治，改阴历为阳历，即服色亦效洋式。”到 1914 年 1 月 1 日，他说：“今日为阳历 1 号，凡有叛逆之心者均于今日庆贺新年。”11 月 17 日，他还在说：

阳历阴历，月日纷歧，民间只记得旧历，而对于新历并不过问，以其时序之不符也。民不遵行新历，当道亦不迫胁；今改民国之年，而予称年号仍系“宣统”，以予系大清之人，非民国之人耳……[27]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前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于式枚的这副春联，“闻者绝倒。旧民心理，此足代表”。

改历与剪辫一样，成为南北最大的共识。袁世凯的幕僚王锡彤自述，等到南北统一，袁世凯下令改用阳历，“天下耳目一新。改玉改步，固新国之巨典也。于国家出入之款，省去闰月，稽核最便，银行、大公司便利亦多。……然阳历之行便利既多，且中华新国将与世界各大国相周旋，固不容独自立异也”。[28]

改用阳历，这是融入“世界时间”的一个新起点。在外交部任职的颜惠庆说：“办公时间也按照现代观念进行了调整。”[29]

五、民国襁褓

共和鼓吹厥功多，今日纷纷骂共和。甘把中华诸幻相，教人看破竟如何。

——《海上光复竹枝词》

1912年，美国传教士汤姆森写下这样一番话：

在最古老的君主专制国家建立共和政体，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它出现了。……这意味着世界上最骄傲、最独立的民族现在必须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和他们交流。这意味着绵延四千年的历史和骄

傲将随风而去，他们需要谦卑地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不再只有一个皇帝，四亿人每个人都是皇帝……[20]

“共和”成为一个时代最时尚的词汇。1911年11月14日，郑孝胥对孟森说：“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惟有以遗老终耳。”[21]

11月26日，有人告诉回到常熟的翰林徐兆玮，准备翻译《平民政治》一书，改名为《共和政治》。邓秋枚的《国粹学报》滞销，改出《共和杂志》，大畅销。他感叹：“今日惟‘共和’二字稍可卖几钱耳！”[22]

稍后，辜鸿铭写信给一位德国牧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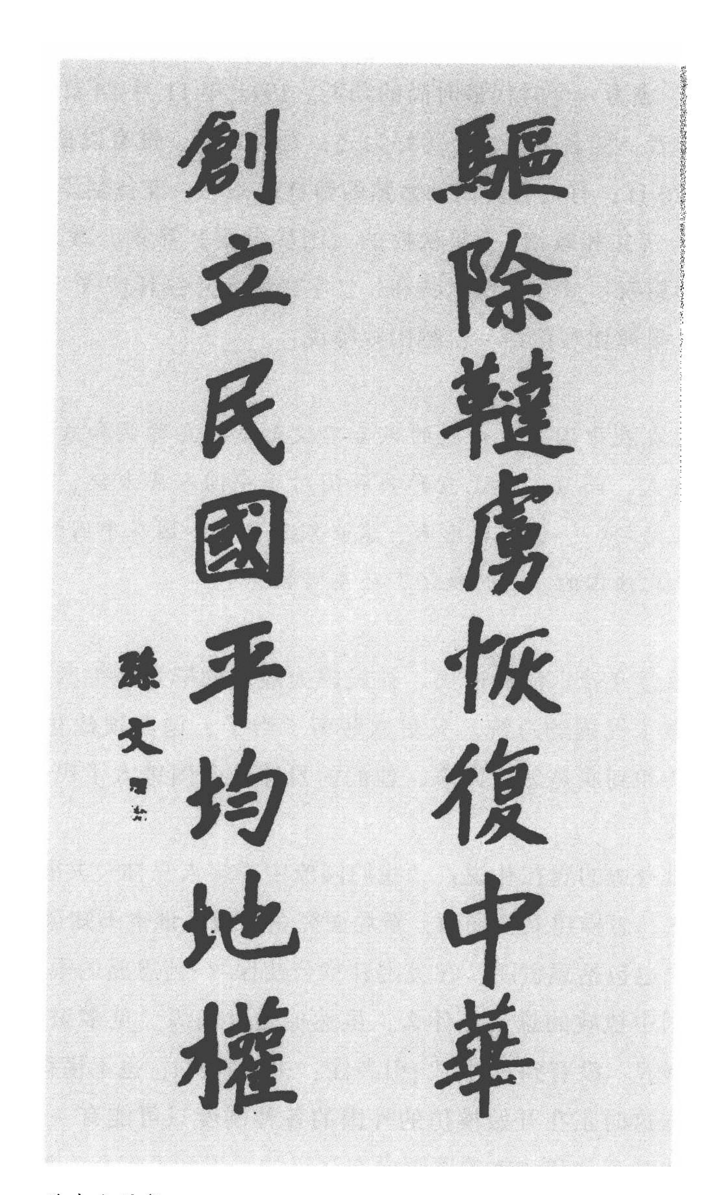
> 现在在中国，袁世凯的喉舌不仅无耻地宣称共和政体是最好的统治形式，而且实际上宣称共和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等于无神论的代名词……但在我看来，袁世凯及其共和国在中国的直接后果，甚至于比法国的“恐怖统治”还要可怕。[23]

真正愿意守着亡清做遗民、视民国为敌国的毕竟是少数人，“太保”徐世昌照样做了民国的总统。只是这些剪了辫子、抛弃顶戴花翎的前朝旧臣，并不清楚共和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的身体从帝国进入了民国，脑袋还在帝国时代打转。

袁世凯身边的唐在礼说：“我们同僚中很多人只知‘共和’，但是这个共和怎样共法，怎样建立新局面，新局面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24]

这当中也包括袁世凯，在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施的眼中，“他不解在一个共和国中执政的意义是什么，虽然他受过训练，见多识广，但他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没有到过外国 [引者注：去过朝鲜]，也不懂得外国语。因此，他对于中国这时正在开始模仿的外国的各种制度只可能有一个淡薄的、模糊的观念。他对于共和政体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他名义上是共和主义者，但内心却是专制君主。”[25]

鲁迅回忆说：“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1912年3月25日，甘肃都督赵维熙致电邮传部：“本日接受护篆，改



孙中山手书

悬国旗，万民欢呼，同申庆祝……”甘肃督练公所测绘科科员张昌荣亲耳听到，赵在宣布共和时说：“世受国恩，不敢忘先帝的德泽。”其后又说“宣布共和，乃周厉出奔，周召摄政”。[⑯]根本不知共和为何物。

革命党人、立宪派对民国、共和的认识同样一片模糊。

亲历武昌首义的工程营士兵吕中秋回忆，“营中张维、杨金龙约我效法桃园结义，宣传革命，1909、1910年时，我兄弟等常伙同外出至长春观、宝通寺、观音阁、正觉寺等各庙观求神问签，十分关怀革命前途”。[⑯]

黎元洪的儿子黎重光听他父亲谈起辛亥革命：“当时有一些兵士哪里知道革命的意义，他们还说请统领‘黄袍加身’。”[⑯]

革命参与者熟悉的只是桃园结义、求神问签、黄袍加身。“中华民国”这些新词，在他们口中，显得新奇而又有趣。在武昌参加学生军的朱春驹记得：

> 起义数日后，已挂出“中华民国”招牌。定武昌起义为“光复”，自然是指的从满人手中把明朝失掉的故物“光复”回来。这时，人人都把“光复”及“中华民国”六个新奇的字，在口中当豆嚼，随时随地都可应用。我们巡查走过旧藩台衙门，一堆还在冒烟的火场上，有许多起义的同胞，在那里支着铁釜，用楠木正梁当柴，烧煮“光复”来的火腿和猪肉，见我们走过，都喊：“同胞快来！中华民国，大家吃得。”……有时互相的拉东西用，口内也常说一声“中华民国，大家用得。”[⑯]

湖南独立，民政部所出的头一张布告，署衔为“中华国民军政府湖南民政部”。当时，“中华民国”四个字在人们脑子里还是相当的生疏。一般老百姓搞不清楚，并不奇怪，然而谭延闿也不懂得。民政部的秘书拟稿时本来写的是“中华民国”，谭延闿在画行时，用笔一勾，成了“中华国民”，交到总务司刻印，张贴全城。成邦杰发现后，对谭延闿说：“中华民国错成了‘中华国民’，太笑话！”他还不相信，文斐上街看了布告，告诉他，“民国”是对“帝国”而言，就是说把“帝国”反正过来，成立“民国”。他才知错了。随即借另一事，印一加大的布告，加贴在那张布告上。[⑯]

从根本而言，革命的推动力还是排满，共和只是排满的产物。武昌首义最初发布的文告都以排满为主题。1911 年 10 月 22 日，西安独立当天，发起者之一张伯英的日记说：

> 行至街中，向空放枪数百出。到处宣言曰：此举排满，与我汉人商民无干，尔等勿惊。识者门口备茶水，贴“兴汉灭旗”字样……[20]

在陕西风云一时的会党领袖张云山发布檄文号召“灭旗兴汉”，“灭了仇敌，夺回汉家江山，与先人争一口气。”[21]

10 月 23 日，留学英国的曹亚伯给吴稚晖写信说，“汉族山河，指日光复，不觉喜之欲狂也”。[22]

胡汉民自传说得很清楚：

> 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取得从来未有之名义而已。至于实质如何，都非所问。[23]

重庆独立后，但懋辛与黄子和相约游龙马潭，“二人对谈之下，都是幼稚的松劲的思想，以为清朝皇帝既已打垮，从此民主共和国告成，任何政党当权，必须是民主政治，不外富国强兵而已。我们既不懂政治，又不愿当职业军人，因而都想再出国求学，以为他日之用”。[24]

福州少年萨孟武记得：“辛亥革命后不久，我即问老师，中国何以尚不富强，此问虽然幼稚，然而由此亦可深知，当时的人，纵是小孩，也以‘富强’为第一目标。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一般人不甚注意。”[25]

更多的人，则连“富强”也没想过，所知不过光复而已。

在宣传革命时，光复旧物，容易使人明白。周建人回忆，绍兴的孙德卿，“他虽是乡下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但对于推翻满清政权这件事是热心的。他曾经拿明朝人的照片去分送给农民，我看到的一张是明太祖的像，约莫三寸来长，分明是从画像上照下来。他并且向农民说明，清朝的政府是外面侵入

的人组成的，我们应当把他们打出去。对于这主张，农民都赞成，愿意起来去打。《扬州十日记》之类的小册子，这时候也流行到民间”。[297]

鲁迅回忆，那时有些人专意收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翻印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有些人则改名为“扑满”、“打清”之类，“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11 月 4 日上海光复，中学生陆澹安到望平街，“购《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各一册而归”。[298]这些书大受欢迎不是偶然的。

嘉兴 16 岁的小姑娘沈性仁陪母亲坐船下乡，“讲说革命是拿回祖宗之物，不是造反，大家不要怕，而应该帮助，乡下人很起劲烧茶水请母亲和她喝”。[299]

乡下人对革命的另一理解就是招兵。青年瞿兑之从长沙到乡下避难，乡人见他们从城里来，纷纷围过来，探听城里消息，且问他们是不是城中的招兵委员。[300]

在吕思勉的家乡常州西门外，有一吴姓（或胡姓）老而无子，他的远祖于明亡时，留下明代衣服一袭，命子孙世世宝藏，光复时他穿上祭告祖先。“此人并一衣之而出，谓吾虽无子，眼见汉族光复而死，吾的祖宗，也可以无遗憾了。”[301]

各地以为光复就是如此，任鸿隽从日本回国，去武昌见黎元洪，发现军政府每一道门的士兵穿着打扮就像戏台上下来的。四川独立，“有的人说要复古，就穿着古装，头插绒花，像戏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招摇过市”。[302]

在湖北襄阳，张玉衡 12 月 2 日的日记写着：

> 沿途尽军人，如穿梭，有步者，有骑者，有以铁丝缠帛作鸡矩形缚额上，有以匹帛缠束腰间，着短绫袄、圆领而窄袖、领甚宽、白质而彩绣者，有骑大马、挂大刀、斜披匹帛，帛上缀五色绢贴大朵花者，有戴老金黄色金丝绒西人鸟打帽者，装饰不一样。[303]

以翻译西方小说广为人知的古文家林纾写信给吴畲芬：“弟早晚亦赴上海，以卖文卖画为生，度此余年。余则教吾数子，为共和国之国民足矣。”

民国出现了，然而如何在新生的民国做一个国民，却是个全新的问题。

翰林徐兆玮认为“国民程度如此，岂能高谈共和”，报界的鼓吹不过是梦呓。[90]

从湖南凌盛仪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革命的参与者迅速从热情转为失望。

12月19日，他认为满清不难覆灭，但袁世凯、孙中山之间将来南北分争，方兴未艾，尸山血海，不知了局何时。等推倒满清，大恨已消，他就披发入山，躬耕自足，不忍见汉人自相残杀。

12月24日，他再次提到，等小子溥仪去位，即当返乡为僧，隐居乡下，以山薯为食，以了余年。

1912年1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成立，“但中国普通程度，实万万不足共和”。过两天，他又说，“当此时代，人民程度如此，专制犹或泛滥，何问共和？予五年来创办女学，本欲为造就完全民国人民计，以今日无真革命程度也。今者，湖北首倡起义，我湘响应，各省风从，然问及一般人民，实无些许程度。人人思作帝王，其略具上等知识，亦希冀总统都督之想。……大局茫茫，谁能收拾？不才如我，有披发入山之想已”。[91]

1911年12月22日，留日学生黄尊三与同学闲谈：“中国要得真正共和之实现，须多得牺牲利禄、忠实为国为民之士。若口头讲共和，而衷心崇拜权势，共和虽成，亦有名而无实，虽然，事实共和，谈何容易，目前能作到名义共和，也算不差。”他从日本回来三个月，同样经历了兴奋到失望的过程：

> 1912年2月18日　满清虽可望推倒，而共和国家之前途暗礁尚多。革命尚未成功，人人眩于目前之安，不肯从根本打算，争权竞位，意气横天，国家利害反置之度外。倘根本不加革改，政治岂有光明之日，思至此，不竟感慨。
>
> 3月30日　回忆自九月民军起义，仓卒返国，至沪上，则见所谓志士者，莫不花天酒地，利海名场，终日昏昏，几忘国家大计、个人本分，不胜诧异。以为纵使革命成功，中国人心非从新改造，国亦必亡。居月余返湘，而湘人之意见冲突，权利竞争，较沪上为尤烈。

于是他决定继续去日本留学。[306]

胡适在美国收到二哥的家书：

吾国今已进为共和，表面上固可自豪，然实际则危险万状，较前尤甚，有识之士多抱悲观主义。倘常此纷扰，将使中国不亡于专制，而亡于共和，至可痛也！

此次革命，其初不过少数志士提倡鼓舞于海外，然以数月短少之时期，竟能收功于全国，实由心理之作用。盖二三年来，亲贵专横，暴政虐民，不堪其苦，故一闻革命二字无不欢迎鼓舞，以期其成。并非醉心共和，能知其义，信其真能利国，是其途辙，已与各国之革命大异，无巩固之根，则摇动亦自易易。……至新政府刻虽已具雏形，然一究其内容，……胸中只有"权利"二字，若国家则不知为何物。……

弟处海外，全不知真相，若使身处祖国，则其愤懑又不知如何！总而言之，今日上下全不知共和、民权、自由等字作何解说，具何界限，唯一味妄行而已。[307]

从帝制到共和，对于饱读旧书的叶昌炽来说，这变化实在太大，大得他无法看明白轨迹。1911 年 12 月 14 日，他在日记中说：

此次奇变为千古所未有，如怒龙挟疾雷而下，其势甚骤，蜿蜒而去，先一鳞，后一爪，不知何日天地始见清夷，守株以待既非计，乡居亦非乐土。[308]

1912 年 3 月 5 日，上海《时报》有一歌谣《新陈代谢》：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兴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剪发兴，辫子灭；……阳历兴，阴历灭；……

新旧交替，新陈代谢，民国要在一夜之间代替帝国，却远没有这么简单。

2月15日，何煜写信向徐世昌建议：

“共和之形式在政府，而精神仍在国民，此时局面仅以南北兵力相蹙而成，国民程度未足，仍难团结，必政府善为调协，斯专制可免复萌。”[309]

唐在礼回忆，退位诏书颁布第二天，北京城老百姓欢天喜地地拱手相告：“换了朝代了，这是共和的天下了，这样就用不着打仗了！”[310]

当天，朱尔典写信给格雷说：

> 北京对待谕旨的态度显然是冷淡的；人民没有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继续进行他们的日常工作。一位满族人到处询问：在新的制度下，他的津贴是否仍可领到。世界上这个最新的和最大的共和国的公民们迄今还不能够理解这件事，统治是可以没有皇帝的。今后将会表明，那个想法是否会消失或不久将重新表现出来。[311]

时在山东威海卫的英国人庄士敦说：“这个小小的地区里，居民们对于革命显然是缺乏热情的，在他们之中对于共和有一点概念的，可能不到五十人，他们也不想去了解共和。”

他在文章中写道：

> 现在很难证明，“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尽管皇帝的退位诏书中承认了这一点。也许这样说更接近实际情况一些，即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人对于共和是怎么回事并没有一点概念，也不知道共和的建立对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会有什么影响，所以，建立共和政体是有利或是不利，他们并没有强烈的主张。[312]

他的观察是准确的。

景梅九记得，当共和宣布，他回到山西运城，出了一张告白，以安人心。“百姓也不知什么是共和是民国；但听说不打仗了，真是喜欢到万分。”[313]

在四川彭县，有两个摆小摊子的，一个是卖甘蔗的老王，一个是补鞋的

戴皮匠，戴皮匠说话句句都离不了“问你哟”三字，这是他的口头禅。有一次戴皮匠和老王闲谈，戴说，“问你哟，改朝换国？你我穷人还不是穷人？问你哟。”老王没精打采地回答：“是呀，是呀！”

小南街一个姓王的大地主说：“改朝换国？总离不了我们粮户上粮纳税！”

穷人还是穷人，粮户还是粮户，彭县还是过去的彭县：

> 北街头绸绸缎缎，南街头黄糖挂面，东街头坛坛罐罐，西街头红豆稀饭。[114]

1911年11月20日，云南独立后，英国驻腾越代领事史密斯给格雷写信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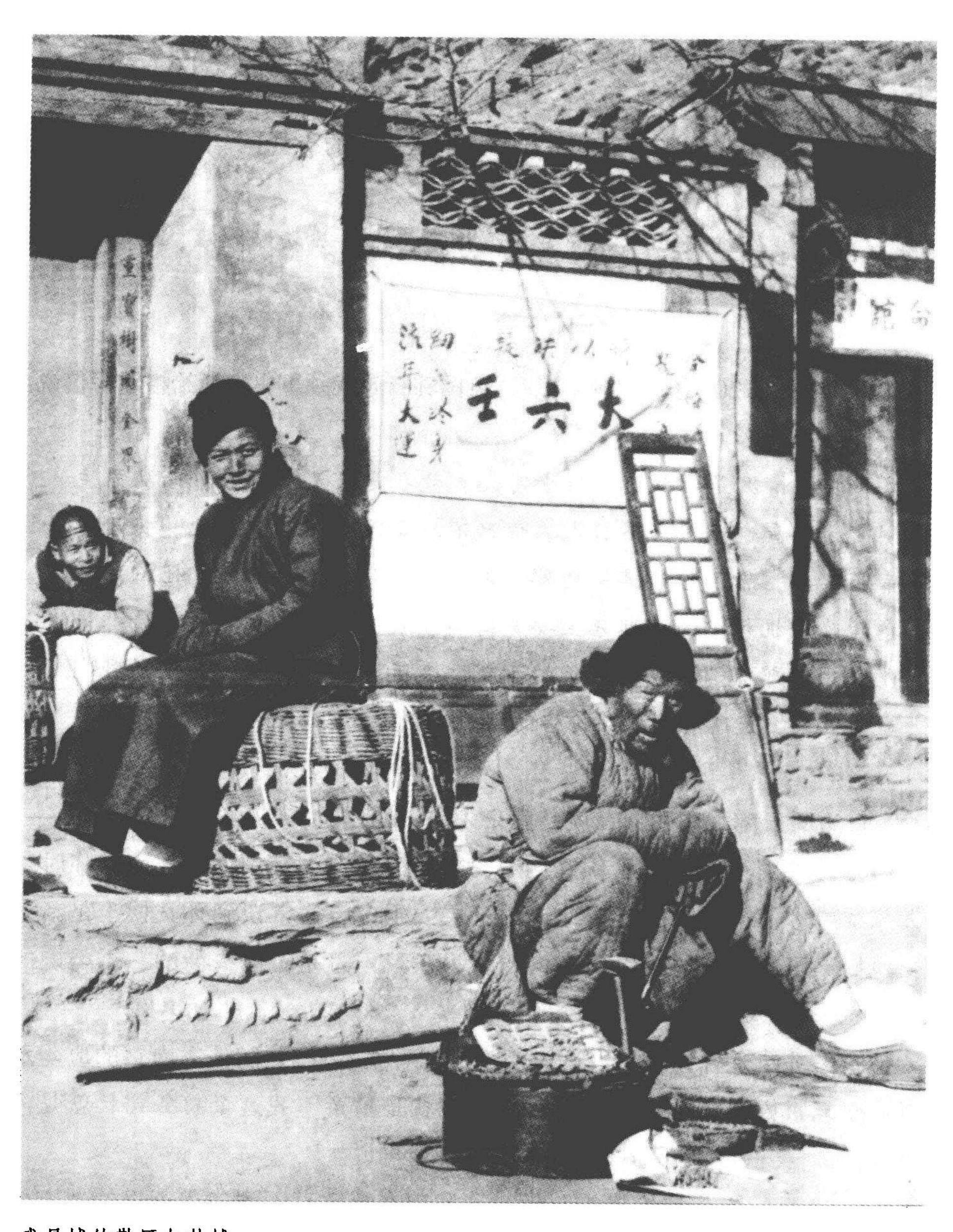
> 实际情况是：改变统治者对大多数人是毫无意义的，而从君主制变为共和制，对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改变统治者而已。关于皇帝和议会，除了作为名称之外，老百姓们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所熟悉的政府机构中的那部分主要是衙门差役，而已经发生的事情并未包含对该部门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最近事件将对他们产生的最明显的效果，是所有必需品价格的猛烈上涨。

不仅边陲云南人不明白，就是南京人也不明白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

1912年1月5日，伟晋颂在南京写信给朱尔典，孙中山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值得说明的是，此地的下层人士中，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只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115]

孙中山进南京就任时，沿途民众“排列香案恭迎”。随他进南京的应夔丞就对许多老百姓说：“你们知道吗，总统就是皇帝，我这个总务司长就是内务总管了。”吴铁城等人当面纠正他，不许他再说。[116]

4月12日，朱尔典给格雷写信：“我曾在离北京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碰见一些人，他们根本不知道民国的成立，而把袁世凯想成是新皇帝。袁氏听后笑了，并说，要让民国政体的观念灌注到民众的脑袋里，可能还需要一段



武昌城的鞋匠与卦摊

时间。我表示同意，并说中国似乎还要几年以共和为名义而实际由寡头政治来治理，但愿目前的少数独裁者能认清他们所负的重大责任，去致力改善农民的生活。”[317]

4月29日，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柏来乐在新疆到甘肃的旅行记中说：

> 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来说，将没有任何差别。至少在很长的时间内，它不会影响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苦力或车夫们的生活。……[318]

1911年11月23日，美国青年史迪威到达上海，在中国共停留了17天，这是他目睹的中国：“不管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普通人的生活跟过去一样仍在继续，也只能继续。”“他看到贫民窟里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到处倒满了垃圾，一个苦力为了三毛钱把一大堆行李从码头扛到宾馆，一个街头小贩一瓣一瓣地卖桔子，庙里有些穿着白色丧服的奔丧者，‘阔太太们排列在门口，在灯光下衣着华丽，披金带银，可是目光迟钝，无精打采’。”在广州，“他在迷宫般的用石头铺成的街道和弄堂里走，那里的中国人摩肩接踵，用大声嚷嚷、吆喝、铃声或者敲打木块来‘骂人，叫人避让或者叫卖自己的货物’。所有商品的买卖双方都在街上进行交易，过秤，讲价钱，妇女们围在篮子旁拣鸡骨头，一个裁缝在做衣服，一个男人往罐子里塞稻草，另一个在称鱼，还有一个在卖头发。他还提到了吸食鸦片的人，在帆船上养鸭子，歌女，坟墓，在门廊烧香，一些闲人一边聊天一边在衣服的缝隙里捉虱子，捉到后放到嘴里咬。用稻草孵小鸡，当铺，笼子里养的云雀，猪和母鸡的叫声，尿味以及公厕的味道，所谓公厕无非是‘一排排蹲坑，人蹲在一根木棍上，有些地方小孩当街大便’。中国是个对比鲜明地方，一方面中国像在搪瓷上的用翠鸟羽毛制作的精致饰画，由剪成淡蓝和紫红色的碎片粘贴而成，另一方面则是‘水坑，泥巴，污垢，垃圾，破布，还时不时隐隐呈现那神秘的内部’。”[319]

新的民国就诞生在这样一片土地上。

华北通州教会的报告说，“中国人根本尚未可担当大任”，“中国基督徒无

领袖，在通州基督教区，欲以透过民主形式的实习培养一个领导人才，但人们不愿受管辖，虽经外国人的再三告诫，仍然未能达到可以自立负责的程度”。[120]

这些外国人的观察和感受是真实的。

1912年6月13日，李提摩太从上海寄写信给谢缵泰说：“破坏只是做了一半工作。困难得多的任务却是建设，这正好与上帝的意志和世界上重要人物的崇高思想相吻合。”[121]

最重要的建设莫过于提高国民程度。1911年12月26日，叶圣陶在《民国报》第二期读到《研究共和政府论》，“至博大而名理精微，自是最完全之学说。读之多有所进益也”。[122]

报纸上讨论共和政体的文章随处可见，小学教科书也引入了共和观念。国民程度不够，那么就从培养新一代国民开始。失望的凌盛仪虽然在日记中一再表示要退隐乡下，但他还是想教五六岁的蒙童，将他们培养成纯粹的民国国民，“以为他日建设完全共和的人物”。他说自己过去办女学着手，就是从根本入手，“虽迂缓而实切要耳”。[123]

1912年1月24日，伟晋颂在南京写信给朱尔典：

> 教育总长已经宣布，今后各初等学堂将采取混合制，即对男女儿童一律开放，中国人认为这是一项很激进的改革。进入这些学堂的儿童年龄为十一岁至十六岁。他进一步宣布，所有颂扬满清王朝的词句应从学堂课本中删去。[124]

蒋维乔应蔡元培之邀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即拟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14条，凡各种教科书，务令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清学部颁行之各种教科书，一律禁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并避讳抬头字样，应由各该书局，自行修改；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等等。[125]在钱塘高等小学堂读书的蒋复璁记得，“学校改用新式教科书，并加入了课外活动，我们曾举行游艺大会，我被分派到演讲‘共和政治’，因为中华书局小学教科书三年级国文课本第一课就是共和政治。”[126]

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第一课是《国体与

政体》，第二课是《民国成立始末》，第二十三课《共和政体》说：

> 考共和国之原则，全国人民，俱有与闻政事之权利，惟国中事业至繁，不能人尽与政，故必选举议员，以组织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议员与总统，既由国民选举，委托以全国之政权。

在这些课本中，孩子们可以呼吸到民国的崭新气息，一切都已开始，如果这个进程不被打断的话。

【注释】：

①《一个县城学生看到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卷，第 386 页。

②《湖南反正追记》，第 18 页。

③《蔡元培书信集》上册，第 114 页。

④《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336 页。

⑤《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785 页。

⑥《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289–290 页。

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 357 页。

⑧《辛亥革命》八，第 77 页。

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998 页。

⑩《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280、282–283 页。

⑪《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300、296 页。

⑫《口述历史》第一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9 年，第 84–85 页。

⑬ 王尔敏编：《康有为手书真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 年，第 20 页。

⑭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676、691–692 页。

⑮《辛亥革命》八，第 144 页。

⑯ 万小南译、张富强校《革命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第 152 页。

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 357–358 页。

⑱《湘绮楼日记》，第 3140–3141 页。

⑲《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第 150–151 页。

⑳ 转引《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 234 页。

㉑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267–268页。参考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第209页。

㉒《郑孝胥日记》三，第1373页。

㉓《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4页。

㉔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102、103页。

㉕《叶圣陶集》第19卷，第43页。

㉖《郑孝胥日记》三，第1355页。

㉗《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第151页。

㉘《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49页。

㉙《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58页。

㉚《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815页。

㉛《陈英士先生文集》，第98页。

㉜《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261页。

㉝《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45–46页。

㉞《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82页。

㉟《郑孝胥日记》三，第1358页。

㊱《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编，第370页。

㊲《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308页。

㊳《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36、43页。

㊴《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288页。

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360页。

㊶《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0、376页。

㊷《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261页。

㊸《湖南反正追记》，第253页。

㊹《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2年，转引《清帝逊位与列强》，第280、496页。

㊺《清室退位前密商美使馆收容溥仪的策划》，《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431页。

㊻《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0–561页。

㊼《汪荣宝日记》，第1060页。

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6页。

㊾《汪荣宝日记》，第1117页。

㊿ 许珏《上陈伯潜侍郎辛亥十二月》，《复庵遗集》，转引《民国乃敌国也》，第211页。

51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4页。

52《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2页。

㊼《孙中山藏档选编》，第 189 页。

㊽《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268、269 页。

㊾《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369 页。

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357 页。

57《汪荣宝日记》，第 1053 页。

58《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304–305 页。

59《辛亥革命》八，第 76、77 页。

60 [日] 内田顾一《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3 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186 页。

61《时报》1911 年 12 月 19 日。

62《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427 页。

63 黄远生：《远生遗著》，上海书店 1990 年影印，第 134 页。

64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292 页。

65《辛亥革命》八，第 77、78 页。

66《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84 页。

67《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302、310–311、331 页。

68《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 354 页。

69《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7 页。

70《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 354、357 页。

71《缘督庐日记钞》，第 245 页。

72《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8 页。

73《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428 页。

74《郑孝胥日记》三，第 1382 页。

75《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第 115 页。

76《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 191 页。

77《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47 页。

78《辛亥革命》八，第 77、78 页。

79 黄尊三《留学、归国日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 261 页。

80《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16、835、845 页。

81《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607 页。

82《抑斋自述》，第 172、173 页。

83 转引《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第 111–112 页。

84《郑孝胥日记》三，第 1387 页。

㉟《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41页。
㊱《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796页。
㊲《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63页。
㊳《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111页。
㊴《孙中山藏档选编》，第120页。
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825、826页。
⑪《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402页。
⑫《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280页。
⑬《缘督庐日记钞》，第248-249页。
⑭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300页。
⑮《我的前半生》，第28页。
⑯《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344页。
⑰《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7页。
⑱《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38页。
⑲《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407、408页。
⑳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307页。
⑪《汪荣宝日记》，第1128页。
⑫ 凤冈及门弟子谨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16页。
⑬《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509-510页。
⑭《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5页。
⑮ 周钟岳辑：《天南电光集》，《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09-110页。
⑯《叶圣陶集》第19卷，第91页。
⑰《陶庐老人随年录》，《近代稗海》第十二辑，第401页。
⑱《张竞生文集》下卷，第362页。
⑲ 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101-102、98页。
⑪《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越风》半月刊第二十期，1936年10月，第4页。
⑪《近代稗海》第一辑，第617页。
⑫《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863、870页。
⑬《孙中山藏档选编》，第122、124页。
⑭《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344-345页。
⑮《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121、117-118页。
⑯《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9页。
⑰《党人三督传》，第62页。

⑱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 155 页。

⑲《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663 页。

⑳《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93 页。

㉑《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663 页。

㉒《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94 页。

㉓《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664 页。

㉔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 155 页。

㉕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总 53 号，第 80、81 页。

㉖ 李健青口述：《辛亥上海光复前后（座谈会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15 页。

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261–262 页。

㉘《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 356 页。

㉙《汪荣宝日记》，第 1119、1122、1139、1140–1143 页。

㉚《辛亥革命》八，第 242 页。

㉛《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465 页。

㉜ [英] 庄士敦著，淡泊、思齐译：《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 1991 年，第 9–10 页。

㉝《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 121 页。

㉞《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40 页。

㉟《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28 页。

㊱《溥仪小朝廷逸事》，第 5 页。《汪荣宝日记》，第 1128 页。

㊲《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85 页，《绍英日记》，第 264–267 页。

㊳《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35 页。

㊴《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 213 页。

㊵《越风》第 20 期，第 4 页。

㊶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309 页。

㊷《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 120 页。《越风》第 20 期，第 4 页。

㊸《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338 页。

㊹《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第 209 页。

㊺《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3 期，第 172–173 页。

㊻《我的前半生》，第 30 页。

㊼《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3 期，第 173 页。

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326–327 页。

⑭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 77、78 页。
⑮⓪《陶庐老人随年录》，《近代稗海》第十二辑，第 401 页。
⑮①《辛亥革命史料》，第 293 页。
⑮②《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 140–141 页。
⑮③《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 370 页。
⑮④《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43 页。
⑮⑤ 黄仲垲（逸民）《辛壬闻见录》，《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 36 页。
⑮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80–81 页。
⑮⑦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53 号，第 82 页。
⑮⑧《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94 页。
⑮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335–341 页。
⑯⓪《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76 页。
⑯①《越风》第 20 期，第 4 页。
⑯②《汪荣宝日记》，第 1143 页。
⑯③《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465 页。
⑯④ 转引《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 182 页。
⑯⑤《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101 页。
⑯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430 页。
⑯⑦《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87 页。
⑯⑧《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410 页。
⑯⑨《黄兴集》，第 256 页。
⑰⓪《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6 页。
⑰① 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十年经过记》，转引《徐世昌评传》，第 175 页。
⑰②《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 77 页。
⑰③《绍英日记》，第 282 页。
⑰④《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103 页。
⑰⑤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181、188 页。《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631–632 页。
⑰⑥《我的前半生》，第 61、62 页。
⑰⑦ 徐道邻编述：《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第 4 页。
⑰⑧《许宝蘅日记》第二册，第 434 页。
⑰⑨《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101 页。
⑱⓪《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95 页。

⑱《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17 页。

⑱《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09、226、226 页。

⑱《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第 569、570 页。

⑱《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 28 页。

⑱ 转引胡素萍《李佳白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50 页。

⑱《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3 期，第 173 页。

⑱《郑孝胥日记》三，第 1366 页。

⑱ [英]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338 页。

⑱ 转引罗冠宗主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第 187 页。

⑲《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 14 页。

⑲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转引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第 135、136 页。

⑲《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304、306、307、301 页。

⑲ 转引王纲领《辛亥革命时期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3 年，第 339 页。

⑲《辛亥革命》八，第 439 页。

⑲《五十年来国事丛谈》，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1922 年印，第 4 页。

⑲《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312 页。

⑲《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17 页。

⑲《辛亥革命》八，第 432、433、429 页。

⑲《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336 页。

⑳ 转引《清帝逊位与列强》，第 299 页。

⑳《汪荣宝日记》，第 1057 页。

⑳ 转引《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三辑，第 42 页。

⑳ 黄仲垲（逸民）《辛壬闻见录》，《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 42 页。

⑳《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49 页。

⑳《吴铁城回忆录》，第 37 页。

⑳《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 65 页。

⑳《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289 页。

⑳《耿翼翘先生访问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5 年，第 12 页。

⑳《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 422 页。

㉑⓪《耿翼翘先生访问记录》，第 12 页。

㉑①《居正文集》上册，第 82 页。

㉑②《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19 页。

㉑③《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 167 页。

㉑④《亦云回忆》，第 53 页。

㉑⑤《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253 页。

㉑⑥《吴铁城回忆录》，第 36 页。

㉑⑦《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287—288 页。

㉑⑧《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十二辑，第 267 页。

㉑⑨《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83 页。

㉒⓪《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197 页。

㉒①《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 91 页。

㉒②《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450 页。

㉒③《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十二辑，第 267 页。

㉒④《澹安日记》上册，第 51 页。

㉒⑤《叶圣陶集》第十九卷，第 75 页。

㉒⑥《厚庄日记》1912 年电子版，未刊。

㉒⑦《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662、663 页。

㉒⑧《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五辑，第 192 页。

㉒⑨ 黎元洪民国初年主持编辑《武汉战纪》[初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三辑，第 133 页。

㉓⓪《辛亥革命》五，第 202 页。

㉓①《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 26 页。

㉓② 瞿兑之：《长沙城内》，《越风》第二十期，1936 年 10 月，第 57 页。

㉓③《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331 页。

㉓④《郑孝胥日记》三，第 1355 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488 页。

㉓⑤《近代史资料》总 45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86 页。

㉓⑥ 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第 87 页。

㉓⑦《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卷，第 383 页。

㉓⑧《吴虞日记》，第 16、22 页。

㉓⑨《黄药眠口述自传》，第 9 页，原文将“四千×百×年”误记为“二千×百×年”。

㉔⓪《康有为手书真迹》，第 13 页。

㉔①《辛亥革命》八，第 144 页。

㉟《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71页。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第66页。
陈德甫《忠县辛亥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194页。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531页。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84页。
《澹安日记》上册，第55页。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321页。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321页。
《湖南反正追记》，第259页。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455、509页。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2页。
《湖南反正追记》，第259-260页。
《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625页。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9页。
《叶圣陶集》第19卷，第117页。
[美]巴巴拉.W.塔奇曼著，万里新译：《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43-160页。
《湖南反正追记》，第260页。
《汪荣宝日记》，第1059、1060页。
《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1页。
《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80、382页。
《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3页。
《汪荣宝日记》，第1077页。
《郑孝胥日记》三，第1368页。
《辛亥革命》五，第502页。
《郑孝胥日记》三，第1376-1377页。
《那桐日记》第706页；《荣庆日记》第201页；《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7页。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84页。
《那桐日记》，第709页。张勋复辟时他又改用阴历。
《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78页。
《许宝蘅日记》第二册，第397页。

㉗③《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第 100—101 页。

㉗④《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96 页。

㉗⑤《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249 页。

㉗⑥《郑孝胥日记》四，第 2268 页，参考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第 96 页。

㉗⑦《平刚日记选辑》，《贵州文史丛刊》1982 年第 3 期，第 150 页。《退想斋日记》，第 175、190、199 页。

㉗⑧《抑斋自述》，第 183 页。

㉗⑨《颜惠庆自传》，第 101 页。

㉘⓪《北洋之始》，第 1 页。

㉘①《郑孝胥日记》，第 1356 页。

㉘②《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79 页。

㉘③ 收入 1912 年 4 月再版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第 293 页。

㉘④ 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第 100 页。

㉘⑤ [美] 保罗·S·芮恩施著，李抱宏等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 12–13、9 页。

㉘⑥《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221 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544 页。

㉘⑦《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第 66–67 页。

㉘⑧《回忆我父黎元洪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302–303 页。

㉘⑨ 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 1983 年，第 175 页。

㉙⓪ 阎幼甫《辛亥湖南光复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 124–125 页。

㉙①《张伯英日记零稿》，《历史档案》1983 年第 4 期，第 42 页。

㉙②《近代史资料》总第 45 号，第 85 页。

㉙③ 转引陈哲三《辛亥武昌起义后欧美党人的活动》，《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七编，第 1422 页。

㉙④《党人三督传》，第 61–62 页

㉙⑤《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 36 页。

㉙⑥ 萨孟武：《学生时代》，第 41–42 页。

㉙⑦ 周建人《略谈关于鲁迅的事情》，转引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295 页。

㉙⑧《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221 页。《澹安日记》上册，第 42 页。

㉙⑨《亦云回忆》，第 24 页。

㉀《越风》第20期，第58页。

㉁ 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69页。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15页。《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页。

㉃《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号，第12页。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82页。

㉅《湖南反正追记》，第253、254–255、258、259页。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262、265、268页。

㉇《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21–222页。

㉈《缘督庐日记钞》，第241页。

㉉《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1912–1916），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㉊《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00页。

㉋《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465页。

㉌《紫禁城的黄昏》，第11页。

㉍ 景梅九《罪案》，《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126页。

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385页。

㉏《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231、450页。

㉐《吴铁城回忆录》，第36–37页。

㉑《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241页。

㉒《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583页。

㉓《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第27–28、41、43页。

㉔ 转引《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第343页。

㉕《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184页。

㉖《叶圣陶集》第19卷，第71页。

㉗《湖南反正追记》，第255、258页。

㉘《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458页。

㉙《辛亥革命》八，第59页。

㉚《蒋复璁口述回忆录》，第25页。

后 记

一百年离我们很远，又很近。说很远，辛亥革命的亲历者都已不在人世；说很近，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影子里，当时的选择一直影响着百年来的进程，历史的每个环节都是无法分开的，一环扣着另一环。不明白历史，不仅难以理解今天的真实处境，也无法清晰地看到明天的去向。

2005年出版的《主角与配角》，我从角色意识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变动，意犹未尽，当时就有围绕辛亥革命再写一本书的念头。这些年来一直留意收集有关史料，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并无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手头积累的这些史料，有些是二十几年前的，有些是十几年前的，更多的是最近六七年、尤其是这三年集中搜罗的，书中各篇的主题都是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我不想复述人们在各种读物中早已熟知的辛亥革命，试图发现一个更接近当时历史原貌的辛亥革命，但这难度实在太大，大得有点不自量力。好在亲历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的人们留下了大量的私人记录，或日记、或书信、或口述、或回忆录，若没有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我的这本书。动笔之前，我只打算写一本十几万字、最多二十来万字的书，没想到最后变成了四十多万字，只好分上、下两册出版，这超出了我原先的设想，完全是根据掌握的史料和读史产生的感受自然形成的结果。我只想把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更完整、更真实地呈现出来，将我这些年的读史所得与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朋友一同分享。

从人心思变、谣言四起、逃难人流、金融恐慌到报馆鼓吹、剪辫易帜，从朝廷内外，封疆大吏与王公大臣们对这场革命的反应，从南北财政的困境到民国的创立，许多细节散落在大量的私人记录当中，我们以往或知之不详，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知。我试图以较大的篇幅将这些细节做一次梳理和整合，我小小的企图就是重建辛亥革命的叙事，将它从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中解放出来，以更多元、更开放的视角重新加以审视，我甚至不想在叙事中加上我的观点，叙事本身的丰富性是任何观点都无法代替的，在这些叙事当中，不同的读者自会看见历史的一个个真相，做出不同的判断。我始终认为，事实胜于任何的理论（这样说，当然不是说不要理论，或理论不重要），但在基本事实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现之前，轻易做出的结论往往是站不住的。重构史实，在多数时候要比表达观点更重要。这是我读史多年的一点小小感悟。

基于对史实的尊重，每一篇的后面几乎都有层层叠叠的注解，感谢东方出版社的编辑容忍了我的做法。可能有些读者会对那么多注解感到头痛，没有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不看注解，只看正文。这些注解标明每一条史料的来源，历史正是由点点滴滴的史料构成的，每一条注解的背后都站着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历史进程。上世纪 80 年代包括我本人在内对宏大叙事的激动，到今天回到一个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不仅一代人、几代人乃至整个民族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也是自我重建的过程，这是个人和民族经过千锤百炼、遭遇无数困厄之后逐渐悟出来的。在史实面前，我们可以看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看见历史的限度、每个历史人物的限度，从而更清楚地看到创造历史的艰难。读史阅世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局限，环境的局限，但人在任何环境下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依然可以超越自己的时代，展开思想乃至行动的翅膀，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等到变化突然来临的时候，你才会蓦然发现，原来一切早已在人心深处悄悄萌芽。这正是历史的奇妙之处。那些漫长的日子，无比寂寞的时光，将因此而变得趣味盎然。诚实地面对历史，就是诚实地面对自己。我常常这样想。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许多朋友提供了无数珍贵的帮助，这些友情都已融汇在这本

书当中。为了寻找新军士兵陈文斌的《生平记》，武汉的王启涛兄几次去武昌起义纪念馆，几经周折，替我手抄了需要的部分。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王秀宁兄多次替我寻找、复印史料，包括托他在香港的同学帮忙。杭州的夏雨清兄多年前送我一批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年谱，还帮我复印了沈亦云的《亦云回忆》。我还要感谢温州的卢礼阳兄、沈迦兄，武汉的田彤、康志刚、阳继波诸兄，上海的陈正卿兄、庞荣棣老师，台湾的李延贺、潘光哲、蔡登山、陈正茂诸兄，香港的董炯明兄，天津的李新宇兄、朵渔兄，福州的林冠珍大姐，南京的陈远焕兄、范泓兄，绍兴的蔡朝阳兄……他们或帮我找书，或帮我复印史料，直到本书终于画上句号，几年来我一次次地想起他们的帮助，唯有在这里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和儿子，她们陪我走过了每一个坐冷板凳的日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全家都归入了基督，感谢神，让我们从此拥有了确定的生活、真实的盼望。我想起朋友说的一句话，历史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我深信，人生的背后同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2011年6月14日杭州家中

8月2日修改